

单位代码	10445
学 号	2012306005
分 类 号	J90
研究生类别	全日制硕士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专 业 学 位)

论 文 题 目

《铁道游击队》谱系研究

学科专业名称

广播电视

申请人姓名

赵忠诚

指导教师

李茂民 教授

杨永军 主任编辑

论文提交时间

2015年4月13日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魏忠斌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学校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魏忠斌

导师签字：李 岑 民

签字日期：2015年4月13日

签字日期：2015年4月13日

目 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绪论.....	1
一、研究源起.....	1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4
三、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	18
第一章 在作家自觉与响应主流之间：《铁道游击队》小说的萌生.....	20
第一节 作家的知识积累.....	20
第二节 作家的生活阅历.....	22
第三节 作家的军事准备.....	24
第四节 作家的写作训练.....	26
第五节 作家故事讲述能力.....	27
第六节 作家创作动机产生.....	29
一、投桃报李的动机.....	29
二、自我实现的动机.....	32
三、响应主流的动机.....	37
第二章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铁道游击队》文本表达.....	41
第一节 历史资料的矛盾.....	42
一、“政委出山”史料质疑.....	42
二、“任命书”史料的质疑.....	42
三、“部队情况”的史料质疑.....	43
四、“一打洋行”的史料质疑.....	44
五、“小屯整训”的史料质疑.....	46
六、“飞车搞枪”的史料质疑.....	47
七、“二打洋行”的史料质疑.....	47
八、“智打票车”的史料质疑.....	50
九、“巧截布车”的史料质疑.....	53
十、“巧打岗村”的史料质疑.....	56
十一、“日军受降”的史料质疑.....	57

十二、“护送刘少奇过铁路”的史料质疑.....	61
第二节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互化.....	64
一、作家坚守“实有其人”的真实理念.....	67
二、作家选择“确有其事”的纪实手法.....	67
三、作家采用“事可失实”的创作手法.....	68
第三章 在各个小说版本的罅隙之间：《铁道游击队》小说流变.....	70
第一节 小说文本流变.....	70
第二节 《解放军文艺》杂志对小说的修正.....	74
一、对文字标点的修改.....	74
二、部分修改质量下滑.....	76
三、美化我军丑化敌人.....	77
四、《解放军文艺》编辑对小说的影响.....	77
第三节 小说各版本正文本间的流变.....	78
一、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处理.....	78
二、对正面人物的美化处理.....	79
三、对反面人物的漫画处理.....	79
四、对胡服过路的滤化处理.....	80
五、对亲情爱情的洁化处理.....	81
第四节 《铁道游击队》小说副文本研究.....	83
一、《铁道游击队》引言研究.....	83
二、《铁道游击队》内容提要研究.....	86
三、《铁道游击队》小说地图研究.....	88
四、《铁道游击队》小说封面研究.....	89
第四章 1956 版《铁道游击队》电影研究.....	93
第一节 影视剧文本流变.....	93
第二节 1956 版《铁道游击队》电影创作背景.....	96
第三节 从小说到 1956 版《铁道游击队》电影.....	98
一、凸显游击队之铁道特色.....	99
二、增加英雄救美人的情节.....	100
三、删除芳林嫂刘洪爱情戏.....	101

第四节 1956 版电影：游走于主流规训和爱情书写之间.....	102
第五章 198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研究.....	106
第一节 198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创作背景.....	106
第二节 198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艺术之变.....	108
一、增加支持儿子抗日革命母亲形象.....	108
二、建构爱情滋养中成长的新女性.....	108
三、凸显了反战厌战日本民众形象.....	109
第三节 1985 版电视剧：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故事再书写.....	110
第六章 《飞虎队》电影研究.....	113
第一节 《飞虎队》电影创作背景.....	113
第二节 《飞虎队》电影艺术之变.....	115
一、故事讲述方式变化.....	115
二、整体风格变化.....	116
三、政治性的弱化.....	117
四、中间人物复杂性.....	117
五、故事结局反常性.....	118
第三节 《飞虎队》：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主旋律创作.....	119
第七章 200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研究.....	121
第一节 200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创作背景.....	121
第二节 200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艺术之变.....	123
一、场面动作化打斗化.....	123
二、彰显人物的成长性.....	124
三、凸显战争中的爱情.....	125
四、增加国共合作情节.....	126
第三节 200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红色经典”改编的精品之作.....	127
第八章 《铁道游击队——战后篇》电视剧研究.....	131
第一节 《铁道游击队——战后篇》电视剧创作背景.....	131
第二节 《铁道游击队——战后篇》电视剧艺术之变.....	133
一、反思问题人物.....	133
二、丰富爱情故事.....	134

三、漫画敌军狡诈.....	135
第三节 《铁道游击队——战后篇》电视剧：经典改编的狗尾续貂.....	136
第九章 女性性别想象：《铁道游击队》谱系作品女性形象分析.....	138
第一节 原型：鲁南妇女的群像.....	138
第二节 芳林嫂：巾帼不必让须眉.....	140
第三节 “铁姑娘：女性性征缺失.....	141
第四节 灰姑娘：男性拯救的对象.....	143
第五节 孟姜女：闺房幽怨盼君归.....	144
第六节 “潘”之“花”：女“祸水”于女战神.....	146
第七节 亚努斯：于连般红黑人生.....	149
结语.....	153
注释.....	156
参考文献.....	178
附录一 《铁道游击队》家族谱系.....	185
附录二 《铁道游击队》小说研究史料.....	186
附录三 《铁道游击队》小说各版本印数情况.....	189
附录四 《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出版和印刷情况.....	190
附录五 《铁道游击队》史实、解密类电视节目.....	191
附录六 上海文艺出版社“收获创作丛书”书目.....	192
附录七 山东卫视《铁道游击队》电视解密文字实录.....	193
附录八 1956 版、1985 版《铁道游击队》作家简介.....	195
附录九 济南“皇宫”照相馆的前世今生.....	200
附录十 莫让经典成绝唱.....	20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203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204
致谢.....	205

《铁道游击队》谱系研究

摘要

当下进入消费时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传统观念、民族精神受到青年一代怀疑。研究《铁道游击队》的谱系就是为了凝聚目光，融铸真正的文艺经典，扩大作品在当下的影响，促进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红色精神接受与传播，使作品中的红色基因能够一代代发扬和传承下去。（绪论）

作家知侠自小无意为《铁道游击队》创作进行各种准备，一旦创作时机允许，在创作动机的诱导下作家发愤著书。每一个人都为完成一件伟大事业而生，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在点滴时间淬炼中获得了艺术生命的长青。（第一章）

《铁道游击队》小说是知侠根据自己多次采访的素材，借鉴传统小说的结构模式写就的。当事者口述资料的细节矛盾为知侠的创作提供了书写空间。他选取实有其原型的人物和确实发生过的事件，在写作时，他采用了“事件可失实”的创作方式。老队员后来讲述铁道队的故事时，他们不自觉地借鉴小说的情节，艺术和历史在双向流动呈现相互借鉴之势。（第二章）

小说创作出来后，文本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个体，由于作者文学素养的提升和政治风向的不断转变，小说进行了多次大的修改。除了正文本的变化，副文本也有自己的艺术特点和时代印记。小说共形成了七个版本，这些版本成为了铁道游击队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三章）

小说《铁道游击队》在一个甲子的时光流转中被改编成五版影视剧，较之原作发生了“剧”大的变化，有时代的原因、主流的原因、大众的原因也有市场的原因。（第四章至第八章）小说和影视剧中的妇女的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们在不同作品中形象的变迁，建构起铁道游击队女性形象谱系，女人撑起半边天。（第九章）

从抽象的小说到具象的影视剧，《铁道游击队》们仍然能“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支撑我们的党和人民由一个胜利迎接下一个胜利。但这些作品还远不够，因为铁道游击队系列作品还很多（比如连环画、京剧、舞剧以及正在拍摄的三个影视剧）将留到下一步进行研究。（结语）

【关键词】铁道游击队；谱系；文化基因；红色精神

【分类号】J90

"Railway guerrillas" genealogy research

Abstract

Mammonism and hedonism are prevailing in the age of consumption, result in the query of ethos in youth. The pedigree research of *Railway Guerrilla* aims to remodel classics, thus, gain more attention, and promote better accepta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continuous "Red Spirit", then inheritance the gen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Introduction)

Zhixia accomplished the work at the motivation of reciprocation, Self-actualization and in response to the mainstream after full preparation since young. Zhixia made the *Railway Guerrilla* immortal, just as every author dedicates to his career. (Chapter One)

Railway Guerrilla is based on the material of interviews did by the author, and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novel pattern. The disparities told by the participants inspired Zhixia. The author picked the true persons and events when he made up the story, while the participants referred to the novel when they told the story. And that's the merge of art and history. (Chapter Two)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author's literacy and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wind, the novel, both main text and minor text, changed along. There are 7 novel editions altogether, and they are indispensable part of *Railway Guerrilla* pedigree. (Chapter Three)

The reasons of times, mainstream, public and market led to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adapt of films and TV plays in the past 60 years. (from Chapter Four to Chapter Eight) Female images were changed in the novel as well as on the screen, therefore, constructed their own pedigree. (Chapter Nine)

Railway Guerrilla, both novels and images, are effective in leading people, shaping people and inspiring people, and they contribute to the victory of our Party and people continually. These works are far from satisfying, for there are other forms, like comics, peking opera, ballet and so on. What's more, there are 3 films and TV plays are not completed yet, as my research is still on the way. (Conclusion)

【Keywords】 Railway guerrillas, pedigree, Cultural gene, The red spirit

【Category】 J90

绪论

一、研究源起

在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们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为叙述对象,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如“三红一创”^[1]、“青山保林”^[2]、“三火三花”^[3]等。它们经过作者本人或他人在以后的各个时期基于种种原因反复修改加工生成了不同的小说和影视剧作品,这些作品鼓舞精神催人奋进,传递着正向的价值能量。作为这些优秀作品中的一员,《铁道游击队》也不例外,文本问世60年来,滋养了几代人。《铁道游击队》就其文学的价值而言可能还没有达到上面这些作品的水平,在时光的流逝中,在读者和观众的接受中,大众的呼声持久不断,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小说修改出现的版本,以及小说改编成的文艺样式(电视剧、京剧、舞剧、评书等等)都是其他任何十七年的作品都无法企及的。对于这样有着生命力的小说及其衍生文本,本论文拟将《铁道游击队》作为个案,利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文本之中驾驭文本之上跳出文本之外,分析《铁道游击队》各个时期的作品(主要分析小说和影视剧),寻找作品的文本变化,探求作品的流变规律,建构起文本的谱系,厘清各个文本与前一文本的关系,以及各个文本与当时文化语境的关系。试图发现小说的整个文本谱系对当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和意义。基于这些问题出发,就要寻找《铁道游击队》产生了哪些文本,这些文本之间有何关系,以及文本与文本如何统一构成一个系统,不同的文化语境对文本的生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本的变化对当下有何现实意义,这都是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论文试图回答上述的问题,并探寻出在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商品文化下的角力过程中文本演变的成因。

1. 为什么研究《铁道游击队》

当下进入消费时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外来文化浸淫,言必哈日哈韩,传统观念、民族精神受到青年一代怀疑。荧屏一片“高碳文化”乱象,国人读书“色变”,^[4]一些负向价值观严重影响着当代文化的建构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稳定。电视荧屏,节目“秀”此起彼伏,综艺栏目无底线娱乐节目无下限,志在满足观众窥视欲,赢取高的收视率,赚取高额广告收入,提供给观众林林总总的精神快餐。些许电影电视剧也乐于与真善美绝缘,在那里传统的价值观念被消解被稀释,铜臭味世俗气弥加浓重。传统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如《铁道游击队》等,虽然还有栖身之地,但与上面的节目相比变得身份尴尬无所适从,仅有的一些观众也被满天飞的无敌抗日“神剧”所诱惑。战

争在“抗战神剧”中变成了一厢情愿的想象奇观，变成了中国奇侠壮士战则必胜的演武场，变成了“手撕鬼子”“手榴弹打高空飞机”的神话乐园。鬼子们个个是呆子、傻子、“色狼”和“缺脑子”，我军个个是神武英明伤而不死的不朽肉身。这些导演编剧和投资人想打着革命之名实现获利之实。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5]。革命不是那样的温柔和谦恭，革命是流血是牺牲。革命也不是喜乐的童话，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不能因为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失去民族气质和中国气派。传统革命历史情怀对于当下仍然有着珍贵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抗日题材“神剧”悄然卸下了宣传教育的“包袱”，变为纯然的娱乐品。神剧“自我解放”的足够“彻底”，连基本的公共理性也置之不顾，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在“神剧”中已被空洞化和游戏化，变作掩护暴力刺激的一张虎皮，真可算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如果真的像某些神剧所宣扬的那样，我们还需要几十年数万万人的牺牲才换来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吗？我们迫切需要具有正能量的作品。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重读经典并且研究《铁道游击队》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这同样也是笔者研究《铁道游击队》的原因。

2. 为什么要进行《铁道游击队》谱系研究

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自1954年出版后，在政治规训下，进行了多次修订。产生了1955版、1959版、1965版、1977版和1978版等多个版本。同时小说还被翻译成英文、俄文、日文等10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迄今为止，《铁道游击队》小说畅销达400多万册。^[6]后来小说还被改编、续编或新编成近十部的影视作品。比如1956年的电影，1985年的12集连续剧，1995年的电影《飞虎队》，2005年的35集电视剧，2011年的36集电视剧，这些作品广受观众的喜爱，即叫好又叫座，获得了不错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更加可喜的是小说《铁道游击队》已经作为固定词条被收录进2009版的《辞海》中，这更彰显了作品的价值和经典魅力。^[7]然而当下学者们要么是研究某一时段的作品，要么是研究某一类型的作品，大多孤零零地考究作品本身，没有能从家族谱系维度进行人文关怀，因此就《铁道游击队》作品而言也往往会忽视上述问题。基于这种学术的视角考虑，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维度进行研究：为什么《铁道游击队》有如此多的改编版本，改编版本和初文本有着什么区别，这些版本出现的背后缘由是什么，《铁道游击队》出现那么多影视剧作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出现的时代背景是什么，这些作品产

生了怎样的艺术价值和意义，以及这些版本对于当下现实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血脉传承基因传递中一以贯之的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将作品置入一个系统中进行整体考察，从宏观的视角来分析和考量以建构起属于铁道游击队作品的家族谱系。

“研究文学谱系就是为了凝聚目光，融铸真正的文学经典，扩大文学在当下的影响，促进中国文学经典在中外读者中的接受与传播。”^[8]然后从微观的视角来探究内在的基因密码，提取出他内在的滋养中华儿女的营养的成分。这些营养的物资也即是精髓的东西在以后的文化传递中则是一条根脉，是续写改编的灵魂。研究铁道游击队的谱系同时还能间接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发展脉络图景，即精英文化、意识形态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如何相互冲突互相融合。尤其是在当下，消费文化当仁不让地占据大众日常生活主流，大家每天都在这种文化的包围之中，其他三者仿佛是消费文化的小跟班，主流文化如何春风化雨亲润百姓的心田，精英学者的讲坛将安放在何处才能被大众所接受，大众文化如何在通俗中抵制“庸俗、媚俗”，在欢快中抵制过度的“透”和“露”。

1949年至1978年，意识形态主导文化占据主流的位置，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遭到抑制，“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的思想情感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因此所有的作家竭尽全力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为政治服务。1978年后随着毛思想影响式微，邓小平提出了新的艺术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探索不断取得进展，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一道形成了二元文化格局。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者，经历了政治左右文学的高压时期，他们极力地用一种去政治化的口号彰显文学的人道主义美学品格，同时他们从寻根、改革等角度为中国开方问药。在这样的形式下所创作的作品自然会被百姓所接受，与革命有关的文学在这时处境有点尴尬，当然也不免有一些对这些作品念念不忘的人，比如1985年《铁道游击队》连续剧的创作者们。创作环境相对自由，自然大量作品会涌现，只是革命题材的作品有可能被挤压得没有了位置。1990年以降大众文化经过了数度波澜和坎坷，在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合力作用下，终于登上了当代文化的前台，成为了独立一脉，呈现为三足鼎立或“三方会谈”的格局。同时商业文化还在引诱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这四个方面呈现了互相角力互相妥协的势态，并且一起随时代发展而前进。1995年的《飞虎队》是在后现代的热潮席卷中国的背景下，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相结合，以当时香港的武侠的惯用手法来创作的，还被界定为“主旋律”电影。2005版《铁道游击队》是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风口上拍摄的。作品以缅怀为主题，在最大程度上对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进行重现的基础上彰显爱国主义的情怀，也显

示出作品对主流的尊敬，对历史的遵照，导演以一种严谨的正统的视角对作品进行了改编。2011版电视剧是建立在对“铁道游击队”品牌继续消费的基础上，情节大胆虚构，情感大肆滥觞，即可以看作是一部“戏说剧”，也是一出“狗尾续貂”剧。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1. 理论专著研究现状

《铁道游击队》作为十七年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可以从十七年文学重读的角度分析。先前出现了不少卓有成绩的专著：如程光炜的《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杨厚均的《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其中下面三本书尤为重要。

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采取的是“再解读”的方式。他“选择文本再解读而不是‘文学生产’之类的概念进入‘50—70年代中国文学’，是因为担心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放置在‘生产’这一框架中加以理解，仅仅关注文学制度对文学的组织和规约的过程，可能会忽略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情感、梦想、迷狂、乌托邦乃至集体无意识的力量，而这些元素并非总可以通过制度的规约加以说明。”^[9]李杨质疑对了“文学生产”“一体化”这样的解读方式，采取了“再解读”的方式，“他关注的不是“历史”如何控制和生产“文本”的过程，而是“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过程”^[10]。可是，这种解读方式将文本和时代分割开来，文本与生产的语境产生了割裂，就不能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从而不能充分展现文本是怎样从历史语境中生成的。

《“灰阑”中的叙述》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作者黄子平对一系列十七年的作家作品进行解读，他认为“当代文学正典的建立，是人们把握现实和历史并试图将这种把握制度化的一种努力。正典的调整或重建，亦显示了意识形态、文化机制、阅读群体等之间的错杂互动。”^[11]黄子平“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作者对革命历史语境、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书中处处充满真知灼见”^[12]。然而，他对文本的解读还不够详细，因而没有将文本与历史恰当地结合。而且他用散点透视的方法从多个作家多部作品中解读小说叙事，也不能更好地发现

一部作品在各个时代的不同面目、不同命运遭际。

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也是从“解构”这一角度去分析“十七年文学”的。在对纯粹感性阅读与静观式理性阅读两种阅读方法提出质疑之后，他说，“面对十七年文学，我们愿意进行第三种阅读，即‘解构式的阅读’”，^[13]他用“现代性”、“日常生活”、“物质话语”作为回到历史现场，发现文学内部张力或文本破碎的工具，“发现‘十七年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化表情实在是十分的丰富。”^[14]

总之，他们的研究一般来说将解构式阅读、重读，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立场，这种方法深入到文本的内部进行细读，从而发现了许多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总体而言，通过“再解读”研究，学者们力图呈现出所谓的“一体化”时期的各种文学力量和文学形态之间的关系，呈现这一时期文学的多层次内容，以及这些有差异的文学内容或冲突或融合的编码过程，从而暴露看起来很“光滑”、“铁板一块”的文本中蕴涵的缝隙和矛盾。同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一般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解读，文本生产与生产语境产生了分离，就不能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从而不能充分展现文本是怎样从历史语境中生成的，历史是如何影响生产的。这些是文章中论述不够的地方。这些专著揭示文本内部的叙事系统与意义系统所存在的裂隙与冲突，从而重新阐释这一特定时代的文本，应该说，对于推动“十七年”文学研究是非常有积极的意义。

还有几本经典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对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分析也有新见解。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他的研究在处理这些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理论批评的时候，本书的着重点不是将作品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作出臧否，而是首先设法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书中的第八章主要以革命历史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对《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革命传奇体小说则从文学创作的源流关系上，分析这些作品与古典文学的遗传与变异。“具有民间意识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一类的作品并不是边缘性的作品，无论就其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就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而言，这些作品都是不折不扣的主流作品。”^[15]还有同时期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他对铁道游击队的研究有了新的维度。该教程认为《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都是“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来表现战争的成功之作”^[16]，尤其是《铁道游击队》和《林海雪原》“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17]从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利用方面分析《铁道游击队》，分析了作品内部的“政委—草莽英雄”、“英雄—美人”等模式、

“敌军我军”等二元对立模式。这些研究具有独创性,给新世纪以来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18]对于研究《铁道游击队》有着一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这些作品虽然关注的多是某一个方面而忽略了谱系维度,但对本文的研究仍然提供了借鉴的思路。

如果想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的话,有一篇研究文章不可不看。《新时期以来的“革命历史小说”研究述评(1978——2008)》。该论文对1978—2008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从总体研究、重要作家作品研究、史料整理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把30年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重建与恢复(1978—1990)、延续与开拓(1991—1999)和繁荣与深化(2000—2008)阶段。并对当下的研究提出了对策和展望。我们在平时能够读到的经典文章和书籍在本篇文章中都有研究和定位,是一篇有深度和高度的文章。

2. 学界新锐研究现状

学术界也有新锐的专著和博士论文出现。比如李茂民先生的专著《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和马立新先生的博士论文《红色理性与革命战争文学》。《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一书中,作者把研究的范围集中在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包含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的问题,提出了从事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历史题材文化价值观中的文化价值观,作者意在表达这样的一个研究进路:要想建构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可以通过历史题材电视剧作品的分析,理清其背后的价值观;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叙事与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关系;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发展方向。作者提出历史题材电视剧应当自觉地把建构当代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追求,既要体现文化价值,也要有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为当代电视剧创作提供指导。作者从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入手,利用文化诗学的方法对历史题材电视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指出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三方会谈”的文化格局。^[19]博士论文《红色理性与革命战争文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建国十七年时期的革命战争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生产传播规律,在此基础上对制约文学创作的理性因素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红色理性以其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双重品格及其表现影响革命战争文学。^[20]

3. 作品谱系研究现状

现在也出现了几篇关于作品谱系的专著和文章。它们针对某个作品以及作品的谱系进行研究。比较有分量的有这样几篇:

孙士生的《小说〈红嫂〉及其跨媒介传播研究》^[21],该论文是针对1961年知侠的小说《红嫂》进行的研究,小说《红嫂》先后被改编成京剧《红嫂》、芭蕾舞剧《沂蒙颂》、

电影《红嫂》、电影《沂蒙六姐妹》和电视连续剧《沂蒙》等以“红嫂”为元素文本，这一论题的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当下性意义。孙士生本着三个意图进行自己的研究：其一是尽可能理清小说《红嫂》真实的传播轨迹，系统探求其形成、改编和流传的原因，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二是回到历史和文学的现场，深入文本内部，研究分析其情节、人物塑造和特定时期读者接受心理的契合效应；其三是运用大量的史料，从文学的真实性和人性的丰富性出发，对“红嫂精神”的当代传播价值作出判断。阐释不同媒介的传播形式是如何实现政治话语向文学话语的审美转换，剖析其五十年来持续赢得观众的深层原因及其传播价值。从文学价值、精神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三个维度展开。重点对“红嫂精神”“沂蒙精神”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进行诠释，通过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以实现“红嫂”传播价值的全面把握。

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22]，当年写作该文章时，善于做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围绕着《红岩》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回到历史现场，呈现出丰富的历史细节，是把“红色经典”做成文化研究的成功之作。此书给人的启发是，“红色经典”在其经典化建构中同时动用了两种经典化的生成方式，所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能风靡一时。但由于其文学价值不足，阐释空间有限，从而使后来的文学研究陷入到某种窘境之中。由于“红色经典”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工业机器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产品，所以对这种产品进行文化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而借助于民族志、接受研究和厚描等文化研究方法，往往能形成新的问题意识，进而发现文学研究中被忽略被遮蔽的方面。因此，对“红色经典”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做文化研究，应该是摆脱目前文学研究困境的路径之一。以至于学者赵勇说“他的论文出来以后，可能一些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就有点下不来台，因为他们使用的一些史料是错的。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也注意到了他的论文，由此可见他的博士论文是真的下了功夫的，真的做得不错。”^[23]

周春霞的《解读红色经典——〈春青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24]。周春霞下了很大的功夫，专门去采访杨沫的儿子老鬼，后来取得了老鬼的信任，老鬼把杨沫的日记全部交给了周春霞。她结合自己所收集到的一手的资料，对《春青之歌》小说连续剧的生产过程出版发行进行了重新的梳理，计入了很多细节的历史的资料使得文章有理有据，她认为“红色经典生产过程中多种因素的互动与交锋”也就是说在“主流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市场和大众的交融的多因素”的互动和交锋中得以生产和流转的，同时她认为多种因素的矛盾和冲突还应归结为各种文学观念之间的碰撞和交锋。

姚丹的博士论文《“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25]。她在这篇论文中专门考察不同艺术门类对同一题材进行改编后的变化表现及原因,并由此探讨这种变化与时代思潮和艺术门类自身特性及拟想读者(观众)期待之间的关系。姚丹通过考证发现在《林海雪原》的传播、改编过程中,作品的个性越来越稀薄,人物身上的“杂质”越来越“净化”,群体对之改造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越来越强化。这些文章都为笔者提供了一个个参照的窗口,他们的文章无疑会给笔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4. 铁道游击队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CNKI)中键入关键词“铁道游击队”,发现从1955年开始截至2015年4月1日,共有2462条相关文献信息。这些文献涵盖41个学科,其中与本论文有关的学科有7个,即为中国文学有601篇,戏剧电视和电影有432篇,人物传记有190篇,中国近代史有151篇,文化有73篇,文艺评论有33篇,世界文学有16篇。(如图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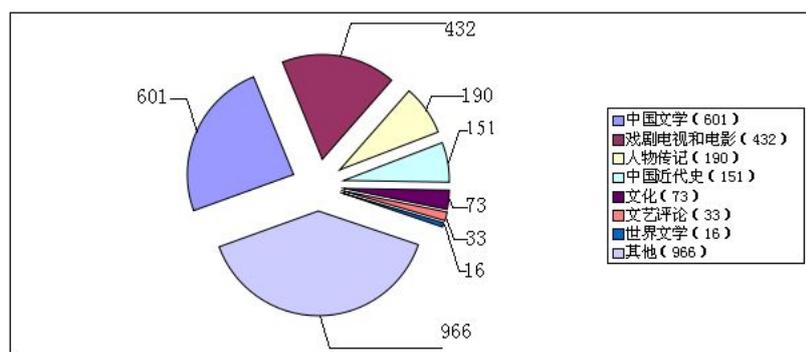


图 0-1 中国知网 (CNKI) “铁道游击队” 检索情况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不妨可以把这些论文分为3个阶段:1954—1979年为第一阶段,1980—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1至今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4—1979年,也就是从小说出版到文革结束的将近30年的时间。在这个阶段的《铁道游击队》作品可以概括为1部小说和1部电影(1956年电影)。对于小说的评介文章还是比较多的,通过梳理比较有名气大概有40多篇,详见附录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这样几篇:《评介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在文中指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妻子,那种豪爽风度和忠厚义气,甚至那种大碗吃酒的豪放性格,都是作者所熟悉的,是作品写来显露了一些可爱的生活实感,也富有某些传奇色彩,失于人物的塑造不突出,故事情节的线索也显得不够清楚。^[26]

南波的《<铁道游击队>读后》^[27],作者评价到:这小说流露着真情实感,故事性强,故事中的人物们一般都有自己的性格,作者既积蓄了如许丰富的斗争生活经历和体会,

又写得那样自然朴素，没有令人感到卖弄笔墨、矫揉造作之处。同时他指出惊险的情节也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有现实生活作依据的。同时他还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之处：人物方面的缺陷。比如李正的性格没有写出来，他只是在关键的时刻发表演讲，平时却不见了踪影。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没有写好真是一大遗憾。同时他还指出人物的性格没有看到变化和发展。不如鲁汉林忠等人的性格有变化，可是变化不大。在情节上，看不到游击队在做群众的工作，没有发动好群众”，从语言上文字还不够洗练，比如每个人在气愤和激动时的语言都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李正不正常，说的都是官话。还有朱三，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了他前后十几年的事情，有些喧宾夺主了。

叶朗认为：“《铁道游击队》所描写的生活内容“新鲜别致”，他的“惊险的战斗，吸引着读者，受到读者的欢迎。”^[28]吕哲认为：“作品吸引读者，是因为他的故事虽然是传奇的，但也是真实的，说到缺点主要是人物太简单化。比方说在写芳林嫂时“美丽的大眼睛从头用到尾，跟老洪谈恋爱时用的是美丽的大眼睛，被鬼子关到监狱里也是美丽的大眼睛”，梅妮也是美丽的大眼睛，小坡也是美丽的大眼睛。这样就造成了任务性格的刻画不够突出而平面化。”^[29]上述这些文章基本上能够对铁道游击队小说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此后他人的评价基本不出其右。

侯金镜在《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中提到了小说《铁道游击队》，文章对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描写新英雄人物的作品当中，有一部分虽然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但是因为他们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新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有只是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生活的面貌（《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等），他们的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30]

1956 版电影上映以后，作为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其评价文章不断出现：1957 年第 8 期《大众电影》刊发了一组文章，比如王云缙的《谈谈〈铁道游击队〉的改编》、赵明的《几点说明——写在〈铁道游击队〉上映以后》、姜蕙的《刘金山和“铁道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插曲》等文章。其中王云缙的文章中提到了《铁道游击队》电影的缺陷：影片没有对当时铁道游击队所处的环境，做充分的描绘，几个主要的英雄人物和一些敌人的形象是相当失败的。影片中在表现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消灭敌人和成长方面太轻易简单，好像不需要很大的困难就能把敌人消灭。同时她指出李正和小坡的形象在电影中表现的也不足。李正的作用仅仅是出主意，在后半部分他去山里养伤，他回来时正好是

革命胜利的时候，缺少了他的战斗历程。同时影片中的几个日本兵表现的也太过简单和弱智，无能而可笑。赵明的《几点说——写在〈铁道游击队〉上映以后》在文章中回答了两个问题，即为什么不表现打洋行和搞布车这两个情节。前者担心画面过于血腥，后者导演认为不是重点情节。这也可以看做是最早的关于《铁道游击队》的导演阐述了。

第二阶段是从1980到2000年，是文革结束后到新世纪初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诞生了两部影视剧，即1985年的12集连续剧和1995年的电影《飞虎队》。对于这两部影视剧作品，在今天可看到读者的接受文章有这样几篇：《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31]这篇文章展示了刘知侠和刘金山两人对1985版电视剧改编的看法，为我们呈现了当事者对于作品改编的心情，“总体还可以，加上去的人物和情节不真实，因为编剧不了解生活”。林小龙《〈铁道游击队〉搬上屏幕得失》文中评价到，站在当今时代改编原著，对如何认识这场战争有了新高度。同时在全剧的最后增加了小林的夫人芳子这个人物，把这个人物的命运与芳林嫂的命运相连接，反映中日的百姓都在反感战争，也是为作品增加了新的内涵。同时作品也讲到了遗憾之处，有些情节拖沓，同时道具和画面不够精致。^[32]《允许改编者再创造》文章中对于他人反对加入小林夫人和其弟弟的情节给予了学理的回答。这篇文章对于小说如何改编的问题还是有洞见的。1986年第9期《大众电视》刊发文章《牛娜和芳林嫂》对牛娜当时扮演芳林嫂的情况进行了书写和回顾，其他人对她的表演表示了怀疑，但是她尽自己最大努力表演好。她也承认拍的不太好，“如果再来遍会更好”。在同期的《大众电视》上，还有《岂能顾而不问？》一文，文章指出铁道游击队的顾问和监制们为什么他们连最起码的道具关都没有把好呢？“既然挂上了名就要好好的干事，把推出的剧当成自己的作品”；1986年第10期《大众电视》刊有《怜子如何不丈夫》的文章，是一篇关于刘洪扮演者张甲田的文章，文章评价到：“他那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脸盘，一眼便能看出，他就是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这一外貌特征延续到今天的影视剧中。同期杂志上边国立在《好心不如苦心》中写到电视剧试图超越1956版电影，但是存在三点问题：(1)从演员的角度而言，游击队员的形象缺乏内在的气质，时代感不突出，现代性更强，一看就是在演戏；(2)就场景而言，不够真实，对于拍摄场景是当代的场景不是老场景；(3)人物的关系把握的不好，政委成为了刘洪的小跟班，尤其是在表现李正的党性时，表现不足。举个例子就是李正和彭亮都想去临城打探信息，他对彭亮说，‘你留下，他们信任你。’这不仅破坏了主题的严肃性，思想的深刻性，而且也削弱了李正的艺术形象。”。在《大众电视》1986年第12期有一豆腐块文章，指出了“少拍重复片多开新剧目”，对于当时的重复拍片提出质疑和反问，

还是很有远见的。

1995年的《飞虎队》上映以后，有这样几篇文章散见于报刊杂志之中。《大众电影》刊登了《明星“飞虎队”》“他们本着向50周年献礼，同样的游击队的故事，他会拍的和别人不一样”。“九五年新年伊始，重新研读了铁道游击队史料的王冀邢，加兜里揣着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和香港永盛电影公司投资的几百万块钱的石兆琪，伙同一帮明星开赴微山湖拍摄现场。拍就了这部《飞虎队》”，文中解密了制片人石兆琪和导演王冀邢当时决定拍这部片子的一些情况，给我们还原了《飞虎队》拍摄的整个过程。^[33]

洪流的《〈飞虎队〉得失谈》，“诚然，《飞虎队》是这样做了。以娱乐片的律式做包装，将人们耳熟能详的情节和人物魅力再生，辉煌重现，非得大刀阔斧的改头换面不可。我们确实在影片的某个场面、某个人物、某个细节中获得全新的感觉，但是影片的整体构思却时有捉襟见肘之处，其艺术价值、文化意味则可谓大异其趣了，至于那种深入人心的教育意义也不可同日而语。”他也指出了问题“惊而不险，是影片情节的一个缺陷。尽管运用现代电影语言和手法能自如地制造了不少直观刺激、火爆热闹的视听场面，但多限于枪战、暴力和血腥，很容易落入港台和好莱坞式的俗套。感官的刺激不能替代心灵的共鸣，浮华的包装却掩盖了真实的生命。背离了严肃，势必会逼近虚假。”

《飞虎队》是可取的，但并不很成功。作者给予了我们五点启示。其一以娱乐功能为主的艺术作品不可忽视教育作用和社会效果。其二要重视人物的创造。枪战惊险片也好，娱乐片也罢，其审美价值和艺术生命力主要取决于人物的塑造。《飞虎队》重情节而轻人物的倾向(其实情节也并不完美)，致使除李雪健饰的王强还有点意思外，其他本该丰满的正面人物单薄了、扁平了，与人们所期待的相距甚远。其三要以生活为本。强调娱乐功能，不能脱离作品发生的时代背景。艺术创作在表达艺术家主观的现代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同时，应时时立足于原著所提供的客观据。“演戏须知戏”，改编和重拍同样也需要生活。其四要正确对待明星。在明星的选择和使用上，要充分发掘其独特的光彩和魅力，把握角色，成为角色的“这一个”，还要尽量淡化明星自己的本色及其以往角色的旧色调。其五要善于把握艺术规律。艺术的演变与社会的发展相关，也与人们的文化素质，审美情趣有关。艺术家应以迎合大众的现有欣赏水平为基石，通过自己的作品给人以正确善意又切合实际的提示和引导。这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34]

《电影评介》杂志在1996年第10期在同一页刊登了关于《飞虎队》两篇文章，美其名曰为“针锋相对”，表明这两篇文章的立场和见解不同。其中有一篇为施殿华的《别具神韵 各有千秋——〈飞虎队〉与〈铁道游击队〉对比谈》，在作品上映后，观众有着各

种各样的声音，有人认为“失败的翻拍”“徒劳的浪费”等等，但是作者明确的指出，无论思想内涵和认识价值，还是艺术个性和审美特征别具一格而又独具千秋。《飞虎队》在前面改编的焦虑中，编导们知难而上，在保留精髓上大胆创新，拍出了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都俱佳的作品。《飞虎队》和《铁道游击队》电影都反映了铁道为战场的故事，而《铁》电影线条单一脉络清明，是有头有尾的故事。而《飞虎队》是由一个个小故事联成的大故事。《飞虎队》中还加了李九等中间人物来彰显全面抗战的复杂性。从艺术上而言：其一是人物思想和形象刻画上两个片子都很优秀；其二是整体特点上《铁道游击队》质朴无华，而《飞虎队》是视觉盛宴。另一篇是申洪涛《艺术分寸严重失衡——〈飞虎队〉人物形象诤议》的评价，与上一篇完全不同，他指出尽管视觉上很刺激，但是人物没有拍好。刘洪成为了绿林好汉，不再是朴实憨厚的农军领导；李正成为了刘洪的小跟班；王强油腔滑调。芳林嫂成为了怨妇，没有成长为革命的战士。作者很深情地说艺术分寸严重失衡。

第三阶段 2001 年至今，是新世纪以来的 15 年。铁道游击队产生了两部电视剧 2005 年 35 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和 2011 年的 36 集电视剧《铁道游击队战后篇》。对于这两部影视剧作品，在今天的杂志上对他们的研究文章不多，但是报纸上的文章却不少，由于互联网的完善，报纸上的报道大多上网，因此今天能够清晰的看到他们并不困难。搜狐娱乐^[35]2005 年连续剧播出时专门做了一个专栏，转载各家报纸对《铁道游击队》的文章，以加强宣传，提供给铁迷们进行阅读。其中有这样几篇比较有价值。打开主页面就可以看到。如晶报报道《导演王新民让〈铁道游击队〉变得更“武侠”》^[36]，《铁道游击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翻拍也意味着能够把这些老观众吸引回来”。如何有“新意”，他表示，为该剧加入武侠元素，应当是最吸引观众的一大卖点。“铁道游击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动作元素的注入，无疑会为观众带来很大的看点。如何进行“人物的塑造”，王导表示，以前的作品中，刘洪、王强等人一出场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因为篇幅的限制，观众很难看到他们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新版电视剧中，“这些英雄人物不再像以往那么高大全。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如何“怀旧一把”，重拾那一代人当年的激动心情，王新民在拍摄一开始，就给剧组每人买了一本《铁道游击队》的连环画，大家一有空就琢磨当年的场景。于是，电视剧中的许多镜头都是根据这些画面‘照搬’上去的。同时在电视剧中《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未加改动。对此，王新民的说法是，这首歌曲的影响太大了，而其他任何一首歌曲都无法替代。也是对经典作品致敬的一种方式。再比方说《新〈铁道游击队〉浪漫多而凝重少 红色经典也

可以拍成商业片》。很多人都说，翻拍红色经典会吃力不讨好，但我就是要通过这次尝试让大家看到，红色经典也可以拍成商业片。”“他采用‘多浪漫、少凝重’的方式，表达了他们从爱慕到终成眷属的过程。”^[37]还有《铁道游击队再现枣庄 编剧感言告别时代局限》对当时的拍摄现场给予了揭密与还原，可以看到很多幕后花絮。比方说拍摄现场煽风点火、爆炸隆隆浓烟滚滚、烟火师到处煽风、点火，导演严禁“放冷枪”、散漫“伪军”跑得快，从中看到了电视剧的生产过程。^[38]以及《〈铁道游击队〉将开机 导演让战斗片战斗起来》，这是一篇王新民导演接受记者采访的报道，文中就导演介绍的以下问题：“让战争片呈现出武侠色彩”“人物不再是高大全”“怀旧”“主题音乐”“武打特技”等做了一一的回应。^[39]

在《〈铁道游击队 2〉不当‘狗尾’ 无缝对接成典范》一文中，王新民表示，“《铁 2》作为《铁 1》的续集，巧妙地延续并发展了第一部中的多重故事情节，使得该剧与上一部电视剧具有现实、合理的契合点。剧中随着铁道游击队的转业，好多《铁 1》人物的故事都在延续。此外，《铁 2》中的诸多元素在当年基于各种原因未能在《铁 1》中得到展现，譬如《铁 2》中具有多重人格的孙玉田，从一名曾在抗战时期立下汗马功劳的共产党员，最终成为投敌叛变的罪人，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历史性在《铁道游击队 2》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进而弥补了未能在《铁道游击队》中展现的历史空白。某种程度上，这种延续作品兼顾观众需求的续集模式既保障了《铁 2》的可看性，也为未来影视续集创作提供了一个模板，‘青胜于兰’而绝不是‘狗尾续貂’，完成了无缝对接，势必成为影视剧续集的典范。”^[40]

《〈铁道游击队 2〉加了很多动作戏很像武侠剧》一文中讲到，导演认为拍好两场戏，这部戏的精彩就出来了。即火车戏：真人玩命直接跳上跳下，导演表示，为了真实表现紧张刺激感，剧中的火车戏都是真人拍摄完成，危险系数非常高，演员吊着威亚直接飞到奔跑的火车上，有几次都差点撞上了，其中有些直接从火车上跳下来的戏也是惊险万分，演员还因此受了伤。动作戏：展现后抗日年代的侠义风采。“所以拍摄技巧上，我们是把动作、战争、武侠糅合在一起，让打斗更精彩夺目，只有这样的动作场面，才能完整呈现出铁道游击队员的英雄侠客情怀。”^[41]

同时《铁道游击队战后篇》的制作方专门设立了网站“三文影视网”，对铁道游击队战后篇进行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宣传的一系列报道工作，线上线下全媒体营销，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幕后解密，同时也吊起了观众的胃口，对节目有着越来越高的期待。

5. 红色经典的研究现状

尽管新世纪以来,杂志上对于《铁道游击队》自身改编的文章评价和分析的文章不算多,但是学者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影视剧改编这一现象上,也即是“红色经典”的改编这一现象上,他们跳出了具体的文本而进入了文化的高度。笔者在搜索引擎“百度”中输入“红色经典”四个字,得到大约160多万条相关记录,足见其流行程度。关于红色经典的来源,我还没有查到该词的最初出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词汇被广泛使用是在2000年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播出以后。同时学界和业界对它也没有绝对的界定,广电总局称“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是红色经典;也有人认为“所谓‘红色经典’既包括那些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红极一时的中国作品,也包括斯大林时代被钦定为“经典”的苏俄作品,如《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人认为“要有更广的‘红色经典’概念则要把范围扩大到所有其他的艺术类别,绘画、雕塑、音乐与舞蹈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传记文学”等等;还有人要求把鲁迅的作品也要并入到红色经典之中去。陶东风先生曾惊叹道:“《阿Q正传》是‘红色经典’?我的天!”^[42]在一篇文章中陶先生指出:“红色经典”的基本内涵大体一致:它一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关,是典型的革命话语。^[43]与一群学者在对“红色经典”的概念界定喋喋不休讨论的同时,陈思和先生对“红色经典”不以为然,他不赞成“红色经典”的提法,指出“经典”是“被历史所证明它代表着人类整个文化传统的根本的一些文本,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称为‘经典’”。而这些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时间尚短,才几十年,还不能擎起经典的大旗。他认为,“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陈思和特别不能容忍把“样板戏”纳入“红色经典”,认为这把“红色经典”的意义给颠覆掉了。^[44]

关于红色经典的文章有很多知名的学者教授的文章,就本人的研究而言,有这样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刘康在《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中指出,红色经典是中国50年代至60年代以革命为主题的文化生产,是建立革命文化霸权和话语体系的有机部分。文中指出:在全球化与世纪转换时刻,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红色经典通过小说再版和电子媒体(电影、电视剧等)得以再造。其目的是重建文化遗产和打造文化市场。^[45]

景秀明在《“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研究的反思及改编的再出发》中指出,当前对“红色经典”改编为电视剧的研究,一是未能很好地结合改编客体、改编媒介、改编的

文类等因素来进行研究；二是存在着角度单一以及研究范围过窄等问题。本文对上述这些问题予以揭示并从改编观念出发，重新思考今后“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的立足点。对当前“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的研究的反思以及改编观念的再思考，其实对反思其他文艺作品的影视改编研究以及改编理念的再出发不无启示意义。^[46]

张法在《“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读解》认为，“红色经典”作为共和国前期的文艺模式，内含了青春性和成年性的统一。当下人的三种意向，对历史总体的重塑，对理想的重温，对人性丰富本质的认识，以及这三种意向本身的复杂性，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及其结果，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他从紫禁城的建构历史梳理了历史经典的作用。他提出对历史总体的重塑，中华民族从原始向理性的演化，一方面是观念上的大变，从图腾到天神到祖鬼到人王，另一方面却不是—个否定—个，而是每一个对前—个保持了最大的尊敬，并为自己在体系中找到—个恰当的位置，这样既使自己有了—个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承传，又把每—段历史放好了—个位置。那么，把“红色经典”改编好了，中国现代性历程及其总体性也就很好地呈现出来了；而—旦体现出来，就没有再进行改编的需要和冲动了。如果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性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定义，“红色经典”的改编结果也没有满足方方面面的渴望和期待，改编“红色经典”的冲动就还会出现，因为创作者总认为自己还能在上面加补上—些“红色经典”本来缺少的东西，而为当代观众增加—种新观念，以完成人们对中国现代性总体认识的需要。^[47]

陶东风《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在文中作者经过梳理总结了红色经典的内涵：“它一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关，是典型的革命话语。”“红色经典”万万不可变成“黄色经典”。在消费主义的逻辑驱使下，这些改编后的“红色经典”开始“变味”：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被大众消费文化的巨手所改写，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奇特结合物。从大家一致的感受看，“红色经典”不过是包装过的某种大众消费文化快餐而已。红色经典的改编、定位、目标受众，是完全按照当前消费市场逻辑运作的。尽管主流采用了下发文件的方式对经典改编进行规限，但作者清晰地感觉到这不是在打压，只不过是—在批判而不是在封杀。这种举措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它表明官方对于“红色经典”改编的态度是矛盾的：既希望利用“红色经典”来进行革命教育，巩固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同时又不满意于改编以后的“红色经典”对原作的改写——实际上也就是对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削弱。这个原则概括起来：可以改，但不能乱改。这一点正好表明红色经典的改编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话语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并存的特殊语境中，红色作为市场与官方同时利用的资源，所处的尴尬境

地。在消费主义话语与革命政治话语的夹缝中，“红色经典”也只能在“红色经典”消费、政治与经济、革命与金钱之间左右不逢源。改编的“红色经典”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害”，它的价值是为我们提供了解剖当代中国文化症候的极好案例。^[48]

余志平在《关于“红色经典”的几点思考》中指出：既然承认“红色经典”的经典地位，那么，我们当然还需要“红色经典”，特别是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尤其需要“红色经典”。因为它是矫正当前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的需要。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偶像崇拜和英雄贫血已成为一种时代病。偶像崇拜现象自古有之，它反映了人类在本体意义上的信仰追求。偶像会因时而变，但人类的求真求善求美的信仰是永远不会变的；它是弥补当下文坛经典匮乏的需要；它还是满足人们怀旧心理和重新思考历史与现实的需要。具体说来，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首先，要尊重原著，坚持“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的统一；其次，改编应该高于原著。再次，坚决反对情色化庸俗化改编。^[49]

於曼的《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视剧》试图正确处理好改编的电视剧创作忠实于原作和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新的关系。通过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期望通过这种类型的改编电视剧，探求其中的规律。她在书中对经典的生成（创作的滥觞、高潮以及经典之路）、经典的类型（传奇类、史传类次生的红色经典）进行了分类，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用了一个篇章来进行分析，对红色经典改编的文本从互文的间性和层级与接收的层面进行了分析。最后她总结要多维视角看改编。对红色经典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但是这本著作出版的较早，是“红色经典”研究的开端，对后来者有继承和借鉴价值。这些论文对于本论文深度分析颇有启示意义。^[50]

王春艳的《“红色经典”研究综述》。这是一篇对“红色经典”学术论文进行了再研究的文献，虽然这篇文章发表在2006年，距今有些久远，但它仍有学术价值和意义。它在文中提到当下的学者们对于“红色经典”研究的几个路径：(1)人本研究——延续1980年代的人本主义思潮，一部分论者以人道主义为尺度，对“红色经典”加以批判性重评；(2)现代性的研究——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这一角度，成功而有效地启迪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把握；(3)叙事学的研究；(4)审美研究——是“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打出的一面旗帜，以此来反拨以往文学史的政治评价标准，进入90年代对“红色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评也用了审美的标准；(5)文化研究；(6)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的研究。这六大视角是对研究者们研究概述的总结，同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维度，后来者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的，这篇文章无疑是阶梯也是新的起点。^[51]

6. 民间对铁道游击队研究现状

与学界研究的热闹喧嚣相比，民间也有一批对铁道队感兴趣的人，在孜孜不倦地整理收集铁道队的资料。有三位经常活跃在报刊杂志电视上著书立说做访谈的人物。其一是王金国，他是铁道游击队大队副王志胜（王强）的儿子，他经常活跃于电视的屏幕接受采访，对先人们进行缅怀，通过讲述父亲在生前告诉他的一些历史，使得这段渐远的历史在岁月的流转中多了一份佐证，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使历史人物在口述中立了起来，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今天的日子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希望他们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好好学习。”^[52]其二是潘福安，他自筹资金创办了“铁道游击队展馆”，保存“铁道游击队”的画册、图片、实物等，已达500多件。每逢重大节日，潘福安都要把展板和实物等搬到公共场所，进行义务展出，并亲自担任解说员。现在他的展览馆已经安置在枣庄的东湖公园，在公园湖心小岛的三层小楼上。“我是2000年向民政局申请成立铁道游击队博物馆的，成立后不少人慕名前来，我自己也到全国各地巡回展览，11年来有数百万人参观过这些文物。”^[53]潘福安坚信：“我们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都熟悉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但现在的孩子知道的就少。越是有人不理解，我越要多办展览，办好展馆，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枣庄铁道游击队这段历史，教育大家不忘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其三是枣庄的干部兼业余作家李海流，他写了大量的关于铁道游击队的文章。比如《铁道游击队》《背后的传奇往事》《智斗临枣日军投降记》《铁道游击队护送刘少奇过津浦路》《铁道游击队里的日本人》《铁道游击队政委郑惕与德国传教士的一段交情》等多篇文章发表在期刊杂志上，这些文章在杂志上不时地被书写给读者提供阅读机会，这段历史不时被回忆和缅怀。在民间除了这三位还有很多人坚持对铁道游击队历史进行梳理，为传播铁道游击队事迹起到了应有的贡献。

统观上述研究，我们发现，研究者们往往没有站在宏观的角度分析《铁道游击队》文本，建构起一座谱系的大厦。不过已有学者提出了文学文本谱系建构问题。如刘勇在文章中指出“无论是就西方福柯所强调的复杂性、差异性而论，还是就中国传统谱系观念中秩序性和关联性而言，都是有欠缺和距离的”，^[54]他尤其强调：“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将某一时代的精神或者感觉作为单位，也不是‘团体’、‘流派’、‘世代’或者‘运动’，甚至不是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55]刘勇的文章

力求从谱系的角度来研究小说文本，对本论文研究影视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依照上述观点，我们把小说谱系研究推广至影视作品。我们研究《铁道游击队》小说和影视剧共产生了哪些文本，文本之间有何关系，以及文本与文本是构成一个怎样的体系，不同的文化语境对文本的生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本的变化对当下有何现实意义，这一切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这里借用福柯的话来说明本文使用谱系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对陈述的分析是一个历史的分析，但无需任何的解释：对于那些已说出的东西，它不寻求它们隐藏着什么，不寻求它们之中什么东西已被说出和它们的不觉中所包含着没说出的东西，以及寓于它们之中的思维、形象或者幻想的丰富性；而是相反，它寻求的是它们以什么方式存在，它们被表现出来意味着什么，它们留下的痕迹是什么，也许还有它们已经显露的是什么。”^[56]

三、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

本文将理清《铁道游击队》文本的流变规律，建构起完整的发展谱系，厘清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本论文主要运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对《铁道游击队》文本进行互文性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口述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文本分析等方法研究作品。

(1)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研究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由于论文研究的是《铁道游击队》文本的谱系，涉及到以往的小说、评论、电视剧、电影等，因此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很重要，同时分析归纳整理资料得出的结论也弥足珍贵。

(2) 个案研究法是本论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具体说就是把在文本生成上具有特殊性同时又有典型性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详细的梳理《铁道游击队》小说和影视剧生成的全部过程，呈现《铁道游击队》文本生成的复杂性、丰富性。同时对《铁道游击队》的各个版本进行跨文本的研究，以探究文本间的互文性，即文本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

(3) 文化诗学研究法。“虽然是以文学文本为中心，但它是在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中研究文学，并且是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中进行阐释实践。所谓互文性是指不同文本相互之间相互渗透、互相解释的现象。在文化诗学中，互文性研究实际上就是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文本界限，进行综合性的跨文本研究。由此看来，文化诗学就是要将被现代性学术话语孤立出来的文学现象重新纳入具有整体性的文化中进行研究。它

跨越了学科之间的藩篱，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是对于科学主义的分科研究方式的一种革命。”^[57]“文化诗学就是要在上述多种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中展开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研究。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需要落实在具体的批评阐释之中，所以它不是宏观的和抽象的，而是契合于对象的具体阐释方法。”^[58]

童庆炳先生在《文化与诗学丛书》的总序部分对文化诗学有很多好的概括，比如说“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所以本文采用文化诗学的理论工具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既可以避免在小说文本和影视剧文本的内部就其艺术性的“有一说一”，同时也避免了从文化的角度对作品分析而造成作品的疏离。把《铁道游击队》的研究从内和外两个角度结合起来，对内分析其艺术价值、语法修饰、结构篇章，对外分析其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大众的因素对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将入乎文本读情节，出乎其外看文化。

首先，研究的文本性。小说创作出来以后，不断被改编，必定有其内在的原因。所以本论文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去发现小说中被视作经典的东西，以探求小说和影视剧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

其次，研究的历史性。把文本回溯到生成的年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考量自身生成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这样书写而不是那样书写。

其三，研究的当下性。研究不同时代的作品对当今时代的现实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关注这些作品对观众尤其是对当代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意义，寻找电视剧谱系作品对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作用和功能。

第一章 在作家自觉与响应主流之间：《铁道游击队》小说的萌生

一位作家要想成就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马平川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他要经过水滴石穿似的积累也要有铁杵成针似的耐心，积累自己的学养丰富自己的生活磨砺自己的心性，期待着一个成熟的创作机会，在自己内在创作欲望的驱使下，进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构思和创作。作家知侠创作《铁道游击队》也是充满了荆棘。三下枣庄，访谈数人，十年等待，三年思考，一年疾笔，铸成一剑。据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回忆说：“现在《铁道游击队》已经得到读者的认可，但知侠写成这本书颇费周折，一个初中学历的人想驾驭这样一部小说，难度可想而知”。我认为知侠在创作时难度是有的，可是作者在写作前已经为此做足了准备，包括文化修养、军事思想、生活积累等多个方面，一旦恰逢其时，他写就大众喜闻乐见妇孺皆知的《铁道游击队》则是水到渠成般自然了。

第一节 作家的知识积累

“知侠原名刘痴侠，后来接受好心的同志建议，才把“痴”的病字头去掉，改为刘知侠。他说话带有浓重的河南中州腔韵味，听着使人感到朴实亲切”^[59]。有钱人家的孩子六七岁就上学了，而知侠上学的时间并不早，11岁才勉强上了小学，对于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有机会上学就不错了。知侠就读的是半工半读的慈善学校，学校免收一切费用，学生在这里，既能学到文化知识，又能学到劳动本领。在劳动期间，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来支持学校，毕业后，还可以用学到的劳动技术在社会上谋生路。这对知侠，一个家徒四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记得语文的第一课是‘大狗，小狗’，第二课是‘大狗叫，小狗跳’。为了引起初一上学的小学生的兴趣，课本的第一页还有彩色的插图。在这所学校知侠从一年级一直读到四年级，读完了初小的语文、算术、地理、自然和公民的全部课程。”^[60]

在外读完了初小四年，知侠随工作调动的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在家门口的高庙小学继续读高小。老师和学生都很喜欢他，他们认为他在“大地方”住过，成绩好、见过世面、还懂事。“由于我初小的功课学得扎实，加上我又有私塾的旧书底子，所以在五、六年级学习过程中，我的功课是班里最好的，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城最好的中学——省立第十二中学。”

他在省立第十二中学学习努力，课余到图书馆去阅读大量的书籍，课余时间，大部

分都待在图书馆里。他爱上了文学喜欢阅读，经常借阅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即便是他失学在家时，还到小学的老师那里去借文学书，还到街坊邻居家寻找散见于农村的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后来在车站自费学习时，空余的时间很多，他就拼命地找书读，读进步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鲁迅的杂文，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鲁迅的杂文像匕首，像刀枪，刺向旧世界。文学作品读的越多，自身的积累就越丰厚，他的写作能力就逐渐地展露出来，再加上一直以来他就喜欢语文和作文。在上小学时老师在他的作文后边往往用红笔加上一些赞美和鼓励的批语，这无疑给年幼的知侠以莫大的鼓励。“在上中学时，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春游》的作文题，我竟写了一篇小说，在作文本上写了有厚厚的半本子。老师耐心地用红笔在我的作文上加了眉批。”^[61]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东三省，并一路向南侵略，直逼直隶、北京。国难当头，政府软弱无能丧权辱国，知侠个人自觉生活无出路，他陷入难言的苦闷之中，满腔的激愤能向谁诉说。闲暇时他在电报纸的背面尝试着写文章，他把写成的“豆腐块”文章邮寄给天津一家名叫《快报》的小报。知侠不断地写不断地投稿，一来二去，小篇幅文章常常在小报副刊上发表，这意味着知侠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这也为他以后进入部队加入宣传队写写画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学习和阅读所积累的知识，为《铁道游击队》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62]

他在业余时间还大量阅读了名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也在作家以后的写作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在写《铁道游击队》之前，知侠又温习了一遍《水浒传》，对语言、结构以及人物塑造的方式都有了新的认识，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尽可能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和穿插。”^[63]在写作时，知侠在小说每章都安排了小故事，故事个个有高潮，两章间巧妙设置悬念，把读者的阅读好奇心紧紧勾住。作品创作完毕后读者整体反响不错。这种种机巧设置自然归功于作家对于中国章回小说的叙事机理的把握和理解，能把这种写法和技巧运用到《铁道游击队》的创作之中。同样需要关注的是从作者读书识字的那一刻起，他在不自觉地这一伟大的作品积累着，他在为这件大事而来。如果他没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他也不会更加透彻地理解《水浒传》的叙事规则和人物塑造方式，这是和传统的文章内在结构的契合，大众就爱读这样的作品。

第二节 作家的生活阅历

知侠自小生长在铁路边上，村前有一条铁路通过。在村东三里处，有一座以家乡的村名命名的火车站。村民们站在村子周围的高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火车上的一切，特别是当客车通过时，人们都能感到隆隆奔驰的火车所引起的地面颤抖，打眼一看乘客的面貌和衣饰都能分辨出来。当货车通过时，机车喷出的烟雾，笼罩着村子，粗壮的汽笛声在村庄的上空回旋。火车是孩子们的大玩具，道轨成了他们的游乐场。火车给作家的童年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青少年时期，他的命运又和铁路紧紧联系着，也可以说，他的整个人生跟铁路有着不解之缘。童年时期铁路给他带来了快乐，青年时期结识了一帮铁路兄弟，中年时期写就了《铁道游击队》，老年品尝着《铁道游击队》给他带来的快乐。只有熟悉铁路和铁路规则的人才能写好铁道游击队，他的童年和少年的铁路生活是他创作《铁道游击队》的必要条件。铁路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立话语规则的交通系统，它有自己独特的运营方式、通信话语和运行规则，它相对于外界是封闭的，对于一个没有深入接触到该系统的作家而言写好这个题材是很难的。即便能够写出来也往往因为术语应用不恰当而露出破绽，细节描写不到位而读之无味。对于知侠一个从小在铁道边上长大的少年来说，这都不是问题，铁道和火车是在他生活中最好的玩伴。“我每天和街上的孩子们到车站上去捡煤，在原来堆过煤的地方扫煤末，并用小钩把陷进泥地里的小煤块挖出来，煤灰也常常把脸熏得黑糊糊的，落一层乌黑的煤灰，‘沾了光’，出了汗用手一抹，个个都成了黑花脸，变成了小‘煤黑子’。我们在两条铁轨之间走。也要走出个花样来，比赛着谁在上边走的时间长。因为铁轨很窄，在上边走，简直像走钢丝似的，走不几步，一掌握不住身子的平衡就掉下来了。由于常练，有时也能走多远，一边走，身子一边左右摇摆，为的是配合脚步，掌握好身子的重心和平衡。当列车转眼之间飞驰过去后，看不见火车了，就又跑到路基上，伏下身去，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着渐渐逝去的铁轮磨擦铁轨的轧轧声。这音响是铁轨从远处传过来的，离开铁轨是听不见的。由于我们常常这样听，听惯了，所以我们从高低的轧轧声中能判断出远处有火车向这里急驶。”^[64]

《铁道游击队》还描写了铁道队队员徒手爬车的本领，徒手爬车对于一个从事列车调度的人来说，这是必备的本领。他们爬上行进的列车给前面的司机发出信号。但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讲这是一个惊悚而危险的行为，对于一个久在书斋的文弱作家来讲，描述起来更是无从下口。“扒车时，先要跟着车身飞跑几步，抓紧车的把手再迈脚去找脚蹬。

下车时要顺着列车行进的方向，向右前方猛地往下跳。如果跳得慢了，当你迈开右腿的一瞬间，列车就会将你的右腿带出很远，你就要摔筋斗，甚至会卷进车底。我学会扒车了，也学会了看车速。站在火车上往下看，能分清路基上一粒粒石子，这时的车速还不太快，如果下边的石子模糊一片了，这说明车速很快了，这时候如果马上跳下，一不小心，就会摔出老远，翻两个筋斗的，可是从地上爬起来，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我能乘上快车行进了”。^[65]这些都是知侠的经验，有了这种经验他在描写小说游击队员徒手爬车就游刃有余了。我们不妨阅读一下大队长刘金山关于扒火车的回忆文章，“抓车，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我从十一二岁起就在铁路上学着抓车，后来我到铁路上干活，家离工作地点五六里地，每天来去，都是抓上飞跑的火车上下，火车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得好手才能上得去，我们那时穿的是有松紧口的布鞋，在搞鬼子的火车时，跳下来时鞋底和鞋帮都震裂了，全身的力气全落在一双脚上，那次搞鬼子的布，我跳上去，那股子风和火车的劲，把我的身子掀横了，与车厢成丁字形，两只手要稍微松一点，可就完蛋了，这时候，你得把自己全副力气用到两臂上全身才能正过来，两只脚再找到落脚的地方，这是很困难的。你叫演员去跳，那得多危险，一时学不会；这得用电脑的特技来解决，这一行我可不会了”^[66]看知侠和刘大队长的回忆何等地相似，只有他们这些会扒车，在铁路旁长大的孩子才有这样的技术，学扒车如同学游泳，仅仅靠听是学不会的。如果仅仅靠听就能够学会的话，《大众日报》的记者早就写出了优秀的报道，这样艰巨的任务也不会落在知侠的肩上。同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联想，比方说老洪飞车夺枪时的一字型的飞车造型，这虽然是作家没有经历过的，可是他对于机车太熟悉了，他虚拟想象创作出来也会合情合理。

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生活经验的人来说，铁路上的一些术语也会让他一团雾水。比如扬旗、路牌等等，这些术语对于知侠来讲不是问题。因为少年时期知侠在车站上做了两年的自费练习生，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拿工资的铁路工人，他学会了全套的铁路规则和语言。比方说路牌等术语，他在文章中写道所谓“路牌实际上是根有螺丝的铁棍，嵌在这座机器里，它是列车通过车站的通行证。打旗工人把它从机器上取出后，放在一个小皮袋子里，皮袋上有一个大的铁环，机车从月台上通过时，司机抛下一个路牌，然后把手往铁环里一套，就把这个站上给的路牌带走了。这路牌是避免单线铁路行车出事故的重要措施。列车到下一站去，必须经下一站的同意，如同意列车进站，就摇动路机的把手，发出呼呼的声响，电流就通到这一站的路牌机上，打旗工人抓住路牌用力往上搬，只听“叭”的一声，路牌就取出来了。当有的旅客问站上工作人员：火车何时到站？回答

说：要牌了。这就是说，已向下一站要了路牌，火车已开过来了。”^[67]这些都是知侠的直接经验，这些专业知识内化为作家不经意的知识积累，这些话语规则都已经牢牢地固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一旦需要，不经意间就可以跳出来，为作家所用。

知侠描写的铁道队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童年或少年的生活经验，他一点儿也不感觉陌生，相反他写起来更得心应手。假如没有这些生活经历他也不可能把这些铁道队人物形象刻画的如此生龙活虎、活灵活现。如果对铁路战斗的描写不够淋漓尽致的话，铁道游击队小说故事就不会那么出彩（比如说《解放军文艺》编辑对“彭亮驾驶火车”修改后就不够精彩）（后面详述）。在《铁道游击队》小说面世以前，曾经有记者想写文章报道铁道队，但最后无功而返，刘知侠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记得一九四三年《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到铁道游击队去采访，被敌人捕去了。当时铁道游击队由于多年来的神奇战斗，打得敌伪胆寒，他们通过伪军硬把这个记者要了出来。这个记者且有这样惊险的经历，可是除了写点通讯报道，并没有把铁道游队出色的战斗事迹写出来。我想他没写的主要原因是熟悉铁路上的生活”^[68]“因为抗日根据地的作者，多是生活在山区，他们大多数人不仅没坐过火车，甚至没看见过火车。有的城市出来的作者，曾经坐过火车，但仅坐过而已，对铁路上一切并不了解。”^[69]

第三节 作家的军事准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发起全面进攻。不久，知侠的家乡河南汲县全面沦陷。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知侠在探求着自己的出路，思考自己将走向何方。有一天，他偶尔看到了一张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简章，这份简章像茫茫黑夜中的灯塔般指引着知侠的人生道路，他心中的爱国烈火熊熊燃烧。“对，奔赴延安，到抗大去！”，一个抗日救国的革命信念在这位中原青年的内心升腾。此时正是1938年的春天，知侠兴奋地跑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申请报了名，经过各种测试（口试和目试），取得抗大介绍信，他会同另外几个知识青年，怀着激动的心情胜利地到达了洛川，顺利的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12月，抗大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组成抗大一分校，开赴晋东南太行山地区。知侠也跟随抗大一分校深入敌后，进行对敌斗争。行军途中，知侠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5月，知侠在抗大毕业后又留校继续学习专门军事，在抗大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收获最大的是一些高级官员亲自给他们讲授的军事思想知识。比如朱德总司令特别精炼地总结了一些毛泽东关于《持久战》

的军事思想，他指出“从战略上讲，我们是持久战，这是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从战争全局出发确定的方针。从战术上讲，一个战役。一个战斗，打的是速决战，要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取胜，拖延持久就不行，这就叫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同学们不是已学过辩证法了吗，我们学理论应该像毛主席那样联系实际，要懂得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战争也不例外。毛主席阐述的持久战与速决战的关系，就是把哲学运用于军事，是军事辩证法”，同时他还结合我军的战斗经验现身说法来讲解游击战。“我们在山地如何打游击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在平原如何打游击还只是刚开始。今年年初以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主力一部，从太行山区挺进冀南平原，罗荣恒率领一一五师主力部，从晋西山区挺进鲁西平原，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主力一部，从晋北山区挺进冀中原。三路挺进冀鲁大平原，部队从山地到平原，是个大转变。怎样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连布置岗哨这样极普通的事，平原和山地也不同，在山地只要在山道隘口布置好岗哨就可以，在平原就不同，四通八达，哪里都可进，岗哨布置在哪里，是不是四面加四角，团团布岗哨，这样还睡不睡觉？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在平原，除岗哨外，因地制宜，还可加设游动哨。又要动员群众，军民一起挖村与村之间的道沟。战士们给它起了一个有政治意义的名称，叫抗日沟。便于作战，便于隐蔽转移。不论山地和平原游击战，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推不倒的万里长城。在平原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作战，打了好几个漂亮仗，粉碎了敌人扫荡，坚持了平原游击战争，取得了平原作战经验。这是从战争中学来的，这就是从游击战中学习打游击。”^[70]这一战略思想更好地解决了力量单薄的小武装力量如何与敌人斗争的难题。对于由几个人组成的小武装——铁道队如何与凶狠的鬼子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形式军队高层领导是很重视的，如果战斗打得巧妙能起到以小抗大的效果，“蚍蜉撼大树，可自量”。这种思想在知侠的心中无疑埋下了种子，当他听到铁道队的故事时，他不觉会将过去学到的理论与当时的实际结合，并保持很大的兴趣，激发他的创作热情。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和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他都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战斗与工作，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进行战地的宣传报道工作。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顽寇向山东解放区大肆进攻。在胶东半岛的战斗中，知侠所在的文艺队失去了主力部队的依靠和掩护，情况十分危急，知侠命令所有的文弱书生和文艺工作者自发拿起枪来成立武工队，他自认队长，与当地百姓相联合，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斗争，这些军事思想和战斗经历丰富了知侠的内心。后来在写《铁道游击队》时，这些军事思想成为了铁道游击队的思想总纲，这些战斗经历也会内化为铁道游击队的战斗经历，为他更好地创作以铁道为背景

的军队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原本心怀一腔热情奔赴延安学习文艺创作，可是领导偏偏把他分配到抗大学习军事，这一不幸的安排日后成为了最幸运的事情。行军打仗所经历的故事使他受益匪浅，作者自己的话说“进入抗大真是赚了大便宜”，他文武双全的品质，奠定了他创作《铁道游击队》小说的基础。无心插柳，成为了知侠写作的军事思想准备。

第四节 作家的写作训练

作家是热爱生活并且感恩生活的。在现实中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事迹，往往会令知侠激动不已，产生强烈的写作欲望，所以每当战斗和工作之余，他常给根据地的报纸写些文艺通讯、特写或报告文学。他创作了《钱包身》《葛沟的识字班》《攻克干榆之夜》《燕子崖保卫战》《机枪射手老刁》《遥寄给沫河边的民兵英雄们》《韩邦礼苦学记》等作品。解放战争中，他随军参加淮海战役，在《华东前线》上发表了《火线入党》等几篇通讯。虽然他先前没有写过小说，可是写文艺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也是个磨砺。如果连一个人物的特写都写不真切、写不生动，怎么可能塑造出小说中的典型形象。他经常捕捉生活中出现的好人好事，平日也对战争生活作细致地观察，深入地了解，这就使他对战争生活有了更深的感受，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以后创作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全国解放以后，作家开始写小说。他的第一篇小说《铺草》^[71]，是在全国解放后1950年写的，这篇小说来源于村民向他讲述了一个故事：“那天我们的队伍进村时，一个战士为了搭地铺，向这个王老头借草，王老头强调牛缺草，不愿意借，因此两人争吵起来，后来打仗时这个战士牺牲了，老人感到无比悔恨。刚才村长在村民大会上总结支前工作时，批评了这件事，王老头感到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包括他在内的翻身果实，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可是他却舍不得拿一把铺草去帮助自己的战士，他受到了良心的责备。村民中有不少人听说战士牺牲，也落下了悔恨的泪水。”

知侠听了村民的叙述，仿佛看到老人哭诉的情景，也为老人内心的诚挚感情迸发而深深地感动，觉得这是一篇短篇小说的好素材，通过王老头和战士为了一把铺草争执的矛盾，极深刻地体现了我们解放区军民牢不可破的鱼水情谊。为此，他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写作欲望，一定要把王老头感人的悔恨之情写出来。当时因为战时紧张的工作，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作，可是这个铺草的故事却使他经久不忘，仿佛不把它写出来，就像有件要办的事没有完成一样，成为一种负担，只有把它写出来，心里才会感到轻松。时机允许，

知侠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在高潮部分知侠是这样写的“王老头的头像泼上了一桶冷水，他叫着问：“你说什么？”他抓紧战士的臂膀，“张立中同志牺牲了？”战士用袖口擦着冒出的眼泪，重复了一句。王老头的脸刷地变白了，他的心像无数的针在刺，他的头像被急剧地摇了几百转似的发昏，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在远处，他整个是呆在那里了。……“他真是个好同志！作战多勇敢啊！死的真可惜！你看！”战士指着靠墙的那挺崭新的美式机枪说：“那挺机关枪就是张立中同志和敌人搏斗时夺过来的……”王老头没有听完战士的讲述，就站起来，转身向外走了……他拖着木棍似的双腿，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了。他走在街上，雪花还在飘着，老人一跤滑倒了，他无声地从雪地里爬起来，混身上下都是泥水，胡须上沾着点点残雪和水珠，但他像什么也没感到，拖着沉重的步子，很艰难地向家门走去。……”^[72]

为了达到高潮，王老头和战士双方怀着急切想见到对方的心情，三次想见都没见面最后酿成了遗憾。还有张立中作为正面的光辉形象在王大娘和玉英面前出现，都是为它做准备。就是战斗的胜利，王老头心情的转换以及张立中英勇夺机枪的事迹，都是烘托、渲染这一高潮，以期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我再现了王老头在村民大会上哭诉的场面。我认为只有在张立中牺牲之后，充分地写出王老头沉重的悔恨之情，才算最后完成了倔强的王老头的生动形象”。“如果说《铺草》这篇小说有什么技巧的话，就是如何组织高潮的问题。王老头和张立中提高觉悟以后，相互都渴望着见面，老头找战士，没见着。战士找老头又没见。老头又去找战士，还是没见。最后战斗胜利了，老人怀着欢快的心情去找战士，认为这一次一定能见到了，可是战士牺牲了。”^[73]在这种相见而不得见之中，作者以螺旋上升的方式增强艺术感染力，在最后一次老汉满怀欢喜去找战士时得来的却是噩耗，战士牺牲了。内部矛盾复杂化的处理手段，达到了这种“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读者看了头不会轻易地知道尾。这种故事的结局方式完全出乎读者的想象，才富有艺术效果。这篇小说中知侠对于人物的描写、结构的搭建和节奏的处理表现得老道而娴熟，他已经拥有了写作小说的能力和水平。

第五节 作家故事讲述能力

在如此紧张的战争年代，频繁地行军打仗，作家知侠坐下来长时间的写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此，写小说《铁道游击队》成为了奢望。写作计划被搁置，一放就是好几年。可这几年中，知侠为他们著书立传的承诺一直牢记心中，他在等待时机。“每当我听到他们战斗的胜利消息时，兴奋之余，马上联想到这一未完成的任务，心情也就沉重

起来，总觉得有件重大而严肃的工作没有完成，并因此感到难过。”

在知侠与铁道队分别后，当获悉他们一次次的战斗胜利的佳音时，总是让知侠很兴奋，好像是自己的部队获得了胜利一样，当时转而一想自己对于队员们的承诺，把他们通过故事写出来时，总感觉对他们很亏欠，没能及时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可是，知侠当时在跟随部队，边战斗边采访，哪有时间坐下来，安静地写作。“在这种心情下，我就用嘴来讲，像一般的故事传播者一样，在战斗或工作之余，我把他们的战斗故事，讲给战友和同志们听。大家都爱听，并深受感动。每当休息下来的时候，同志们都围上来，要我讲，有时我也主动地讲。由于我对铁道游击队故事中人物的喜爱和热心传播，有的同志见到我竟喊我为‘铁道游击队’当时所讲的故事，也许就成为我今天小说的胚胎了吧！”^[74]解放后作家远离了戎马倥偬，暂停了行政工作，内心得以闲静，作家要专心致志地写作了。那些铁道队的老哥们不时浮现在脑海之中，为他们作传成为了不可遏制的欲望。“在动笔前，我经常把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人员的杀敌故事，讲给同志们听，大家都喜欢听。由于讲多了，同志们也听惯了，有时同志们正在聊天，看见我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看！铁道游击队来了。”没等坐下，就对我说：“再讲一段。”我又和他们讲起了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75]

知侠不仅仅是讲故事抒发情感，他在讲故事过程中也理清了自己的写作思路，也提升他对事件的概括和总结能力。故事讲得有趣，说明故事内核是优秀的，接下来就是书写表达的事情了。编辑王永乐回忆说：初识知侠，是1959年夏天。这天晚上6点多钟，青岛市工人文化宫工人业余创作班的学员，请知侠谈创作。我坐在前排座位上。……说心里话，打从上周听说请大作家知侠来谈创作，我就琢磨着一个平时写作最棘手、最苦恼的问题，眼下机会来了，我忙站起，毕恭毕敬地说：“请知侠老师讲讲，如何让人物在纸上活起来？”我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热烈鼓起掌来。知侠问了我的姓名，在哪个工厂做工？我一一作答。他朗声笑道：“这个题目出得好啊！”……他讲了他的得意之作小说《铺草》。他很认真，也很投入。当他讲到主人公王老头得知因没借铺草与自己发生争执的那个战士于第二天牺牲了时，知侠仿佛就是那个悔恨不已的王老头，他两眼噙着泪水，激动得浑身打颤，脸也变了颜色，他压低着声音、动情地说：“这是小说的高潮啊，到底要不要内疚着的王老头在风雪地上跌一跤呢？我想啊想啊，为了这一跤，我整整三顿饭没吃，最后还是咬咬牙，让王老头滑倒在雪地上了……”，“第二次听知侠谈写作，是1962年夏天。也是晚上，……他讲了两篇同一个题目的小说《瞎子》。一篇是美国作家写的；一篇是苏联作家写的。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因战争双目失明的未婚青年。结

果，苏联的瞎子，被曾经是海誓山盟的恋人抛弃了；而美国的瞎子，怕自己给恋人带来痛苦没去找她，却受到恋人的指责，却获得了姑娘的真正爱情。那天晚上，他一面摇动着手里的折叠扇，一面滔滔不绝地分析着两部小说在刻画人物、铺陈情节方面的技巧，使我又一次领略了大家让笔下人物立起来的高招。”^[76]一则故事经过了作家的口头讲述，在心里会形成内在逻辑和表述思路。经过了这样的概括和抽象加工，在作家的内心深处得以加工，形成了故事书写的思路和脉络。

第六节 作家创作动机产生

每一个作家进行艺术创作都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灵光一现，有的是情感郁积，有的是迫于生计，有的是立说传世。作为创作动机就是“驱使作家投入到文学创造的一种内在的动力”^[77]。这种动力本来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

“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所有的一切。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动因，这包括了他过去所有的生活状况，他在创作时的身心状况、意识和气质。包括有能引起灵感现象的一切情况。这些情况严格说来可以包括直到艺术家所描写的那件事为止以前全部宇宙的历史。”^[78]

就《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而言，他在进行构思小说伊始，就包含多重而非单一的动机。他内心深处至少交织着三种不同的动机：其一投桃报李的动机，自己被铁道游击队的实际所感动，通过接触跟队员们成为了朋友，自己还被队员们尊为荣誉的游击队员，写出他们的事迹是自己的责任。“这是他们给我的光荣委托，以及我个人多年的愿望”。其二自我实现的动机，解放后，知侠这个穷苦农民的孩子，已经在党的呵护下长大成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不幸的是在三反五反中受到了打击，作家自然心怀不通，内在的善良又不愿意还击别人。解决自己烦恼，回应攻击者的唯一手段就是积极努力地写作，写出好作品，给予他的攻击者以无声的还击。何以解忧，唯有写作。其三就是响应主流召唤的动机，新的政权成立，作为主政者采取多种手段对他的公民进行再教育，强调新生政权来之不易和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通过文艺作品来竭力打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作为在战斗中成长有着多年党龄具有高度政治自觉的作家一定会写出大量作品来响应主流价值观的召唤。

一、投桃报李的动机

1943年夏天在山东军区召开的全省英模大会上，刘知侠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徐广田，他听了这位英雄的报告，了解到他们在铁道线上与鬼子斗争的故事，他

们搞机枪、炸桥梁、夺物资、端据点，闹得敌人精疲力尽，搅得时局天翻地覆。他们的活动打击了敌人威慑了伪军吓了汉奸鼓舞了人民，知侠被他们的英勇故事所鼓动、感染，他产生了为他们写作的欲望。根据采访的素材，写了一些小文章，并发表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七年的《山东文化》杂志上^[79]。因为是真人真事故事性比较强，读者还是欢迎的，可是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和队员却有不同看法。“不久，我接到了铁道游击队的来信”，信上说，“他们看到游击队的事迹被报道很高兴，也很感谢；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邀请我去做客，深入了解他们的斗争生活，同时他们还说，像徐广田一样的战斗英雄还有一些，如果能到他们哪儿去深入的全面的了解一定会写的更好”。^[80]信的措辞尽管委婉，感谢他写铁道游击队，同时又邀请他去做客，这让知侠感觉不妙，发热的头脑像是泼了冷水一样。这封信让知侠有了新的认识，他感到自己写作太草率，仅仅依据徐广田的一面之辞是不够的，还要深入全面地区了解战斗生活，知侠停止了这篇文章的后续写作。虽然写作停止了，但是他写铁道游击队的决心没有改变，相反“决心更强了”。他决心到铁道队集中深入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把他们的事迹写成小说。在1945年鬼子投降前后，他两次深入到铁道游击队中去。“当时，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和作战，对他们比较了解和熟悉。后来为了写作这本书，我和他们又曾在一块生活过”，“回忆和他们相处的日子，是使我永远难以忘怀的。由于他们的热情、豪迈，我们很快就成了不分彼此的亲密战友和同志。在这段时间，我又系统地研究了他们的斗争和生活。我和他们短枪队的‘老哥们’做过长久的深谈，我走遍了他们所有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最令知侠难忘的一件事，是日寇投降后的第一个春节的新年会餐。在丰盛的酒席上，正像他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他们是以古老的形式，来悼念自己牺牲的战友。他们把一桌最丰盛的酒菜，摆在牺牲了的战友的牌位前边。他们平时喝酒喜欢游拳行令，可是在这一次新年会餐席上，他们却都沉默地喝闷酒。他们隔着酒桌，望着牺牲了的战友的牌位，眼里就注满了泪水，哪怕在最欢乐的时候，一提到已牺牲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就会痛哭流涕。队员们一往情深感情，和他们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打动作家的还有那些为了革命的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也就在这时，为了悼念死者，他们有人提议，希望我把他们的斗争事迹写成一本书。”^[81]同时知侠被他们尊称为“铁道游击队”荣誉队员。也正是“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因此我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出自我个人对他们的敬爱，同时，由于他们的委托，也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了”。

不久，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全山东的军民动员起来投入了紧张的斗争，铁道队转入

了主力作战，知侠也到新的战场接受新的宣传报道任务。戎马倥偬，坐下来写作是件奢侈的事情。“因此，这一写作搁置了下来，一搁就是好几年。每当我听到他们战斗的胜利消息时，兴奋之余，马上联想到这一未完成的任务，心情也就沉重起来，总觉得有件重大而严肃的工作没有完成，并因此感到难过。”^[82]

“在这种心情下，我就用嘴来讲，像一般的故事传播者一样，在战斗或工作之余，我把他们的战斗故事，讲给战友和同志们听。大家都爱听，并深受感动。每当休息下来的时候，同志们都围上来，要我讲，有时我也主动地讲。由于我对铁道游击队故事中人物的喜爱和热心传播，有的同志见到我竟喊我为‘铁道游击队’，当时所讲的故事，也许就成为我今天小说的胚胎了吧。”^[83]新中国解放以后，作家在新的岗位上从事机关行政工作，工作繁忙，写铁道游击队的愿望成为了一种奢望。直到1952年他请假专职写作，这一愿望才有机会实现。为了完成任务，他故地重游，走遍了铁道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遍访了那些人，他们过去在这里所从事的英勇顽强战斗仿佛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浮上脑际，历历犹新，唤起了埋伏许久的创作冲动和欲望。从鲁南枣庄回到泉城济南，知侠在大明湖畔开始潜心创作《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于1953年5月杀青。在以后这本书一直陆续再版，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曾被列为全国畅销书。90年代初，国家版本图书馆对各种版本的印数统计为二百五十七万多册，加上四川、江西和贵州等地的少年版和节编本，已接近四百万册了，同时作品还被翻译成英、俄、日和朝鲜等国文字。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更是随着各种艺术样式传播成为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抗战传奇。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作者创作铁道游击队的一条完整的创作动机路径：最初，作者在听到徐广田、杜季伟讲述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时被他们传奇而过度夸张的讲述而冲昏了头脑，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当时这种创作欲望或者是一时之感动，或者是需要完成自己报道任务。当他真正地深入了解铁道队的故事以后，“他们所创造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为了要把这些英雄事迹在文学上反映出来，我经常和他们接触，并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密切地联系”。这样作家的创作欲望就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欲望。“每当休息下来的时候，同志们都围上来，要我讲，有时我也主动地讲。由于我对铁道游击队故事中人物的喜爱和热心传播，有的同志见到我竟喊我为‘铁道游击队’当时所讲的故事，也许就成为我今天小说的胚胎了吧。”尤其是接受了队员们所封的“铁道游击队”的称号以后，作家以一种无形的契约写他们刻画他们成了自己分内的事情，因为自己和他们是同一个主体，写队员们也是在写自己。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欲望的支配下，作家将写真

人真事的纪实文学的思路转变为“真实加虚构”的小说思路，“过于繁琐的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当然有的也有所加强。为了反映整个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有些地方又把它丰富和发展了”^[84]。作品杀青了出版了，作家如释重负，更加欣慰的是，铁道队一帮老哥们交付的重任完成了，他个人的创作愿望也得以实现。可是，“自己再看一遍（作品），又使我很不安，总觉得自己所写的，远不如他们的斗争那样丰富多彩”，^[85]这足以看出作家对他们的一片深情，这深深的情，作家感觉怎样表现都不够，这恰恰是作家内在投桃报李情感的一种外化。他深爱这些战士，深爱这里的人们，深爱着这片土地。正如诗人艾青深情绝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二、自我实现的动机

与战争年代的戎马倥偬紧张充实相比，解放以后，知侠进入了山东文联从事行政工作。当时行政工作的琐碎繁杂和政治运动的反复无常，使他沉闷抑郁。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为众矢之的，使他陷入长期的郁郁寡欢的境地，这一状况起源于“三反”“五反”运动时期。“三反”运动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活动，“五反”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众所周知的是刘青山、张子善两只“大老虎”在那次运动中得到了历史的清算。该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进行。“事实证明：文艺部门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同样是严重的。因此，在文艺部门中，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认真地展开这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当前文艺界的首要任务。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欧阳山在华南文联的领导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欧阳山同志已作了自我检讨。这个检讨虽然还不够深刻，但就他所暴露的许多错误思想和作风来说，已足够引起文艺界的警惕。”^[86]欧阳事件无疑吹响了文艺界打“虎”的号角和成为了打虎的催化剂。这股狂潮在主流的支持下很快由南及北，席卷山东文艺界，痛打“大老虎”成了山东文联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有“大老虎”被连根拔起，也“大老虎”遭到错打，知侠就是其中一位。^[87]一名匿名的读者写了《应该彻底检查山东省文联的工作》的举报信并且发表在1952年2月11号的《人民日报》上。

“编辑同志：……刘知侠任文联秘书长后，在使用干部上，有搞小集团的现象。他的思想作风，有许多地方令人非常不满。秘书处的的工作，常常看人行事。一九五〇年的干部家属救济粮，刘知侠一人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刘知侠和私商的关系很不干净。他

和济南的“皇宫”照相馆^[88]来往很密切，……并帮“皇宫”拉生意……他把他的被管制的哥哥从家里带出来，介绍到省政府去工作……他的爱人生小孩住医院时，有三个公务员，一个小姑娘，轮流买送东西；家里还有一位岳母，一位事务长作后应。他的爱人出院后，再加上一个保姆伺候。他爱人怀孕五个月就休养，生产后开始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平均不超过两小时。……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冯毅之同志从来没有认真地对文联的工作作过检查。他和刘知侠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两人常在一起吃喝，他也接受过刘知侠的礼物，希望有关方面对这种情况进行检查。”

一读者^[89]

姑且不论这篇报道是否真实，对刘知侠都是有影响的，在当时《人民日报》作为百姓了解新闻的重要途径，它的受众广，并且有绝对地权威。经过《人民日报》的报道，读者必定会认为刘知侠是有问题的，他的个人政治声誉也受到影响，他就是山东文联内部还没有被揪出来的“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的大老虎。这篇报道的影响还未平息，接下来“几个文艺爱好者”觉得上一封信举报得还不够彻底，有必要继续补充，没有多长时间，几篇举报刘知侠的稿件陆续在《人民日报》上发出。

编辑同志：我们认为人民日报二月十一日“读者来信”栏发表的“应该彻底检查山东省文联的工作”一信中，所揭发的事情，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在这里作一些补充。

一、两年来山东省文联从未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和文艺创作，也没有组织过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参加群众斗争，在机关内部根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少数负责干部经常忙于“请客”“招待”，几乎是“朝朝筵会，夜夜笙歌”。……

二、文联机关因人设事、人浮于事的现象也很严重。有的干部的爱人长期不工作，仍要雇保姆；甚至有的干部不做工作，竟雇两个保姆，而文联把这样的事情，美其名曰“照顾干部”。许多有正式工作的干部，工作任务不明确。结果，一个文艺工作的领导机关变成了保姆、闲员、浮员的招待所，正气不得抬头，歪气很盛。

三、……《山东文艺》创刊以来错误百出，作为《山东文艺》的领导机关山东省文联，对广大读者所提出的正确批判，并未重视和注意，任其在群众中散布错误思想的毒素。

……

五、省文联秘书长刘知侠平时作风恶劣，手脚不干净。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从开始到现在，他的反省始终是“挤牙膏”式的。譬如他在第一次反省时，只是在人所共知的铺张浪费问题上作了一番极其肤浅的检讨，等到文联派人到与刘知侠

来往甚密的“皇宫”照像馆调查时，才发现刘知侠在这个照像馆白洗像片，请客吃喝，而且有受贿的事情。经大家揭发后，他又在第二次反省时谈了出来。当文联派人到青岛追查潜逃的邓守禄及其所勾结的商号时，刘知侠恐怕到青岛又发现自己的问题，于是又谈出了曾与青岛某商号有来往关系。这种不老实的态度固然应由刘知侠自己负责，但负有文联领导责任的丁志刚（副主席）、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长，文联党组书记）也应该负一定责任。因为从运动开始，他们就对刘知侠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袒护和姑息的态度。

希望山东省文联能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把入城以来受资产阶级腐蚀的污毒彻底消除干净。

几个文艺爱好者^[90]

在1952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第6版上，“林昕和田浩”和“几位文艺学徒”继续揭发山东文联领导干部的恶劣作风。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读者所揭发的前任山东文联副主任于寄愚和秘书长刘知侠两人的恶劣作风，完全是事实。我们除完全同意外，再作一些补充：

一、于寄愚和刘知侠都是以“功臣”自居，不求上进、贪图个人享受的腐化堕落分子。他们突出的表现是成年不做工作，一味吃喝玩乐。……

二、刘知侠特别喜欢讲“派头”。他成天背着从淮海战役中私自弄来的“卡宾枪”，到处找鸟打，任意浪费子弹，不顾纪律。刘知侠的爱人刘苏（原文工团团员），经常不做工作，也不学习，住在文联里，吃中灶（刘苏本是大灶待遇），并且随便支使机关通讯员。

三、于寄愚和刘知侠从来很少参加政治学习，也不参加业务学习，每天睡到“红日三竿”还不起床，同志们多不敢提意见。……刘知侠领导编辑部的工作时，“山东文艺”发生了许多带有原则性的错误，他不问不闻，竟擅自跑到青岛去“消夏”。他明知道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要开宣教会议，却故意避不参加。他曾是“山东文艺”的副主编，他从没有说过一句。“如何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话。他竟毫不加考虑地把于寄愚写的“把地主比做猫、把雇贫农比做老鼠”的一篇有原则错误的杂文，刊在“山东文艺”的首页。

四、于寄愚喜欢玩“金鱼”，刘知侠在一边喝彩助兴。单修鱼池、买鱼缸，就花费了公家几百万元。他指定了一个“金鱼秘书”（周中瑜），和三、四个通讯员，专门钓鱼和到街头选买各色名贵金鱼，还要轮流到大明湖捞鱼食。于寄愚和刘知侠整天不作工

作，坐在池旁赏鱼。特别是于寄愚，他不管烈日和风雨，在鱼池旁一站，就是两三个钟点，机关的干部暗中反映：于副主任关心我们，还不如金于的百分之一。

五、于寄愚和刘知侠最感兴趣的工作，是经营情、庸俗、有毒的影片，如“绣鞋奇案”“说谎世界”“双枪女侠”“痴男怨女”等等。他们打着“文联”的招牌，单纯为了牟利，毫不顾及政治影响。当大众日报把读者对该影院的批评文章转给于寄愚和刘知侠看时，他们不但不虚心检讨，反而压制民主，将批评文章压下不发。他们牺牲党的政治影响，一心要把“大观电影院”变成私人的“摇钱树”和“金库”，赚来的钱都被任意挥霍了。过去山东文联每天晚上都有打“麻将”的声音，有时楼上一桌，楼下一桌，互相赛赌。

总之，于寄愚和刘知侠已把山东文联变成一个旧式的旅馆，和革命的文艺团体毫无相似之处。而于和刘本人，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正在日益堕落。我们要求他们两个人作公开的深刻检讨，以便清除山东文联在群众中的坏影响。

几个文艺学徒

编辑同志：对山东省文联领导干部的铺张浪费、官僚主义作风，已有不少读者公开揭发。但我觉得还有加以补充的必要。山东省文联负责干部有“山头”作风和自满情绪。他们平素不研究文艺政策和文艺作品，更谈不到组织别人来研究讨论。冯毅之、丁志刚、刘知侠组成一个小圈子，对文艺工作包而不办。文艺整风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很久，丁志刚、刘知侠不回文联领导运动，也不彻底检讨，却搬到大明湖畔一个幽静的地方躲风避雨，叫别人“掌握”运动，还美其名曰“离开机关进行创作”。刘知侠借口“创作”，曾在去年秋天到青岛，以每月二百多万元的代价，在风景区租了一幢小洋楼，整天坐小汽车，玩玩逛逛，吃吃喝喝，并且和商人称兄道弟。这样，他当然写不出什么文艺作品。他以后又搬到大明湖畔，后因避不过“风”，才和丁志刚搬回机关。文联同志发现了很多问题，提了很多意见，刘知侠始终是挤一点谈一点，还发牢骚说：“文联里没‘老虎’，你们拿我当‘老虎’对象啦。”

……

林昕 田浩

这几封关于“知侠问题”的读者来信，一而再再而三地见报，“三人也会成虎”。原本纯洁的山东文联，在党报多次反复报道以后，大家自然会认为有知侠之类的“大老虎”隐匿在山东文联。这就给原来对知侠有偏见的人或者本来就不怀好意的人机会，对知侠进行了批斗。尽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谁又愿意冒险为他来澄清呢。当然事实

真相经过时间的冲刷也会露出本来的样子。有文章回忆“三反”运动时讲到“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信的现象，误伤了好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91]好友王希坚在怀念知侠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知侠同志作品好，人品也好。他从抗战初期去陕北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后随军来到山东，一直是我市最有成就的老作家之一。建国后，“左”倾整人的风气方兴未艾时，他却从来不整别人来保全自己，因此往往使自己成了挨整的对象。三反五反时，他作为省文联秘书长，就受到了一次无中生有的批判和处分。”^[92]“他平时言语不多，不善于表现自己，但他对同志，对战友却有着火一样的热情，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和小同志的困难，总是无私的奉献自己的帮助，他是我们非常信赖的老大哥……知侠救了老丁一命的佳话，人们一直传颂着。”^[93]在文革期间，知侠的党性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被造反派囚禁在三层小楼上，遭到毒打，深夜他缒绳逃命，“不久，由于党性观念太强，刘知侠从肥城寄出了6个月12元的党费，暴露了住地”，造反派通过汇款单上的地址又找到了他，知侠再次遭到追捕。自己被造反派追捕，但他还不忘邮寄党费，看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置生命安危于不顾，对党和人民的无言述说和不尽忠诚。

在这样一个“思维简单化的政治一体化时代”，这种举报信一旦在具有权威的党报上刊出，不论是否属实，读者更愿意认为来自于官方媒体的报道是真实的。类似报道的一次次累积，造成了读者向一边倒，形成了“沉默螺旋效应”。经济界有“劣币也会驱逐良币”的良训，同样在人类生活中也有负面信息掩盖正面信息的教训。这种媒介信息传递的单向度造成了“刘知侠就是大老虎”的论断是理所当然的，他的问题是客观属实的。在这种外部环境压迫下，知侠处于失语的状态，无处诉说也无人听他诉说，即便给别人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因为三人成虎谎话，讲一百次也会成为事实。代表群众话语权力的举报信被主流官方政治权力认可，并得以合法化，被冤枉的刘知侠自然成为了这种“暴力话语”的祭品。

这种创作动机不仅仅知侠有，创作了《林海雪原》的曲波也有类似境遇。曲波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至于我怎样写出来，纯是偶然事件。我负伤后转业到地方，当党委书记，经常要对工人进行传统教育，我就讲杨子荣的战斗故事。四年中讲了七八次，越讲越精炼、集中，越叫座。后来因在一次工业会上我发表了对一长制的不同意见，触怒了主持会议的高岗，我碰了大钉子，就调到北京工作了。当时，七情除喜外，六情都有。每逢佳节倍思亲，回忆当年，回到战争的年代，津津有味。我想我能不能写成一本书？开始我觉得咱没有那个本事，后又想，是不是可以较量较量。于是下定决心干，一个年三十，喝上酒，打开窗，飘进雪花，写下第一句：‘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战友……’，

我腹稿已达到相当熟练程度，人物情节都熟了，再加上当时心怀不通，只有一路通，如不写好，誓不罢休。我从事文学创作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写成后，没想到很快成功了，作家出版社表示很喜欢。”^[94]

对于“心怀不通”的作家曲波来讲，1955年的春节除夕夜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他“每天写一本书，不感觉是坐在温暖的宿舍里，而是在林海雪原和小分队的战友们在一起”，心中郁郁寡欢，怀才不遇的卑中情无以言表，这种情感不亚于对战友的思念，怎样体现自己的价值，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把自己的战友写好，把这本书写好，证明自己英雄未老，尚能饭也，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要“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战友……”同时也是送给自己，和那些对自己有歧视和偏见的人，正如勒热讷指出，强调为他人着想之后，作者就可以为自己的写作寻找某些个人的动机，“找到自己一生所隐藏的意义，为将来总结出一条生活之道，从而为自己定位”^[95]。这是贯穿于曲波写《林海雪原》的一个核心动力，这种动力对于其他的作家也有借鉴意义，对于知侠而言也是如此。幸好，这些作家，经历过炮风弹雨的“战士”，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被打垮，他们以手中的笔为枪，以墨为弹，向自己的斗争对象进行猛烈反击。他们是海明威笔下的战士，“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跟曲波相似，作品的成功自然是对不公正待遇和被无端歧视的最直接的反抗与精神超越。刘知侠把这种内在创伤或心怀不通转化为精神驱动力，全身心致力于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创作。作家写就了《铁道游击队》，反复修改，并邀请铁道游击队的指战员专门为小说提意见。作品一经正式出版便获得了成功，在出版的同一年就连续印刷多次，印数高达400万册，翻译成10国语言。

三、响应主流的动机

新中国成立以后，继承光荣传统，改变国民陋习，打造新的国民精神成为国家的任务之一，以一种柔性的方式构建国民精神，文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强烈的邀请态度，强力呼吁有写作能力的农军青年加入到轰轰烈烈的文艺写作之中去。“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

术的记载。”^[96]“文学艺术在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用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工作上，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他们是建设新社会的接班人，需要肩负艰巨的复杂任务，需要他们不断地去克服新的困难。社会主义文艺应当通过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真实描写，帮助青年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帮助他们认识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认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艰苦过程，培养他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的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使他们对于当前的时代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未来的任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为了同样的目的，还要通过文学艺术向青年们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和民族传统的教育，让他们具体地了解我国人民革命的战斗历程和英雄事迹，了解我国各民族历代祖先艰苦创业、英勇奋斗的历史。”^[97]上面的这段话已明确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的使命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之间的关系，文艺一则“让青年们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再则还能让青年微笑面对人生，继续为我们社会建设添砖加瓦，而这一过程中由革命历史书写加工成的教科书，为培育新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建造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新型国家，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人在试图通过构建新人，改造国民性来实现。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一文中讲：“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然则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此其功虽非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今日舍此一事，别无善图。宁复可蹉跎蹉跎，更阅数年，将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复得者。呜呼，我国民可不悚耶！可不勦耶！”^[98]承前启后，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认为“复健肉体不若改变精神”，他认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99]借文艺的魅力和精神来构建、改造和提升国民性是近代以来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所达成的共识，从梁启超到鲁迅，从《少年中国说》到《阿Q正传》，这些仁人志士，这些经典元章都彰显着他们为了提升国民性，打造新人所做的努力。同时以毛泽东思想为先导的新中国文艺也有着同样的认识，新中国的文艺大管家周扬在1949年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就疾呼：“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

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100]“……这就是说，要歌颂他们坚韧的斗争意志、忘我的劳动热忱，表扬他们对集体、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无限忠心，借以培养人民的新的品质和新的道德，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101]“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102]

在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邀约下，一大批经过战火洗礼的“苦孩子”开始大胆而热情地写作，他们出生在丑恶的旧社会，成长在战火中，生活在新时代，他们对这两种社会有着直接的认识和体验。虽然他们的文字能力与五四时期的老作家比还比较稚嫩，但是他们根正苗红，是党遴选出来的书写这段历史最合适的人选。虽然他们驾驭长篇题材还有些力不从心，语言不精炼，文法修饰还不妥帖，但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读者整体水平还不太高，他们所写的这样的文章读者更愿意接受，读者就喜欢阅读这样的文艺作品，可以打发他们的劳动、工作之余单调的时间。百姓关注的是故事情节，关心的是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塑形进入了他们的思想视野，成为他们道德的楷模，身边的榜样，行为的标准。《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在谈到创作缘由时深情的说：“我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那时候在党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情绪非常高涨，感动了我，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到后来，觉得这些先烈、前辈们在领导这个地区的农民斗争中，对革命贡献很大，他们的斗争事迹应该保留下来，传给下一代。这是我写书的动机。”^[103]作家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形象，如：刘洪、王强、芳林嫂、李正、江姐、林道静、刘胡兰、方志敏等等。现实中的人们在回忆过去之苦更能体会今天之甜，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全身心的投入到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之中去。在自己的行业内建功立业，个体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也使传统的家族思维和宗法观念变得浅薄，大家更愿意为国家为集体（大家）而舍小家，才愿意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尤其是刚刚解放，国家一穷二白的前提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正悄悄地巧妙地实现了意识形态的规训功能，这些作品恰恰巧妙缝合了主流的精神和思想形态，作品成为了主流的腹语。正是在这些作品的感召下出现了一批“欧阳海、雷锋”们，这些革命历史作品对于打造新人，无疑起到了召唤意义。正如小说《欧阳海之歌》的结尾所描写的那样“……在这短短四秒钟内，欧阳海都看见了些什么？”

迎着扑将过来的列车，也许他看见了一条英雄的大路：瞧！董存瑞在大路上走着，他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响了导火索，坚定地站在“桥型碉堡”下边。看黄继光在大路上走着，他飞快地扑向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回过头来，眼睛望着冲锋的战友和胜利的红旗。看！张思德在大路上走着，他正挑着一担刚刚出窑的木炭，从安塞的山里边笑呵呵地走下山来。江姐也在大路上走着，她还穿营那件红色的绒线衣，步伐是那样坚定有力，神色是那样泰然自若……无数的人民英雄在欧阳海眼前出现了。有的为新中国举起了炸药包，有的为中朝人民用胸膛堵住了枪口，有的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到最后一息，有的为了实现人类崇高的理想，含着笑容走上刑场……大路上的英雄们用生命抚育着欧阳海。在这即将发生翻车惨剧的关键时刻，面对飞驰而来的列车，这不正是他的桥型碉堡吗？早就准备为革命献身的欧阳海，他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哩！”^[104]相信读者读了这些充满了正能量的文字，会以小说中的人物为榜样，也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最可爱的人”，“还有什么可选择的早就为革命献身做好了准备”。他们的故事让每一个读者都热血贲张。它指引着普罗众生为了新中国的革命建设为了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奋勇向前。这样的文字所宣扬的精神巧妙地将主流的训诫春风化雨般滴灌到每一个读者的心田。

第二章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铁道游击队》文本表达

与《红色娘子军》是作者根据史料上的一段历史虚构和生发出来的相比，作者知侠口口声声说《铁道游击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出来的”^[105]。对于新版的影视剧作品，有铁道队队员大声疾呼：“老电影和新的电视剧我都看过，老电影里的事都是真的，新的不行，太假了。”^[106]为了进一步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在小说最初出版时编辑特意加了一章地图，美其名曰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鲁南地区”图。对于作者本人、老队员和小说文本都在试图澄明《铁道游击队》小说和电影的真实性，我对此始终抱着难以苟同的态度。《铁道游击队》小说印数高达四百万册，连环画一千万的印数成为了时代传奇，1956 版电影《铁道游击队》感染了几代人，各版的电视剧更是每晚让百姓意犹未尽，欲罢不能。几代中国人对这本小说和其衍生文本趋之若鹜的原因，难道是它的“历史真实”性吗？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分析艺术作品的艺术性与历史性时，往往对艺术盲信盲从，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失去了主体的意识，往往会认为艺术作品就是历史真相。历史就变成了各类小说和衍生作品的组合，这些艺术作品中的描写成为我们心中的历史。一切革命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发生的年代不重要，重要的是讲述历史的年代。正是如此，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界限才会像冰雪一样消融，艺术作品成为了“我们革命理想主义政治信仰的精神支柱”^[107]。我个人坚信铁道队队史的本真，同时赞成小说中所构建的艺术虚构。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毕竟分属于不同范畴，我们不能将其混淆，让对方暗度陈仓进入他方的领地。基于此，我特别关注铁道游击队队员的口述资料或者他们自己书写的回忆资料，因为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基本上贫农出身，没有文化。但是通过他们的口头讲出来，别人帮助记录，这样资料也比较保真。这些回忆资料也权威，可以称得上是铁道游击队的队史，纵使官方出版的历史资料那样完善和精致，但他们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只有他们，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为那个时代代言。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把众多的口述历史资料汇总，阅读他们试图勾画出一部严丝合缝的铁道队的队史。不过在整理斟酌甄别鉴赏后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鲁南铁道游击队”原型人物如杜季伟、刘金山、王志胜等队员的回忆资料，发现任何一件具体历史事件都不能够做到内容统一、细节一致，即便像一些在“铁道游击队”队史上光耀千秋的重点事件，如“政委出山”“二打洋行”“打岗村”“临城受降”“巧截布车”等，每一个人的回忆也都有所偏差，回忆的细节让人疑点丛生，真假难辨，这就使我对这些队员回忆资料的真实度产生了疑虑。他们的话语间充满了矛盾，探究这

些资料的矛盾并且探究这些历史罅隙对小说艺术真实性的影响，成了本章研究的起点和动力。

第一节 历史资料的矛盾

一、“政委出山”史料质疑

杜季伟接到苏鲁支队命令，要求他去铁道队担任政委职务，这一历史事实在杜政委的历史回忆中就产生了多种版本：①1940年1月的一天上午，政治部李主任下令派杜季伟去铁道队当政委，杜认为自己刚刚的提升为副教导员，还不能胜任团职的政委角色。经过政治处李主任的开导，杜接受了任命“我辞别了战友，又找老乡换了一身破旧棉衣穿上，当晚就离开了山区根据地。在一个侦察员的带领下向枣庄出发了”“公开身份是你们的管账先生，名字叫李鹤亭，他们称我李先生。”^[108]，②1939年的冬天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命令，李主任谈话的第二天，我交代了营里的工作，换上一件旧棉袍，前往枣庄。我的良民证上写着刘鹤亭，二十八岁，陈庄人，经商^[109]，③我是在1938年12月进入枣庄的，^[110]④1940年2月，苏鲁支队决定成立铁道游击队，派杜季伟来枣庄任铁道游击队政委^[111]，作为事情亲历者的杜政委在接到任命后，对自己出发的时间和日期在每一次的叙说中都不尽相同，有时说是1938年、1939年还有说是1940年等。如果说杜政委对自己出发的细节记忆不清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绝不会忘记自己曾用过的化名，忘记自己是李鹤亭还是刘鹤亭，亦或者是口述记录者将李和刘误听误记。虽然这些细节放在整个铁道游击队战史中无关宏旨，那么它也表明铁道游击队员发自内心的口述只是一个个虚幻的美丽传说。

二、“任命书”史料的质疑

李政委来到铁道游击队后，在与游击队员们的见面会上宣读了上级关于成立铁道队任命书。在他的口述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我也宣布了苏鲁支队的任命书：鲁南铁道队队长洪振海、政委杜季伟，副队长王志胜、赵连有。鲁南铁道队隶属八路军苏鲁支队领导。”^[112]如果说杜政委的任命书可以算得上言简意赅的话，然而在大队副王志胜(王强的原型)那里任命书就变得丰富和详实，“枣庄情报站洪振海、王志胜同志：报告收悉。一年来，你们在抗日斗争中做出可喜的成绩。经研究，同意你们在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拉起武装，可称为鲁南铁道队。隶属苏鲁支队建制。任命杜季伟为政治委员，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有为副队长。此令，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李乐平，参

谋长胡云生。政治部主任李荆山。1940年1月××日。”^[113] 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任命书被口述为：“枣庄情报站洪振海、王志胜同志：报告收悉。一年来，你们在对日寇斗争中做出可喜的成绩。经研究，你们可立即成立铁道队，隶属苏鲁支队建制。特命如下：杜季伟为政治委员，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此令。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 政治委员李乐平 参谋长胡云生 政治部主任李荆山 1940年1月25日”。^[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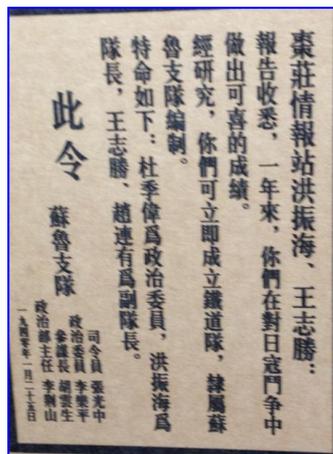


图 2-1 “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任命书

无论任命书简洁或详实，问题的关键是是否存在这样一份任命书。假如真的有这份任命书，这份任命书现在尚存也是个问题。作为两个当事人杜政委和王队副，一个人记忆是模糊的，寥寥几字一带而过，而另一个详实具体，不但日期记忆清晰，连任命书的细节也一字不落。可是让人产生疑问的是，无论后两个版本的任命书多么丰富和仿真，其真实性仍让人大打问号。让人感到更加可爱的是其中一个任命书的内容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成为“真实”的任命书，被后人观看膜拜。^[115]（见图 2-1）

三、“部队情况”的史料质疑

铁道队的第一任政委杜政委和大队副王志胜作为铁道队成立时的领导者和见证人，同时也是战争结束时的健在者。他们对铁道队成立之初的武器装备和队伍人数说法不一，甚至差异很大。对于杜季伟本人来说至少存在着五种迥异的说法：①“说是铁道队就只有八名队员，在炭场里号称“八大金刚”“他们只有七八个人，两把短枪^[116]”“这时，他们已秘密发展了 11 名队员”“他们当时只有一支手枪，感到力量不足，巧妙地进入洋行院内，将三个特务头子毙二伤一，缴获长短枪各一支，然后安全撤出。他们又飞车搞机枪，一举成功。受到苏鲁支队的表扬，并奖励他们两支手枪和 500 元钱。”^[117]也就是说他们至少有 11 人 3 支短枪和 1 支长枪，②“洪振海任大队长，我任政委，王志胜任副

大队长，下有 11 个队员，只有一支短枪其他是大刀片，还有徒手的”；^[118]③“我了解到全队只有 11 个人，1 只短枪”“政委，打日本侵略军、除汉奸咱不含糊，可目前咱全队只有一支枪怎么能行啊”^[119]；④“我们名声响，人手并不多，眼下只有八九个弟兄。洋家伙(指枪)只有一支”^[120]⑤“我们十八个队员只有三支枪寸其余的武装就是大刀。”^[121]身为铁道队主要领导的杜季伟政委在多次的回忆中对于自己领导的队伍人数和武器口径不一，不禁让我们生发疑问，这个在小说中如此有党性的领导到底在实际工作中干了什么事情，莫非是自己不作为，连队伍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掌握。作为大队副的王志胜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对这些情况的说法也不相同：①“我们炭场子越办越兴旺了，这时全场 11 个人”。“分别时，张司令把随身用的一支 20 响驳壳枪交给我们”“打洋行，我们要了那支短枪，从此，我和洪振海每人都有 1 支短枪了，实现了张司令的‘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武装自己’的第一步计划。”，“我们的炭场子利润是挺大，卖的炭钱 80% 是赚的。我们将这些钱除上交支队和自己消费外，还买了两支短枪。”^[122]也就是说在铁道队正式建制时人数应该达到十多个人，武器应该有至少四支短枪；②“1940 年 2 月，枣庄铁道队更名为鲁南铁道队，此时，全队已有 10 多名队员”，“我们从朋友处借了一支手枪，在夜幕的掩护下摸进洋行，将正在熟睡的 3 个以经商为名、行特务之实的反动日特毙伤，缴获长短枪各 1 支。”^[123]在这时铁道队已经有了 10 多名队员有长短枪各 1 支。政委和大队副各人有各人的见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谁说的细节是真的呢，我们疑点重重。也许有的人会为他们辩解说这是记忆错误，是过往的细节，可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件事仅仅发生在铁道游击队刚刚组建的时候，人员和武器装备相对较少，他们有能力记忆清晰。因为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队伍而言这属于“童年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对于领导人来说记忆当然是清晰的，每一个细节记忆会分厘不爽。“记忆错误”，这样的注解显得软弱无力。如果连这些基本数据都不能记忆清晰的话怎么能当一个足智多谋的领导呢，这种种解释给人留下广阔思考空间。

四、“一打洋行”的史料质疑

“一打洋行”是小说刘洪王强二人回到枣庄后的牛刀小试，也是铁道游击队军事生涯中的战斗序曲，更是队员们引以为豪的一次智斗。早期的游击队员对于该事件是熟悉的。当他们回首追忆这个事件时，同样存在着混乱和出入。

老铁道游击队员赵明伟生前接受《杭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说：“1939 年 8 月的一天夜里，老洪他们 3 人准备动手。王志胜熟门熟路，带着老洪等人摸进洋行。洋行离车站

炮楼只有几十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鬼子做梦也想不到，“毛猴子”（敌人对游击队的称呼）竟然胆敢跑到鼻子底下“摸老虎屁股”。3个鬼子喝完酒刚睡下，还没反应过来，就稀里糊涂地被老洪们用大刀夹头夹脑地劈了。前后不到10分钟，老洪们已完成任务，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出洋行，炮楼上的鬼子一点也没察觉。”^[124]在赵明伟老人看来，王强三人不费吹灰之力直捣鬼子的老巢，用大刀片轻而易举地一派砍杀，鬼子稀里糊涂地命归西天。除此，在第一任政委杜季伟那里还有好几个不同版本：①“1939年8月，洪、王二人决定杀掉洋行的三个经理。他们当时只有一支手枪，感到力量不足，又联系了与八路军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第五十支队的警卫员宋X X，并由宋借了两支手枪。三人借夜深人静时，巧妙地进入洋行院内，将三个特务头子毙二伤一，缴获长短枪各一支，然后安全撤出。”^[125]②“洪振海、王志胜为首的铁道游击队、决心拔除这个钉子，夺取武装，扩大影响。当时两个人只有一支枪，通过社会关系经宋四九又借到两支短枪。于七日夜，洪、王、宋去袭击洋行。三个鬼子正在开会，当场被击毙两个，另一个负伤未死。”^[126]如果说赵明伟和杜季伟没有亲自参加战斗，是这次活动的旁观者的话，那么作为该事件的策划者参与者，王志胜本人在不同的回忆文章中仍然有着不同的描述：①“我们从朋友处借了一支手枪，在夜幕的掩护下摸进洋行，将正在熟睡的3个以经商为名、行特务之实的反动日特毙伤，缴获长短枪各1支”^[127]。②“我们3人摸进洋行，将正在熟睡的3个日本特务全部毙伤。随即安全撤出”^[128]。③“我与洪振海商量，决定利用鬼子麻痹之际，立即将其铲除。我俩只有一只手枪，武器不够。于是，我们便找到跟国民党50支队司令梁继璐当警卫员的宋世九说：“洋行里有很多钱，我已看好了，咱们一块搞去吧！再来咱们对半分。”宋世九当场答应一块干，并负责借两支短枪。1939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们3人摸进洋行，将正在熟睡的3个日本特务当场打死，随即安全撤出。”^[129]与赵明伟所讲的，“鬼子是用大刀片砍死砍伤”的不同，王志胜讲鬼子是他们三个人用枪给打死的，并且是以洋行里面有钱为理由，而召集国民党的警卫一起行动的。而王志胜说的“宋世九”，在杜季伟那里也变成了“宋四九”、“宋X X”等称谓，到底是四九、世九、也许是记录者听力混淆（因为在枣庄地区平翘舌不分），到底是鬼子在开会还是鬼子在睡觉时被我游击队打死的，历史事实在这里成为一个谜，单独看每个人的讲述都貌似真实，文本间互文分析后发现事实真相已经在历史长河中消失殆尽。

五、“小屯整训”的史料质疑

在杜政委来到铁道队不久，针对队员们作风涣散纪律性不强的状况，经政委提议，在枣庄西南约 20 里的小屯（小屯当时是峰县二区区委所在地和秘密联络点）进行了一次整训学习。在 15 名队员中抽调出 7 名进行了第一期的培训学习。政委杜季伟和大队副王志胜对该次学习效果分别进行了评价：①“1940 年 4 月，为进一步加强政治军事教育，我们在小屯举办了一期为时 7 天的训练班。当时全队共有 15 个人，抽出 7 个。但由于他们散漫惯了，受训如入笼之鸟，加之我过急的要求和教条主义，不适合他们的口味。比如当我在进化论中讲到猴子变人时，有的队员就跳起来反对说：“日本鬼子整天骂我们是‘毛猴子’，你怎么也骂我们是猴子变的？”结果训练班只办了 5 天就结束了，收获不大。7 个人参加训练，只有两个说我讲的还不错。结果第二期也办不成了，以后便采用到群众中去进行教育的办法。”^[130]②“每次受训七、八个人。他们受训时还带着酒瓶子，在农村弄不到吃的就对村长发脾气，纪律很成问题。”^[131]队员基础文化素质是差的，分不清科学话语和日常土语。在杜政委看来，整训的效果是差的，是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的，队员们一副无所事事，不思进取的样子，没事找事，胡搅蛮缠。在整训的前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王志胜大队副认为整训的效果截然不同：①“办训练班期间，我仍带着其余 8 名同志开炭场子。后来听说由于队员们散漫性大，不愿蹲下来学习，加之训练内容脱离实际，不适合队员的口味，如讲人类进化由猿猴变人时，有的就说：“日本鬼子称我们为‘毛猴子’。您为什么也唱鬼子的调？”这样，训练班仅办了 5 天就结业了。尽管时间短，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打架骂人的现象少了，集体观念、保密观念以及组织纪律性都有所增强。以后，我们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对队员中的缺点毛病能及时教育，个别谈心，帮助纠正。对极个别错误严重的同志，也采取了组织或行政纪律的手段，逐渐培养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132]②“尽管训练班时间短，仍取得明显效果，铁道队的战斗力有了提高。”^[133]很显然王志胜认为培训班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队员们是配合的，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一改杜季伟政委认为的效果不理想，没有达到效果的看法。山东省档案馆中保存了一份杜季伟政委在 1946 年写的“鲁南铁道队介绍”^[134]的文字，我们能够更加详细地看到这次活动的某些细节。“计划用七天的时间完成初步的思想改造。培训的内容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论持久战》，意在加强对队员们的阶级教育与抗战前途教育。队员们唯恐生活受到了限制，于是乎扛着煤炉子，担着柴、米、油、盐，提着烧酒和纸烟，踌躇满志地开进了距离枣庄只有 10 公里元的一个小村庄，培

训班正式开课。队员们感觉受训像笼子中的鸟受困，枯燥无味，难以为继……结果培训班只开了5天，就匆匆结束。”^[135]这些队员们哪里是去锤炼思想，他们倒像是度假，受苦在后，享乐在前，在这种思想的左右下，以整风为名的这次活动，自然效果不佳。不过通过这个情节也能看出我们党一以贯之地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这项工作的持久性、必要性和艰巨性。在文章中也能看到知侠对于政治整风运动的一种渴望，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保持政治先进性的一种自觉。

六、“飞车搞枪”的史料质疑

1939年10月，王志胜在枣庄车站发现有一批军火弹药准备发车外运，他们认为是搞武器的好机会，搞到这批枪自己可以留着补充自己的实力，也可以送到山里去补给大部队。在装车时王志胜对武器进行了标记并放在了靠近车门的地方，对车门铅封进行了伪装，做足了搞枪的准备。“晚9点左右，火车开出站，洪振海等便跃上火车，待火车进入我们预定的地点——王沟西侧时，他们将包扎好的两挺机枪、12支马大盖步枪、两箱子弹掀下火车。”^[136]在随后对这批武器的处理过程中，当事人之一的王志胜是这样讲述的。①“跳下火车后，3人齐动手，将这些武器弹药运往蔡庄赵永源家的地瓜窖里暂时隐藏。当夜，张司令派了一个连队来将武器弹药取走了。”^[137]②“随后，我们将这些武器弹药运往蔡庄赵永泉家的地瓜窖里，并及时报告苏鲁支队。第二天夜晚，张司令派一个连，将武器弹药取走。”^[138]③“连夜派人报告支队长张光中。张支队长给予我们高度评价，并及时派连队将武器弹药取走。”^[139]从列车上搞下来的机枪放在赵永源家还是赵永泉家，武器是当夜运走的还是第二天夜里运走的，在同一个人的讲述中有截然不同的答案。飞车搞枪是王志胜做好了前期工作，由洪振海大队长实施的，因为洪大队长战斗中牺牲了，因此王志胜的口述变得格外重要。这件引以为豪的事情，王志胜讲给了家人。在不同的场合，我看到了王志胜老伴和他儿子王金国的两份视频资料。其中有一个细节，两个人的讲述不尽相同。王志胜的老伴说：“当时老王是用红色的粉笔在火车车厢上做的记号”，而王金国则明确说：“当时到哪里去找粉笔，就在地上找了个建筑工人干活剩下的白灰块在车厢上画了个记号”。自家人对细节的讲述也不相同，这真是真假难辨。

七、“二打洋行”的史料质疑

“二打洋行”是铁道队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的一次重要的战例，也是各位老铁道游击队员又一引以为豪的战斗。“打好这一仗，对于打击敌人气焰，提高我军威望，树

立必胜信心，都关系重大”^[140]。对这些亲历者的回忆材料进行爬梳分析会发现人人讲得都很精彩，但是他们之间重要的史实细节都各不相同。我们先来看看大队长王志胜的几种说法：

①“8月下旬，洋行里……由日军特务机关的矛山·郎大佐任大掌柜：当晚10点，我们32名队员到了洋行附近，手持铁钎和铁锤在院墙上挖起洞来，第二天早晨4点，洞挖好了，我们进去4个组，每组4个人，洪振海带一个别枪组在外面掩护，我住院子里任总指挥，迅速将分住在四间屋子的敌人全部干掉。这次夜袭洋行，杀死13个日本人和1名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141]（②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将洋行内日特、汉奸14名全部击毙，缴获长短枪6支。”^[142]）

③“我根据侦察来的情况确定去32名队员，分成5个组。队员们分别带短枪和大刀片。一计算，大刀片不够，我们……借了好几把大刀片。……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我们进去4个组。每组4个人，配备1支手枪和3把大刀片。洪振海带一个短枪组在外面掩护。我在院子里任总指挥。战斗组按预定的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三下五除二，分住在4间屋子的日军全被干掉，三四分钟解决战斗。我们正准备集合撤出，发现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到。我过去向那屋里一看，1名日本兵手持白腊杆正在与梁传德搏斗。我用手枪一点射，将那日兵击毙。这次夜袭洋行，杀死13名日兵和1名日本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块。”^[143]

“尽管杜政委在袭击方案确定后便回山里向首长汇报行动方案。”等战斗结束了他才回来，但是作为领导者，听取了同志们的汇报，对事件也是很熟悉的，他的回忆应该有很高的真实度。

再看看杜季伟政委是怎样说的：

①“我们决定从洋行南边厕所旁挖墙而入。一切准备妥当，这天夜晚，我们把全队十六个人集合起来，分成四个战斗小组。每组配一支短枪三把大刀，悄悄地摸到洋行南边墙底下。……一阵刀声，十四个敌兵脑袋搬家了。”^[144]杜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杀死13名日本特务和1名翻译”^[145]。

②“我们的力量很小，全队只有十四个人，一支枪。怎么打好这第一仗呢？……我们十四人，一人带手榴弹监视日军营房的动静，一人带手榴弹监视火车站的敌人，其余十二人分为三个组，每人持一把大刀片。……按照计划，……十二个队员犹如十二只猛虎，同时冲进南、西、北屋，挥舞锋利的大刀，抓着鬼子就砍……不得不象剁饺子馅一样，七上八下乱砍乱杀，直杀得日寇鬼哭狼嚎，血肉飞溅。……给敌人留下的是十二具血肉

模糊的尸体。”^[146]

③ “我们十八个队员只有三支枪寸其余的武装就是大刀。第一次袭击后，鬼子司令是矛山三郎（有一说矛山郎^[147]）。……十六个人分成四组，每组一支短枪，三把大刀。……这次共杀死十四个人（其中包括翻译和日寇家属各一人），缴获了三支短枪，其他物资未来得及搞，只弄走了一个皮箱，都是衣服。”^[148]

④ “这次行动共抽调 32 名队员，分为五组，一组担任警戒，其余四组分别负责消灭四间屋子里的敌人。……共杀死十三名鬼子和一名日伪翻译，缴获长短枪各六支，手表、怀表 100 多块。”^[149]

⑤ “我们 14 个人分为四组，每组 3 人，剩下两个人分别带手榴弹监视大营房和火车站日军的动静。每人拿一把大刀片，全队就一支短枪，由王志胜同志带着。洪队长一声命令，队员们一个个势若猛虎下山，破门而入，舞起锋利的大刀，抓起日本人就乱砍乱割。他们把平日对敌人的仇恨全集中在刀刃上了，直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飞溅。不一会就把东屋，南屋及西屋的敌人全砍死了。……敌人的哨兵听到叫声后立即鸣起枪来，……情况十分紧急，必须马上撤离。但进北屋杀鬼子的同志仍未见回来。副大队长王志胜进去一看，只见三个日本人死了两个，另一个光着上身，下身只穿一个裤头，手里拿一根棍子乱舞。我们的队员拿的大刀柄短，砍不着他，所以就象走马灯似的在屋里转圈。王副队长看到这种情况后，一甩手枪，“叭”地一声就结束了这场走马灯战斗。这时枪声更紧了，从洞里一个个地往外钻已经来不及了。一转眼，我们便全部冲出大门，消逝在夜色里，带着缴获的武器和其他战利品安全转移了。给敌人留下的是 13 具血肉模糊的尸体。”^[150]

读了这两位领导者的诸多回忆资料，我们感觉到了很多的困惑和矛盾：第一，当时参加战斗的人数是 14、16、18、32 人，参与人员最多的比最少的多了 1 倍；队员们按计划分为了几个小组呢？是 3 个、4 个还是 5 个；杀死的鬼子是 13 人还是 14 人，这些人中有几个是翻译官和家属，被杀死的大掌柜叫什么名字是“矛山三郎”还是“矛山郎”；第二，袭击洋行时铁道队有几只枪呢？是 1、3 还是 14 支，是用大刀片砍死的还是用手枪打死的还是手枪与大刀片相结合杀死敌人的；第三，战利品的问题，是“缴获带走了多少长枪、短枪、手表、怀表”，还是仅仅“缴获了三支短枪，其他物资未来得及搞，只弄走了一个皮箱，都是衣服”。如果这些仅仅代表着一些细节，时间的久远令我们无法记清楚的话，那么更让我感到困惑的是“王队副点射日本兵”的细节，“我们正准备集合撤出，发现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到。我过去向那屋里一看，1 名日本兵手持白腊杆正

在与梁传德搏斗。我用手枪一点射，将那日兵击毙。”按照王志胜自己的讲述，他们进到洋行的时间是凌晨四五点钟，鲁南地区冬季的在这个时节天还是黑的，到6点钟以后天才放亮，铁道游击队进入房间也不可能采取任何照明措施，基本上是凭着感觉在室内战斗，如果是这样的话，王大队副“进去一看”又怎能看清人呢，如果看不清楚人的话，又怎么能够举枪点射。“一甩手枪，‘叭’地一声就结束了这场走马灯战斗”，我对于这个情节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有着故意夸大其词的可能。

八、“智打票车”的史料质疑

日寇集中兵力对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为了牵制敌人的扫荡，我们决定截击列车，扰乱敌人的后方”。^[151]票车是一个移动的舆论场，也是信息的集结地。火车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能够把消息带到南北上千里，信息传播速度快且不需要任何成本，同时也能让人民亲眼看到游击队是怎样智取敌人的，从而更加相信这支人民的武装。打了票车，就能“牵制扫荡山区鬼子的腩”^[152]，同时也相当于打了那些窝居在枣庄城里敌人的脸，一举多得。“打票车”是铁道队战斗历程中的又一经典战例，同时也是小说、电影、电视剧、评书、京剧等各种文体最喜欢改编和展现的场面之一，这个故事更是表现军民鱼水情的一次战例。但是这个情节在亲历者的口中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先来看一下杜季伟政委的各种现身说法。

①“梁传德，王志友同志化装商人从泥沟上车，王志胜同志带一个短枪班化装农民从枣庄上车。组织的区中队在曾店四孔桥潜伏监视敌人。规定了时间、信号。由洪振海、曹德清同志化装为工人从王沟西头爬上车头，将鬼子打死掌握了机车的行驶。这时各组都已将鬼子钉住。……全体队员齐起行动。这次战斗，共杀死八个鬼子，缴获长短枪各四支，以及布匹、百货十余车，均运往根据地。”^[153]

②“1940年6月，我们决定截击日军押运的混合列车。经侦察得知，车上有布匹和日用百货。洪振海、曹德清从王沟跃上车头，打死司机，掌握列车的驾驶。……王志胜带1个短枪班，化装成农民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154]

③“1940年7月底，……按照预定计划，洪振海带领十二名勇敢机智的队员组成先遣队，预先入列车，选中目标，拿出事先备好的烟、酒、点心等食品与敌一齐吃喝，稳住敌人，王志胜带领十二名精干的短枪队员埋伏在预定地点。火车开动后，洪振海首先除掉日本司机，控制机车。列车一出王沟车站，按预定部署，车速减慢，王志胜带领十二名短枪队员跃上火车，与早已在车上的队员紧密配合，将二十余名日军全部杀死，又

在最后一节车厢内找到了装现款的帆布袋子，立即撤出战斗，我队员无一伤亡。这次打票车共缴收现金八万多元，短枪八支，长枪十二支，手炮一门，机枪一挺。”^[155]

再来看一下王志胜大队副的各种现身说法：

①“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我们挑选了 12 名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情况，稳住敌人；我带 20 名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埋伏；洪振海、曹德清负责控制火车头，……这次打票车共得 8 万块钱，并缴获短枪 3 支，长枪 12 支，手炮 1 门，机枪 1 挺：经上级批准，除留 3 支短枪外，其余全部上交鲁南军区。”^[156]

②“此次计毙敌警备司令以下 20 余人，缴获伪钞 8 万余元，枪支若干，军用品一宗”。^[157]而杜季伟有一文认为：“奇袭敌票车，将敌警备司令以下 20 人全部击毙并活捉伪军 34 名。”^[158]

③“我带 12 名精干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埋伏好。……星期六的这天，赵永泉、刘炳南等人分别带领队员化装从泥沟、峰县城、枣庄上车。可是他们到了车上一看，发现日军比原侦察的人数增加了 10 多个。经他们了解，这部分日军是由枣庄到王沟换防的 1 个小队，装备齐全。面临这一新的情况，队员们都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各自盯着自己的目标。有的同志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烟酒、点心和烧鸡来“慰劳太君”。日本兵见这些工人、农民、商人打扮的“乘客”这么“实在”，并没有在意，也就与队员大吃大喝起来。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和队员曹得清熟练地跃上火车头……列车一出王沟，猛一刹闸，车速放慢，我带领 12 名短枪队员敏捷地爬上火车，与早已在车上的队员互相配合，20 余名日本兵全部被杀死。我们又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帆布袋子抱下车，立即撤出战斗。参加战斗的 32 名队员无一伤亡。这次打票车共得到 8 万多块钱。并缴获短枪 8 支，长枪 12 支，手炮 1 门，机枪 1 挺。这些战利品，经上级批准，除留 3 支短枪外，其余全部上交了鲁南军区。”^[159]

尽管杜政委与王大队副同样作为亲历者，两人都对同一场战斗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可是我们却不难发现，仍有其不尽相同的战况细节：其一是铁道游击队参加战斗的人数由 16 人变为 24 人又变成了 32 人之多；其二是歼灭敌人的数量由 8 个变为了 20 个，同时俘虏的人数也多达 34 个；其三是缴获战利品枪支（长枪加短枪）8、15、20 支不等，而且门炮和机枪的数量也不尽相同，现金由 8 万元变成了日用百货。其四，队员们作战的时间具体是什么日期，是 1940 年的 6 月还是 1940 年的 7 月。如果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数据是否一致，在王志胜的讲述中存在着常识错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部队中“小队”的人数，换算成中国军队的编制就是一个“排”，人数起码也应是 30 人以上，将 10 几

个“鬼子”说成是“一个小队”^[160]，显然是叙述者不懂军事常识的缘故。

相较于王志胜在讲述中所犯的常识错误，杜季伟在一篇文章对这场战斗的描述更加夸张大胆，更富有传奇色彩和故事情节。

“具体的战斗部署是这样确定的：在王沟车站西五里的四孔桥，截击由陇海路上的赵墩经枣庄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一些爬车不熟练的队员，扮成工人、农民、商人各种人物，分段从峰县、枣庄等站上车，对付各车厢押车的敌人；会登车的队员，在四孔桥以东，临时登车；余下——部分同志埋伏在四孔桥附近；洪队长和老朴负责控制火车头。一切安排停飞，队员分头出发。

预定的这一天，由赵墩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象往常一样，突突地冒着黑烟，按时开到了王沟以西。还没到四孔桥，两条黑影嗖的一下，从路旁跳上了车头脚踏板。开车的日本人根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便一命呜呼了；两个中国司炉明白过后，已经被上了绑。火车头，被洪队长和老曹控制住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两分钟的时间内发生的。这一切，坐在客车里的人和押车的敌人，更无从知道，列车照常向前开进：

列车快到四孔桥时，速度慢了，路两旁突然跳动起几个黑点，我们的人又上去了。车头猛然放出一声汽笛，所钉潜伏在各车厢的队员，亮出武器，向敌人猛扑过去。车厢里耀武扬威的敌人，一霎时有的躺倒不动，有的就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哭叫着。

隆隆滚动的列车，失去了它的威风，在四孔桥附近停下来。我们冲上铁路，各车厢里的短兵战已经结束。洪队长挥着二十响的驳壳枪向跳车的旅客大声呼叫：

‘老乡们，同胞们，不要惊慌，我们是八路军！……’

惊慌的人群，渐渐安定了下来。他们纷纷提着自己的行李，走下列车，集结在桥洞下的干沟里或田埂上。我们安定了旅客的情绪，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劝人们快快离开这里，为了迷惑敌人，我向旅客讲话中，特别提高嗓门说，我们是从山区出来的八路军。人群中发出一阵‘八路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

两个钟头后，敌人的铁甲列车开来，旅客已经四散一空，我们也带着大批的军用物资，远远地离开了四孔桥。”^[161]

杜季伟的讲述，展现了高超的故事讲述能力，他充分表现了铁道队员在危机时刻满满的自信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在有限的时间内还要进行政治宣讲，向老百姓讲述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可实际上，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老百姓乘客在又惊又怕中（在客车上遭到不明身份的人劫车，同时还要担心日本鬼子杀过来），哪还会那样乖乖地呆在那里听宣传，他们当时的状态，我相信是拼老命抢时间背行李逃命。那么多亲自参与过战斗

的队员对“老洪宣讲”这一事件都没有言说，是别人的疏忽，还是杜的主观臆造。我对于听宣讲的细节表示怀疑。在这里历史和艺术的界限再度模糊，历史真实倒向了艺术的真实。阅读小说以后我们才会发现，这段历史口述和知侠小说中《票车上的战斗》章节高度的一致。除了讲述者由刘洪大队长换成了杜季伟政委，因为政委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先锋，在小说中两个人物角色进行了对换。

下面是知侠小说中的故事：

“……李政委站在桥头石台上，用他清脆的嗓音对旅客们讲道：

‘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我们这次打火车，是消灭火车上的鬼子。现在我们北山里的八路军，已拉到这铁路两侧，推备向枣庄的敌人进攻。刚才我们把票车上的鬼子消灭了，枣庄和临城的鬼子会马上来报复，你们留在火车上，会遭到鬼子的伤害，希望你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到四乡去躲躲。远道的旅客，可以绕路到其他车站上上车。’他表达了人民部队对旅客的关心以后，接着说，‘同胞们：日本鬼子是我们民族的敌人，我们要坚决地把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消灭在我们的国土上。我们八路军就是人民的部队、是抗日最坚决的武装，希望大家今后多多帮助我们！……’

正讲着，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陇随’的机枪声，李政委匆匆地结束了他的讲话。

‘机枪响了，敌人马上就要来到，同胞们再见吧！最后让我们高呼几个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八路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队员们都高举着手，随着政委高呼着，雄壮的呼声震动着人群和原野，人群里有的也随着高呼了。”^[162]

九、“巧截布车”的史料质疑

“巧截布车”是“鲁南铁道大队”的又一经典战例。事件发生于初冬，鲁南军区被服厂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经济被封锁，部队物资匮乏，几个人穿一件棉衣，这严重影响队伍的战斗能力，也将关乎队伍的生死存亡。上级指示铁道队想方设法截击鬼子运送布匹的货物列车，以解决山区根据地八路军部队过冬棉衣的装备难题。得到命令后，铁道队深感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但是他们不惧困难，当他们获悉有布车通过，在沙沟车站附近截获列车，并且发动微山湖畔的群众配合游击队进行运输布匹。这一次他们又成功地完成上级军区的任务，解决了山里军队过冬棉衣问题。这场战斗意义非凡，

关系到主力部队战斗力保存。参与这场战役的队员健在者较多，和平时期他们每每回忆起此事，总是唏嘘不已，留下较多的口述资料。这些史料对事件的还原应该是清晰的，但对比这些资料会发现他们的讲述各不一致，如果我们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有几个讲述者就有几个铁道游击队”。看看队员们是怎样回忆的：

①“同年 11 月，铁道游击队获悉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日军严重破坏，部队冬服与原料被全部烧焦或抄走，干部战士穿衣成了问题，于是决定搞一次布车。在具有民族正义感的敌沙沟站副站长张永纪的协助下，……搞掉了两节车箱；共缴获洋布一千二百多件，计一万八千余匹，日军服八百余套，毛毯、药品一宗。为鲁南、鲁中、苏北等五个军区部分解决了部队御寒问题。”^[163]

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关系联络了沙沟车站副站长张明季（本人吸大烟，收买的关系），了解到从北京开往上海的一列急行快车载有布匹六百吨。部队组织了微湖、滕、沛大队二百五十余人，发动渔民六百余人，渔船一二三只。我们共截获布匹一千二百余匹，军服八百余套，皮箱二百余个，缎子被一百余床，其他物资一部，解决了鲁南、滨海部队的用布问题，还救济了当地群众。”^[164]

③“1941 年 11 月，（在《铁道游击队的年轻人》^[165]一文中杜季伟又说是在一九四二年秋末时节），我们在沙沟火车站得知，由青岛开往上海的一列客车后尾挂两节货车，我们决定夜袭。当日晚上 11 点火车通过沙沟车站时，由我地下情报员、沙沟车站副站长张允骥剪断风管，拔下插销。货车脱钩后，我们组织 250 余人搬运，缴获布 1200 余件、皮箱 200 件、日军服装 800 余套，呢料、毛毯、医药器材等一宗。”^[166]

④“11 月，在沙沟车站得知，开往上海的一列客车后尾挂了 3 节货车。当该车通过沙沟车站时，由沙沟站副站长张允骥剪断风管，拔下插锁。货车脱钩后，组织 250 余人搬运，缴获布 1200 余匹、皮箱 200 件、日军军服 800 余套及呢料、毛毯、医疗器材等，支援了鲁南、滨海军区部队，并救济了贫苦群众和渔民。”^[167]

⑤“副站长张允骥尚有民族正义感，经过细致的工作，他同意了。……同时，迅速动员群众，组织运输力量。男女老少竟出动了近千人，编成三个队……。四节载运布匹的车皮缓缓地停下来了。湖上早已准备好了十几只捕鱼的大船，但刚开始装船，远处就传来了枪声，显然是敌人发现了。我们利用大雾这个天然屏障，……摆出了主力部队的架势，敌人果真被我们唬住了，推进迟缓，当接近我们时，布匹、军服、被子和皮箱等物资基本装完了。”^[168]（在《铁道游击队战斗生活片段》^[169]一文中与该文大致情节相同，

但是有两个细节不同一是把副站长又说是张云继，二是称铁道队卸下来两车厢的布匹)

⑥ “他(张允骥，引者注)又准时拔掉风管和销子，使两节运布的车厢停在了沙沟南面的塘湖附近。我们跃上车厢卸布，微湖大队长张新华和微湖区区长黄克俭组织上百条船停在湖边，等待运输。两三个小时后，布大部分被卸下，没卸下来的被我们放火烧了……这次共缴获洋布 1200 余件，日军军服 800 余套，毛毯、药品一宗。”^[170]

⑦ “天刚黑，火车开过来了，我们的人爬上车，把最后两节车厢的挂钩弄掉，搞到了 1200 匹布，还有大量日本军装和药品。怎么运呢？我们事先已经发动好群众了，老百姓在附近等着呢，连夜运倒了微山湖边的船上，剩下的两节铁皮车厢也被我们烧掉了。”^[171]

⑧ “将列车后部的两节车厢一起摘了下来……我们组织数百名农民隐蔽在两站之间的铁道两旁，等待抢运布匹……大家每人肩上至少都扛了一捆(12 匹)。经过一夜的紧张搬运，车厢的布匹及药品、器械，运到了微山湖。布匹卸完后，我们又将不要的东西连同车厢一起浇上汽油烧了。后来，鲁南军区专门抽调了主力部队的一个连协助铁道队将这批布安全转运到山里，解决了鲁南我军的越冬棉衣问题。”^[172]

通过这些口述回忆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有以下几处不一致的细节：其一是截布车发生的时间。有 1941 年 11 月、1941 年秋初和 1942 年秋末等几个说法；其二是铁道队线人的姓名和身份。有“张永纪、张明季、张允骥”等等几种说法，线人的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比如有烟鬼、进步人士等多种说法；其三是被我截获的车厢的数量有 2、3、4 节不同的说法；其四是缴获战利品的数量。就布匹而言，1200 件、1200 匹还有 18000 匹等等说法；其五是参加运送的百姓人数有百名、250 人和一千多人等等；其六是参加运送的船只有“渔船一二三只”、“十几只捕鱼的大船”等等；其七就是所截布匹所惠及人群的覆盖面，有“五个军区”、“鲁南军区”、“一个军区三个军分区”^[173]和“鲁南、滨海部队”等等，这些细节的变化也就意味着这批布的重要程度，两车厢能解决那么多人的棉衣问题。还有就是，既然有那么多人参加了运输工作，几千匹布匹还不是很轻松的就搬掉了，干嘛还要烧掉呢。再有就是，那么多的群众怎样隐蔽呢，如果中间有一个是潜伏运输队伍中的汉奸，把消息报告给伪军或鬼子，那行动岂不暴露了，不出事情才怪呢。这不禁让我们打个问号。这些细节在多次讲述中变得含混不一。时光如流水，不舍昼夜，谁又能分清其中的真真假假呢？

十、“巧打岗村”的史料质疑

铁道队在抗日游击战争这一广阔舞台上的演出，可以称得上有声有色，其中“巧打岗村”可以算得上最壮观的一幕。在小说中的岗村就是历史上盘踞在枣庄的日军特务高岗。为了避嫌当时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国家副总理高岗，作者把鬼子的姓名改为了岗村。在日军中有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特务头子，叫岗村宁次，制造了济南的“五三惨案”，恶贯满盈，革命胜利后，他被列为首要战犯。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知侠使用“岗村”这个名字，也许是想通过文学的手法，让八路军游击队亲自把他击毙，以快民心，报仇雪恨。小说中的特务高岗是个中国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深谙中国的风俗文化。此人行动诡密、冷酷、狡猾，神出鬼没。他通晓中国的文化和习俗，善于拉拢人心，一些乡长保长多成为他的拜把兄弟，还认了一群干儿子，外联内合，对我们铁道队和人民威胁很大。鬼子高岗是铁道游击队的心头一大恨，如何除掉他成为了铁道游击队面临的难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铁道队清楚地知道强攻不行，只能智取。看看队员们的回忆：副大队长“王强”王志胜在回忆文章中说：

A:1941年7月的一天夜里，我们化装成伪军巡逻队，……干掉日军头子高岗和他的警卫员石川，……收缴了放在那里的16支长短枪、2挺机枪和3箱子弹。临走时，我们有意丢下阎成田部伪军的军帽来迷惑敌人。……阎成田及其副团长、参谋长在古井村被日军绑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捅死了。^[174]

杜季伟是这样回忆的：

B①……打死日本特务高岗、石川两人，缴获步枪13支、短枪3支、机枪两挺。撤出车站后，扔掉伪军帽，制造了日、伪军之间的矛盾。^[175]

B②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十点钟，我们换上伪军服装冲进车站以内。将鬼子特务高岗石川击毙。缴获步枪二、三十支，机枪两挺，快慢机四支。……以后日寇将阎团编散，并将团长阎成田、参谋长郭秀林绑解济南日本法庭治罪。^[176]

B③1941年10月的一天夜晚，洪振海、王志胜、刘金山等领导人带领部分队员，化装成伪军巡逻队奇袭临城火车站，打死日军头目高岗与石川，缴获步枪22支、机枪两挺、子弹三箱。……将阎部三百余人遣散，押运东北下井，伪团长阎成田、副团长郭玉才及参谋长等被日军在古井村处死。^[177]

刘金山回忆道：

C①1941年7月的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根据前一天晚上侦察到的情况，重新

组织了三个战斗小组。第一组是我和王志胜、徐广田化装成铁路工人，……（在另一篇文章中被称为小许^[178]）第二组是由曹德清、孟庆海两同志组成，化装成伪军……第三组由李云生、梁传德等六个同志组成……另外，外围还有一个组负责监视伪军阎团的行动。整个战斗由政委杜季伟指挥。……这一仗我们共缴获步枪 30 余支、机枪两挺、手枪 3 支和子弹数千发，我铁道队无一伤亡。……他将伪军阎团的枪支全部收缴，并把阎成田和几个主要伪军头目都绑走，后来杀掉了。日军把阎团的许多官兵都押解到东北做苦力去了。^[179]

C②我(刘金山,引者注)和杜季伟,王志胜同志商量,决定把他干掉。……我们化装成工人,分成三个小组:一组是我和王志胜,徐广田,二组组长梁传德,组员孟庆海等,三组组长孙茂生,组员殷延华,徐广海,王志友等。一切准备妥当,便开始行动。……王志胜缴了日军两支短枪,徐广田扛上一挺重机枪,我手里抱着另一挺轻机枪。二组的孙茂生进去话拿了十三支步枪,另一队员缴获敌人两箱机枪子弹。^[180]

通过这几位经历了该次战斗的铁道游击队员的讲述,我们不难发现也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 1941 年的 10 月还是 1947 年的 7 月呢?十月的天气和 7 月的天气有相似之处但绝不相同。比如说铁道游击队员从高岗的老巢中所缴获的枪支数量,“16 支长短枪、2 挺机枪和 3 箱子弹”“步枪 13 支、短枪 3 支、机枪两挺”“缴获步枪 22 支、机枪两挺、子弹三箱”“步枪 30 余支、机枪两挺、手枪 3 支和子弹数千发”等等,武器数量之多足可以装备一个班。同样让我们产生困惑的还有伪军阎团的下场问题,有的说“在古井村被日军绑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捅死了”“绑解济南日本法庭治罪”“押解到东北做苦力去了”等等各种说法,如果从历史真实的角度来考虑的话,这些只是猜测,不足为信。作为日军的军事机密又怎会轻易的公开呢。但只要坏人得到了相应的惩罚,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根本不会关注真真假假。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恶人受到惩罚,为后来的改编者留下了足够的改写空间,为我们提供多维的阅读快感。再者,“巧打岗村”已经写入了铁道游击队光荣的战斗历史之中,谁还会对细枝末叶较真呢。因为英雄已乘黄鹤去,往事如云空悠悠。

十一、“日军受降”的史料质疑

铁道游击队接受日军的投降,在整个铁道游击队的战史中是一件斗志昂扬的大事,代表着我军的完美胜利,犹如十七年电影中常用的桥段——“光明的尾巴”:“冬日的早晨,一轮红日在冉冉升起,映红了东方的天空”,这也标志着我军将由“这一胜利走

向下一个胜利”。在小说和各类艺术改编的文本中也是艺术家最喜欢大书特书的情节，代表着我军的无上荣光和至高荣誉。可是阅读各类历史资料，各种自相矛盾的述说同样令人的费解。

“鲁南铁道大队”老队员时任中队指导员的张静波老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45年，一个日军联队投降时，日军的大队长声称只向‘飞虎队’交武器。”^[181]时任鲁南铁道队的大队长的刘金山在回忆文章中说：“第二天上午，我骑着马去了，日军以为来了“太太君”，就都站出来夹道欢迎。进去后日军又举行宴会招待我。席间太田问我：“你是什么部队？”我说：“我是铁道队的大队长。”太田说：“铁道队太小了。”我马上回答：“我们共产党的部队是中国军队惟一代表。凡是八路军，不管是哪个部队开的条子，在全国都能通行。因此，请你们不要为人身安全担心。你们不缴枪是不能走的。”太田一看继续坚持也没戏了，不得不答应刘大队长晚上9点钟缴枪。”^[182]再来看看杜季伟政委是怎样回忆这段经历：我军让其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日军故意推脱不交武器，我军即行战斗，歼灭了为敌效劳的伪军。日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姬庄、沙沟和我方谈判，举行缴械签字仪式。^[183]看了几位铁道队的领导的回忆材料，我们会感觉到这些材料混乱芜杂，归结为这样一点，就是日军向我军缴械时的态度：是日军主动向我缴械，还是在日军跟我军交涉无奈缴械，还是在我方军队的威逼下日军缴械的，在三个不同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说法。1945年12月《大众日报》的报道我们能看出个中端倪。

鲁南千余日军向我缴械

（新华社山东分社鲁南10日电）津浦前线记者报道（迟到），策应陈大庆向我进攻之临城日军“铁道队”千余人，沿津浦线向我沙沟、韩庄解放区进犯。我即旅行包围，并以政治攻势劝告日军，勿作无谓牺牲，勿为国民党反动派之炮灰。该敌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被迫分别于12月1日、2日放下武器。我缴获大炮一门、步枪千余支、轻重机枪及弹药甚多。放下武器之日军均要求和平回国，对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日军作战，一致表示反对与愤慨云。

（朋）

在报道中我们看到的只能是日军向我军小规模投降而不能被称为受降，同时也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在各类书籍上倒是能够看到日军向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投降的场景和报道。如果真有日军向“铁道游击队”受降这一历史事实的话，这无疑会在我军建军历史上留下浓妆重抹的一笔，我党必定会有详尽而清晰的书面材料，而不会像我们看到的

各位铁道队领导们那样随意而任性的自由发挥。如此不实的数字记忆，很难让人相信这次受降过程的真实性，更难怪陈毅看完电影《铁道游击队》之后，对于结尾处的受降仪式很是不满。^[184]“众所周知，在抗战受降史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没有过接受成建制日军投降的历史记”。^[185]

日军在与我铁道队几番较量以后，它们终于答应向我铁道游击队投降缴械，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对这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讲述。

1945年12月，在姬庄和沙沟车站正式举行受降仪式，鲁南军区派两个连队协助铁道大队受降。投降日军及其家属共两千多人，因日方家属哭闹，秩序很乱，受降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日军共交出轻机枪130挺，步枪1400支，子弹100箱，铁甲列车一辆。日军投降后，由铁道大队队员将其押送徐州，第二天，有四十多名日军炮兵又返回要求参加我军，经鲁南军区同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186]

日军退至临城以南姬庄附近时，被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包围。……日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姬庄、沙沟和我方谈判，举行缴械签字仪式。但签字后，日军企图蒙混逃脱，只把重武器交出不交轻武器，说是要自卫。由于我军重重压缩，迫使日军第二次全部交出武器：计山炮两门，轻重机枪130挺，步枪1400支，子弹百余箱，并在沙沟车站附近的一片田野里举行了投降仪式。^[187]

1945年10月，我们铁道队负责日铁联队受降。我们同日军谈判几次，日军仍不投降。我们就拆除了姬庄至临城的铁路，把日军装甲列车大队困在沙沟一带，迫使日军老老实实地回到谈判桌上。谈判进行了半月，穷途末路的日军才同意完全交械投降。最后，我们在沙沟车站附近的一片开阔地里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他们共交出机枪130挺、小炮数门、各种枪1400支、子弹百余箱。^[188]

这天晚上，我们铁道队穿了便衣，到日军那里去接受他们的无条件缴械投降。……日军缴出重炮2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80多挺，步枪1000余支，手枪两麻袋，炮弹40吨，子弹两车皮。我们用20多辆牛车拉了两天，才把这些武器送到南常，交给军区司令部。

回来后，听说日军手里还有枪。我们又强力要求日军缴了枪。这次共缴获步枪500多支，还有70多架照相机。日军缴枪后，我们开了路条，送他们返回了日本。^[189]

在刘金山的另一份口述材料中同是二次缴械，物质不同。（晚上9点钟，日军列队列沙沟缴枪。这次又缴了500多支步枪，70多挺机枪，手枪、盒子枪也有好几百支，还有70多架照相机，一直到晚上12点才收缴完毕。）^[190]。

首长们经过一阵酝酿同意了日军的三条意见(其中一条是要保留一些自卫的武器)^[192],同山田达成了协议。山田部队长带着全体官兵,在沙沟车站下站成四路纵队向我们投降。他们交了两门山炮,二十多挺重机枪,一百多挺轻机枪,八百多支步枪,弹药一部。我向林旅长提出要求,炮和重机枪全上交,其余武器我们要;林旅长同意了我们的要求。铁道队都换了日军三八式步枪。每个班还配备了一挺轻机枪。^[193]

我们铁道游击队曾经三处接受日军的投降。这三处是临城附近的鸡庄,沙沟和韩庄,投降日军的总数共有二千五、六百人,缴获的武器有山炮六门,重机枪四十多挺,轻机枪一百几十挺,步枪二千多支,炮弹子弹光鸡庄缴到的就堆满了二大间房间。

更让人感到吊诡的是,在杜季伟的讲述中有“有四十多名日军炮兵又返回要求参加我军,经鲁南军区同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的情节,假如确有其事的话,参加了我军以后我们把他们安排到何军种,他们都参加了哪些战斗,有何表现。仅仅铁道游击队也没有权力来批准他们参加队伍,我想这必定会请示我军上级机关来决定这些请求,这样我党必定有详细的资料记载,这些人不能无缘无故地从我军历史中失踪,对他们的记载无疾而终。据铁道游击队队员傅永顺的回忆“在这支队伍里还有两个日本籍队员,他们就是田村伸树和小山口。他们原是日本骑兵,1940年9月被铁道游击队俘虏……主动要求参加日本反战同盟会。他们和中国战友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4]日军投降,他们回到了他们的国家对中国的老战友仍然念念不忘,在1990年代还给大队长刘金山写了信:“感谢你们把我这个幼稚的外国人放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洪流中去锻炼,改造我的人生观,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5]。

如果说上面的口述资料还算得上严谨的话,看看刘金山大队长的另一篇回忆文章《受降记》,其讲述则更加传奇,哪像是在回忆历史,倒像是站在村头的麦场上在给人民说评书。“受降的经过也非常曲折,现在回想起来,还饶有趣味”,^[196]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杯酒释兵权”气息,游击队充满了神性的光芒。

“我重回车站,好说歹说,这鬼司令同意再缴重机枪,轻机枪和步枪坚决不肯缴。我只得再同来请示,林旅长不答应,我说:“是不是请他来和首长谈谈,”林旅长说:“行啊,试试看吧!”我把鬼子请来,谈了一番,还是僵持不下,这鬼司令反而耍无赖来。什么都不肯缴了。我想谈判不成,得施个小计。这鬼子司令嗜酒若命。常言道,贪酒误事,我们用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在队部,干事几个人当陪客,我的酒量也很不差,我俩轮番用一大碗一大碗高粱酒和鬼子司令干杯,酒席称得上是宾主尽欢痛饮,这鬼司令几大碗灌下去,像个红烧猪头,说话舌头也打了结,又喝了几大碗,应经有九分醉意,他

突然放声大哭，哭得同刘备一样。一面安慰他，一面敌工干事赶快写缴械命令。我们按小林联队缴械的先例，在命令上注明：准许日本士兵每人携带刺刀一把以作自卫，我们保证日军士兵生命和个人财产的安全，我们并出通行证，限期到滕县集合。日军方面负责将所有武器弹药无一遗漏，无一损坏造具清册，点交我军接收。命令一写好，先盖上铁道游击队的方印。我把它摊在鬼子司令面前，做个手势叫他盖章，他醉得糊里糊涂，嗯嗯呀呀的乱哼一阵，在身上摸来摸去掏了很久，才从屁股口袋里摸出一个黄铜图章，睁着红红的眼睛，傻笑几声，手颤颤巍巍地不知盖在那儿好，我连忙扶着他的手，“笃”把图章盖上了。手续办妥，我一边叫通信员扶着鬼子司令去睡一会，一边派人去请日军副司令来，告诉他：“你们司令已同意缴械，现在他喝了点酒再休息休息”。副司令一看命令上确实有司令的私章，二话不说，回去集合部队，发出命令，从列车上把武器弹药都卸下来，集中在车站场地上，移交给我们清点。到五点多钟，鬼子司令酒醒，我叫通信员给他送了茶点烟和毛巾，服侍得周周到到。我把军区发的通行证递给他，说：“上级已经批准你们每一个黑大三留下一把刺刀自卫，这是通行证，我们保证你们路上安全。他圆瞪着双眼怔怔盯住我问“什么的意思？”我说，“你们已经全部缴械了！”他跳了起来：“那个太君的命令？”我把命令给他看一看说，“你的太君的命令。”他明白误了事，可又无法挽回，又放声大哭，这个哭得更伤心了，足足哭了二二十多分钟，我只好又劝他一番，祝他们一路平安，回国和亲人团聚，他突然止住哭，长叹一声，一把拉住我就走。我这同倒其的发慌了，怕他要赖皮，死不认账，那可麻烦了。我向副政委投个眼色，副政委连忙叫我俩铁道队的二个全幅日式装备的同志跟了我来。这鬼子司令回头一看，苦笑笑说：“不好、大大的不好，你的不够朋友！”我才相信他并无恶意，到了车站，他又集合部队，作了最后一次训话。第二天早晨，这一千六、七百人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整队步行向滕县出发。还有十几个日本妇女身背婴儿也走在这支队伍里。鬼子司令满面愁容，解下望远镜、指挥刀，双手献给我，万分感慨地说，“这个望远镜还是我父亲遗下来的，我继承父业，想不到今天这样下场。这点送给你做个纪念。”我接了他的礼物，握握他的手说：“谢谢你。你们投降了，我们就是朋友。”^[197]

十二、“护送刘少奇过铁路”的史料质疑

护送干部过铁路是铁道游击队战略任务转移后的主要工作，他们曾经护送过很多高级干部，比如刘少奇、陈毅和肖华等。掩护“胡服过铁路”在小说中也成为重要篇章，该部分也是文革期间小说被评为“毒草”的主要原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据此

将小说界定为“大毒草”，将知侠打成“反革命”，把他打得皮开肉绽，还关押起来。但是在鬼子较量中都没有服软的他，面对这样一帮被扭曲的人，知侠表面是服从，但内心深处是不惧他们的，他不强攻而要智取。在深夜他从三楼上趁看守熟睡，缒绳逃脱，虎口逃生，得到了“芳林嫂”刘桂清的掩护。曾经亲自参与过该次护送活动的游击队干部杜季伟、刘金山和王志胜有多篇文章进行了回忆。其中杜和刘的讲述大致相同，先看一下他们的说法“1942年10月底（据刘的回忆还有一说是在1942年的8月^[198]；1942年的7月下旬^[199]），上级要求我们护送刘少奇同志通过敌占区会延安。我们的过路点选择在沙沟到临城之间的干沙河处。因为顺着这条沙河可以从铁路下的涵洞里穿过去，这样不容易暴露目标，比在路面上通过要安全些；同时也可以避开铁路两边又宽又深的封锁沟。我们出发了，当我们走到离铁路还有三四百公尺时，突然从背面闪过一道白光，远处的铁道发出突突的响声，鬼子的一辆摩托卡巡逻车从临城方向驶了过来。强烈的探照灯光束在我们头上扫来扫去，一挺轻机枪‘哒哒哒’地扫射着。我们赶快沿着沙河边隐蔽下来，长短枪的枪口也都对准了摩托卡。巡逻车在我们前边不远的地方停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瞎打了一阵机枪，又突突地向沙沟开去了。铁路又恢复了平静。我们赶快护送刘少奇同志沿着干沙河，一溜小跑，从涵洞下穿过铁路，直向微山湖边进发。大家一日气走了七八里路，到高桥庙时见敌人仍没有发现我们，才松了一口气”。^[200]

王志胜的讲述与刘金山和杜季伟的讲述有天壤之别，

“小北庄村在津浦铁路东侧，离敌伪据点较近。为防意外，过路前大队长刘金山派我先与据点里的伪军小队长取得联系。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我带警卫员杨家成和一名短枪队员，腰插短枪，身着大褂，头戴礼帽，提着几瓶美酒和几条哈德门香烟来到伪军炮楼。伪军小队长一见我，“叭”的一声敬了个礼，笑嘻嘻地说：“王大队长，有什么事需小弟帮忙，尽管吩咐。”地铺上的五六个伪军倏地爬了起来，立正站着，个个面带惧色。我把伪军小队长拉到一旁，对他说：“刚才送信来说，山里有几个朋友要过路。”伪军小队长挺干脆地说：“过吧，过吧，这还有什么问题，王大队长，有啥事尽管吩咐就是了。”……这天我事先安排几名队员，换上伪军服装，守护在岗哨周围，并随即发出暗号。刘大队长等人看到暗号后，便率领铁道队短枪队掩护着刘少奇等20多名同志朝铁路方向而来。我站在炮楼外边东西大道旁，向临城和沙沟望去，借着日军的探照灯的光柱，远处的碉堡隐约可见。转过身来，看到少奇同志骑着一头骡子，正从我眼前通过。就在这时，正南方向有几道白光闪，接着传来一阵“突突”的声响。日军巡路车从沙沟方向驶来了。我立即同刘大队长研究了应急措施，命令大家暂时到一条干沙河边隐蔽。

谁知，在这紧急关头，那骡子一蹦哒，“扑通”掉进堑壕里。刘大队长“嗖”地跳下去，用力将骡子推了上来，牵到一个崖头后边。我们刚隐蔽妥当，日军的摩托车就开过来了，特务队长松尾望着道边的伪军问：“毛猴子的有？”伪军小队长回答：“报告太君，毛猴子的没有！”松尾拍了拍伪军小队长的肩膀满意地说：“好的，好的！”就坐上车朝临城方向开去了。”^[201]

王的讲述还有另外的版本也同样的精彩：“不一会儿工夫，十几匹战马奔驰而来。从马上跳下十几名军人，为首的身体瘦长，一身灰色军装，看上去十分慈祥、和善，这就是胡服同志。……我转过身来，看着胡服同志骑着一匹小骡子，正从我眼前走过。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他是个多么伟大的领导者！这时，北面有一道白光闪过来，接着传来一阵突突的声响。这是鬼子巡路的摩托卡从临城方向驶来了。我立即同刘队长杜政委交换了一下意见，请示胡服同志，同意后，人员暂时进炮楼内隐蔽，将小骡子牵到碉堡后边的棚子里藏着。谁知，就在这紧急关头，那骡子一蹦跳“扑通”掉进了堑壕里。刘金山一见，“唿”地跳下壕去，我们就在边上拉着缰绳，他在下边用力将骡子推上岸来。我们的人刚进炮楼，鬼子的摩托卡上的探照灯就在周围不停地扫来扫去，机关枪也“哒哒哒”地朝远处可疑的目标扫射了一阵。枪声刚停，几个鬼子就从摩托卡上跳了下来，直奔炮楼。特务队长松尾见小队长夜间出来查哨，非常满意，问：“毛猴子的没有？飞虎队的没有？”伪军小队长恭敬地报告：“没有！”松尾用手推了推架在凹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然后拍了拍小队长的肩膀说。“好好的！力随后坐上摩托卡向沙沟方向驰去。伪军小队长见松尾走远，这才“唉”了一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就在松尾查哨的当儿，在伪军炮楼里边，胡服同志正给伪军们训话。他屹立在炮楼顶层扶梯口旁，挥动着有力的手臂，说：“目前在苏德战场上，红军已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法西斯灭亡的日子就要到来。在我们中国，日寇正在作垂死的挣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武装的大反攻即将开始……”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胡服同志也不忘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可在当时，我曾劝胡服同志不要讲，以免暴露身份，但胡服同志说：“没关系，这正是瓦解敌军的极好时机。黥确实，经胡服同志那么一讲，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注意那些伪军的脸上，一个个面带土色，感到十分震惊和恐惧，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吱声，双腿盘坐铺上，乖乖地一动也不敢动。后来，我们也经常学着胡服同志的办法，时常给伪军汉奸进行训话，以分化瓦解敌人。”^[202]

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王志胜副大队长的讲述更有神话和传奇色彩。这段文字完全可

以命名为“王强智斗伪军党 胡服勇敢敌炮楼”。看罢这几段文字叙述，我感觉到有这样几点矛盾之处：其一，刘少奇过铁路的时间是在1942年7月、8月还是10月，在文章中有了好几个版本，孰是孰非，无从辩解；其二，那头可爱的骡子有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刻上演一出“掉进壕沟”的好戏，为过路留下戏剧性的一笔呢？这是事实还是杜撰呢？恰巧的是在游击队员回忆游击队护送陈毅过铁路的情节中，陈毅骑的骡子也不约而同的掉进了壕沟里；其三，刘少奇过铁路时是低调地走沙河中的干河沟还是高调的跨铁路通过的，如果是过铁路他有没有更加夸张的在小鬼子来巡逻时登敌军的炮楼，同时还对伪军宣讲政策呢？我想如果前者表现了铁道队的策略抑或叫做自信的话，我想后者绝对是夜郎自大过分自满。因为铁道队一个小队几个人，在日军巡逻时躲进敌人炮楼，一旦敌人进入炮楼巡查，看到我军在炮楼里，那么以他们人员和地理位置优势会把我军全部捂在炮楼里消灭，或者一旦伪军临时起了歹心给日军通风报信，那也将是一场不必要的牺牲。对于有着高超政治素养和军事素养的干部而言犯这种错误是不可想象的，他会拒绝铁道队的建议；对于铁道队而言，纵使他们在敌人那里有再高的威信，也不会冒如此之险。难道真的验证：“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艺高人胆大。这种讲述是不顾历史的事实合理性，一味追求故事的传奇色彩和艺术拍案效果，给后人留下的只是惊世骇俗的传奇。

第二节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互化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有多少当事人就有着多少个回忆版本。这些当事人的回忆都不尽相同。照理说，这些事件才仅仅过去了四五十年，并且这些事件基本上都是他们亲力亲为的，对这些事件本不陌生，他们应该会有一个确切记忆，但他们回忆的重要细节却不尽相同，并且有些回忆与知侠的小说文本无限接近，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要找到个中原因还要从知侠的个人成长和《铁道游击队》创作历程寻找蛛丝马迹。

1938年春，河南卫辉。刘知侠，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年，他胸怀理想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参加延安抗大，编入抗大一分校，并从陕北向山东边战斗边宣传，传播革命的火种。1939年到达山东军区，从事宣传报道和文艺创作。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夏天，为了鼓舞士气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山东军区召开了全省英模大会，大会在滨海抗日根据地的莒南县召开。在会上他第一次听说铁道游击队的英雄故事。作为一名革命宣传工作者，知侠和他的战友们担负了双重任务，编印英雄模范的战斗事迹材料，同时还对英雄进行采访，采写报道和文章宣传他们。就在这次会议上，刘知侠认识了铁

道游击队的战斗英模徐广田，“他二十三、四岁，中等身材，穿着便衣，脸孔微黄，说话时面带微笑，慢声慢语，眼睛也常眯缝着，看上去像个腼腆的姑娘，可是一旦眼睛瞪起来，却充满了杀机。”^[203]这个青年人的演讲当时在会场中引起了轰动。也可以说是徐广田把铁道游击队的几次战斗蜻蜓点水般地出色一谈，他就被大家任命为“甲级战斗英雄”。^[204]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经过徐广田的讲述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大家听了受到了感动，被故事中的人和事所折服，才冠以他英雄称号。如果换成别人，能够把故事讲得好，也会获奖。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徐广田仅仅是代铁道队去领这个集体奖项的代表，这一成绩属于这个作战小队。其二，在当时铁道游击队事迹还不是太有名，还没有一个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需要自己的广泛宣传。与其他作战部队相比（比如和比邻的微湖支队与运河支队相比）影响还是小的，故事自身魅力还没有泽被后世的能力。既是宣传员又是记者的刘知侠也被这个战斗英雄故事折服被铁道游击队英勇杀敌的故事所感染。恰逢其时，铁道游击队的杜季伟政委也到军区党校去，刘知侠同期采访了这位“管账先生”。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发了作家强烈的创作欲望。作家草创了铁道游击队的章回小说，写这些真人真事。并在山东文化杂志上连载了两期，^[205]因为故事性强，在军民中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读者还是欢迎的”，可是微山湖畔的铁道队干部和队员看到后却有不同反应，他们给知侠写了信，信的大意是：“当他们知道我在写铁道游击队，向广大读者介绍他们的斗争事迹，他们是高兴的，对我表未感谢。……他们说像徐广田这样的英雄人物，铁道游击队还有一些，因为对敌斗争任务比较紧张，他们只能派徐广田一个人去参加英模会”。^[206]信中还提到假如知侠能够实地到他们那儿去采风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会对铁道队了解的更深刻，写起来会更加的全面和生动，写的也会比现在好。“我看了他们的信，沉思良久，深感到在从事这一写作上，有点过于草率。”^[207]也就是说刘知侠仅仅根据徐广田和杜季伟提供的材料来写作铁道队的生活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的，是不深入不全面的。作家深信如果不充分地了解他们的战斗生活，作品肯定写不好。刘知侠停止了写作，于1945年、1946年两次亲赴鲁南地区，深入铁道队体验生活。“我结识了大队和长、短枪分队的各色英雄人物。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我经常和他们促膝谈心，谈他们所从事的斗争。不仅和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活着的人谈，而且对于那些在铁路线上艰苦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干部和队员，从旁人口中也作了详细座谈和了解。”^[208]不仅仅如此，他还到铁路的沿线采访群众，沿着铁道队战斗过的足迹实地田野调查，感同身受，回望勇士们战斗过的地方唏嘘不已，这些经历大大丰富了作者的创作素材，“收获是很丰富的，材料记了两大本”^[209]。刘知侠本人不是铁道

游击队员，他本人没有直接的“打票车”“截货车”“扒铁道”“炸桥梁”的战斗经历，但是通过实地采访使他对铁道队有了深刻的感受和体悟，有时老百姓还称呼他“铁道游击队”来了。

知侠采访铁道队时，铁道队基本上不跟敌人发生正面的冲突，工作重点转变维护枣庄地区和铁路的治安。他在采访时也跟随铁道队参加过一次战斗，（也就是枣庄煤矿之战，作者知侠后来把这次战斗创作成小说《煤城之战》），更多的是听干部队员口头讲述，或者是在田间地头，听老百姓讲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因此他对铁道游击队的了解也基本上是口口相传的故事，听的越多，故事就愈加丰富，把这个故事发扬光大的愿望就愈加强烈；和队员们呆的时间越长，感情就越浓厚，宣传他们的事迹就成了作家的一种自觉，尤其是在新年庆祝会上，知侠被铁道队尊为“荣誉队员”，他举杯誓盟，要把铁道队写成一本书，为铁道队著书立说的任务义不容辞的落在了这位文化人的身上。让英雄们千古，让“铁”军精神发扬光大，成为了他的使命，也成为了他内在的个人契约。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图：作者听了徐广田杜季伟的传奇故事，产生了肤浅的认识，到后来去铁道游击队去体验生活采写材料的过程，产生了深刻的想法——由“听”个体演说到“听”群体演说，故事一点点的在作家的脑海中累积，素材日渐厚实，故事日趋神奇。那些战斗英雄话语间的矛盾和罅隙，给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他在选择素材时自然会选择具有神性的部分。同时铁道队的队员要求“老刘，你写这些战斗时，不要忘了也把我写上去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历史真实在向“艺术真实”无限靠拢或者是高度默契，那么“因为他确实参加了这些战斗，在战斗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艺术真实”在向“历史真实”的庄严承诺。作者不自觉地跟铁道游击队签订了“契约”，写上他们写好他们是知侠的职责和义务。创作冲动在逐渐累积，在写作契约的激励下，一旦时机允许，作家的创作就是就变得水到渠成了。

小说创作的过程无疑是将听到的战斗故事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创作出具有“历史真实”感的传奇故事。读者阅读后感觉是真人真事，当事人看了感觉比真人真事还精彩。在这样文字符号转换过程中，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界限在悄悄地消融，历史真相消解在艺术文本故事之中。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存在与作家加工的艺术审美的虚幻故事相纠缠在大众阅读中幻化为“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战史，知侠也悄然成为铁道游击队战史的书写者。这种转化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作家坚守“实有其人”的真实理念

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是历史上有其名，现实中有其声的人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需怀疑人物的真实性。比如，小说中政委李正就是那个“苏鲁支队”下派的干部杜季伟。刘洪就是洪振海和刘金山的化身。“副将”“老好好”的大队副王强就是现实中的王志胜。解放后，这些同志（除洪振海外）都工作在行政一线从事管理工作。而芳林嫂这一形象更是鲁南地区无数女性的化身。她的来源主要有三位，“一个姓时的大嫂，外号叫时大脚，近三十岁，有个叫小凤的女儿。另一个是刘桂清，她的儿子是铁道游击队后期王志胜的通讯员，队员们都称她二嫂。还有一个姓尹的大嫂。她们的家都是铁道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她们不仅给队员们做饭吃，还在村边为他们放哨。这三个妇女都被捕过，虽然受尽敌人种种酷刑，有的被打得碎了头骨，才丁断了肋条，但她们从不屈服。放出后，继续帮助铁道游击队歼灭敌人。”^[210]解放后，小说出版发行了，她们担负着讲述铁道游击队和芳林嫂故事的使命，住在黄埠庄的尹大嫂（当地人称为“大老尹”），晚年双目失明，每天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给孩子们讲述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在济南安家的刘桂清，“人人都尊重她，青年团、少先队常去拜访她，并请她去作辅导报告，谈谈铁道游击队打鬼子的战斗事迹，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211] 这些人物进入了文学作品，并与文学作品中的物象相认，既增强了文学作品的真实感，又增强了读者的认同感，还增强了当事人的荣誉感。不仅仅如此，原本勤劳善良农家妇女已经成为了如今响当当的宝典品牌，“芳林嫂渔家饭庄”早已成为了微山湖畔最好的渔家乐品牌。

二、作家选择“确有其事”的纪实手法

知侠将他听到的材料，历经岁月的尘封，在情感酶质的发酵下，用想象的画笔书写出具有历史真实的作品，实现艺术和历史交融统一。比如，小说中“打岗村”的情节。“刘洪把特务队的门慢慢推开，里边明亮的灯光射出来，老洪一看桌上两个鬼子趴着，手里还握着二十响。桌上的机枪正对着他张着口，他不觉一愣，因为据谢顺的情报，说里边只有冈村。彭亮低声的说：“两个！”话还没有落地，忽然冈村抬起头来，老洪眼快，只看到冈村眼里有一忽惊恐，他正要举二十响，可是老洪的手早扬起，只听“噹噹噹”三枪打去，冈村便应声仰倒在桌后，特务伍长肩上只中了一枪，正要挣扎，彭亮又噹噹两枪把他打死。当鬼子伍长还没倒在地上时，老洪像愤怒的狮子一样，已经跃到桌子上，抓住鬼子的机枪，把机枪口往房间里调过来，彭亮也抓过了另一挺机枪。这时，里间睡着的特务，听到枪响正要起身，只听到老洪吼道：“不要动！”^[212]小说中描述的“打岗村”与王志胜和刘金山

所描述的“打岗村”，没有太大的本质的区别，所以把小说看做是真实的历史也就不足为奇。这种历史场面故事化和历史事件传奇化的处理方式，使得艺术中彰显历史美，历史的故纸堆中闪耀着艺术的光芒，艺术和历史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三、作家采用“事可失实”的创作手法

我对多个队员的口述资料爬梳剔抉会惊讶地发现每个人对每一件事讲述的细节都不相同，恰是一则则“罗生门”的故事。真与幻交融，历史和艺术弥合，这对于作家来讲无疑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对历史事实根据艺术效果取其需要就可以了，没有约束和羁绊。可以把英雄人物写的更英雄，把战斗场面写的更宏大，把敌人写的更愚蠢，把我军写的更机智。只要不给铁道游击队员抹黑，符合队员们的利益，纪实性稍稍弱一些，当事人也不会揭穿，因为小说中的故事就是他们的历史，谁不想让过去的自己更荣光。小说出版发行后，小说中的原型人物，迅速走红，刘洪、王强、李正、芳林嫂的名字代替了现实中的名字，进入了报纸的报道中。比如我在翻阅 1957 年的《解放日报》时，不经意间读到了一篇对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的报道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枣庄煤矿重新出煤 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回矿工作》，在文中直呼“王强”，而人家王大队副的真实姓名“王志胜”已经没有了踪影。^[213]并且编辑还把这一消息放在了头版的报眼的位置，报眼“位于横排报纸上与报头并列相对的位置，即第一版的右上角。因其在报头旁，故名。报眼虽容量不大，但由于地位显著而引人注目。一般在报眼处刊登重要而简短的新闻或本期报纸的内容提要、重要启事或图片等，现在也有刊登广告的。”^[214]，这一位置是后来“毛泽东语录”御用的位置。可见编辑对此类消息或者人物多么地关注和重视。（见图 2-2）



图 2-2 1957 年 12 月 2 日《解放日报》

报纸对队员们进行跟踪报道，使小说中的名字在现实生活中合法化。小说中文学人物变成了现实中的人物，虚构与真实划上了等号。小说给队员们带来了至上的荣誉和无上的荣光。他们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铁道游击队的“代言人”，他们成为了座上宾，应邀到各

地去做讲座。在往日的报章上仍然能够看到当年组织部门邀请他们作报告前所发布的宣传材料。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在 1957 年在济南上映前，铁道游击队长枪队队长孙茂生（小说中申茂的原型），多次应邀到济南的军区“八一”大礼堂做报告。《大众日报》同年 5 月 4 号以报花的方式广而告之（见图 2-3）。铁道游击队队员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语言组织、文法修饰能力当然比不上“高才生”知侠，更比不上专业编辑，他们在讲述故事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借鉴《铁道游击队》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这样会使他们讲述的故事更有文采，同时也有助于塑造他们自己的完美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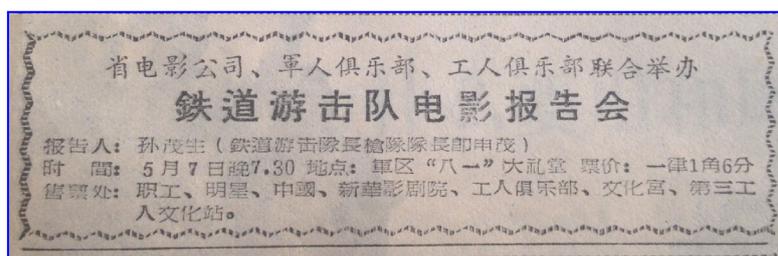


图 2-3 报告会报花

就这样，各位亲历者讲述的多个版本的战斗经历，经过作家的个人选择加工进入了小说之中，成为了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铁道游击队员们在口头宣讲中以自己的身份权威地明证了小说中艺术真实性。这样小说悄然置换为一部铁道游击队的队史。“刘洪们”在大众阅读的想象中走进读者现实生活之中。在艺术真实向历史真实的转化中，其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队伍被构建成了抗日战史上赫赫有名的神勇奇兵，《铁道游击队》小说也成为回望过往历史传奇的最佳文本。

第三章 在各个小说版本的罅隙之间：《铁道游击队》小说流变

第一节 小说文本流变

1953年5月，知侠完成了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写作，当即把其中的精彩一章《票车上的战斗》投给《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辑对文字进行加工整理完善提高后，发表在同年第7期杂志上。而《铁道游击队》小说则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在1954年1月出版。小说甫一面世立刻受到了读者的喜爱，读者纷纷购买，上市不久便告罄。同年印刷至少7次，印数至少12.509万册，“据说1954年图书每种平均印数为四万九千多册”^[215]，小说的印数可是平均数的一倍，同样是流行读物的《林海雪原》1957年的印数也才5万册。^[216]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本小说（见表3-1）。在以后的时间里由于作家自身的文艺水平和文学功底不断提高，政治风向不断变化以及读者阅读需要，作品经过了数次的改编。小说在艺术上更完美，在意识形态上更贴合主流。几次修订以后，有的地方完善了提高了，但有的地方适得其反，发生了倒退。

表 3-1 1954 年《铁道游击队》第一版的印刷情况^[217]

《铁道游击队》							
1954年版				新文艺出版社		竖排繁体	
印次	印地	封面	印刷时间	本次印数(册)	字数	定价	版权页备注
1印	上海	软	1954年1月	25000	450600字	22600元	封面作者：罗工柳
2印	上海	?	?	(13000)	?	?	A
3印	上海	软	1954年6月	12000	451000字	22600元	累计50000册
4印	上海	软	1954年6月	20000	451000字	22600元	累计70000册 本书曾印三次
5印	上海	软	1954年9月	20020	451000字	22600元	从70001-90020册
6印	上海	?	?	(20020)	?	?	B
7印	上海	软	1954年12月	15050	451000字	226000元	从110041-125090册

1954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是繁体竖排版，而对于阅读水平和认字水准相对较低的读者而言，他们还不具备熟练阅读繁体字的能力，况且竖排版也不太符合读者阅读习惯，这会阻碍小说在读者中广泛的传播，小说自身的涵化功能也不能更好地实现。因此，新文艺出版社于1955年8月发行横排繁体普及本，其字行字距都调整得比原来小，这样节约纸张成本。利好的消息是，书的定价由原来的22600元变成了1.16元^[218]。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做一个类比会很清晰：解放初期一斤小米的价格大约是一封平信的邮资定价8分钱^[219]，那么原来的定价相当于28斤小米，而调整后14.5斤小米，结余的12.5斤小米将是一个人至少一周的口粮。这一调整更加有利于收入不高的读者购买。按照正

常的规律，以后再出版的话，要在这个普及本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然而在1955年10月，出版社又重新推出了竖排繁体版本，这个版本跟1954年的初版本相比，外表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采用了同样的版式、字号，但是仔细地阅读文章内容会发现该版本与普及本的内容基本上一样，也就是1955年10月的繁体本采用了1954年版本的形式，而选用了1955年普及本的内容，成为了一个杂糅的版本。这说明竖排本经过了长期的应用，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大家的阅读习惯，大家仍然认为这种排版方式有需要，于是出版社顺势而为，这一版本也应运而生。由于扫盲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百姓能够读书看报，百姓间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铁道游击队》等通俗作品在图书馆内一书难求。“据浙江图书馆反应，文学书籍的流通情况近两年来有了显著变化，1956年以前，……我国的现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小说如《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等，因为这些文学作品表现了我国人民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对神圣祖国的热爱，广为读者爱好和关注，有的书在图书馆的拒绝率高达90%以上。”^[220]

1957年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赶苏超美。文艺界同样不甘落后，文艺工作者们自然也不愿意懈怠，大量作品涌现，出版社之间竞相搞起了出书竞赛，有的十几小时就出一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文艺权威宣传机构举办了“建国十周年优秀选拔本”活动，《铁道游击队》也在“十周年优秀选拔本”之列，为建国十周年献礼。作者对小说进行了多处修改，多达356处^[221]，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的5月重新出版这部小说，“如果说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伯乐发掘了《铁道游击队》，那么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秀选拔本’则正式赋予了《铁道游击队》的经典性”^[222]，使得《铁道游击队》进入了经典小说的行列，尽管在艺术上还有一些差距。作者在这个版本中，按照读者和领导者的意图进行了修改，这个版本成为了第四个版本。因其水平高，用语规范也成为了铁道游击队的善本。当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印刷时，采用了这个版本，《铁道游击队》也入选为“收获创作丛书”。^[223]

1964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露出端倪，国内的文艺形势每况愈下，学术问题极端政治化。“左”倾思想愈加严重。根据当时的文艺要求，作者不得不再度进行修改，1964年4月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新一版本。这一版本的修改与上几版的修订不同，它更加注重于与意识形态的政治匹配。对芳林嫂和刘洪爱情情节进行了删除或洁化、对祭奠战友的封建迷信行为的情节进行了处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铁道游击队》小说和电影与其它作品一起被批为“大毒草”，“这本黑书的要害，就是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歌功颂德，与毛主席分庭抗礼，为刘少奇篡

党篡政的大阴谋制造舆论”，尤其是描写了游击队员们掩护胡服同志过津浦铁路的情节，遭到了极其恶毒的攻击，刘少奇同志也被诬陷迫害致死。所以，即便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在“两个凡是”思维余绪威慑下，其思想惯性仍在，社会中毒依然严重。1977年版的《铁道游击队》删除了游击队掩护刘少奇过路的情节，成为第六个版本，虽然知侠在这一版本的出版后记中写道：“这次重版，只有个别情节和文字上做了一些删改”^[224]，“但鉴于当时刘少奇同志的冤案还未平反。所以出版社重印时建议把掩护胡服过路一段文字删去”^[225]。寥寥数语，看似轻松，却力透纸背，其中渗透着几多无奈和不解。这显然是一次不恰当的删改。

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随着刘少奇平反，在1978年的版本中，作者增补了小说的第二十七章《掩护过路》的大部分情节，使小说恢复了原貌，成为了小说第七个版本。1979年2月28日，山东省委在中央有关文件指示下，为一部分在“文革”期间被“毒草”化的作品解“毒”平反，《铁道游击队》也在其中。三年后，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为刘知侠同志平反的决议，至此小说《铁道游击队》和知侠完全获得新生；小说经过了七次大的改动一版再版印数达400万册，并被翻译多达10种文字。更加可喜的是小说“《铁道游击队》”已经作为固定词条被收录进2009版的《辞海》中，这更彰显了它经典魅力和不朽价值。^[226]

表 3-2 《铁道游击队》小说出版情况和印数情况^[227]

序号	版本/刊物	出版社	印数	印次	官方版权页累计	备注
1	1954年1月	新文艺	1-186130	至少10印		
2	1955年	新文艺	1-285060	至少10印	(1、2两个版本) 575310册	
3	1958年	人民文学	1-22000	2印	2000册硬皮, 20000册软皮	
4	1959年5月	上海文艺	1-122000	至少6印	1、2、4、5印 807310册	
5		收获创作	1-80000	至少2印		
6	1965年4月	作家上海	1-98000	1印	1、2、4、5、6印 910310册	
7	1966年1月	人文上海	1-65000	至少2印		
8	1977年9月	上海人民	不详	至少1印		有毛泽东语录字样
9		农村版	1-300000	1次		封底有麦穗和拖拉机字样
10	1978年3月	上海人民	1-641400	截止2005年13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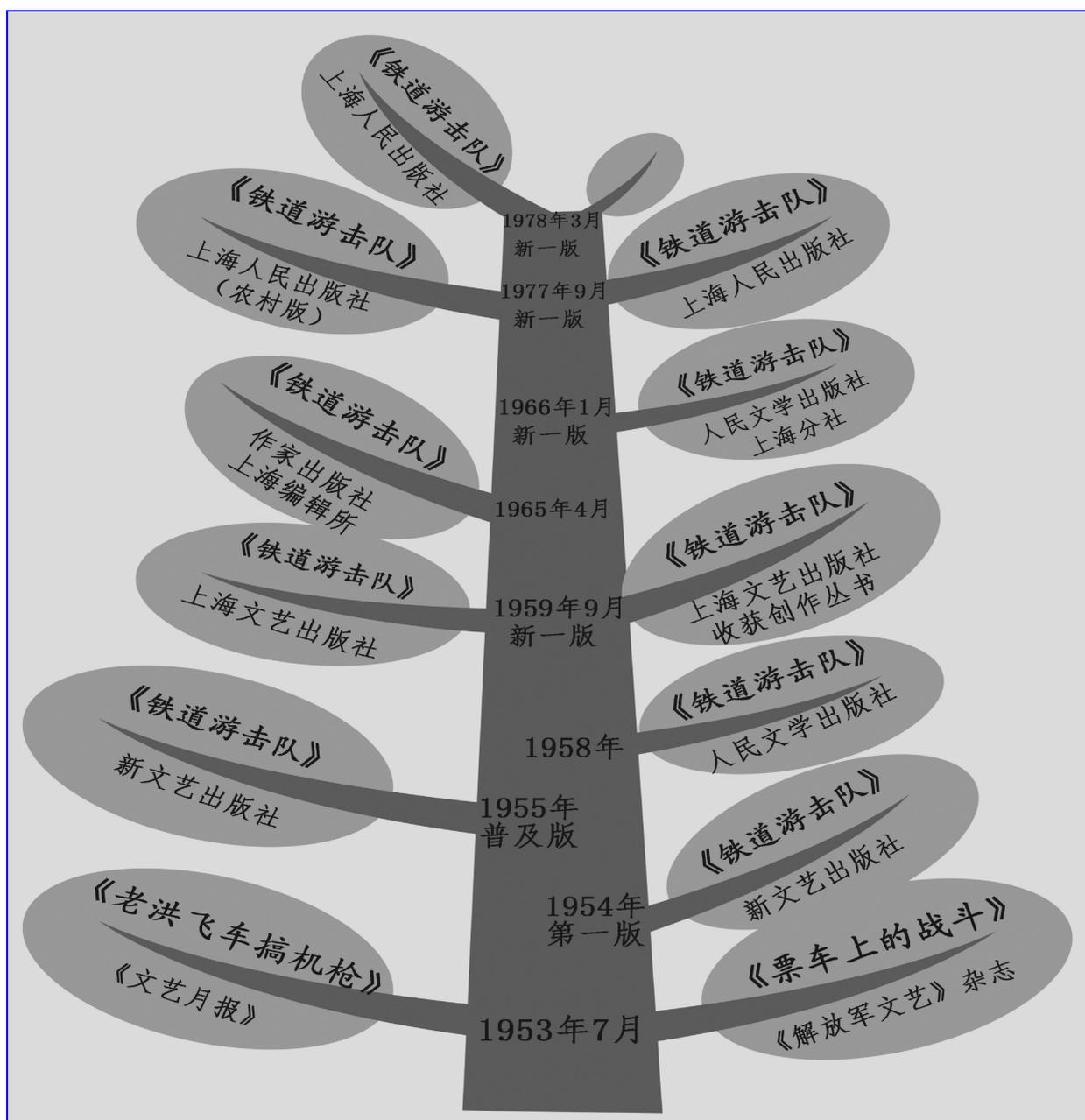


图 3-1 小说《铁道游击队》谱系树

第二节 《解放军文艺》杂志对小说的修正

1953年5月，知侠完成了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创作。他选取了其中的第九章《票车上的战斗》投给《解放军文艺》杂志，以观察编辑、读者的反应。《解放军文艺》杂志编辑对这一章小说进行了非常精致的校勘修改加工润色，从标点符号到字词句篇做了专业化的增删补修，仅仅1万余字的文章，修改就多达200余处。修改后迅速在1953年的《解放军文艺》7月号公开发表，编辑的修改基本是成功的，使文章更加文通句顺，逻辑性更强。当然，有些情节的修改也缺乏诗意和激情，使文章质量下滑。杂志出版后，知侠并没有按照编辑的思路进行修改，仍然依照自己原来的内容在1954年1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第一版。《解放军文艺》完整出版了小说第九章，为我们进行文本间互文性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较之小说《铁道游击队》的文本做了以下修改：



图 3-2 《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刊封面

一、对文字标点的修改

比如《铁道游击队》原著中写到“一个乡间老头，雪白的胡子”，在《解放军文艺》编辑把这句话改为“一个白胡子的乡间老头”，原来的句子把定语放在名词后面是欧式表达。这里将定语前置避免了欧化，也符合中文阅读的习惯，语句也更加地紧凑。还有，知侠写到“夕阳耀在上面”，被编辑改为“夕阳照在上面”，这一改动也避免欧化表达，因为在英语中的照和耀是同一个单词“shine”，照和耀本没有本质性区别，但是“耀”字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汉语中一般用“照”而不用“耀”，在这里编辑进行了改变，变得自然。同时编辑还对一些用词不当的地方进行了修订，比如说，原文中“你要

注意呀，今天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故”，把“事故”改为了“变故”，“事故原泛指事情，现在指意外的损失或灾祸”。“发生了意外的事件（意想不到的问题）”，他们之间有微妙区别，就是事故侧重于造成的损失，而变故是侧重于发生的意想不到的情况性，在这里改为“变故”要好一些。还有小说原文“甩着电话机子”改为了“摔着电话机子”，“甩”偏重于抛和扔，而“摔”无疑有着向地上扔的感觉让人感觉有了力量和动感。还有原文中写“噓着烧鸡”，编辑把他改成“嚼着烧鸡”，烧鸡怎能噓呢？它又不是流质的液体或汤汁，只有嚼才能把骨头嚼碎，能否“噓”到肚子里去还真是个问题。把“机器”改为“机件”，火车上喇叭是一个小的零件，是一个小的部件而不是小的机器，机器是若干个机件的组合。除此之外对一些长期使用的名词也进行了固化。再比如“扫荡”一词，在原文中“扫荡”一词，没有用引号引起来，编辑在修改文章中，把该词用引号标注。因为在长期的使用中，加上引号特指日本鬼子对中国的扫荡，不加引号表示别的扫除或荡涤。

编辑润色语言使文章有了诗意和韵味。又如老洪和彭亮准备爬车去控制火车头时，彭亮内心紧张而激动。彭亮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驾驶火车了，当他再次驾驶火车时就如老朋友再次见面一样，所以“‘他心跳的是感到他真的要参加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战斗了，在这次战斗里，他要真正作为司机来开车了’……老洪一把拉住他说：‘我上去先开枪，记着别伤了自己人。’”^[228]编辑在处理作者原文第一句中增加了一段彭亮作战时的内在激动的心情：“他心跳的是感到他真的要参加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战斗了，他们将亲手消灭掉这趟车的一小队日本鬼子，这次战斗会像在喜鹊巢里捣上一棍一样，把鬼子的心脏地区闹翻天，迫使日寇把在根据地扫荡的部队撤回来，好减轻山里的压力，保证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就是为了这个，在这次战斗里，他要真正作为司机来开车了”。^[229]（强调号部分是增加的部分）编辑通过这种动态描绘，“像捣上一棍一样，……闹翻天，迫使日寇……撤回来，好减轻山里的压力，保证反扫荡斗争的胜利”，这种描写动感十足，表现了彭亮参加这次战斗喜悦的心情。如果游击队这次活动成功了，能够起到牵制敌人，对根据地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编辑还使用了比喻“像在喜鹊巢里捣上一棍一样”，这个比喻形象地展现了敌人像喜鹊被端窝似的，狼狈地叫喊和挣扎。这段话使得鬼子被灭亡时的挣扎和狼狈，一览无余。读者读后会更加仰慕这支充满非凡毅力和神奇战斗力的队伍。

编辑的修改使文章变得文通句顺、逻辑性强。但也出现了修改质量倒退的情况，这表现在一些词语的使用上。知侠原文中用了“飞快”，“这消息也飞快的传遍了全枣庄”。

编辑在这里改为了“风快”“这消息也风快的传遍了全枣庄”。“飞快”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经常用的词语，而“风快”是一个更有比喻意义的词语，在当时去欧化的语境中，这个词语虽然好，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一致。还有就是“有要紧的事情托你做”的“做”字，编辑却改为“作”。“做”跟“作”在某些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可是大家一般还是认为“做”是做事情，编辑弃“做”而选择了“作”，这样的修改不仅仅没有提高文字质量，反而使质量有所下滑。

二、部分修改质量下滑

每一个编辑的修改未必都是成功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思维方式不同，每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不尽相同。再加上编辑对铁路系统的熟悉程度也不一定如知侠深刻。知侠毕竟是在铁路上长大，有着铁路工作经历。编辑对游击队在火车战斗的描写，可能不如知侠把握的好。对以铁路为背景的战斗进行描写，知侠是有自信的。例如在本章小说中彭亮驾驶火车头的情节，修改以后文章水平明显下滑。在知侠小说中关于彭亮驾驶火车自由飞翔心情的一段全部删除了。在知侠的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他从小就梦想着将来当一个司机，正像现在一样，稳坐在司机座上，眼睛发亮地直视着前边，铁轨像两条抽不尽的银线一样，往自己脚下拉。在铿锵的机器声中，耳边听着呼啸的风声，无数的村落、树林、河流、山脉……像旋盘似的往后滚，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呀！可是在旧社会里，父亲的叩头求情，也只能使他空有一身开车的技术，始终没有达到愿望。想不到今天，他成了抗日游击队员后，才真正地来当一个司机，虽然他这次开车，是个很短的距离，可是他这次开车的意义，不在距离的长短，而是掌握住它，像跳上性急的烈马，奔向敌人一样，他要把它开到埋伏的地点，把敌人载到那里给以消灭。他就是这样战斗的司机工人，虽然开车的时间短，但是对这次配合山区反扫荡的战斗，却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几分钟后，就要实现这个理想了。”^[230]而编辑把上面的情节全部删除，在文章中仅留下了这样一句“彭亮驾驶着火车在飞行……”，这样的删除直接损伤了文章语篇内渗的革命浪漫激情，同时也不能完整表现彭亮复杂欣喜的心情。反观知侠的描写，把彭亮开火车的心情描述得淋漓尽致、富有内涵。而编辑修改得干瘪憔悴不丰韵，根本不能表达出战士舒畅和喜悦的心情。

更有意思的是，在知侠的小说中，游击队完胜票车一役后，政委李正带领队员和火车上乘客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但是编辑将“八路军万岁”删除了，而且在文章中出现的好几处“八路军万岁”都被删除，

删除这句话显然是多余，有画蛇添足的嫌疑。如果作者原文中没有写到的话，编辑可以不必加上。可是作家已经写上了，编辑予以删除，有些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三、美化我军丑化敌人

原小说中铁道游击队打死一个欲逃跑的日本鬼子，《解放军文艺》的编辑把他转换成日本鬼子被我军俘虏，原文如下：“可是鬼子从车门那里跃出来，外边天黑下来，为了怕鬼子逃脱，紧跟着三棵短枪朝鬼子的身影砰砰砰的打了几枪，鬼子死在路基上边的碎石头上了。”^[231]然而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中，编辑则把它改写为：“鬼子吓蒙了，扬着两手嗷嗷叫着，到处乱撞，小坡伸手去抓衣领，一把没抓住，鬼子踉跄地歪倒车门前，栽下去了。小坡连忙纵身跳下车，正好跳到鬼子身上，两个人扭在一起一直滚到路沟里去。接着王友也跳下来，卡住鬼子的头，狠狠地按到泥土里，小坡把鬼子两臂使劲往后一扭，一个活鬼子被俘虏了”，这种修改起到双重作用，其一强化日本鬼子在我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威慑面前无胆可逃、惊慌失措、丑态百出。同时也表现出了我军优待敌人宽待俘虏的政策。由于敌人没有要还击的意思，同时他也没带枪，就不能无端地把他枪毙，否者会显得我威武之师不够人道，给这支铁军脸上抹黑，也不符合我党对待俘虏的政策。

除此之外编辑还自觉地把“皇军”和“鬼子太君”全部更换成“鬼子”。“皇军”和“太君”是“旧日本帝国军的自称（当时有皇军、国军、皇协军、帝国军、帝国陆海军、大日本军等称呼），即天皇统领下的军队。”^[232]这两个称呼本是日本人对自己军人的敬语，作为党性强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编辑当然要把这种称呼换成鬼子了，这样做才能贬低蔑视敌人，把鬼子称呼我军的毛猴子改成了“铁道游击队”，“‘毛猴子’是日本鬼子对游击队的蔑称，日寇对神出鬼没的八路军游击队无可奈何，称他们为‘毛猴子’”^[233]。因为“毛猴子”具有讽刺意味，语言不文雅，所以编辑改成了铁道游击队。

四、《解放军文艺》编辑对小说的影响

应该说每一个编辑都有自己的责任心，他们都尽全力对入选的文章从字词句篇到结构逻辑等多个方面进行爬梳剔抉。他们是文章的“清洁工”，也是文章的“美容师”。他们进行整体润色使之符合这个杂志的风格特点，使文章能够顺利出版发行，从这个意义上还可以说是“助产士”，作品在编辑的呵护下水平得以提升。《解放军文艺》杂志的编辑对《铁道游击队》小说第九章《票车上的战斗》修改后，文章水平整体上升。当然也有经过编辑的修改后文章质量下滑的现象（比如，本文中“彭亮驾车”情节）。对

于这种好的改进方向，作者在今后的修改或再版时理应效仿学习，按照这样的风格进行修改。可是我们对小说的各个版本对比后发现，作者在以后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向修改。我们认为不是编辑修改的不好，而是作者对自己的文笔太自信，或者说对自己的文笔太自恋。作家对编辑修改的文字不认同，也可能是作家和编辑在不同的话语语境场域中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和分析不尽相同的结果。但毋庸置疑，《解放军文艺》编辑对文章的修改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专业编辑加工改造过的《铁道游击队》别样文本，让我们在对不同版本对比分析时感受话语变化的乐趣和快感，获取别样审美感受。

第三节 小说各版本正文文本间的流变

一、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处理

1955年10月，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根据从简从俗的原则，精简了汉字的字数，这样“使汉字系统向规范化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而且有效地遏制了汉字使用中的字体混乱现象”。知侠在以后版本的修改中努力地照着这个标准认真修改，经过了几次反复以后，把原来一些使用不够标准的字词修改过来。比如“沈”字原来与“沉”是相同的，在以后版本中全部改为“沉”。“沈静”改为了“沉静”，“沈沈长夜”改为了“沉沉长夜”，“兹兹”改成了“吱吱”，“胡疑”改为“狐疑”，“吵仗”改为“吵架”，“王大队附”改成“王大队副”，“那末”改成“那么”，“脾味”改为“脾胃”，把“毗毗叭叭”改成了“辟辟拍拍”，把“混身是劲”改成“浑身是劲”，“叱呼”改成“喳呼”，“好象”改成了“好像”，等等。

解放后，官方发布了《标点符号用法》。文字书写和书刊排印渐渐由竖排改为横排，标点符号用法也有了些发展变化。明确规定“电影、电视、音乐、诗歌、雕塑等各类用文字、声音、图像等表现的作品的名称”用书名号标示。在修改过程中知侠对标点符号进行了修改，把涉及话剧、舞剧、书名、歌曲的引号改为了书名号，比较突出的改进在第十三章《进山整顿》一章中，因为该章出现的上述艺术作品较多。作家对此一一做了修改。比如把“八路军进行曲”改成了《八路军进行曲》，把“血染洋行”改成了《血染洋行》，把“火车上打鬼子”改成了《火车上打鬼子》等等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同时语言也更加文明加以了收敛，老洪骂顽军“奶奶个x”，在1959年版本中修改为“奶奶个熊”，这是对老洪的语言清洁化，再者“奶奶个熊”这个词语在鲁南枣庄地区就是口头用语，特别常见，出现了这个习语给读者一种真实感和熟悉感。还有“老百姓难道都信这些屁谣言麼？鲁汉气愤愤的打断了政委的话问道”^[234]。这样的性器话语表达明显是粗

鲁野蛮的，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于是在以后的版本中作家把最粗鲁的语言删掉，改为“老百姓难道都信这些谣言麼”。再次把一些外来语改成了规范语言，把原来文章中的“洋火”改成了“火柴”。通过作者的几次修改使文章更加的文通字顺了，大家读后也容易理解，促进了艺术作品精品化和艺术作品经典化。

二、对正面人物的美化处理

比如在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同志过铁路的情节中，王强到堡垒里找伪军小队长安排情况，这时鬼子的铁甲巡逻车开过来了，王强跑到了碉堡门里，其他两个队员也“都匆匆的窜进了附近的树丛里”，在后来的修改中作者改成了“也都急速地伏在附近的树丛里”，因为前者的“窜进”表现的是我队员惊慌失措胆怯害怕担忧个人安危，胆小怕事。看到鬼子来了就赶紧逃路的狼狈样，不能表现我战士的勇敢威武，胆大心细的英勇形象。后者的改变当然就要好的多，“急速伏在附近的树林里”，这表现了我战士有着自己的战略战术，在情况不明的时候要先进行隐蔽，先掩护胡服同志过路，把大事办完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表现了我军能屈能伸的灵活精神。

比如车站上打旗的老张帮游击队散发传单时，被敌人逮捕英勇就义。老洪特别悲伤。“老洪是个刚强如铁的人，他不愿把自己的悲哀表现在脸面”。“老洪是个刚强如铁的人，不轻易流露自己悲痛的感情”。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作者修改了一个词语就是把“悲哀”改为了“悲痛”。“哀”作为一种负性情绪，通常指是由分离、丧失和失败引起的情绪反应，包含沮丧、失望、气馁、意志消沉、孤独和孤立等情绪体验。悲伤根据其程度不同，可细分为“遗憾、失望、难过、悲伤、极度悲痛”。把这个负面的词语改成了“悲痛”，意指老洪会在这种伤离别极度痛苦中痛定思痛，从悲哀中走出来，投身到下一个战斗中，为老张报仇，把日本鬼子早日赶出自己的家园。这种修改不仅仅表现在老洪身上，还表现在所有的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身上，展现了他们英勇的气概和无畏的精神。

三、对反面人物的漫画处理

在修改的版本中，作者对于敌伪顽等反面人物进一步的丑化处理，以期凸显他们凶狠的兽性本质。比如刘洪受伤在芳林嫂家里养伤时，顽军到芳林嫂家来搜查，砸开了芳林嫂家的门：“大门一开，一群顽军拥进来”，在以后的其他版本中，知侠把其修改为“大门一开，顽军像狼群一样拥进来”，很显然后一个句子加了一个比喻像狼一样，这些顽军分明就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狼，别看他们外表是人，他们不干人事，像狼一样吃人。人面狼心的本性表现的栩栩如生，凸显了敌人的兽性，他们本来就是人面兽心的豺狼虎

豹。铁道队袭击了监修水塔的鬼子以后，鬼子们对湖边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扫荡，特务队长岗村“在吼着对中国人讲话”，在后来的版本中则修改成为：“狂吠般地对被迫集合起来的中国人讲话”。在这里作者把岗村比喻成一条狗，在那里吼叫。“这两天车站上的冈村特务队长特别不高兴，看见中国人就眼红，连警备队的伪军都怕见他。他短粗、黑脸白眼，经常撅着小胡子在叫嚣。除了见了他的上司中队长时两腿合拢、毕恭毕敬的立正站着以外，平时看着下级或中国人，他都是两腿叉开，抱着膀子站着，显得非常傲慢。”“他有一只心爱的狼狗，常跟在主人后边，逢到主人的两腿叉开站在站台上的时候，狼狗就蹲在主人旁边，尖竖着耳朵，前腿蹬着，后腿弯着，作预备进攻的姿势。”当冈村看到不顺眼的中国人，把手里的皮鞭一指，狼狗就猛扑上去，将人咬倒，直到被咬的人遍体鳞伤，冈村一声口哨，狼狗才舐着嘴上的血，跑回主人身边。”^[235]看，岗村平时的站姿跟他那条心爱的狼狗多么的相似，他们都会两腿叉开站在站台上，真是人不如畜。当作者在后面讲岗村趴在哪儿吼时，读者往往会击节称快，因为前面的篇章已经做好了铺垫，将这个貌似豺狼的野兽交代给读者，也为“打冈村”埋下了伏笔。

四、对胡服过路的滤化处理

“文革”时期《铁道游击队》被批判为毒草小说。^[236]“它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公开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特别恶毒的是，它打着反映人民战争的招牌，进行歪曲、攻击人民战争的罪恶勾当，对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237]。小说主人公的刘洪，被批判成“毒草小说炮制者着力刻划的一个‘流寇主义’的黑标本”^[238]，“刘少奇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中国的赫鲁晓夫”加紧了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竭力为篡党、篡政做舆论准备。要彻底批判这些毒草、黑书，是革命大批判，是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39]

在“文革”期间，知侠的作品被列为禁书，不再出版发行。1977年粉碎了“四人帮”，知侠接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来信，声称如果小说再度出版发行的话，必须将原著第二十七章“掩护过路”删掉，因为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了铁道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去延安的历史事实，否则不予出版。迫于当时“四人帮”势力的惯性威慑和“两个凡是”的政治形势影响，为了自己作品能够继续出版发行，也是为了自己政治立场安全，作家作了让步，他违心接受了这一要求，删除了“少奇过路”一章。“少奇同志他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到了哪里，那里的危机就转为胜利，原有的胜利扩大成更大的胜利。现在他要回到延安毛主席那里了，正从微山湖过路，掩护他过津浦铁路的任务，

落在铁道游击队的肩上”^[240]，少奇同志要过路，这怎能不让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感到高兴呢，他们为这次过路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及策划了各种预案。全体动员全程戒备，队员们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安全掩护少奇过铁路。尤其是政委和大队长们更是护送少奇同志荡舟微山湖上，少奇同志给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表扬了他们的成绩，也指出了他们存在的问题。同时指明了他们未来的工作之路：坚决保护好这条交通线。这一事件无论是故事情节的曲折性还是政治性都是可圈可点的，对铁道游击队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就是这样一个党性十足的情节被“四人帮”贴上这样的标签：“在第二十七章《掩护过路》中，把胡服(即刘少奇)吹捧成‘伟大的领导者’，‘到了哪里，哪里的危机就转为胜利，原有的胜利扩大为更大的胜利。’是对刘少奇大肆吹捧。”^[241]这一如此出彩的情节在新的版本中，不得已被删除，为了避免过于突兀，在文章中加上这样一句话：“队员象箭一样没入道东的黑影里。不一会，从东边大路上出现一簇黑色的人影，向这边走来。他们就是这样安全地掩护了一批干部，过了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线。”^[242]小说共删除了3页1250余字。这种删除对作家而言无疑是违心的，1977年的版本成为了极夸张的缺本，也成为了极大的遗憾，好在这种错误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和政治倾向的矫正，得以纠正。在1978年版中删除的部分得以恢复。这种政治上的波动造成了文学文本上的荒谬，这一文本也成为了那个特定时期的艺术政治化背景下又一滑稽的呈堂证供。疯狂的时代有疯狂的举动，政治对文艺的干涉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上。曾经进过小学课本人们颇为熟悉的油画《开国大典》，在政治风暴的疯狂左右下，也可以任意变形。原油画中毛泽东主席站在城楼正中央宣读中央公告，国家领导人胸配红花站在其后，一派祥和喜悦之气。这幅作品被其他艺术家给予了满分的高分。作品也遭到几次大的改动，1954年，“高饶事件”后，高岗副总理在油画中被抹掉；“文革”时刘少奇成了“走资派的当权者”，也被从油画中抹掉；1972年，林伯渠也被从油画中抹掉，因为他曾经反对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就这样一部好作品，创作者董希文在文革中也因其受到了迫害。好在粉碎“四人帮”后，本着事实求实还原历史真相的原则，油画的复制品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美术作品在不同政治风暴下展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成为了特殊历史时期政治对艺术干扰的明证。

五、对亲情爱情的洁化处理

在《初回微山湖》这一章中，冯大爷带老洪和政委去芳林嫂家找水喝，刘洪和芳林嫂见面后，两人进行了眼神上的交流，互相有了好感。随着交往的加深，他们产生了情

感。

在 1955 年的普及本中，作者是这样描写的“老洪的眼睛是很亮的，但是他在芳林嫂的注视下，忙低下了头。因为他在过去孤零零的苦难与斗争里，从来没有这样近的和年青的女人谈过话，而且有被这样的眼光盯住他，他含羞的垂下了脸，却看见了芳林嫂脚上的白鞋子”。^[243]

在 1966 年的新一版中改为：“老洪这个什么也不怕的铁汉子，在芳林嫂的注视下，却腼腆地低下了头，因为他过去生长在苦难与斗争的环境里，从来没有这样亲近地跟女人谈过话。他低下头时，无意中却看见了芳林嫂脚上穿的白鞋子”^[244]。这只能说两个人见面时萍水相逢的感受，还没有进入互相热恋的程度，即便这样对于作为革命战士的老洪也是有着革命的纪律性的，他不能对一个对他有好感的女子在表情上有什么变化。这是革命者的自觉，也是作者的自觉。在主流对情感洁净化要求愈来愈强烈时，作者进行了如此修改是必要的。在修改版本中，把“老洪的眼睛是很亮的”删掉，因为眼睛亮，见到了芳林嫂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看，看到了如此美丽大眼睛的女子，就会分神，就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中去。同时加上了作为被看者刘洪的表情，芳林嫂看他，他就会“腼腆”地低下头，不能迎合看他。这里的腼腆的意义不如含羞强烈，腼腆指不好意思，而含羞是羞涩，如果指情感的话是两个人实心实意地都有了感觉，这里只是芳林嫂在关注他。对于老洪的身世进行了毫不留情地删除，“在过去孤零零的苦难”，每一个有着斗志的革命战士无不是从孤苦悲痛中走过来的，原来的“孤零零”并不可怕，因为“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芳林嫂在第一次见到了刘洪同志时对英雄产生了崇拜之情，而刘洪对于这种情感的紧逼采取了退让的态度，这使得小说更有内涵，因为芳林嫂追求爱情的主动性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具有英雄气质的男性英雄。这种单向情感还没有上升到两人互相产生情感的高度，还没有达到需要删除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人互相有了好感，产生了爱的情愫。当刘洪去山里整训时，他不由自主地会想起在芳林嫂家养伤的情景：“她又是那样的把鸡蛋汤一口口的喂到他的嘴边，他仿佛听到她的跳动”。在后来的修改版本中作者把后半句给删除了，变成了“她又是那样的把鸡蛋汤一口口的喂到他的嘴里”，这表示革命同志之间虽然关系紧密，但也是纯洁的同志友情，不能在养伤期间以公济私产生恋情。还有一段就是“有时他压抑着自己，不要常往这里想，可是有时他也在低低的对自己说：“他是个多么勇敢的女人啊”。在后来的修改版本中，作者对刘洪的自言自语，“他是个多么勇敢的女人啊”给删除掉，加上了“这是不可能的，他怎么也不能把她的形象从自己的脑子里抹去”。作者把自己对芳林嫂直白

的开放的表扬改变成间接含蓄的赞同。这些散点在文章中富有个人情感的人性化语言，在政治风暴的洗礼之下逐渐地被荡涤，作家采用了更加低调稳妥的方式进行写作，这样使得正面英雄形象更加地纯净，也使得作者本人在政治运动中处于更加稳妥的位置。

第四节 《铁道游击队》小说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的概念是法国文论家热奈特在研究文本间性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来的。^[245]“副文本”是相对于文章的主体（正文本）而言的。所谓副文本可以包括正文内容部分以外的所有的文字内容和图像内容，即包括“封面、插图、插画、引言、题词（题记）、版权页、附录、后记、出版说明”，等等。^[246]“副文本”在热奈特那里被喻为“进入正文本的门槛”，它是“文本周围的旁注和补充材料”^[247]。所有的副文本和正文本组成艺术作品统一完美的生命体，他们成为了一个系统，同呼吸共命运。在研读正文本时，通过副文本可以看到历史在作品中留下的痕迹，看出历史本来的容颜。通过副文本中的封面页、插图页、引语页、版权页等等能够微妙地反映时代的变化和政治的变迁，以及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尤其是在“十七年”的政治狂潮中，不仅仅是正文本的内容在政治的约束和要求下发生变化，同时副文本的形式也在主流的规训和监督下变化。副文本的设计和安排有着重要的宗教修饰和隐喻意义。在十七年文学中，正副文本一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们呈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和英雄气概，强调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继而为新的政权孕育、培育、教育一代又一代新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铁道游击队》自1954年杀青出版到1981年的新版，近三十年间，内容进行了七次改写，副文本也有些许变化。读懂副文本的内在意义，对于理解正文本变迁的原因以及洞察时代变革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意义。

一、《铁道游击队》引言研究

“引言是引他人的话简洁地表达作者用意或正文本主旨”。^[248]引言一般有两种形式：献给某某人的呈现体或者叫“献祭体”。比如《林海雪原》的引言“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另一种是引用名人名言的语录体。在十七年文学中多采用毛主席的语录体。这种引言是“十七年”以及文革时期文学中最流行的一种创作时尚。毛主席的话语思想成为了这些小说内在基本精神注脚或行文的指导思想总纲。在“政治一体化”时代，作者引用毛主席的话语也能保护自己。《铁道游击队》采用了不同于《林海雪原》的毛主席语录体。小说的引语是“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剥削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

战略上配合正规军战争。…”（如图3-4）这段话引自1938年5月毛泽东写就的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无端挑起事端，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抗日民族救亡图存的战争从此开始。抗日战争初期，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产生这种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形式下，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只有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形势，才能更深刻理解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重要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就是毛主席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他强调游击战是阵地战和运动战以外的又一有效的抗战方式。知侠洞透领悟了这一红色理性精神，书写“鲁南地区铁道游击队员们在铁路沿线骚扰敌人抗击杀敌的故事”时也紧紧抓住了这一精神内涵。“然而，我们从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没有丝毫地发现出理论阐释的痕迹，却真切地感受到了从文本中吹来的浓郁的传奇风味。这也许就是革命战争文学特有的魅力之所在。”

^[249]自1954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繁体竖排版小说开始，这段引言就进入了小说，并给予了一页纸的篇幅，就像是堂屋墙上的中堂彰显和透露着主人的格调和品格（如图3-3）^[250]。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铁道游击队》小说，作者在“重版说明”中说“《铁道游击队》是作者在解放初期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九六六年前曾几次再版。这次重版，只在个别的情节和文字上做了删改。”^[251]这一版的标志性改动之一就是作者在引语的前面加上了“毛泽东语录”五个字，同时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字样去掉（如图3-4，3-5）。虽然当时“文革”接近尾声，但“四人帮”的余威犹存，“两个凡是”的思想尚在，毛语录仍盛行，以“毛主席语录”字样作为日常对话、文学作品的开头成为了一种时尚，可以获得语言意义上的合法性，也是作者向主流意识形态积极靠拢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作者知侠试图通过语录作为金钟罩，向世人展示自己对毛主席的思想内涵的高度掌握和熟练运用，保护小说和自己免遭政治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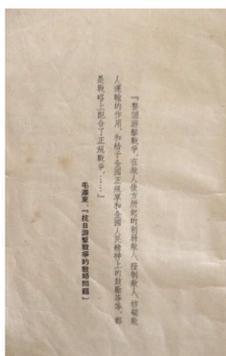


图 3-3 《铁道游击队》54版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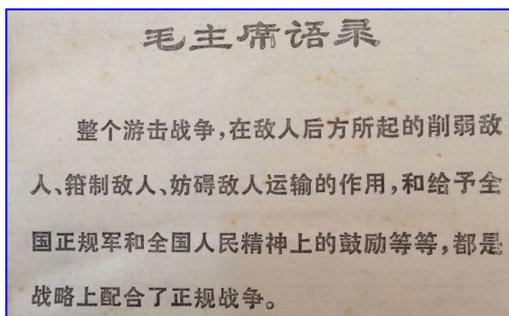


图 3-4 《铁道游击队》“毛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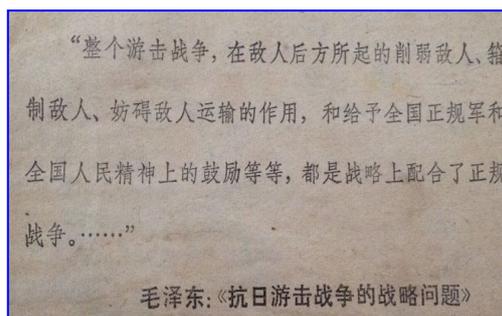


图 3-5 《铁道游击队》引言

不仅仅是图书,在其他印刷品上同样印有毛泽东语录。当年的报纸作为最有力和广泛的宣传媒介,在头版,语录也必不可少。它一般在报眼的位置以加粗加黑加大字号排版,并且在周围还要镶嵌花边图案,起到醒目的效果,同时也对第想的概括和总结。比如在1968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毛泽东语录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在珍宝岛战后,为了纪念表彰孙玉国等十名“战斗英雄”,当时的《大众日报》农村版专门在头版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中央军委命令授予孙玉国等十同志“战斗英雄”称号》的文章,同时在报眼的位置刊发了毛主席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那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见图3-6)这句语录简短有力,简单易懂,却有着很强的号召力,经过多家的报纸传播,在当今的时代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我们经常还会听到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图 3-6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语录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言必称“毛泽东语录”,有时教条使用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据说当年,有一人拉车上坡很困难,希望有他人停下来帮忙。可是,他却拉不下面子,便每当有人路过时便大声背诵毛泽东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明显是期望有人听到毛主席语录,发扬助人为乐精神,帮忙推车。不料,却迟迟无人回应。后来,终于有人走近停下了,不过,戏剧性的是,那人也并没有帮忙,而是朗诵了另一段语录:“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依赖它……”。在今天看似可笑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毛语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这种疯狂的教条没有使人民的内心产生根本改变,却给生产和生

活带来了不便。不过在接下来的1978年，文艺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摘帽”运动，把日常生活、语言文字中使用的“毛泽东语录”五个字祛除。于是，小说在1978年3月新一版第二次印刷时，就被还原成原来的样子（见图3-5）。在这以后的各个版本中，小说彻底祛除了语录体，一些语录被摒弃在小说文本之外，语录自然也失去了原本的活力。

二、《铁道游击队》内容提要研究

新中国成立伊始，文学作品在出版时没有充分地重视内容提要，以至于大多干瘪乏味，千文一面。“如果要寻找典型的八股文字，我提议诸位不妨去领略一下各书的内容提要。”^[252]“写法上却近于千篇一律，总是什么‘语言精炼、通俗易懂’”，^[253]还有的读者认为：“我每次去买书，总要先看一下书籍扉页上印着的‘内容提要’，根据书的内容，再抉择是否买这本书”。但是，近来不少书的扉页上再也见不到内容提要了。像影响巨大的小说《红岩》，一打开封面就是正文，既无序跋也无‘内容提要’。我觉得这对读者选购书籍是不方便的。”^[254]这样的批评自然会引起作者和出版社的关注。内容提要写得好的作品，能给读者以推荐作用，能起到省时省力选择的效果。“长篇小说的读者，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工人、干部。由于时间、文化程度、兴趣等不同，其中很多人不能阅读长篇论文或书评。那么，要首先对某些作品有一个轮廓的了解，才能选择买什么。这借助于书前的‘内容提要’（或内容说明）是很便利的。以往出版的小说大多没有‘内容提要’，最近，特别是1958年出版的一些长篇小说都有了内容提要，这给读者带来很大方便，而且有的写得很好，颇受读者欢迎。……”^[255]

“我以为好的‘内容提要’应当是该书的简短的然而却是优秀的‘书评’。必须在几百字的短文里扼要地生动地介绍作品的故事内容、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主要情节、人物性格特征及该书的艺术特色。当然在几百字的短文里要介绍这样复杂的内容是不容易的。这就需要写‘内容提要’的人熟悉作品，掌握作品的特点，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用最精炼的语言，生动活泼地写出‘提要’来。”^[256]“长篇小说的‘内容提要’既然要让读者对作品有一个轮廓的了解，从而帮助读者选择作品，理解作品的重要作用，出版社应当继续重视这一工作，使这一工作做得更好。”^[257]

“内容提要”还是做学问的好方式，“马克思对于他的每一种著作，都搜集大量的准备资料——摘录，提纲，图表，以及一切可能的数字、原始材料目录等等——加以整理，作成有系统的内容提要，以便在以后工作中易于选用。”^[258]正因为有了事半功倍的方法再加上自己的勤奋，马克思完全可以骄傲地说：“人类的一切东西，对于我都不是

陌生的。”同时内容提要还是书店选购图书的好方式，因为书店在订购图书时一般都是看一下内容提要。好的内容提要能够对书籍的内容进行抽象概括，能够看清内容，估计其销量，利于书店订货。巴金在视察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时就指出“书店根据出版社交来的公式化的‘内容提要’来决定印书数量，也是造成积压的原因之一”^[259]

作为刊发上述这些读者来信的《人民日报》，对内容提要没有袖手旁观，它在积极响应读者的诉求，在1952年至1954年3年间和1960年全年的时间内每天专门在报纸上留有一小块地方用于刊登当期报纸的内容提要。1961年元旦起，《人民日报》将内容提要改为了“今日要闻”，这也算是对“内容提要”的继承和发展，并且一直坚持了4年，到1964年年底，这一必选栏目才被新的栏目取代。

“内容提要”能够充分有效地向读者提供信息。它通常被放在扉页上。如果说文本的引言是从宏观的的纬度上对一篇文章的精神内涵进行了提炼和概括的话，那么内容提要则是从微观的角度对小说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相较其他小说的内容提要，《铁道游击队》小说的内容提要倒是有几分新意。它基本上能起到对归纳总结内容，提纲挈领主题的功用。从内容的层面来看，本小说内容提要要把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任务分为三个层面：其一，他们打票车截货车炸桥梁袭据点等进行了具体战斗；其二，他们抵挡敌人的铁壁合围，清剿扫荡，把敌人打得魂飞魄散；其三，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他们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继续努力，他们继而编入了主力部队，迎接更大的挑战。通过阅读这一内容提示，我们能深刻的感觉到，这一小段文字，是整部小说的缩略和概括，同时也完全符合格雷马斯结构矩阵^[260]的模式：“我方与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我方的支持者是工人和广大的农民，而敌人一方的支持者是伪军和汉奸，我方以铁路和微山湖区为主要的战略阵地对敌军进行了猛烈的打击。

好的提要同时也能够自觉契合“拉斯韦尔 5w 模式”的信息传播机制（见图 3-7），也就是通过文本，作家把怎样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在读者心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读者阅读了内容提要以后，内容提要能够诱导他继续阅读正文本，内心产生了愉悦的快感，精神上受到鼓舞，思想上得到启迪，意志上获得同一，能体会新生政权来之不易，从而全力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造、建设之中去。



图 3-7 拉斯韦尔 5w 模式

三、《铁道游击队》小说地图研究

在一些长篇小说中如果地名出现较多，往往会加上一个地图用以指导读者阅读。比如《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卷首就是一副“陕甘宁边区地图”，“以五角星为标记的延安当然处在地图的中央，西安则以不起眼的小圆圈绘在地图下缘。全书八章，除最后一章“天罗地网”外，均以地名为题，“延安—蟠龙镇—陇东高原—大沙漠—长城线—沙家店—九里山”，正好串出一个“圣地失而复得”的情节模式。因此，这幅地图不单是可读成政治军事地图，也可读成一副经过宗教修饰的寓意图。”^[261]延安跟西安相比是一个小的城市，在正常的地图上的标示要比西安小的多，模糊的多。但是在我党的革命史上延安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我党的根据地，正是延安母亲般的胸怀哺育才使我党强壮光大。在这种意义上来讲，延安是举足轻重的，西安则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保卫延安》的地图中将延安放到了一个中央的位置。正如现在我们国家的地图上北京是中国的中央一样，在北京的旁边永远标注一颗红色的五星一样。因此这本小说中插图延安的政治意义大于其地缘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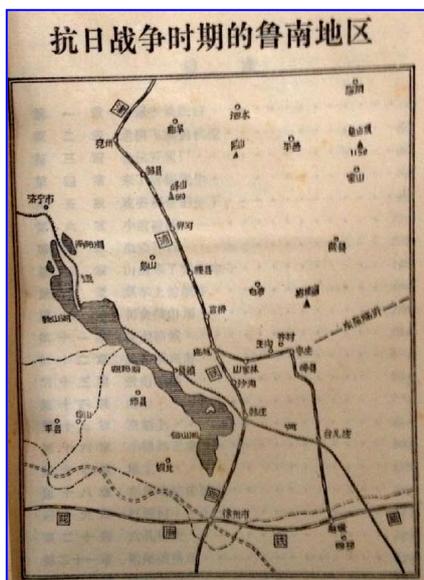


图 3-8 《铁道游击队》小说中的地图

因为《铁道游击队》中谈及的区域是从枣庄到微山湖区域，涉及了大量的村庄名称，作者为防止读者阅时思绪混乱，从 1955 年的普及本开始在小说中加上了上一页地图，把这张地图命名为“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见图 3-8），这不过是一张鲁南地区的平面缩略图，尽管作者试图向读者提示一些地名的信息，可是地图中也没有详尽的标明重点地名，比如刘少奇去微山岛时经过的“蒋家集”，刘洪牺牲的“黄埠庄”，芳林嫂的村庄“苗庄”以及双面保长所在的“鲁庄”也没有标注。小说一再强调小说中都是真人

真事真地方，在小说中出现的“洪山口”位置就是地图中鳧山山脉缺口处，距离游击队登陆的微山湖畔有 50 多公里，虽然洪山口距离微山湖的湖边有 5 公里，如果不乘船的话，在很短的时间内铁道游击队是不可能到达的，这在地图上就可以看出小说的纰漏。

四、《铁道游击队》小说封面研究

书籍的封面是读者阅读的第一页，好的封面能够揭示书的主题，同时也是对内容的高度概括，能够体现出作品的总体风貌和精神气质。

封面画家在阅读小说内容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抽象概括，提纯出作品的精髓，然后用线条色彩进行编码，创造出“决定性的瞬间”。读者在拿到文本第一瞬看到他，通过自己的大脑进行解码，在解码的过程中对作品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并且吸引读者读下去。好的封面画能够架起小说作者、绘图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262]视觉画面语言自然能够赋予我们无穷无尽的想象，尤其是那些不断修改的封面画。

“‘图书也是一种商品’，因而其‘包装’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出版单位的声誉和图书的销路。一个出版单位，只有把图书内容和封面装帧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一起抓好，才能够使自己的出版物，取得良好的效益。”^[263]

因此我们可以说封面是小说正文内容的镜像引语，既体现出了特定的革命话语对小说作者和绘画者的训唤，同时也体现了艺术品自身独立美感。新中国成立伊始，封面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也经常遭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诟病。有读者给《人民日报》来信说：“目前新书的封面装帧不够讲究，封面画的设计有公式化、简单、粗劣的现象。我常看到这样的封面：书名大致是用宋体字，另加印一张照片，或加印一些与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的常见的图案，或者是窗花。如《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丛书中的《吕梁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最近出版的人民文学丛书《铜墙铁壁》《火光在前》等等一套书的封面，都是那么平板、乏味。象鲁迅先生对待一些书刊的出版那样地注意。……”^[264]“读者对目前文学读物中插图艺术的衰落、封面设计的一般化是不满意的。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映，许多出版社、杂志社都常接到读者的意见，他们要求有优秀的插图出现在文学读物中，并有美观而又与书刊内容、性质吻合的封面设计。”^[265]

在读者的批评、监督、建议和呼唤下，各类出版社对小说的封面愈加重视，许多文学作品因为有了精致的封面而获得了读者的好评，“近年来，文学书籍的插图，渐渐多了起来，这是极可喜的现象。一部好作品，如果没有好的插图，就好像缺少了什么似的，

总使人感到有些不满足；反之，好书如有好画相辅，对于读者，不独于阅读的兴趣会有所添益，对丰富人的想像力，提高人的欣赏水平，也有帮助。……拿《李双双小传》的插图来说，那几幅水墨画，是很有特色的，张育德画的李双双，极其有神，那种热爱生活的青年劳动妇女的神态，传达得真切动人。蒋兆和画的《耕云记》中的气象员淑英，也很出色，画的特点，恰当地表现了她在观察气象时的苦学勤练精神和负责的精神状态。……吴作人、孙滋溪为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作了插图和封面画，使这部书更突出了它强烈的气氛。……应该庆幸的是，作家与美术家的这种合作，尤其应该感谢美术家们为书籍插图付出的辛勤的劳动。他们的画，为书籍的美增添了绚烂的异彩，给了读者以更丰富的美感享受。”^[266]

“图书的封面装帧，类似于人的穿着打扮。一个人的装扮，只有适合这个人的性别、年龄、体形、职业，及其所处的场合，只有体现了这个人的气质、修养与风度，而同时又显示出了当今社会的风貌与时代特点的时候，才是美的。一本图书的封面装帧，也只有适合于这本书的内容与篇幅，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表现出设计者的独创性的时候，才是美的。”^[267]

《铁道游击队》的封面画是罗工柳在 1953 年专门为小说初版本创作的（见图 3-9）。这一图画表现的是游击队员在某次战斗中攀爬上火车头，站在火车的门口，脸神刚毅，怒目凝视，观察车内情况。他左手抓住车门把手，右手举起手枪，列车在从左向右高速行驶，衣服在身后随风飘扬飞舞。画面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整幅作品充满了动感和诗意。尽管封面的标题依旧使用了宋体，“铁道游击队”五个大字像是铺在碎石上的铁轨，铁字和队字中所包含的象形“人”字，像是道钉紧紧扎进大地。五个大字上面行驶着高速的列车，宋体的稳重气息和上面灵动的图画相得益彰。看过这幅画使读者不由地想起《票车上的战斗》一章中老洪攀爬车头打死司机控制机车的场景。“这个铁牛越来越大，大的简直像半壁黑山样向他头前压过来，他毫不畏惧的迎着即将压到眼前的黑山，勇敢的窜到倒边的路基小道上，当车头的前面闪过他的身边，他的手臂像闪电样的向车头上一伸，抓住上车的把手，紧跟两部，身子一跃，右脚就踏上脚踏板了”。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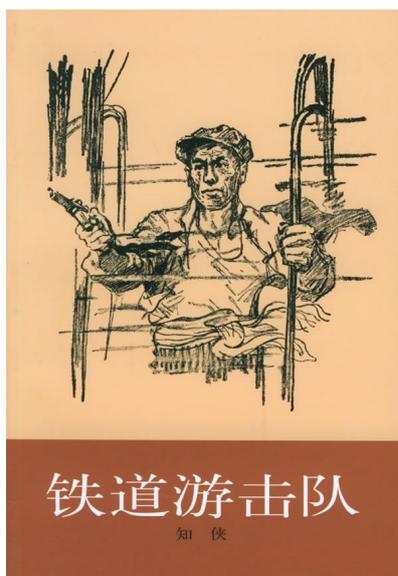


图 3-9 《铁道游击队》封面

1962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收获创作版《铁道游击队》小说。“创作收获丛书”是一个包括多本书的书系。^[269]要想使这套书系的图书整齐划一，用每本书的原来的封面显然不合适，他不能给读者视觉上的一致感。于是出版社委托钱君陶进行创作书系的封面。他舍弃了原来的具象的图案，使用了浅深浅三条竖条纹排列的图案组合在一块，封面洋溢着韵律感，会给读者带来阅读愉悦快感，也象征着文艺作品大丰收。书的封底最中央的位置作家放置了一株成熟的麦穗，以象征丰收之意。在当时的年代再也没有比庄稼丰收解决温饱更加让人高兴和愉悦的事了，这种小麦的造型也出现在了以后的版本中。（如图 3-10）



图 3-10 创作收获丛书封面

在 1977 年“‘农村版图书编写小组’遵照毛主席‘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的教导，‘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270]，《铁道游击队》也忝列其中（见图 3-11，3-12）。既然这套书是面向农村大众的，那么在封底右下角设计者加上了一个小小的 2*3 厘米规格的小图案，

在这个图案色上方是三束麦穗和一架拖拉机，在其下部有着“农村版图书”的字样。这一设计与该系列小说的读者定位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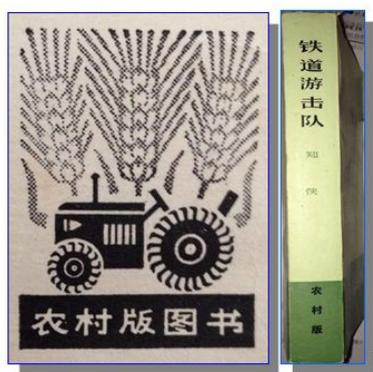


图 3-11 农村版《铁道游击队》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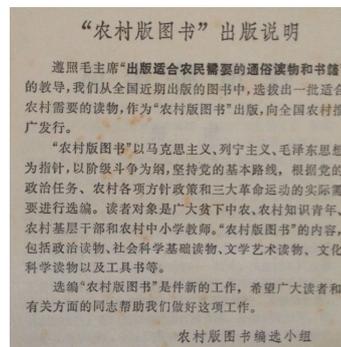


图 3-12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第四章 1956 版《铁道游击队》电影研究

第一节 影视剧文本流变

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发行之后，因其通俗易懂，故事性强，真实可信，红透大江南北。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平原游击队》捷足先登，引起轰动，老百姓读者强烈要求《铁道游击队》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换种方式读故事。小说出版后两年，1956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铁道游击队》纳入自己的拍摄日程。电影的编剧是小说作者知侠，导演赵明又对剧本进行了再次删改。剧情基本上是摘取了小说中最精彩的几个故事，同时对芳林嫂和刘洪的爱情进行了最大幅度展现。虽然在男女演员看来电影没有拍出爱情的精髓，但是在当时文艺小阳春时节，这也算是一抹春色。作品放映后，得到了大众的好评，还获得好几个大奖，后来还被出口到国外。因为小说牵扯到“胡服过路”的情节，在“文革”中，电影被打为了“毒草”，“文革”结束后不久电影被平反，仍然被主流推荐为青少年成长必观看的影片。直到今天，它也是“红色经典”放映月的高放映率影片。1956 版电影是最贴近小说原著内容的一次改编，是革命历史小说的具象书写，是《铁道游击队》影视剧的第一个版本。

198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四十周年”。全国各行各业踊跃向四十周年献礼。在此时机下，上海电影厂将 1985 版电视剧纳入自己的献礼视野，并与知侠商量剧本内容改编事宜，得到了知侠的欢迎。本剧是由张弘和 1956 版电影中小坡的扮演者冯笑为导演。功夫演员张甲田和青年教师牛娜分别饰演刘洪和芳林嫂。由曾经拍过《翠岗红旗》《鸡毛信》《白求恩大夫》的“清华才子”张骏祥导演为艺术顾问。^[271]198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理应反响不错，可是生不逢时，同期的精品作品太多，同时这部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审美不大契合。再加上作品自身的画质和道具品质不够精美，收视反响平平。虽然问题不少，可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艺术价值。故事情节比原来更加充实，节奏更加明快，女性形象更加地丰满，被压抑的爱情和情感得以舒展，相爱的人们得以自由地低吟浅唱。这是《铁道游击队》影视剧的第二个版本。

1995 年，峨眉电影制片厂与其他几家电影公司^[272]，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名联合投拍了商业电影《飞虎队》。导演认为一部影片的成功不在于拍什么而在于怎么拍。他相信同样一个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会拍得完全不一样。正如导演开拍前所讲的“绝不用新瓶装旧酒”，他从原著中摘取了极小的一部分，生发了

史实中“老洪娶亲”的情节，渲染了“李九和小青的情感戏”，将铁道队的活动场地集中在铁道旁边，将枪战和暴力图景作为影片表现的第一要务，呈现了激越悲壮的暴力视觉奇观。尽管电影情节与原小说的故事联系不大，但仍不失为一部“弘扬主旋律，追求形式多样化”的影片。《飞虎队》成为了《铁道游击队》影视剧的第三个版本。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六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历经六十年的重要事件，多部影视剧围绕抗日战争题材进行创作，其中就有2005版电视剧《铁道游击队》，这部剧由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和内蒙古电视台联合拍摄。剧组为了使剧本的文学性更加地贴近原作的基本风貌，邀请了知侠的夫人刘真骅女士作为艺术顾问，李世明和胡燕怀为编剧。在最初的8个月内厚厚的3大本剧本，四易其稿。导演是以武侠风格著称的王新民。赵恒煊被邀请出演刘洪的角色，刘长纯出演政委，史兰芽是芳林嫂的扮演者。电视剧于2004年的10月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开拍。为此，枣庄专门建设了本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的拍摄基地，同时也借此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本版电视剧在最大程度忠实于小说原著的基础上，吸收了铁道游击队历史史实，借鉴了铁道游击队其他衍生版本的精华，扩大了故事的内容容量，丰富了故事戏剧效果，“成为了戏剧性最强最忠于原著的作品”，同时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被中宣部评为“五个一工程奖”。这成为了《铁道游击队》影视剧的第四个版本。

2011年是“建党9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六十六周年”。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在2005版电视剧名利双收后又有了新的想法，他们继续拍《铁道游击队战后篇》。创作者清楚地知道好的抗战剧能缅怀战争使人珍惜和平，更能使人勿忘国耻奋力前行。经过了五年的剧本打磨、三个月的紧张拍摄。剧组在保持2005版电视剧演员阵营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了微调，再续铁道游击队新传奇。2011版电视剧剧情是抗战胜利后，铁道游击队由原来的打击鬼子改为保卫枣庄安全，与国民党顽敌及鬼子余部开展有勇有谋的战斗的故事。与2005版电视剧的故事无缝对接也好，还是狗尾续貂也罢，2011版电视剧也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但从思想艺术的高度、戏剧情节的强度与涵化教育的深度，距离2005版电视剧还有很大的差距，成为了《铁道游击队》影视剧的第五个版本。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各行各业都将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文艺界的反应会更早一些。在2014年的冬月，山东电视台山东卫视传媒在枣庄高调宣布：“自制剧《飞虎队》开拍。”素有“鬼才导演”之称的钱雁秋将用全新的手法重塑《铁道游击队》，传承红色精神，向经典致敬。钱导

演说“我们压力也很大，我觉得我们的戏动作上要创新一些，人物上也要有创新，还是要出点儿新的自己的东西，把自己拿手的东西奉献给观众。”^[273]现在该剧已经在枣庄的葫芦套影视拍摄基地拍摄。

2015年春节刚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内部创作会议上也公布了改编《铁道游击队》电影的计划。新版的《铁道游击队》将从徐克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中吸取成功经验，利用3D技术和影视特技，启用“年轻的演员、年轻的明星、年轻的导演”。上影厂还打算邀请成龙为武术指导，成龙有着汽车动作特技的充分经验，相信他也能设计出更多、更精彩的火车动作特技。2015年3月广电总局官网已经公示了该电影的拍摄制作备案表^[274]。具体的信息是：片名：《铁道飞虎》；备案单位：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编剧：汪天云、袁孝民；备案结果：同意拍摄；备案的立项号：影剧备字[2015]第858号。拍摄指日可待。（如表4-1）这一国字号的影视作品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表 4-1 电影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

备案立项号	片名	备案单位	编剧	备案结果	备案地
影剧备字[2015]第858号	铁道飞虎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汪天云、袁孝民	同意拍摄	上海市
梗概	略				

2015年3月北京的一家民营电影公司在青岛召开新闻发布会，它将中美合作的方式复拍《铁道游击队》，请知侠的夫人刘真骅做文学指导，请芳林嫂的第一代扮演者秦怡为艺术指导，请好莱坞的名导为导演，请重量级一线演员担纲，旨在打造商业大片。

《铁道游击队》将进入了三国混战时期：国企和民企哪家强；影和剧哪种更胜一筹：“小鲜肉”“老戏骨”哪个更受待见；是外来“和尚”会念经还是本土“和尚”服水土，这都将是悬念，必将好戏连台，烽火不断呈现三国混战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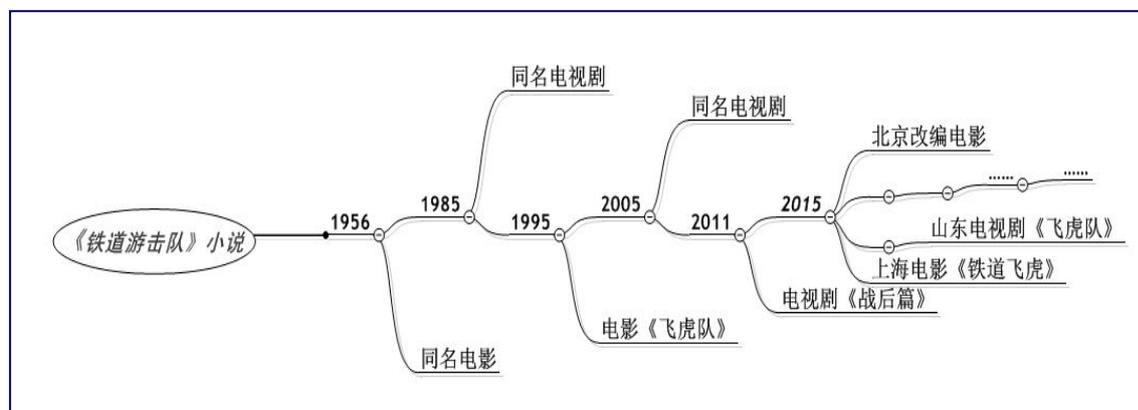


图 4-1 《铁道游击队》电影文本发展流变

第二节 1956 版《铁道游击队》电影创作背景

小说《铁道游击队》面世之后，风靡一时，要求改编为电影的呼声随之而起。尤其是《平原游击队》率先上映产生了轰动，众多喜爱《铁道游击队》的读者也通过各种渠道询问、建议，强烈要求小说改编成电影，其关注热切程度颇为罕见。1956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顺乎民意将其列入摄制计划，将其搬上银幕（如图 4-2）。



图 4-2 1956 版电影《铁道游击队》海报

上海电影制片厂请知侠来改编剧本，同时安排赵明做导演，配合知侠参与剧本改编。赵明的提前介入，给初次“触电”编剧的知侠不少帮助。赵明提示知侠因为影片长度有限必须要举重避轻，突出最主要的情节，舍弃、省略或合并次要人物和情节。对于作者刘知侠来说，这种修改无疑是一种难言之痛。这些情节和人物都像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哪有亲疏远近。知侠后来回忆：“小说写得虽然有许多缺点，可是再不好的孩子，总是自己生的，不免有些偏爱。现在要把它拿来肢解，实在不忍下手。”^[275]改编的头几稿，他认为已经删了很多，再也精简不下去了。这可能也是原著作者编写剧本的一大弊端。于是赵明拿过去，做了一番删削调整提炼浓缩。刘知侠对导演“果断处理”表示佩服，感叹比自己“客观、冷静得多了”。“知侠建议请刘金山当军事顾问。在南京见到杜季伟，到枣庄也和王志胜见面”。^[276]赵明，这位曾经拍摄过《团结起来到明天》和《三毛流浪记》的导演，在剧本完成后，开始班底搭建，演员的选择倒是颇费了些心思。



图 4-3 1956 版电影《铁道游击队》剧组在外景地合影

刘洪的角色专门外请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曹会渠出演。《铁道游击队》是曹会渠的第一部电影作品。“1956年，全国各地话剧团到北京参加话剧汇演，当时我们团排的话剧是《保卫和平》，最后得了全国话剧汇演一等奖。正在我演出时，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赵明也来到北京为《铁道游击队》选演员，觉得我身上有股和刘洪很相近的工人气质，就选中了我。”^[277]秦怡，“中国最美丽女性”^[278]，是芳林嫂扮演者，拍这部电影时34岁，正符合芳林嫂的年龄。“秦怡外貌略显孱弱、单纯却本性聪慧、机灵，形象要求最为接近角色。”^[279]据秦怡本人回忆：“我们（引者注：指导演赵明）认识很久了，他找我拍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我身体健康。这个角色其实也要有点本事，因为她也要探听敌情，要照顾大家的衣食住行的。”^[280]虽然芳林嫂的角色在电影中是配角，但是经过了秦怡的演绎，绘声绘色栩栩如生，让观众记住了这个角色，芳林嫂和刘洪的爱情故事也在大家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委李正则由上影演员冯喆出演，一个矫健英武，颇有军事干部气质；一个清癯精干，带有知识分子特征，从外形到内在都很贴近，“文武”互补颇为般配。”^[281]游击队其他骨干王强、小坡、彭亮、鲁汉等，分别由冯奇、冯笑、仲星火、邓楠等扮演，也都各具角色所需的练达、朴实、憨厚、耿直等特征，阴险狠毒的日寇特务队长岗村，则找了在反派表演中崭露头角的陈述。在现在看来可以称的上是全明星阵容。（如图：4-3至4-5）^[282]选定了角色，演员们开始了艰苦辛劳的体验生活。演员们深信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只有前期体验的好才能在实际拍摄中产生好的效果。因为胶片供给紧张，前期人物揣摩角色到位，才能够节约胶片。为塑造好刘洪，曹会渠提前半个多月去铁路上体验工人们的生活。当时司机、副司机、司炉三种工作，他都体验过。他对司炉的工作颇有心得，“往锅炉里送煤要呈扇形，一下子窜起火苗才行，要不然，一大铲子煤送进去，煤燃烧不充分，就会冒黑烟，那是把煤顶出去了”。

^[283]徒手扒火车自然是曹会渠体验生活的一门必修课。“不但要胆大、心细，准确抓住时机，还要有丰富的经验。”他说：“当时有专人训练我怎么扒、怎么跳，用哪个手抓，先跳哪个脚，都有技巧。记得他告诉我，如果车速 40 公里的话，要把握屁股先落地，在空中通过惯性调整后，脚就先落地了；如果车速 60 公里，那就要背先落地，这样才不会踉跄着。”^[284]在拍摄过程中演员们也不马虎。秦怡声称：“导演让你跳火就跳火。”《铁道游击队》拍摄时正直七月，那时在太阳下面的温度有 50 摄氏度。可是需要拍的戏却是冬天的戏，秦怡每天要在拍戏现场要穿个大棉袄，在“送政委疗伤”那场戏中，导演还要求裹了个大围巾，“跟我们一起拍摄的马都热晕了，我还算不错，人没晕。长痱子，从下巴到全身，全部都是痱子，痒得不行了，很痛苦。痱子长了一辈子，就是《铁道游击队》那时捂的。但是拍戏的时候不会觉得的，演员嘛，拍戏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觉得苦，导演让你跳水就跳水，让你跳火就跳火，跟战士上前线一样。”^[285]

辛勤的耕耘总将有回报，这部影片也让演员们的表演技艺有了提升。在 2005 年第十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即“金凤凰奖”颁奖典礼上，这一群老战友不约而同再度聚首。因其一生的演艺经历，他们在这次的典礼上获得了荣誉：秦怡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老演员曹会渠、冯奇则捧得“特别荣誉奖”。^[286]



图 4-4 电影中芳林嫂（秦怡）和刘洪（曹会渠）



图 4-5 电影中王强（冯奇）和刘洪（曹会渠）

第三节 从小说到 1956 版《铁道游击队》电影

1956 版影片在保持原著精神风貌的前提下加入了原小说中没有的情节，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尽管主流意识形态对此甚是不满，“据说陈毅同志看了影片后对这一点很不满意，认为艺术虚构如此夸张，未免太过分了”。^[287]片中的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成为几代人传唱的经典，也成为了《铁道游击队》和今日枣庄的名片。

除此以外，电影与小说相比较，情节有了如下变化：

一、凸显游击队之铁道特色

赵明在创作伊始就刻意从其他游击队电影的艺术窠臼中跳出来,想方设法地拍出“铁道队”的特色来,同时也克服在小说中铁道游击队铁道战表现不足的问题。因为在小说中铁道队主要活动在三个区域(铁道、平原、湖区),在前十章中描写的是游击队的铁道战,这样的情节安排会使铁道战在小说中特征不够鲜明突出。导演赵明清楚地知道在时长有限的篇幅中要表现好铁道队,就要在铁道和火车上下功夫。他说:“关于游击战争题材,可以说并不新鲜,但铁道线上的斗争却有其独特性。如何把这些英雄人物在铁道上的战斗生动地表现出来,赋予他们以独特的、新鲜的艺术形式,这一点也应慎重考虑”。^[288]“为了攻克这一难关,剧组专门从上海铁路局调来了一列火车供演员们训练,这列火车由1节火车头、5节客车、1节卧铺车厢组成。演员们就在这列火车上练习扒车跳车,吃住都在火车上。火车的速度由缓慢开始到逐渐加快,大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先跟在火车旁边跑,然后再练习如何抓住车门的扶手,如何起身往火车上跳……可是,待到正式开拍时,却发现了问题。因为平日大家都是练慢车,火车行驶的速度如果按照大家练习时那样,在镜头里肯定会露出明显破绽。在正常车速下,特别是在如实展现火车风驰电掣的环境中,表现游击队员轻巧的扒车、跳车的惊险场面,才能达到影片中的理想效果。于是,为了影片的进度,演员们只能在飞驰的火车前,做好飞速快跑和扒车的姿势,然后再让聘请来的专业“替身”完成实际动作。”^[289]大队长刘金山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扒车,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我从十一二岁起就在铁路上学着扒车,后来我到铁路上干活,家离工作地点五六里地,每天来去,都是抓上飞跑的火车上下,火车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得好手才能上得去,我们那时穿的是有松紧口的布鞋,在搞鬼子的火车时,跳下来时鞋底和鞋帮都震裂了,全身的力气全落在一双脚上,……你叫演员去跳,那得多危险,一时学不会;这得用电脑的特技来解决,这一行我可不会了”。^[290]在拍摄“智打票车”那出戏时,我们观看影片会感觉到特别的逼真,火车在左右摇晃,外面的景物急速飞过,并伴有隆隆的响声,一切都是那样的真实。其实,这场戏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中完成的,在拍摄时所有的道具都是按照小票车的规格样式仿真设计制作的。在车厢外有三道近景:靠近车厢的是树,稍远一些的是电线杆,最远的是山的布景。拍摄的时候这三道布景以不同的速度循环转动起来,就像是火车行驶在郊外的田野里一样。^[291]

二、增加英雄救美人的情节

在本版电影结尾剧情是这样安排的：日军在撤退前欲将芳林嫂等人拉到一个地方全部活埋，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刘洪大队长策马奔驰飞骑营救，要赶在芳林嫂她们遇到危险之前到达。（见图 4-6）这样一个说起来简单的老套剧情，在拍摄过程中，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因为导演要求刘洪的扮演者曹会渠必须按照拍摄的要求从高速前进的火车头前穿越铁路，距离、速度和时间都要必须高度的精确，在奔马跨越铁轨的同时，火车头正好通过也就是马尾巴要碰到火车头。如果奔马穿越火车时距离太远则太假，距离太近就会增加演员的危险。

如果现在拍摄飞骑过铁路的镜头难度不大，可是在当时无替身、无特技和无后期合成的“三无”背景下，拍摄演员骑马过铁路还真是一出惊险戏。曹会渠感慨道：“当时唯一担心的是马蹄子在奔跑中踩到铁轨空里，也就是马失前蹄，那人就完了。老实讲，拍摄前我并不害怕。我是从战争里走出来的，战争的硝烟在我身上还没退呢。”^[292]“真拍时，导演只说了一句话：‘能过去就过，实在过不去你就把马头勒住。’火车起动了，我骑在马上跑，快到跟前时，我一看还可以，也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劲儿，一下子就穿过去了。当时我骑了一匹抢头马，善于冲锋，拍完后，火车因为惯性还在跑，这匹抢头马也跟着并行跑，一直跟了四五里地。”^[293]曹会渠说：“那时候一个镜头拍完不知道怎么样。完了我就问导演：‘要不要再来一条？’他说：‘不拍了，好不好就这一条了。’我这才看到导演的脸都白了。后来我还得知，为了这场戏，刘洪的原型刘金山、同时也是这部戏的军事顾问，就负责驾驶火车。他对我说：‘打了一辈子仗，我从没紧张过，拍这部戏比我打仗还紧张啊’”^[294]

后来，秦怡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拍摄那天我们所有人都去看，大家都想着看看有什么是可以帮忙的，我们都很担心曹会渠，因为他不是太会骑马，刚学会的，这组镜头非常危险，大家在准备‘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工作。我们都坐在对面的地上，离火车大概 50 米”。“正式开拍时，曹会渠骑马过去，眼看着火车迎面开来，马受惊了，但是就一两秒，那真的是一匹很好的马，训练有素，很懂事很快它就反应过来了，冲过去了，镜头刚好就是马尾巴碰到火车。”秦怡回忆说：“拍的时候我吓死了，闭上眼睛倒在地上，心想怎么办啊，曹会渠是不是就这样死了啊，等导演一喊停，我睁开眼睛，看见他还是很神气地坐在马上，才放心，大家都说总算过去了，我们在现场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295]



图 4-6 最后一分钟营救

三、删除芳林嫂刘洪爱情戏

《铁道游击队》开拍前，包括导演在内的主创人员，都主张要刻画芳林嫂与大队长刘洪在共同对敌斗争过程中——特别是刘洪负伤疗养芳林嫂尽心护理中，两个人萌生爱情的细节。戏正式开拍后，拍了两场完整的爱情戏。但意想不到的是忽然节外生枝，影片即将上映时，有关领导不主张在本电影银幕上表现爱情戏。就这样拍好的爱情戏被迫删除，造成前后的情节接不上，芳林嫂的形象也有些支离破碎。观众在观看影片时总能够感觉影片的节奏和叙事不是那么流畅，有一种错乱的感觉。假如一开机干脆不涉及爱情，反而能保证全片的完整，不会出现这样的硬伤。

然而，电影中被删除的情节，秦怡表现芳林嫂获得爱情情绪变化时，动作和表情表演得朴实自然，丝毫没有“做戏”的痕迹。屋内，刘洪轻轻拥抱芳林嫂，芳林嫂百感交集，她有些慌乱与腼腆，迅速跑到外屋门口，推开木门眺望远山，心情激动，思绪万千；刘洪跟着跑到外屋，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披到芳林嫂的身上。棉衣温暖了芳林嫂的身体，也温暖了她的心……为了拍好这场戏，秦怡整天思考沉默，寻找芳林嫂的感觉，因为只有感觉到的东西才会是真实存在的。江苏省沪剧团的名演员张慧芳在一旁看这场戏的拍摄，戏拍完后她对秦怡说：“秦老师，你当时的感觉真实极了，看上去一点都不会不舒服……”张慧芳的话给了秦怡莫大的安慰，为拍好这场戏，她下了很大的功夫。虽然这场戏最终被剪掉了，但对今后的表演来说是帮助的，秦怡永远也不会忘记。^[296]

相较秦怡拍爱情戏时表现得自然和真实，男主角曹会渠则表现得紧张和拘束。与秦怡配戏，曹始终放不开。这成为了他最大的遗憾，而这恰巧是曹会渠一生中唯一的一场爱情戏。曹会渠讲：“刘洪和芳林嫂产生感情后，导演想发展一个比较亲热的镜头，芳林嫂站起来打开门，靠在门边上，表示她的感情很激动了，就叫刘洪过去把手放在芳林嫂的肩上，

扶着她的肩膀。可是我的手一放上去，导演就说不行，不像那么回事。看我像个木头，扮演政委李正的冯喆就给我示范。可一到我拍还是不行。因为我不认可他的示范，我觉得那是李正的感情，不是刘洪的。芳林嫂是个寡妇，她丈夫打鬼子牺牲了，他们两个人不是单纯的找对象，刘洪是因为对鬼子仇恨并同情芳林嫂而产生了感情。当时，秦怡大姐比我大八岁，也对我说要放开点，可拍了几遍导演都不满意。”^[297]这出爱情戏没有演好，也成了男演员曹会渠唯一的遗憾。但无论演员演得好坏与否，这出戏终究没有呈现在观众的面前，爱情戏在公映时被删掉，这成为剧组演员们终生的遗憾，也成为“铁”迷们的一大遗憾。

第四节 1956 版电影：游走于主流规训和爱情书写之间

1956 版电影《铁道游击队》故事情节之所以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中渗透着“文艺批判标准”和“创作者争取人性表达自由”之间的博弈和纠缠。这种文艺作品政治批判倾向还要从 1949 年的《武训传》说起。无论政治上如何褒贬，如何评价艺术作品的文艺价值，这本来是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是一种文艺争鸣，与政治无关。但是对《武训传》的批判带来了新的批判潮流。武训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一生以行乞之身行兴学之事，清政府给予了他多项奖励。1944 年导演孙瑜把武训的故事搬上了荧幕，拍成电影《武训传》。影片表现的是武训行乞义学的故事：主人公生来贫寒，十三岁便给地主做苦力，后来三年的工钱被地主无端赖掉，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不认识字的缘故，从此萌生了兴办义学的年头，遂以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乞讨，后来在地方官吏、土豪劣绅的帮助和支持下终于办成了义学。尽管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办义学的故事，但是在影片的结尾的台词仍然试图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劳苦大众做一头牛吧！”从 1950 年 12 月电影公映到 1951 年 5 月 20 号《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前的半年时间内，人们对于《武训传》的评价大多是正面的，只有极少数反对的声音。在那些反对声中，有一篇名为《不足为训的武训》对电影命运影响最大。文章认为：“影片是失败的。武训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不识字当做穷人受苦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把阶级压迫当做本质来认识”。“武训既然是一个善良的劳动人民，按照他小时候的‘聪明灵巧’善于学习的特征，对于私塾先生和掌柜之类的人物的仇恨，到了后来为什么都丧失殆尽了呢？”文尾还得出了结论：“作者在这里尽其能地做到了一种模糊阶级斗争意识的一种无原则立场的宣传。”^[298]

这篇文章成为了这次政治运动的先导。1951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在《人民日报》。这一社论将政治标准深入到了文化之中，并对《武训传》做了这样的定论：“它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这篇社论开创了“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以政治手段解决文艺问题”的先河，严重地影响到了几十年的中国文艺批评和文艺的发展。

在文艺批评走向单一的政治主导路线以后，文艺界的气氛变得格外紧张，人们开始重新检讨自己，重新确立一种创作和批评模式，去顺应新的形势。经过了几次波折和运动，电影界创作者变得谨慎，创作题材变得单一，创作的冬天到了。在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让他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叫百花齐放”。又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在战国时代，两千年前的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鸣，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在报纸上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党的方针明确文艺可以争鸣，言论比以前自由了，文艺工作者的春天到来了。既然是什么花都可以开，无论“香花”还是“臭花”，都有表达的空间和权利，爱情故事也应当是可以表现的。可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即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一个“隐形人”，暂时藏匿起来，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全身而退的意思。作家们有了更加自由的创作空间，有了更加充足的题材进行创作。创作气氛进入了比较活跃的时期，趁着这样自由的机会，赵明开始了《铁道游击队》的拍摄工作。如果这一创作的小阳春没有到来，电影《铁道游击队》这朵小花就不可能绽放，自然也不可能为大众欣赏。

《铁道游击队》电影的关键问题就是对于刘洪和芳林嫂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表现问题。同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将爱情放在一个显性的层面来书写真的不多，基本上“爱情”处于一个缺席的位置。即便在文艺作品的初版本中有，经过几次的筛选修订，爱情也被悄然“升华、移置、忽略”，这是因为电影作品都基于这样一个逻辑起点：“爱情”是一种个人的情感的代名词，她所打造的是一个“私人空间”，这与所倡导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你有我有全都有”的集体主义是分道扬镳的。所以，作品需要引领私人“爱情”进入一个公有的领地，一个更加崇高的境界，万不可沉溺在自己的小圈子，沉浸在自己的二人世界中卿卿我我不可自拔，会丧失革命建设的“力比多”。而追根溯源，这种思想认识当源自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的结论部分，毛泽东将“人性”放在阶级社会中来考察：“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299]毛泽东虽然承认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但是，“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300]这种对“人性”的阶级分析和对“爱”的实践观照，实际上暗示，应该倡导无产阶级的爱情。《讲话》还强调，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党的工作服务。具体来说，就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工人、农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讲话》仍然作为政府制定和执行文艺方针的重要理论依据。这样，如果“爱情”不能为政治服务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或者即使对“政治”投怀送抱但歧义丛生也属大逆不道，这种爱情也应该被祛除。

1956年文艺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给文艺界带来了一丝温暖。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文艺界的春天来了。一些文艺工作者开始探讨“人性”、“我们对于所有充满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们，则永远怀着深深的敬仰与感激的心情，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作品里赞美了人，润饰了人，使人的形象在地球上站得更高大了”。^[301]“什么是人情呢？我以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302]

文艺工作者在政治环境稍稍宽松的背景下，开始了更深的哲学思考，进而想探究“人性”“人道主义”的内涵。将人性从阶级的本质试图还原为人的普通情感。同时他们将爱情理解为是人类共通的东西，是来自于人的本身、超越阶级性的东西。不仅仅是此阶级有爱情，彼阶级也有爱情，爱情是每一个普罗众生都在追求的美好事物。没有爱情哪有繁衍，没有繁衍，哪还有革命的接班人，没有革命的接班人怎能使我们的伟大事业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艺术是生活的再现，在生活中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然而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却不能出现，一旦出现会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文艺作品不是表现粗俗的“兽性”而是召唤美好的“人性”。尽管在1956—1957年的文艺界的春天，有一两部电影表现了爱情，比如《铁道游击队》（1956）《柳堡的故事》（1957）等影片，但在其他影片中爱情却很快被驱逐得不见踪影。今天创作者仍然对这些作品的遭遇感到遗憾，那些探讨人性的文章和影片，被贴上了“集中地，有系统地贩卖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行了歪曲的攻击”的标签。^[303]春天很快过去，严冬不远。文艺界经过少许活跃，接着又迎来的“反革命”“大跃进”的高潮，使得文艺工作者寒蝉鸣泣，顿时失声。在1959年以后，电影中英雄人物，已经没有了爱情，他们的任务就是无休止地工作和革命。在1949—1976年的27年间，电影对爱情的呈现，映射出特定的历史和政治年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一体化的”僵化时代，为追求“人性”抑或真理所作出

的种种努力，以及让“爱情”正大光明地进入电影中英雄人物抑或普通百姓生活的种种尝试。然而，在电影功用过度放大化的背景下，在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的钳制下，文艺作品中的爱情只能静悄悄地离开，这对于艺术家来说也是最安全的保护。

就这样，在1956、1957年间，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给电影导演以空间让其自由书写，创作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然而在上映时主流意识形态又会对某些情节给予规限，使创作者处于了兩难的境地，不得不对电影进行删减，结果自然造成电影整体情节不流畅，有割裂感。正如导演在回忆录中讲：“有人主张它应该是惊险的，也有人主张它应该是正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摇摆过，最初我坚持惊险，后来我又倾向正剧，再后来由于某种力量的推动，我又在实际工作中向惊险方面努力，但拍摄过半的结果，我又感到它仍然是正剧的了。”就是在这种徘徊不定中，铁道游击队电影诞生了。尽管如此，其“战争题材与传奇色彩游击结合，严肃紧张与幽默诙谐的绝妙搭配，重大的历史背景与浓厚的乡土气息相辉映。在同时代和同题材的电影作品中，《铁道游击队》都算得上上乘之作”^[304]曲折惊险、险象环生、悬念迭起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一经问世，就格外引人入胜。^[305]在1957年背景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的国产片评选中，该片被列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十部影片之一。

第五章 198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研究

第一节 198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创作背景

198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那一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开展了各种纪念活动，对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主义教育。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也精心准备了自己的献礼片——依托自己原有的精品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优势——电视剧《铁道游击队》（本文也称 1985 版电视剧）（见图 5-1）。“拍这部戏真难，《铁道游击队》的影片是家喻户晓的，观众先入为主。演员班子又很强，曹会渠、秦怡、陈述等都是很有影响的演员，我们重拍这个戏，感到有一种压力。”^[306]1984 年 4 月，上海电影制片厂电视剧部从上海远赴青岛，与作家知侠共同研讨创作大纲。知侠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了这部电视剧：“电视剧本已经比较满意，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但不管如何，我对剧组的这种创作精神是敬佩的、欢迎的，并预祝他们成功。”^[307]摄制组来到枣庄薛城拍摄《铁道游击队》外景。当时，小城的建设还不太好。“摄制组的导演围着小城转了一圈，当他看到那灯光昏暗的火车站，坑坑洼洼的马路，城北侧一排排低矮的草房时，不由兴奋地说：好，不用搭外景，可以直接开机。据说，摄制组为此省了不少钱”。^[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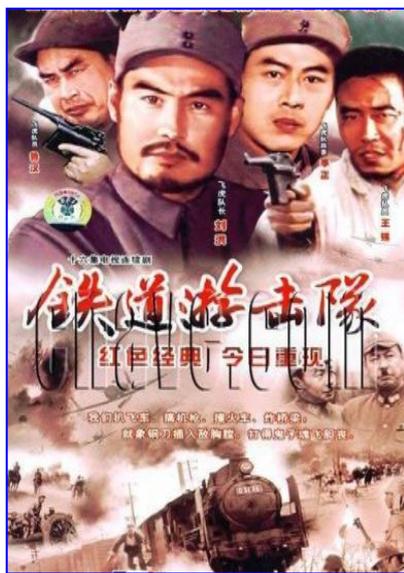


图 5-1 1985 版《铁道游击队》海报

紧赶慢赶，电视剧还是没能赶上 1985 年的献礼。1986 年 6 月 26 日，1985 版电视剧的首映仪式在枣庄市驻地的枣庄宾馆举行，作家知侠以及主创人员参与了首映式。^[309]同年 7 月 7 号，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这部电视剧，赢得了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喜欢。电视

剧由电影的一个半小时拉伸为9小时12集，^[310]创作者们给予了每一集一个章回小说般的“四字标题”，标题对本集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同时集与集之间预留了悬念，“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紧紧相扣。1985版电视剧成为了《铁道游击队》影视剧改编的第二个版本。

1985版电视剧总导演是高正，导演是张弘和在同名电影中扮演过小坡的著名电影演员冯笑。编剧是师征和刘泉，师征曾经写过《同魔鬼打交道的人》。艺术顾问是曾经拍过《鸡毛信》的电影艺术家张骏祥。^[311]刘洪的饰演者张甲田表现可圈可点、不落窠臼。他浓眉大眼典型的国字脸与56版的刘洪扮演者曹会渠相似，与原型人物刘金山也有些相仿，同时扮相与连环画中的刘洪神似。他努力靠拢角色，竭力塑造人物形象真实感和逼真感。同时他还能做到不受角色的拘泥，尽量表现他自己特有的魅力和气质，塑造出一个全新的、能被他人认可的刘洪。同样可圈可点的还有饰演小坡的演员。他比知侠书中描写的同名人物要机敏灵活，他不但会唱歌会文艺，还是队伍的通讯员。他更是一个勇敢的战士，铁道游击队重要的活动都离不开他，他能够把敌人收拾的服服贴贴。剧中的其他人物比如王强、林中和鲁汉等也为电视剧增色不少。芳林嫂的扮演者牛娜，当时28岁，是一名艺术院校的青年教师。“我本来不想上（这部电视剧），觉得困难重重，最重要的是秦怡演的‘芳林嫂’已在观众心中深深地扎下了跟，至今难忘。再说‘芳林嫂’又是由农村寡妇成长为一个八路军战士，人物性格变化很大，电视剧有长达十二集，‘芳林嫂’是主角，戏很重，演砸了，关系到整个戏的成败。”“芳林刚死时，别人不相信她，对她冷言冷语，她的心情压抑，一脸愁容，整天想掉泪。她遇到刘洪和游击队以后，才从苦闷的泥潭中跳出来，脸上出现微笑，并憧憬着与刘洪的爱情。芳林嫂外表粗犷、倔强，尤其在危急关头，显得很有力度。但对老人、亲友却显示了她善良、细腻的一面，充满深情。芳林嫂与刘洪的关系也是很难演的。她向往爱情，但又是农村寡妇，她性格勇敢倔强，但又有农村妇女都有的封建意识。我花了好长时间反复考虑，并与高正总导演、张甲田一起讨论，才渐渐地理清了芳林嫂的脉络。”这中间的秘密就是：“人物性格反差大，变化多，有可塑性，反而能激起演员的创作激情。”当然牛娜也实事求是地说：“我感觉演得还不够，如果让我再演一遍，一定会演得更好，我请人转告秦怡老师，请她也给我多提意见。”^[312]其实演员们的性格禀赋以及对角色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影视剧是有遗憾的艺术，这些遗憾将会一憾终生。

与同时期其他作品相考量，电视剧的画质、道具、美术和节奏等方面还称不上精品，但是故事内容的二次改编和创作人员对小说中洋溢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自觉传承和表达，

还是值得拍手称道的，甚至有文化学者认为它是当年电视双奖（金鸡、百花奖）揭晓后又一思想艺术质量俱为精品的力作。较之小说，内容容量和思想深度均不逊色，不愧是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的抗战题材作品。它自然成为了《铁道游击队》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支。

第二节 198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艺术之变

一、增加支持儿子抗日革命母亲形象

在知侠的小说中刘洪和王强都是枣庄本地穷苦人家的孩子，其中在小说中关于刘洪的身世描写是这样的：“他四五岁的时候，就死了父母，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苦孩子，靠他姐姐抚养。”^[313]王强在小说中也仅仅是出现了自己的父亲，老父亲在鬼子的洋行里当搬运工工头，当老洪回来时，帮助王老爹烧焦炭。王强的母亲始终没有出现。而在电视剧中刘洪和王强的母亲都是健在的，在电视剧中增加了母子亲情和家庭伦理。如老洪刚刚从山里回到枣庄，看到了在家里孤苦伶仃的老母亲时时刻刻在挂念着自己，而自己又无法守在母亲身边尽孝时，流下了热泪，孝心溢于言表。当游击队遭遇敌人的围堵，而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到微山湖地区，缺吃少穿，生活境况如此窘迫，然而刘大娘却只身要饭，不顾个人安危，越过鬼子封锁的铁道线，一路乞讨，去寻找自己的儿子，把一路上乞讨的干粮给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吃。当松尾在抓捕刘洪未果的情况下，他假装铁道游击队队员诱惑刘大娘，把她抓捕施刑，刘大娘也未透露一丁点信息。松尾气急败坏对她施以酷刑，把她的头生生砍掉，并把人头给刘洪送去。刘洪和队员们悲痛万分，咬紧牙根，不得不把刘大娘埋葬，埋葬时，刘洪这个硬汉，像个孩子一样扑在母亲的棺材上不让其他队员埋土。这是英雄母亲刘大娘的故事。电视剧中还有一个王强母亲王大娘的故事。王强作为最早的铁道游击队员，在队伍中身份是没有暴露的，他充当卧底，埋伏在鬼子洋行给队伍提供信息，别人对他有误解，认为他是汉奸，在给日本人做事。自己的老娘也为有这么个儿子感到耻辱。不吃他送的粮食，也不喝他煎得草药，自己也不跟儿子住在一起，有着抗日气节，最后在饥寒交迫中活生生地饿死。这就是英雄的母亲王大娘的故事。两个母亲在故事中闪烁着母性的光辉和爱国的精神。这是小说中所没有塑造的形象。

二、建构爱情滋养中成长的新女性

在小说中，作家用了一些篇幅书写了芳林嫂和刘洪的爱情，这些情节给读者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1985 版电视剧芳林嫂和刘洪的爱情故事也比小说中更曲折有趣。刘洪负伤后鬼子和伪军又回到村子里来搜捕，芳林嫂置个人的名声于不顾，与刘洪假扮成夫妻，两个人同床共枕，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汉奸谢耀祖带人来抄刘大娘的家，她临危不乱，给鬼子说了地方以后，自己又抄小道，把刘大娘救了出来。假游击队员聚首在苗庄合围一举消灭真游击队时，她机智地把自己的家点上了火，给真游击队员报信，使真游击队员躲过一劫。假游击队员狡兔三窟，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但芳林嫂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找到了他们的老巢，带领刘洪们把“李鬼”一举歼灭。在参与战斗的同时，他们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而关于梅妮和小坡的爱情，小说中不是那么的清晰，因为在小说中小坡和梅妮最大不过是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他们还没有到谈情说爱谈婚论嫁的时候。而在电视剧中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他们青梅竹马，情窦已开，他们的恋爱也变得名正言顺。在电视剧的前几集，小坡派梅妮去送信，在梅妮出发前，他教给她如何应对鬼子的盘查，梅妮进山整训时，小坡教给梅妮如何反封建，如何大方表现，如何照顾伤员，并教育她“革命就是听党的话，党叫咱干啥咱干啥”。这两对有情人没有陶醉在卿卿我我之中，而是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当日本投降后，新的战斗打响，他们也有了自己战斗任务，并要分开两地，他们没有潸然泪下，没有执手相看泪眼，而是交代给对方下一步应该注意的军事要点。他们是情侣，更是战友，他们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他们没有时间亲密，他们在革命胜利以后旋即投身到下一个战斗之中。

三、凸显了反战厌战日本民众形象

在电视剧中，日本的最高长官小林司令的妻子芳子夫人一家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很多人，日本本国仅剩下一位年迈的老母亲，弟弟龟太郎是家中唯一幸存的男性，也被应征入伍派遣到了中国，来参加“圣战”。龟太郎亲眼看到了日本军人打着“圣战”“共荣”的旗号对中国百姓进行肆意残杀，并且杀人成瘾，视杀人快意若宰杀牛羊。他亲眼看到刘大娘的头被自己的同胞砍了下来，像是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别人杀害一样。白发苍苍的人头像自己母亲的人头一样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他充满了恐惧。他从心底怀疑战争、厌恶战争，他质疑东亚共荣的意义，他也在质问这场战斗的目的和意图。当他被俘虏后，游击队给了他最好的救助，给予他最大的优待。老大娘把家里最珍贵的食品——两个鸡蛋给他吃，来滋补他的身子，并安慰他：“不要想家，这里的人就是你的亲人”，还安慰他战争结束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了。当他耳濡目染并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后，共产党的行为似春风化雨般把他内心的疙瘩化开。他由衷地对八路军说：“我是

人，我也有良心”，他看清了这场“圣战”的嘴脸，就是“邪恶”“侵略”“弑杀”的遮羞布。于是他加入了反战同盟，变成了一个国际主义和平战士。在以后的战斗中，他现身说法，劝导他的同胞日本士兵迷途知返，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人。当他和姐姐再次见面时，他告诉姐姐八路军对他是多么多么好，他生活在正义勇敢的人群之中，他终于明白了这场战争的本质。芳子夫人听后就受到了感化，当他得知小林之流要杀了芳林嫂时，她劝自己的丈夫说：“你们可以杀死一个妇女，而他们为什么不可以杀死一个敌人（龟太郎）”，她求小林放过芳林嫂，受到了人性的感悟。小林司令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他也是一个丈夫和父亲。他在夜深人静时也会褪去那凶狠的面罩，由战争的野兽变成一个柔弱的人。他也会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小梁祝，抬头望明月低头之际思故乡。八路军在给他谈判时，当听到女人和孩子们要求平安回家时，他甘愿放下屠刀投降，没有继续顽抗。通过这种人性化的书写，“战争禽兽”变成了一个正常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不再是那个思想单一的“冷血钢铁强盗”。

较之原著，创作者对角色人性化的修改和再创造不仅限于此。还丰富了跑单帮的李九的形象。知侠小说中对李九人物的一笔带过“‘李九被鬼子杀了’‘李九叫鬼子杀了，死得很惨’”^[314]。电视剧中李九的人物形象是复杂而丰富的。誓死不当汉奸，单枪匹马打鬼子的李九形象。他身上的缺点不少，吃喝嫖赌抽样样俱全，但为人仗义又会功夫，在国民党杂牌军中当过军官，后来因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而闲赋在家。他在家收彭亮和黄二为徒，教给两人功夫。平时经常带着几个穷苦的兄弟去扒火车，补贴家用。因为在一次扒车时有内鬼黄二告密几个兄弟被鬼子伏击而失去生命，幸亏有好汉（刘洪）暗中相助，才没有全军覆没。兄弟丧命令李九十分内疚，他发誓不再带兄弟们扒车吃两条线。自己单打独斗地与鬼子抗争，寻找告密的人。鬼子把他当成眼中钉，派出了大量的兵力围剿他，他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全身多处中枪而失去生命。相比于小说，本版电视剧强化了他圆形的性格，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侠义的精神。从此影视剧中李九的戏份也逐渐增加，从三线的角色跻身于主角的行列。

第三节 1985 版电视剧：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故事再书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入了拨正反乱全面改革的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念日渐瓦解，而新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各种价值观念冲撞纠缠的时代，在这种新旧观念更迭的年代里，社会中弥漫着焦灼的味道。大家有对旧社会的留恋和对新时代的不满，也有对新时代的渴望和对旧时代的倦怠。与此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民的

道德底线在下滑。有外电称：“中国正在经历精神临产前的阵痛”，也就是说，在迅猛的社会变革中，改革开放在促进物质丰富的同时带来了精神的滑落。主流意识形态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85年的党代会上提出：“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党面临的艰巨任务”。电视无疑是加强教育的最好方式，因为在1985年电视机的总数多达5000万台，观众高达几亿人，^[315]二十年前仅有20万台。录音机、录像机、电视机原来是奢侈品，现在也飞入寻常百姓家。电视机摆在位于居室的中心位置，传统家庭的中心位置是神龛或供奉家庭祖先的香案，这个位置现在被电视所占据，电视机代替传统家具，成为了新时代的神龛。同时影视剧的播出量也在大幅增加。“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不过几十部（集）；到1984年，全国制作的电视剧已达800部（集）；预计1985年可达到1300部（集），其增长速度真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连续剧是电视艺术特有的形式，由于它可以根据内容需要几集、几十集甚至上百集地连续制作和播出，对观众的吸引力很强。”^[316]影视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普遍的宣传效果”，“广播电视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方向，为人民提供健康有益的文化产品，坚持导向和市场并不矛盾，受众就是市场，占领市场可以更好的为党和国家服务”。在这个关头，这部片子无疑是受主流意识形态欢迎的。

1980年代，随着“文革”余孽散尽，“四人帮”得以清算，“两个凡是”的教条被铲除，文艺界涌现了启蒙文艺思潮。人性主义开始复苏，人道主义开始蔓延和传播，人们思想解放，精神自由，政治规训逐渐式微，人性启蒙话语日渐高涨，改革开放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人性”在革命话语秩序中缺席多年以后，终于可以大方地进入到文艺的话语秩序之中。原来造成洛阳纸贵的“十七年”文学在那种血脉贲张的文艺阅读视野中变得冷淡落寞，革命题材的类型也被创作者放逐。电视剧在198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精品，比如《四世同堂》《新星》《今夜有暴风雪》《上海滩》《济公》《霍元甲》《血疑》《高山上的花环》《排球女将》等作品。然而这并不代表原来喜闻乐见的“十七年”革命文学作品一无是处，仍有少数作品进入了改编剧的行列，也有像《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作品都曾被改编。

1985版电视剧没有局限于知侠小说的原著，在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再加工和创造，形成了一个新的曲折感人惊险生动的铁道游击队故事。这种新的改编文本比起知侠的小说文本更富有人性，故事也更曲折。但这遭到了知侠、刘金山（刘洪的原型）和刘真骅的质疑。阅读他们留下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各种端倪。刘金山认为，“片子景色虽拍得美，音乐倒也动听，然而整个剧本没有把真实的战斗生活表现出来，

虚假的较多，作为当事人，看了很不自在。另外“刘洪”的年龄不符合当时情况，电视剧中主人翁看上去已超过40岁，其实当时我们都只有20来岁。另外一个主要缺陷，为了连续剧有悬念，变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情节和人物，很不真实，电视剧不能和电影相比”。^[317]1986年知侠在看了电视剧后在给刘洪写的信中，道出了个中情缘和英雄迟暮的心境，“…他们改编的电视连续剧14集寄给我看了，我是有些意见的，但是他们没有来找我我又改为了12集开拍了”，“我看了7、8、9集，感觉还可以。可是后看完12集，我感到很不理解，特别是开头和结尾，小说改为电视剧是允许艺术家再创造的，不过加上的人物和情节显得不真实，以为这两个编剧都不了解这方面的生活。既然已经拍出来了，他们要我发表意见，我只能说不错了，其实我并不满意…”。^[318]后来，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在2005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开拍前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本版电视剧说，“剧中的故事情节严重脱离生活，掺杂了太多的人工痕迹”“知侠看了一半后便没有兴趣看下去，他感叹道，要是看看本子就好了。我觉得他带了很大的遗憾”。^[319]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很大的原因是他们以一副权威者的姿态在评判电视剧的创作得失，他们忘却的是电视剧讲述的故事不是历史，是可以进行再加工和演绎的。小说创造出来以后，就意味着“作者已死”，后来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对文本进行再改写和创造。改写者成为了新的作者，一旦作品创作出来，那么“改写者”也会死，“死人”哪还管得上“活人”的事情。在作品一代代的传承过程中，只要保持作品内在的精神气质、风格意蕴即可，这是作品的基因，具体像还是不像，倒是其次，作用微不足道。戏剧性和虚构性才是影视剧作品的独特的魅力。如果我们一味地重复原来的小说，那只能变成鹦鹉学舌，电视剧也就变成鸡肋了。影视剧艺术是光影在胶片和磁盘中写作并将声和乐凝固其中所创造的新神话。更何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艺生态环境更加地良好，文艺要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性复苏，启蒙思想唤醒，影视剧作品彰显民族气概和革命精神，其中更渗透人性美人情美的伦理情感。只有在作品中加入了世俗的伦理的情感故事，才能使作品渗透着理性的光芒。

第六章 《飞虎队》电影研究

第一节 《飞虎队》电影创作背景

1994年末,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冀邢飞赴北京会见了演员兼制片人的石兆琪,老朋友相见把酒言欢千杯少。觥筹交错间,他们不由自主地聊起了来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并且想为这个重大的日子做点什么。他们还聊起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战争中的诸多传奇故事,聊到了当年的铁道游击队。王冀邢对铁道游击队有着深刻印象。他被电影中队员们勇敢智慧所打动,被刘洪和芳林嫂的爱情故事所感染。这样一部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曾经给幼年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对作品有一些不满之处。“历史的存在永远是客观的,而对历史存在的描述、阐释,抑或是艺术的再现和表现,却永远是主观的,因人因时而异的”,王导演的心中铁道游击队有着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他萌生了重拍《铁道游击队》的念头。他强调“一部影片的成功不在于你拍什么,在于怎么拍”。王冀邢给电影起了个现代人更加容易理解的名字:《飞虎队》(见图6-1),以显示自己与即将拍摄的游击队和原来小说和影视剧(1956版同名电影和1985版同名电视剧)的不同。石兆琪听了他的这番话打消了“重拍有意义吗”疑问,他深信王冀邢已经有了成功的把握,他当即表示愿意跟王导演合作。他们一致认为《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是一个写群像的戏,至少要十名游击队员才能活脱脱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演员在戏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把演员找好了,演员现场演好了,戏也就成了。所以二人就邀请很多著名演员参与,大多数人同意参加演出拍摄。很快由王志文、李雪健、刘威、张丰毅、吕凉、陈小艺、李强、雷汉、常戎等明星搭建的电影演员班底成立了。

王导演“请了两位作者来改编剧本,最后他对两个剧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自己又改了一稿,才形成了现在的拍摄本。从《焦裕禄》到《飞虎队》,王冀邢的拍片原则是:‘重拍片不重复过去,老人物要有新故事,重拍片应该更重刻画人物情感,力求离人近’”。^[320]一九九五年,新年伊始,王冀邢对铁道游击队的史料进行了再度研读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奔赴了枣庄进行了筹备拍摄工作。“有记者问他:这部影片将拍成什么样的影片?王冀邢说:‘昔日《铁道游击队》的影片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们太熟悉那首弹着土琵琶唱的歌和剧中的那些细节,所以这次我不用过去的素材,打算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加入新情节,比如当年日本鬼子曾找到铁道游击队队长,企图收买这个民间抗日组织,铁道游击队也有人单枪匹马的闯进了鬼子的兵营去谈判。后来,中国

共产党经过许多波折吸收了铁道游击队，这些戏都很感人，也很‘生活’。为了让这部影片拍得更好看，更热闹，观赏性更强，力求用新的手法拍出有新意的片子。王冀邢把这部影片定位为惊险枪战动作片，此次重拍也将加入许多特技镜头，如飞驰的列车顶上人在行走等高难动作。为此，摄制组专门请来了神龙特技队设计影片的武打，枪战场面，以求用现代手法拍出一部严肃的娱乐片。’”^[321]著名演员张丰毅说：“这次大家聚在一起也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在片场谁的戏过了，或不到位，其他演员都不客气。担任这部戏的摄影王小列、罗逊，剪辑郑永明等同志都是在艺术上很有成就的同志，他们也将为这部影片增色不少。一流创作人员、一流设备将努力拍摄出一流影片。正像王冀邢期待的那样，《飞虎队》要让观众好好看一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如何打鬼子，如何取得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322]作为国家党报的《人民日报》对此版电影给予了关注也寄予了厚望，在1995年2月27号和28号两天进行了专门报道，并且在28号的报纸上把本版电影标榜为“主旋律”精品影片龙头之作。

铁道游击队将再上银幕

本报讯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以鲁南铁道游击队抗日事迹为素材改编创作的电影《飞虎队》，近日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及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在山东枣庄市薛城开拍。（陈庆恒 扈爱民）

’95 中国影坛亮丽多彩

本报讯 记者向兵从刚刚结束的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上获悉：今年各电影制片厂将以体现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精品影片为龙头，全面提高我国电影质量。目前一批重点影片已开始筹备和投入摄制。

这些影片中有为纪念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拍摄的，其中有描写杨靖宇将军的《步入辉煌》，表现华侨抗战的《闪电——伊洛瓦底》，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根据《铁道游击队》小说改编的《飞虎队》。……

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日子。中国电影将以质量全面提高的整体形象，迎接电影界这个盛大的节日。^[323]

《飞虎队》得以拍摄出品还要感谢当时的好政策。1993年广电部颁发了348号文件，文件将电影的发行权下放给各电影公司，这意味着电影体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电影产业化的运作加快了当代商业电影的发展。这使得峨眉电影制片厂能够与其他几家电影公司^[324]，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为名”联合投拍这部商业电影。这一部电影成为《铁道游击队》影视剧谱系中的第三版。

的确，正如在开拍前所讲的“绝不用新瓶装旧酒”，王冀邢导演所创作的《飞虎队》（本文也称1995版电影）有了以下新意。



图 6-1 《飞虎队》海报



图 6-3 《飞虎队》电影截图



图 6-2 《飞虎队》部分字幕

第二节 《飞虎队》电影艺术之变

一、故事讲述方式变化

1956 版电影采取了与同名小说相同的故事讲述方式，依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线性讲述。电影保持了“在每一章（幕）中设定一个小高潮”，这样读者（观众）看起来会在一个个波峰和波谷中起起伏伏，这是传统的阅读或观赏所带来的感受。在 1985 版电视剧中采用了“草灰蛇线”的方式，刘洪进入临城车站时看到蒙面人在站台上给松尾汇报情况，而后松尾登上客车伏击“吃两条线的”，不久芳林被蒙面人刺杀，接下来“蒙面人”为汉奸谢耀祖卖命，这个蒙面人是谁？他与芳林的死有什么关系。他跟铁道游击队战略意图的暴露有什么关系。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看到“蒙面人”露出了马脚，黄二进入了大家的视线，他利用高粱秸秆和粉笔做记号给松尾报信。这些谜底揭开之时，故事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这种悬念的设定中，观看了故事，也获得了审美的快感。

而《飞虎队》的故事采用了与上面两种模式不同的方式，它是以嫂子的回忆讲述开

始的。（见图 6-2）小说中芳林嫂曾经的战争参与者，在这部电影中嫂子变成了孤零零的战争的旁观者，她只有以画外音的形式来讲述她眼中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她站在现在的时空回忆往事，明显是以献祭的模式支撑起故事的发展。以一种女性的阴柔来书写男人们之间的故事，给战争的残酷增添了几分意味。同时在回忆中又镶嵌一些小故事，大的故事高潮中有些小激动，这种“中国套盒”的模式，形成了独特的观影情调。电影在镜头布置上采用了前后呼应的方式。在开头，嫂子和刘洪一左一右正襟危坐在中堂前，以嫂子的画外音为引导，镜头逐渐由外向内推，镜头呈中景定格在嫂子的身上，话语权就彻底交给了嫂子。导演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这一切都是嫂子眼中的故事。在故事接近尾声时，铁道游击队的战士们与鬼子同归于尽。这时画外音开始，镜头从定格的地方拉出来，越拉越远，老洪和嫂子的那张照片又再度进入了画框中。嫂子说完：“打那以后俺再也没见过老洪，老洪早已在战争中牺牲了”，这时镜头定格。嫂子和老洪的照片在镜头的画框中永固，他们的爱情成为了永恒的符码固定在影片的屏幕上，而后是从下到上的字幕在缓缓升起（见图 6-3）。

二、整体风格变化

相较 1956 版电影、1985 版电视剧作品的正剧表达，《飞虎队》更加突出了惊险的风格。正如 1956 版电影，赵明导演认为“一洗洋行”的情节镜头过于血腥场面过于惊悚，被他人为地删除掉了，他声称：“打洋行用大刀片砍，在电影银幕上表现出来太血淋淋，过分刺激”。^[325]《飞虎队》“一洗洋行”的情节，刘洪、王强和彭亮三个人弃手枪不用，而全部用大刀片来战斗，以传统的刀法跟日本特务进行白刃战。我铁道游击队的功夫猛，日军头子的功力也不赖，他们打斗了若干个回合，时间越长，这种刺激和快感就愈加的强烈，刘洪竟然一刀下去把日本军官的手臂给砍掉，镜头上出现的是肉乎乎血淋淋的手臂在晃动，这无疑增加了影片整体感官刺激戏剧效果。再如，李九为替父报仇、血洗日军澡堂的情节。他混进日军的澡堂后，正襟端坐在凳子上观看澡堂中赤裸裸的男人们在洗澡，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他观察片刻，当一个日本男人光身子向他走来时，他抠下扳机，一池子的男人中弹毙命，以各种姿势倒在水池中。其中一个日军在水中装死，被李九一枪点射，跳出水面多圈才翻滚落水而死，一池清水变成了红呼呼的血水，尸体乱七八糟地横在澡堂中间。其场面血腥刺激，国人看到鬼子这样的下场不得不叫绝，拍手称快，大呼过瘾。在电影中各式的武器出现，手榴弹的大威力，冲锋枪多发连射，让人目不暇接。1956 版电影中的鸟枪土炮根本没法与《飞虎队》中的武器相

提并论，其视觉效果也不可等量齐观。有人看后不禁感叹，如果我们当年就有这些先进武器，我们的抗战胜利不知要提早多少年。武器有无没关系，有关系的是它能否给我们创造一个激情贲张的神话故事，以及通过这个故事展示出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三、政治性的弱化

政委李正是上级派遣到铁道游击队来的党的干部，应该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政治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干部，在《飞虎队》中的政委的表现像是一位“白眉大侠”。他（李强饰演）在义和炭场开业时被派遣到铁道游击队，并且在屏幕上第一次出现，他一反其他版本的穿着打扮：“这人戴一顶带耳的破毡帽，穿一件非常不合身的臃肿的大棉袍，腰里扎了一个碎成条条的腰带，操着手，像一个老人一样”^[326]“破旧棉袄，像山里的放羊人一样”^[327]，而在电影中他一袭长袍，头戴礼帽，一副侠客气，倒像是个白眉大侠。当小混混秦雄（李幼斌饰演）来炭场闹事，刘洪欲与秦雄理论，秦雄一掌把刘洪推出三米开外。李正没有像其他几版影视剧和小说中的政委那样慢条斯理地晓之以情动之于理地做思想工作，他走上前手腕一抖比划几下把秦雄打得满地找牙。大家惊诧于政委的武功高强，却没有在他身上发现政治的先进性，倒感觉他像是刘洪的“大内侍卫”，因为他不善于对队员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政委的表现粗鲁有余而理性不足。我们不是过分地要求李正这一形象多么的高大完美党性强，但是作为一个把握思想政治方向的干部，在部队陷入绝境时他要能果断决策，而在《飞虎队》中政委在刀光剑影炮火轰鸣中他沦落为一个打打杀杀爱出风头的斗士，堕落成刘洪大队长的小跟班，不得不说这是《飞虎队》电影的一大变化，在电影中党的化身的政委在思想价值把关的重任中缺席。

四、中间人物复杂性

在革命的队伍中确实混迹着一小撮思想上和政治上不过关的人，他们成为了队伍的害群之马，成为了革命的绊脚石，他们在紧要的关头甚至还会叛变革命成为人们的公敌，充当了汉奸，顽伪的走狗。比如电影中的黄二。黄二本来是铁道游击队的班底成员，他参与了队伍最初的组建，他从一个合格的游击队员一步一步地滑向了堕落的深渊。相较于黄二的大转变，秦雄是个从头至脚坏到家的大汉奸。他不但欺行怕市，他在义和炭场开业时去搅局，要分一杯利润，行动未果他怀恨在心。日本人软硬兼施地拉拢他，他很快充当了日本人的走狗，竟然假扮游击队的大队长刘洪，拉起队伍来假冒铁道游击队，祸害老百姓，使老百姓对真铁道队失去应有的信任，在与刘洪面对面的激战中他更是下毒手将刘洪打伤。秦雄这样的人物恶态百出，是一个十足的民族败类脸谱符号。如果说

黄二秦雄是一个中间人物的反面代表，那么李九就是一个中间人物的正面代表。

李九是一个以报私仇为目的的人，在《飞虎队》电影中，导演为他浓妆淡抹花费了好大的气力。他独来独往泄私愤报私仇。他在刘洪“一洗洋行”之夜，他独闯车站杀鬼子，单枪匹马，差点丢掉性命，幸亏刘洪王强把他藏到地窖才得以保命。他闯进了日军的澡堂，用冲锋枪把日军全部消灭殆尽。观者不禁击节称快：此乃真英雄。他自己也不禁沾沾自喜，但鬼子很快调查到是他所为，铁道队也觉察到是他干的，提前到大烟馆去通知他，让他马上离开。但他置若罔闻，依旧去他的情人小青家，鬼子很快就包抄过来了，他没有退却，而是挺胸而出，端起机枪向敌人射击，无奈寡不敌众，最果敢的勇气，在充足的武器弹药和众敌的围堵下都显得软弱无力，他的牺牲成为了必然。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必然下场，造成了人员无谓的牺牲。影片通过这种散兵游勇似的个人抗争来展示个体脱离了群体后力量的渺小，要想成就自己的价值必须把个人放置在群体中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出路。

五、故事结局反常性

在铁道游击队的战史上，刘洪生活原型之一的洪振海在“皇甫庄战役”中牺牲，年仅 32 岁。^[328]政委在 6 年内换了 6 位，其中有 3 人牺牲。其他的队员牺牲也很多。战斗的结果不像小说和影视剧中的故事那样柔风细雨风花雪月，牺牲是随时的，伤亡人数也是蛮多的。有资料显示，鲁南铁道大队从成立之初到撤销番号，共牺牲了 150 余人^[329]，有姓名和地址可考的仅 36 人，这些人中一奶同胞兄弟 2 对，同时还有更多不知名的人失去生命。在民族家国将要沦丧的关头，弃小家于不顾，在满门可能消失情况下，参加了斗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用自己微不足道的血肉之躯，擎起了民族的脊梁。

在《铁道游击队》小说和 1956 版电影和 1985 版电视剧中，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成员除了黄脸林中和红脸鲁汉牺牲了生命，刘洪和李正负过伤以外，其他的队员没太大的伤亡。芳林嫂也每每被刘洪在关键时刻救起，英雄抱得美人归，结局皆大欢喜，男人们和女人们在新的战斗任务到来时，分别参加了更大的战斗同时也迎着更大的胜利。

在电影《飞虎队》中铁道游击队队员们个人命运是惨烈的。王强，铁道游击队中的福将，在先前任何影视剧作品中从来没有牺牲过，甚至也没负伤。在本电影中他没有那么幸运，没有逃脱导演设计的牺牲命运。在队员们伤病严重，急需西药品时，他主动请缨到城里赵掌柜那里去买药。这时赵掌柜已经叛变成了汉奸，他引诱王强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王强殒命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在牺牲时，王强（李雪健饰）一改原本山东方言，

一句京骂“真她妈的黑”，成为了千古绝唱。刘洪和兄弟们在火车站营救芳林嫂时与鬼子同归于尽，芳林嫂被押解到德州的集中营，释放后，美人“西楼遥望终不见，萍轩倚窗盼君来”，后来才知道老洪他们早已牺牲了。在电影中队伍的主要骨干悉数牺牲，李正的下落交代不明。这就意味着这支队伍的战斗力量丧失殆尽，哪还有实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呢？革命如何以一个胜利来迎接下一个胜利呢？照这样发展下去，革命将毫无前途可言，革命不再前程似锦也不再是一条金光大道，革命进入了黎明前的黑暗。

第三节 《飞虎队》：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主旋律创作

与前两版影视剧相较，电影《飞虎队》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与之有较大的反差。导演王冀邢的解释可看出个中端倪，“我们这一代人对战斗的理解跟过去有许多不同，不再会用过去的眼光看待战争，或简单的讲战争的故事。我们会用新的办法表达我们的这些新观念，从而和观众贴得更近。《飞虎队》无疑就体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导演没有用往常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战争，描绘游击队。他将原本的历史故事改编成商业片，使之具有了香港 90 年代电影的气质和质感。失去了原来电影和电视剧中那种朴素的品格。之所以这样改动，有导演的原因也有更加深层的社会原因和传播因素。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粉墨登场，计划经济黯然失色，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在港台文化的影响下，后现代解构主义登陆中国，人们对这种思潮表现了极大的好奇和欢迎。求新求异求变是人的本性，“解构主义大胆对传统宣战”，传统的文化习惯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影视剧中旧有的元素和情节被人们大胆改造、延异、肢解、扁平化，打破了旧有的话语规则，原本的叙述方式被肢解，宏大叙事变得一无是处，质疑、解构成为了最热的关键词。对于《飞虎队》作品而言，尽管在电影一开头就迫不及待地声明“根据知侠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见图 6-4）但是看过影片才发现这不过是一块自说自话的遮羞布。电影无论从故事内容到影片的风格都与原来的小说没有太多的联系。王冀邢导演放弃了原来的正剧风格，改编为活脱脱的“戏说”枪战片，震撼的视觉效果，刺耳的听觉冲击以及与众不同的故事情节，颠覆冲刷着观众的观影好奇心，同时也诱惑着新的消费心理的形成。当年刘知侠想把 1956 版电影改编成惊险片，导演赵明拒绝了这一想法，同时主流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也不同意。而今《飞虎队》主动向惊险片靠拢，而得到了各方的欢迎。《飞虎队》中原来的小说情节变成了虚无的幻影，游离于影片的故事之外。故事内容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看到是不是刺激惊险的场面，“刺激”成为了《飞虎队》的第一要务。这类影片无疑更能取悦观众，有了更多观众，就会

有更多票房，也就有了更多的市场回馈，投资者何乐不予投资更多这种类型的影视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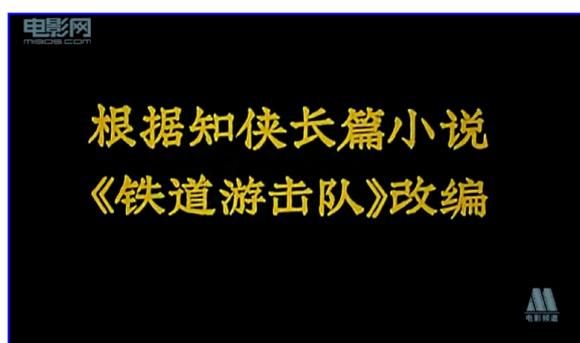


图 6-4 《飞虎队》电影截图

无论是为了商业利润也好，还是实现导演个人的情节也罢，《飞虎队》在拍摄之日起，就贴上了主旋律的标签，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名义，主动向主流意识形态示好。

“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这是江泽民 1994 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指出的。“主旋律”的这一定义既为人民正确认识和界定“主旋律”提供了依据，尤为创作样式的多样化打开了思路。从此我国的电影、电视剧依照“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向走下去。

虽然影片中刘洪的形象较之李九的形象更加的粗狂，也更有匪气，但是他的思想是红的骨头是硬的，他能够以义气聚集一帮穷兄弟，能以自己的功夫打击鬼子，在他的身上展现了“圆形”的性格特质。政委李正，性格表现的扁平干瘪，虽然没有能够像其他版本中的政委那样，一板一眼地给队员们做思想工作，在电影中他也算是尽职尽责，在影片中芳林嫂没有交代他的结局，这就意味着他还没有牺牲。虽然战斗主力牺牲了，可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星星之火终有燎原之势。这种创作方式当然在主流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形式“多样化”的表现，电影得以公映也是必然。正是受这种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受众观赏习惯的多方面因素影响，1995 版电影《飞虎队》成为了新的传奇，流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影坛。

第七章 200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研究

第一节 200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创作背景

200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多部影视剧围绕抗日战争题材进行创作，《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相继亮相荧屏。其中也有电视剧《铁道游击队》（本文也称之为 2005 版电视剧）（见图 7-1）。该剧由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和内蒙古电视台联合拍摄。



图 7-1 2005 版《铁道游击队》海报

导演是以武侠风格著称的王新民，他曾经创作过《燕子李三》《侠客行》《连城诀》。开拍前王导表示：《铁道游击道游击队》创意着意强调创新，此次重拍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在于，将武打动作引进红色经典，让战斗成为故事的主线。^[330]赵恒煊被邀请出演刘洪的角色。他幼年习武，练得一副好武功，在圈内是公认的“戏来疯”，爱演戏，又爱琢磨，再按照连环画上刘洪的扮相，蓄上络腮胡，是扮演刘洪的不二人选。白面书生气质的刘长纯曾经多次出演政委，在本剧中做思想工作无论从形象上，还是表演上都与政委的形象相契合，他就是为政委的形象而生。史兰芽是芳林嫂的扮演者，她与小说中的芳林嫂年纪相当，史兰芽进剧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了 1956 年的老版电影，揣摩秦怡（芳林嫂的扮演者）的表演，不仅仅从内心体会芳林嫂，而且她到枣庄农村观察妇女的言行举止，自己没事时便一遍遍地模仿揣摩。功夫不负有心人，以至于史兰芽一到片场，大家

都会夸赞她“这就是芳林嫂！真像啊！”。在她的身上能够看到第一代“芳林嫂”秦怡的影子，她的表演也有上层的表现。剧组邀请《燕子李三》中李三扮演者张力进入剧组，张力的眼睛小，个子矮，又不英俊。导演最初是想让他演坏人，但是他的形象得到了王志胜（王强的原型人物）儿子王金国的认可，张力的形象和他父亲“王强”有几分神似，“他父亲很爱说俏皮话，我就去书店买了三本俏皮话、歇后语大全，死啃了几个月，现在那些俏皮话我是张口就来”^[331]。这一版本的王强为后来的扮演者设定了一个标高，是小说中的王强成就了张力，现实中的“王强”给予了他力量，张力演活了王强。其他一些角色也邀请了比较有特点的演员参加，比如黄二喜的角色就由太监专业户张春年来扮演，鲁汉由五大三粗的在水浒传中“解宝”的扮演者来担纲。

电视剧于2004年10月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开拍。为此，枣庄专门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民国时期影视城，作为本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的拍摄基地，同时也用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基地成为了全国首批命名的红色旅游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晋身为国家4A级景区。

2005版电视剧共有35集，成为了较之之前的各个版本集数最多的电视剧作品。剧组为了使剧本的文学性更加的贴近原作的基本风貌，邀请了知侠的夫人刘真骅女士作为艺术顾问，参与剧本的审定，李世明和胡燕怀为编剧。在最初的8个月内，厚厚的3大本剧本，4易其稿。期间李世明累犯了两次心脏病。本版电视剧在最大程度忠实小说原著的基础上，吸收了铁道游击队历史史实，借鉴了铁道游击队其他衍生版本的精华，扩大了故事的内容含量，丰富了故事的戏剧效果。比如电视剧中的“红黑帐”，即伪乡保长为铁道队干一件好事就记一个红点，办一件坏事就记一个黑点，过一段时间，统一结账，如果黑点大于红点，那么离死亡就不远了，这个桥段来自于铁道队的史实。电视剧中的“假飞虎队”“真李鬼”也是来自于史实，假飞虎队原本是活跃在津浦线上的一支武装，在日军的诱惑下，成了日军的走狗，专门跟真铁道队作对，祸害百姓。电视剧中的阎特派员的原型是在历史上霸据微山岛的国民党军官阎成田的形象。王强和刘洪进枣庄是的第一个接头点同仁药店则来自于傅泰臣同名评书《铁道游击队》（就是在《飞虎队》中那个同仁药店，其赵老板通日成为了汉奸造成王强牺牲的地方），在电视剧的开篇王强被误解为汉奸的情节则来自于1985版电视连续剧“王强做卧底当汉奸”情节，而特务队长张三和丁二牛狗咬狗的情节则来自于评书曲大眼和潘长安的故事。除此以外，导演还从连环画中让演员学习的服装造型以及表演方式。“王新民在拍摄一开始，就给剧组每人买了一本《铁道游击队》的连环画，大家一有空就琢磨当年的场景。于是，电

视剧中的许多镜头都是根据这些画面“照搬”上去的。”^[332]本版电视剧除了人物和情节向以往的影视剧和其他文学版本借鉴外，还有了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第二节 200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艺术之变

一、场面动作化打斗化

同电影《飞虎队》相似，2005 版电视剧也突出了“打斗戏”，而《飞虎队》突出的是枪战的动作，各式各样的机枪冲锋枪，多发连射，火光冲天所到之处片甲不留（纵使有些武器在当时尚不存在）。而 2005 版电视剧更加突出了武打和特技动作，队员们利用自己强健的体魄，灵巧的动作，扎实的功夫与鬼子和顽军作战，他们往往能四两拨千斤，出手即胜。正如导演王新民所言：“这次重拍和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战斗将成为故事的主线。”“刘知侠的原著是一部 40 多万字的庞大作品，之前有一些影视作品表现过这个题材，但我感觉任何一个版本都没有拍出小说的完整内容，所以我萌生了翻拍的想法，我要把它拍成一部有血有肉的战斗片。现在翻拍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比较多，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无论是《红旗谱》、《苦菜花》，还是《林海雪原》《小兵张嘎》，这些经典老片里虽都有战斗场面，但都不是以动作为主的作品。在《铁道游击队》原著里，铁路矿工们和日本鬼子肉搏的场面很多，我们就想借助这样一部电视剧，让战斗片真正战斗起来。”^[333]他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只是表现了苗庄战役等战役，并没展开，人物一出场就都是完美的英雄，看起来不真实，12 集的《铁道游击队》（引者注：指 1985 版电视剧）容量比较大，但比较粗糙，打斗场面和人物塑造都不够。这些都有待在本版电视剧中解决。”^[334]这不仅是新版剧的特点，也是不同于以往红色经典改编剧的一个看点，通过震撼的战斗场面去表现游击队的传奇故事，突出他们的神勇，让战斗片真正战斗起来。在百姓眼中“铁道游击队”又名“飞虎队”，然而“飞”的特质在其他的电视剧中，表现得并不突出 1995 版电影以《飞虎队》命名，全片表现的倒不是“飞”，而是“匪”，他们展示这支草根队伍的“匪气”和“匪性”。他们的外貌粗糙、话语粗俗、动作粗野、情感粗放，如山大王，桀骜不驯，狂放不羁，看上去倒不如单打独斗个人英雄主义突出的李九更加文质彬彬温柔敦厚。而铁道游击队的“飞”的特质在本剧中得以澄明，成为了本版电视剧的特色，在本版中把重点放在游击队员们在火车上战斗的场景，战士上下飞舞身轻如燕，当微山湖被包围时他们能够扎翅高飞，鬼子包围苗庄围困刘洪时他能飞檐走壁，护送干部过铁路时他们能够飞云乘风，当松尾伪装成叫花子飞鹰走犬般来围堵他们时，他们能够飞驰电掣般及时逃脱，刘洪初次见到芳林嫂，他能够飞眼传

情把芳林嫂紧紧的吸引。就是这些“飞”的特质在本版电视剧中淋漓尽致的展现，成为了本部剧的艺术特色。为了拍好这出“飞”戏，“他们在3节火车顶部架起了一条长达60多米的“过江龙”——在3节车厢的两端分别搭起架子，中间挂一条钢缆，而摄像师就挂在这条钢缆上随演员移动，拍摄在火车顶部的打斗镜头，拍摄的同时，火车是处于高速行驶中的，高风险的演出让3名演员在第一天的拍摄中就受了伤。”^[335]。“我们不少演员都是演动作戏出身，但在拍摄过程中还是有7个人受了伤。我们这样尽心付出，就是为了给观众呈现出真实自然的打斗场面。我相信我们这个戏是红色经典中最好的一部，而打斗场面一定超过港台武打剧。”^[336]“但过去由于条件限制，以往铁道游击队的电影、电视剧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讲故事上，我是拍武打片出身，曾经执导过《燕子李三》、《连城诀》和《碧血剑》等电视剧，自然也把很多武打片中的技巧运用到拍摄上”。^[337]

二、彰显人物的成长性

在本版电视剧中，导演一改往常队员们“白璧无瑕完美无缺”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有着明显的缺点和毛病，他们出场不再是合格完美的战士，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犯错中不断成长的革命战士。正如王新民所说：“改编剧本之前，我们派人到枣庄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对知道当年这段历史的当地群众甚至是部分还健在的铁道游击队员进行采访。这部电视剧和原著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对反派角色和英雄人物的负面性格着力刻画，从而使人物和故事看起来更加丰满。如刘洪等人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革命的，他们是因为生活所迫才自发地与日本人、伪军进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改造，最终才形成了一支革命队伍，这些在以前的影片中都是不曾有过的”。^[338]“原著中有个汉奸黄二，根据我们的调查他其实是铁道游击队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只是后来由于性格缺陷才投奔了敌人，我们保留了这一段的真实性。而另一个角色李九，他是个以为凭自己一条枪就能打遍天下的人，我们则用他最后的死来表现革命斗争还是要依靠集体的力量”。^[339]这些队员们受到梁山好汉的影响，性格中既有仗义豪放的英勇气概，也有桀骜不驯的草莽影子，经过血的教训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逐渐成为党的抗日战争的英雄。只有战士们不断犯错，党组织不断纠错，人物才能成长成熟，人物才会更加丰满，故事才富有戏剧张力。比如鲁汉醉酒打政委，刘洪拿着碗口粗的木棍追着他打，鲁汉走投无路大难临头的时候，政委抢下了木棍，批评了刘洪，鲁汉也勇敢的承认了错误，保证不再犯此类的错误。这一情节无疑增加了戏剧效果，为两场高潮戏份之间的平添了几分轻松。这种创作的方式也一改知侠小说中人物成长不够鲜

明的特点。

三、凸显战争中的爱情

1950年代,“爱情”在文学作品中缺席,使得小说原著中把刘洪和芳林嫂的爱情故事作了暗线处理。在1956年拍摄电影《铁道游击队》时,知侠想将这朵爱情之花绽放。而导演在拍摄现场时也的确拍摄了两场在演员秦怡看来都比较满意的戏。有一场戏是描写芳林嫂精心照顾受伤的刘洪时,不觉产生了亲密的爱情,另一场则是“影片结尾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粗犷的刘洪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想拥抱芳林嫂。而芳林嫂不好意思地跑到屋外,推开门眺望远山,刘洪赶紧出来爱怜地抖下身上的棉衣披在她的身上。一直不擅长演爱情戏的秦怡为了这两场戏确实下了很深的功夫。可惜的是由于主创人员与领导观点不一致在审片时被强迫删剪,全部毁掉了。”^[340]这成为了秦怡永远的遗憾。

而到了1995年拍摄《飞虎队》时,芳林嫂和刘洪的爱情故事与原著完全不同,更新为一个崭新的故事,这个爱情故事没有受到其他样式的故事的影响,也就是说没有“影响的焦虑”,编剧可以讲述自己心目中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芳林嫂不再是丧夫的寡妇,倒是一个黄花闺女,两个人由原来的自由恋爱,变成了奉“奶奶之言”的爱情故事。比如在深夜成亲的桥段,很是精彩,它与原来的故事完全相同。芳林嫂在这里改为“老洪家的”倒是更合适,她与芳林还有什么关系呢?2005版电视剧中,爱情占据了很大的分量。导演将刘洪和芳林嫂的故事进行到底,展现了他们从懵懂相恋到终成眷属的过程,用导演的话说就是:多浪漫少凝重。把芳林嫂、蓝妮、紫玉等多个女性对爱情的渴望、追求和忠贞,描绘得绘声绘色。尤其是李九和紫玉的爱情以及高敬斋和红杏的亲戚关系,更是促进了情节的发展,成亲相认的过程更是渗透着民族爱国人士和走狗汉奸斗争得残酷性。剧中彭亮、田六子和蓝妮的三角恋爱更是风波迭起,彭亮和田六子都想跟蓝妮处感情,然而蓝妮更喜欢彭亮,田六子很吃醋,寻找机会和彭亮比武,以获得蓝妮的喜欢。田六子在彭亮这个榜样的刺激下也越来越优秀,表现的也同样的突出,美女需要英雄,可是这两个人只能二取一。导演巧妙设计让六子在与敌人战斗中英勇殉国,为国捐躯。彭亮和蓝妮结为秦晋之好。对于政委李正的故事前面几版都没有提及,直到《05版电视剧》才还原了政委的爱情故事。因为在知侠的小说的创作后记中对李正的原型杜季伟的爱情做了详细的介绍,“杜季伟他在铁路边找了个姑娘做爱人,……刘金山和王志胜坚决不同意杜和姑娘的爱情关系。杜调到山区进党校学习时,他悄悄地把这姑娘带走,……”^[341]《05版电视剧》故事中把李正的爱人设计成一个能歌善舞的文艺工作者叫白灵,两

个人是郎才女貌，感情甜美，然而他们两个人也没有醉心于卿卿我我，花前月下，他们两个只有在战斗之余才能到郊外的小河边肩并肩互诉衷肠，小河边是他们两个人谈心的场所，谈谈心就是他们的个人私生活。剧中意在表现“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巾帼形象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男儿气概，他们自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的时间都要投入到革命的战斗之中。在新的消费文化语境下，电视剧应该而且必须考虑市场票房，为了适应时代审美和大众文化消费的需要，导演和编剧们不仅增加了爱情描写，更着墨于那些正常的“真善美”的爱情故事，并且对战争革命中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爱情故事也一一展现。

四、增加国共合作情节

在《05版电视剧》中，刘洪一回到枣庄，想劫军火，夺取枪支。他通过王强打听情报，王强当时已经是卧底在鬼子洋行中的八路，他还不知道刘洪也是八路，于是给他提供了个假情报，让他把开往东北的列车劫下来，这列闷罐车上拉的是国民党的士兵，他们要被运往东北做苦力。刘洪不经意间把国民党军队给营救了，其中的最高领导是崔团长。崔团长很感激这位陌生大侠的相救。两人分别后，崔团长一直想找到救他的人，后来得知是刘洪施救，他下决心不打铁道游击队，不仅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坚决不通鬼子，不当汉奸。而国军中的阎铎阎特派员则不同，他明为国民党重庆方面派来的特派员，实为汉奸为鬼子提供情报，把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悉数提供给鬼子，当崔团长带领着游击队队员攻击微山岛，汉奸阎铎竟然开枪射击崔团长，崔团长壮烈牺牲。从此阎铎公开投敌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然而汉奸终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游击队在清除高岗时栽赃阎铎，日本鬼子对其施加了酷刑，下场很悲惨，这种人会被世人所唾弃。这种对国民党军官的复杂性处理无疑颠覆了原来绝对的国共之间的对立关系，反而增加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军官的合作，虽然是政治立场不同，但他们都是一衣带水的同胞，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在国家有危难时也会合作痛击日军。

除此之外，小说中被一带而过的两个日本人，在电视剧中倒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分别是铁道游击队员在“打票车”时俘获的两个人，他们分别叫美惠子和田中。他们被俘后游击队把他们送往了山里的根据地，进行思想再教育。一段时间以后，两个人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了这场战争的本质从而成为了反战的记者，他劝导其他日本人放弃“圣战”；而田中更是加入了八路军，他在敌我发生战争时负责涵化教育瓦解敌人。

第三节 200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剧：“红色经典”改编的精品之作

2005 版电视剧在各大电视台播出以后，观众的反应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经典之作，把小说中最经典的东西都拍了出来”；有人说：“有的情节是瞎编乱造，没有的事情编得有鼻子有眼，净是些‘注水肉’”；还有的人认为：“拍的太过神话，拍成了《神雕侠侣》，拍成了《少林寺》，不就是一群农民闹革命吗？”这种种的评价和质疑其实代表着当下受众的观影心态，什么样的“红色经典”改编剧是好剧？好剧的标准是什么？这是解决上面疑问的关键。要想解决好这两个问题，还要从红色经典的滥觞开始，溯本追源才能得出答案。在二十一世纪的开局之年，深圳的一家影视公司推出了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电视剧出其不意地获得了高的收视率，投资者获取了商业的回报和社会价值；同时还获得了好几个“国字号”的奖项，比如“五个一工程奖”，也深受主流意识的欣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部剧的成功，无疑给文化投资人以新的投资方向，也点燃了“革命题材”影视剧改编的导火索。从 2000 到 2004 年，短短的几年间就有四十余部作品投拍。一时间，电视屏幕一片红，红剧红歌红色经典重现，影视剧改编一派融洽和谐的祥和景象。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杨子荣有了情人和私生子，座山雕有了人情味。观众不答应，杨子荣的养子声称要将剧组告上法庭。还有好几部电视剧出现了这一情况。

在这种愈演愈烈、天马行空一派胡编乱造的热潮中，广电总局不再保持沉默，于 2004 年 4 月 9 号发布《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近期，一些电视剧制作单位将《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红岩》、《小兵张嘎》、《红日》、《红旗谱》、《烈火金刚》等‘红色经典’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有的电视剧播出引起了许多观众的议论，甚至不满和批评。”“一些观众认为，有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有的电视剧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过程中，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爱情戏；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调，在英雄人物身上挖掘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同时，由于有的‘红色经典’作品内容有限，电视剧创作者就人为地扩大作品容量，稀释作品内容，影响了作品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红色经典’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是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而创作的，是文艺作品中的瑰宝，影响

和鼓舞了几代人。”^[342]同时还要求制作部门“在改编‘红色经典’时，必须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和心理期待，绝不允许对‘红色经典’进行低俗描写、杜撰亵渎，确保‘红色经典’电视剧创作生产的健康发展。”这个文件可以看做是主流意识宣传机构对“红色经典”改编剧所施步的紧箍咒，代表着官方的态度，它指明了红色经典改编的方向。在文件的最后强调要求影视管理部门负起责任，对创作生产“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情况，特别要严格把握好尊重原著精神，不许戏说调侃，切实保证此类剧目的各个环节都不出问题。并且还在文件的后面附上了一个附件：题材规划批准立项的‘红色经典’剧目表，2005版铁道游击队也在其中。（如表7-1）并且还指出附表中的剧目都是“红色经典”的剧目，在今后制作单位如果有拿不准的地方可以参照这些电视剧进行对照检查。

表 7-1 广电总局题材规划批准立项的《铁道游击队》

2004.1	铁道游击队	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	根据同名电影改编。	桂雨霏	王新民	革命历史	30	2004.8	2005.5
--------	-------	-------------	-----------	-----	-----	------	----	--------	--------

2005版《铁道游击队》的改编立项申请是在该文件出台之前，拍摄时间基本与文件出台同时，其最后的审批在文件出台之后，可以说2005版《铁道游击队》拍摄时间正在主流监管最严格的时间节点上，其内容和格调都在广电总局的高压监管之下。在最严格时期出现的作品，这种改编方式自然能对以后的改编作品起到借鉴和学习作用。就改编技巧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铁道游击队》就是一本“红色经典”改编的教科书。我在查询广电总局的网站时不经意间看到了《铁道游击队》许可审核表。（如表7-2）

表 7-2 2005版《铁道游击队》制作许可

制作单位	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
剧名	铁道游击队
集数	35
许可证编号	《广剧》剧审字（2005）第107号
发证日期	2005-08-09

表 7-3 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铁道游击队》备案公示

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						
报备机构：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		2004年1月		许可证号：（辽）字第099号		
剧名	题材	体裁		集数	拍摄日期	制作周期
		一般	喜剧			
铁道游击队		✓		20		
内容提要						
省级管理部门备案意见		相关部门意见		暂未批准立项		
备注		2004年第一批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已立项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还发现在2004年1月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也申请了《铁道游击队》的改编，他的立项是20集电视剧。在网页上显示这部剧“暂未批准立项”，其原因是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已经申报。（如表7-3）可以看出一个热门的故事题材，一本优秀小说，对各家影视剧制作机构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事不宜迟，下手晚了可能机会就没有了。由原来的85版连续剧的12集拉伸为35集，这种扩容形式是红色经典改编的一种常态。在作品中导演和编剧没有故意给主角安排个老情人再加上一个私生子；也没有矮化主人公为武大郎，也没有情色化女主人公为潘金莲；没有“手撕鬼子”也没有“霹雳娇娃”；没有“炫酷太空车”，也没有“皮衣皮裤大墨镜”，一切尽显中庸之道。“抗战神剧”的伎俩，创作者都没有使用，一样有高收视和高广告回报，并且这部剧还获得了第十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五个一工程奖”的宗旨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宗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艺术贴近生活，弘扬时代主旋律，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反映青少年一代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能够获得这样的奖项，说明对青年一代的思想具有导向和指引作用。

“红色经典”影视剧如何从母体的文学作品向影视剧改编过渡，怎样具体实施，实施时要把握怎样的度，学者李茂民先生在其专著中明确指出：“从历次‘红色经典’的改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身影。凡是忠实于原著思想内涵和精神旨趣的改编，主流意识形态都会给予支持和肯定，凡是违背原著精神的改编，主流意识形态都会持保留态度，轻则默许，重则校正或禁止：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红色经典’改编的把握和审视，注重的是其思想内涵和精神旨趣，至于作品的篇幅内容增减、情节结构的改变则无关宏旨。”^[343]，所以改编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内在的红色灵魂和红色理性发生了变化，革命英雄身上所散发的正能量发生了变化。既不能为吸引眼球无端臆造情色，杜撰纠葛，更不能为了博得收视戏谑历史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经典改编与社会间存在着复杂的‘动力学’关系，改编经典不仅意味着对‘原著’文本的改动，它同时可能是某种社会情境的一种建构性/解构性力量，至少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方面是如此。作为历史文本的‘红色经典’乃是镶嵌着或铭刻着复杂的社会脉络、文化权力、历史记忆与不同主体位置的场域，对‘红色经典’的当代改编。不仅关系着文本曾经讲述了什么，更关系着文本在当下是如何被讲述的。”^[344]

相较于小说原著和其他几版影视剧作品，该版电视剧在从历史事实上挖掘新的故事

情节，丰富故事内容，添加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低吟浅唱，给电视剧增加了情感魅力，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的丰富。这也恰恰是 1990 年代以来宽松的政治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给人们带来的新的审美需求和变化。

2005 版《铁道游击队》的改编也得到了知侠夫人刘真骅的认可，她评价到：“这一个版本是原著改编最成功的一版”。电视剧获得了“全国城市电视台年度收视率前十强”“北京电视台收视第一”“上海广播电视集团收视第二”等多个荣誉，更加可喜的是在 2008 年还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既赢得了高的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又顺便赢得了高额的广告收入，而且还获得了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中宣部的认可，可谓“一箭双雕”，继而成为了“红色经典”翻拍的典范，是“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的风向标，是一部“红色经典”改编的精品之作。

第八章 《铁道游击队——战后篇》电视剧研究

第一节 《铁道游击队——战后篇》电视剧创作背景

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80周年和“建党90周年”，反思历史勿忘国耻，让历史的教训一代代传承下去。山东电视台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投拍了《铁道游击队战后篇》（本文也称之为2011版铁道游击队）。

这部电视剧的导演仍然由执导2005版铁道游击队的导演王新民担纲，他有“内地电视剧第一动作导演”之称。剧本由上一部的编剧胡燕怀担任。演员班底沿袭了《2005版铁道游击队》的演员配置，并且根据剧情的变化调整了角色。比如王强被安排到外地学习，新的大队副由新人物关义顶替。由于林中和鲁汉的牺牲在这部剧中就没有出现，换上了新的女性角色鲁大姑和邓华同志，当然也增加了问题人物孙玉田。



图 8-1 2011 版《铁道游击队》海报

2011 版铁道游击队志在打造“一个‘后抗战时期’的‘铁道游击队’传奇”。该剧主编剧胡燕怀说：“该剧创作来源于 2005 版《铁道游击队》的大获成功”，第二部如何能与第一部自然顺畅无缝衔接，“这是他当时最犯难的地方，因为拍续集保证剧情的连贯性至关重要，两部戏的衔接是重中之重，这也是编剧个人水平的最好体现。”^[345]他采取了把“第一部里面可用作伏笔的地方整理出来，让其在第二部里进行很好的完善，最大程度挖掘前作没有展示出来的精彩故事，并重新注入新鲜血液，使该剧又鲜活起来。”^[346]胡燕怀为了写好这个剧本还亲自去枣庄呆了三个月，研究当地的风土人情，语言面貌

等地域性的特征，试图保证本土方言俚语的原汁原味。

历史上的铁道队从 1945 年日军投降抗战胜利以后，蜷居在枣庄的日军向铁道队投降并离开枣庄，到 1946 年 6 月内战全面爆发，铁道队编入正规部队，一路向南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在这期间，枣庄地区的战斗形式是复杂的，当时处于国共割据的时期，枣庄地区外方圆 100 里外都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只有枣庄地区是我党的解放区，也处于国军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日之间的矛盾减弱了，而国共之间的矛盾凸显了。在本剧中：“1945 年 8 月末，抗战全面胜利，铁道游击队接受了驻鲁南临枣地区一千余日军的大投降，还未享受胜利的成果时，‘战争狂人’决心把‘圣战’进行到底的日军宪兵司令松尾破坏铁路，爆炸军列，搞了一系列破坏活动。上级派八路军运河支队的副支队长鲁大姑协助侦破列车爆炸案。游击队大队长刘洪为了消灭日本战争集团在中国最后的顽抗分子，派出队员孙茂田潜入敌人盘踞地。松尾因广岛失陷要报复马歇尔将军。刘洪制定了周密的保卫马歇尔计划。此时，军统特务郑祥也得到了‘保卫马歇尔专列’的指令，国共双方联手合作，在险象环生的战斗中挫败了松尾的阴谋。1946 年 6 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根据战场的需要，铁道游击队恢复番号，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乘坐着列车，去迎接新的战斗。”^[347]这是创作者们意欲讲述给我们的。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根据这一内容提要，申请拍摄，广电总局的备案公示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信息。（见表 8-1）

表 8-1 电视剧拍摄备案公示表^[348]

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							
报备机构：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		2010 年 5 月		许可证号：甲第 089 号			
剧名	题材	体裁			集数	拍摄日期	制作周期
		一般	喜剧	戏曲			
铁道游击队 2	近代革命	√			35	2010.7	5 个月
省级管理部门备	同意备案，报请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公示。				相关部门意见		
内容提要：	(引者略)						
备注	须改剧名						

根据广电总局备案公示中“须改剧名”的指示、电视剧实际拍摄长度的变化以及“电视剧制作发行的具体要求”^[349]，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对《铁道游击队 2》进行了两次变更，其一是 2011 年 3 月将剧名改为《铁道游击队——战后篇》，^[350]其二是 2011 年 5 月将原来申请的 35 集变更为 36 集。^[351]在制作部门的有序安排下，顺利杀青，呈现在电视荧屏上的就是 36 集《铁道游击队——战后篇》。

第二节 《铁道游击队——战后篇》电视剧艺术之变

一、反思问题人物

在《2011版铁道游击队》中增加了孙玉田的形象。在电视剧中，孙玉田是一个有勇有谋同时又是一个集个人英雄主义和本位主义于一身的问题青年。他为了摸清敌人的老巢，依着“半瓶醋”的裁缝技术进入国民党的军队去给王团长的姨太太做衣服；他为了进一步套取情报敢于勾搭姨太太白菊花（在05版电视剧中丁二牛的姨太太，被王团长收编为姨太太）；孙玉田在我军把敌人老巢端掉时他不顾军纪把她偷偷带回家，他在组织反对的情况下大迎大娶白菊花。他心胸狭窄，能厚着脸皮去刘洪那里要荣誉和待遇；他在白菊花的教唆下，向组织要票子要位置，没有得到满足时，跟着郑祥（国民党安插在我军的特务）投奔国民党享受荣华富贵，成为了八路军的公敌。不过在敌营中，他还是念铁道队这帮兄弟的好。当刘洪去国民党军营中探听情报时他暗中相助使刘洪脱离危险。他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跟游击队有正面冲突时他能倒戈起义，当他怀着荣耀之心像个迷失了方向的孩子回归时，他是激动和幸福的。他却遭到了敌人的背后袭击，倒在刘洪的怀里牺牲了。这种形象塑造使孙玉田有血有肉，性格多面，是一个圆形人物。“这段感情是我们虚构出来的，这就是戏剧。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合理性。但是其实人本身比戏剧还要复杂的多，谁也不简单。白菊花这个人物第一部里就有，我们当时要求要写一个坏女人，就定了一个型。我创作的方向是：“坏女人的真感情”。”^[352]“孙玉田这个人物，不是简单的创作出来的，他是有原型的。《铁道游击队》小说创作的时候是五十年代，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多的条条框框，作家刘知侠当时搜集了很多的素材，但是都不能用进去，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允许出现这些。”^[353]他是铁道游击队中长枪队队长徐广田的化身。他自家亲兄弟五个，除了老二早逝，其余四个都参加铁道队，还有一个堂弟也在徐广田的宣传鼓动下加入了铁道队，“徐家五虎”组成了“徐半班”。兄弟五人，有两个死在战场上，另外两个有残疾，徐广田身上也有枪伤。徐广田是长枪队队长是个资格老的队员，由于政治立场不坚定，最后叛变革命。其他和他同时加入铁道队的队员。解放后转业到地方（比如说刘金山、王志胜），他们每个月的粮食供应多达三百斤小米，而徐广田仍然是部队编制，吃完喝完仅给他一斤小米的补贴。他的这点补贴，根本无法照顾自己的妻儿老小和伤残的兄弟，自己生存都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跟其他队员进行比较的时候，他更感觉不平衡，发脾气闹性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如果把徐广田放在当下，组织可能会照顾得很好，他的命运将是另外的境地。可是当时组织却偏偏对他

的工作考虑的多，对他的生活照顾的少，造成了他背离革命。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对徐广田的遭遇是理解和同情的。即便他干了一些傻事，大家仍然没有抹杀他的功劳。论打仗，他在铁道队中是数一数二的，论贡献“徐半班”是出色的，而“徐半班”中的其他四虎的贡献全部加起来也不及一个徐广田。王志胜（王强的原型）的儿子王金国曾经说：“没有徐广田，铁道队就打不出天下来。”此话虽然夸张，但不难看出徐广田在铁道队的位置有多么地重要。当时偏偏徐广田没能度过生计这一关，否则将是另一个徐广田了。他最终叛变了革命。徐广田的事件成为了铁道游击队的污点，鉴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太多，这个人物差点使小说难产。这一形象展现了铁道游击队队员成分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多变性，同时引发人们对当时我党干部的民生问题和待遇问题进行反思。

二、丰富爱情故事

在本版电视剧中导演延续了芳林嫂和刘洪的爱情故事，同时也增加了鲁大姑、邓华和李正的三角之恋，孙玉田和白菊花的畸形之恋。芳林嫂在这部剧中已经与刘洪结婚，并有孩子小凤在身边，一家人其乐融融，刘洪在外当铁路局局长，芳林嫂在家是贤内助，还兼着自保主任。她保持了战争年代的敏感，当她的辖区内出现了一个貌似松尾的人时她会悄悄地跟踪，尽管老谋深算的松尾逃掉了。夫妻两人夫唱妇随，恩恩爱爱，这是解放后革命家庭的缩影。相比较，李正的爱情就要复杂的多，他的爱人，在05版电视剧中出现过的文艺工作者白灵，在本剧中去敌区执行任务的路上被流弹击中牺牲，这样李正就变成了单身，李正身上就有了感情戏。八区队的政委邓华和运河支队的队长鲁大姑对他都有好感，都在积极地向他示爱。给他各种情感信号，可是李正不为之所动，因为他的心里还装着白灵，鲁大姑和邓华两个人互相使出了杀手锏来搏爱，后来鲁大姑胜出，李正接纳了鲁大姑，就在李正生日那天，鲁大姑鼓起了勇气给李正讲出了她的伤心往事，“十八年前她被王雅茗的堂兄强暴生下来一个女孩，而这个女孩就是加入了筷子会的小混混珍珍”。李正同情并安慰了鲁大姑。珍珍后来知道了真相，认了母亲，她还被送到山里培训，成为了革命战士，这是新形势下李政委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女性白菊花的故事也格外曲折复杂丰富。她在上一部中是特务队副队长丁二牛的姘妇，同时也跟队长张三不明不白，还勾引王强，在本部电视剧中她的戏份更足，她成王秃子（王团长）的姨太太，当孙玉田打入敌人内部时，她勾引孙玉田，游击队消灭了王秃子，她委身于孙玉田，孙玉田成为了她的靠山，诱惑孙玉田设法弄到钱财，以满足多年养成的虚荣心。当孙玉田为了掩人耳目，把他母亲接过来一起住，白菊花却想尽千方百计虐待孙母，正

是这个有故事的女人导致孙玉田的堕落。影视剧是现实的镜子，“重要的是故事讲述的年代，不是故事所讲述的年代”，在今天贪污腐败生活问题日渐突出，九成贪官都有情人，情人们在乎的是钱财不是情感，她们只是获取更多钱财以满足虚荣心，“小三”的形象简直就是白菊花的翻版。相较于前几版电视剧作品中的情感表现，在本版电视剧中影视剧有了更大的突破，增加了人物形象，也增加了人物的复杂关系。但相较于“红色经典”电视剧中情感处理极端的作品，2011版电视剧的情感设置要保守的多。如2003版《林海雪原》电视剧，男主人公杨子荣在剧中无端多了个情人槐花，还生出了个私生子。当两个人分别多年邂逅时，“执手相看泪眼有语凝噎”，把两个人的传奇爱情无中生有并肆意放大，以至于杨子荣的后代到法庭去起诉。大胆假设一下，如果给刘洪和王强他们增加一些桃色新闻，也整出了三角恋、婚外情、私生子，那将会在民间引起怎样的风波？后果难以想象。这种爱情故事书写方式是《铁道游击队》小说和其他几版影视剧作品所没有的。

三、漫画敌军狡诈

在2005版电视剧中，尽管日军已经失败投降，松尾被芳林嫂投掷出去的手榴弹炸死。在2011版电视剧中，剧情发生了反转。变成了被芳林嫂炸死的人不是松尾，松尾金蚕脱壳，死的是他的一个替身，松尾诈死而悄悄在枣庄潜伏下来，试图继续发起圣战。他暗中与国民党伪警卫团联络，并把日军残余部队安置到伪警备团中，日军摇身一变变成了国军。当铁道游击队向伪军发起战斗时，这些日军残余金蝉脱壳从伪军营中逃出来，被松尾安置在大北窑一带，伺机攻击我军。松尾又把吃两条线上的“筷子会”和“胶东帮”拉拢在一起，松尾任军师，以吃两条线之明行“搜集情报、妄图圣战”之实。不仅仅如此，他还悄然炸毁军列，在我军中安插了一个叫“小东北”的特务，向他提供情报。当松尾的女儿听说他在中国已经阵亡，试图来中国找到他的骨灰，发现他还活着，试图用亲情感化他，让他回家。松尾早已鬼迷心窍，被天皇洗脑，一心想“圣战”。他变成了战争的魔鬼，无视冷漠亲情，成为了战争的殉葬品，松尾形象映射了敌人的顽固和狡猾。

此外国共两党的关系也进一步缓和，在我军攻打王秃子的军队未果时，王秃子的副官主动倒戈，停止火力帮助我军，使我军以最少的伤亡在最短的时间内拔掉敌人。这一情节为国共两党的关系抹上了一些美丽的色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为正义而战的队伍是会得到支持的。

第三节 《铁道游击队——战后篇》电视剧：经典改编的狗尾续貂

当有人问起与王导演的《铁道游击队——战后篇》是否能够摆脱“续写画龙点睛”的怪圈？导演王新民说，“历时五年，推出《铁道游击队》第二部，旨在添彩。尽管间隔时间长，《铁2》却与《铁1》完成了无缝对接，势必成为影视剧续集的典范。”^[354]王新民表示说，“历时五年创作的《铁道游击队2——战后篇》除了延续了第一部的故事走向，更创造性地聚焦‘后抗日时代’的铁道英雄故事。武侠元素的融入，也让剧中的打斗场面更加刺激，更加精彩，真正让战争片呈现出了战斗感。再加上原班人马的精彩演绎与大片感画面制作，多重看点下，《铁道游击队2》之于《铁道游击队1》绝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导演还列举了电视剧中孙玉田的故事，剧中的人物和原型的相似性。“譬如《铁2》中具有多重人格的孙玉田，从一名曾在抗战时期立下汗马功劳的共产党员，最终成为投敌叛变的罪人，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历史性在《铁道游击队2》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进而弥补了未能在《铁道游击队》中展现的历史空白。某种程度上，这种延续作品兼顾观众需求的续集模式既保障了《铁2》的可看性，也为未来影视续集创作提供了一个模板。”^[355]

尽管导演和编剧“信心满满”，扬言追求“青出于蓝胜于蓝”，决不搞“狗尾续貂”。这更加能看到他们有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心态，有着“贼喊抓贼”的嫌疑。理由有三：

其一，从情节真实上看，孙玉田的故事在本剧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可以说，2011版电视剧就是围绕孙玉田的故事展开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原型人物徐广田的故事虽然丰富多彩，但唯独没有的就是爱情绯闻。在电视剧中，孙玉田和白菊花的爱情故事极度虚假的，假的纯粹。他绝对不可能进入敌人的大本营后，在王团长的后宅之中，与白菊花勾搭的那么快，感情发展的那么迅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白菊花在国军军营中也早已红杏出墙。他在敌人的军营中呆了那么短时间就发生了这种故事，他哪还会在现实中愿意为妻儿老小“为五斗米折腰”。尽管后来，孙玉田叛变革命成了国民党的一个小官员，他能够迷途知返，在刘洪去敌人大本营时，他能念兄弟之情放他一马，在薛城一役中他能倒戈投诚，最后被国军打死，而死在了刘洪的怀里牺牲，也算是给英雄一个圆满的结局，并被批准为烈士。尽管导演说2011版电视剧是铁道队战后的故事，但你完全可以认为它是其他游击队之类，因为它与铁道游击队关系已经不大，即便改成了别的标题，你也会认为在逻辑上一切都很顺畅。这种故事虚构远大于真实，故事虚构的力度过大，使得本

剧在格调上与“经典”剧的标准有很大的差距。

其二，逻辑真实上来说。松尾是我游击队打击的对象之一，同时也是2011版电视剧中一以贯之的人物。他的身份设置的是否合理，是故事历史性是否真实的关键点之一。在小说中本来在苗庄一役中芳林嫂拉响手榴弹把松尾炸死，无奈芳林嫂的技艺太差，没拉开拉绳。在2005版中芳林嫂与他再度相遇时，她没有给他逃窜的机会，拉响手榴弹，松尾魂归西天，同时剧终。然而在本剧中，对松尾的命运做了虚拟加工，芳林嫂炸死的是松尾的一个伙夫，松尾没有死，他借尸还魂，并且“金蝉脱壳”般地偷偷伪装起来。他伪装在枣庄的大北窑地区，并且假定这个地方很“高大上”，机关重重，军火库掩体供给等一应俱全。可是众所周知，敌人溃败投降后枣庄周围敌人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和机会布置那么多的军火，同时该地区也没有那么险要的地方可以供鬼子栖身。这种故事的编排在逻辑上不妥当。这是没有历史根基的浮夸，稍稍动动脑筋，都会感到可笑，除非沙发上的“土豆”早已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为了打发时间而打发时间，没有顾及一点点时间的成本效益。

其三，从情感真实上来说。在剧中加入了三角恋情节。在本剧中导演为了剧情的丰富加上了“鲁大姑”和她的“私生女”珍珍的故事以及鲁大姑、邓华和李正的三角恋。珍珍十七八岁小小的年纪，却有一身的功夫，还能自成一派。他们能够把“刘洪们”给逗得整天摸不出东南西北，找不到他们的行踪。鲁大姑和八区区长邓华的感情戏更加的不合情理。两个人争风吃醋为了博得李正的百媚一笑。这种三角恋在当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经不起推敲。因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百姓的思想还是保守的。妇女是矜持的，妇女干部将自己的爱情纯洁的亮若明镜。如果“铁”小说和1956电影对情感的展开不够而留下遗憾的话，那么这种生猛示爱的方式多少让人感觉有些操之过急，用力太猛。

为了故事而故事为了商业而故事，被商业诱惑和收视绑架所书写的剧本，以及由此剧本所创作的影视剧，终究不能走向“高大上”“真善美”的高原。用新坛子装劣酒贴上老牌子，这不是老字号，而是“假冒伪劣”。如果仅仅是逗人一乐，没有非分之想还能简单说说，然而与“五个一工程奖”还相差甚远。可是本剧比起那些“手撕鬼子”“霹雳娇娃”等抗日神剧来，还算是有点节操，它至少没有把“男主人公武大郎化女主人公潘金莲化”的情节和桥段强加到故事情节之中来。尽管如此，该剧仍然有过度消费“红色经典”的嫌疑。

第九章 女性性别想象：《铁道游击队》谱系作品女性形象分析

知侠笔下的《铁道游击队》，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富有典型性魅力的有“足智多谋党性十足”的政委李正，还有凝聚力强闪烁着“卡里斯马”^[356]光芒的带头大哥“刘洪”，当然还有王强、林忠、鲁汉、小坡等四位干将。这种叙事模式被研究者尊称为“虎将模式”，《林海雪原》等小说中同样使用该技巧，这类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同时小说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女性形象，这位女性就是芳林嫂。这一女性形象在以后的影视剧改编中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女主角，从未缺席。

自1956年起，铁道游击队在众人的期盼中进行了改编，在文革期间一度被打成“毒草”，被列为禁片，在文革结束后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仅仅如此还多次被评定为“青少年成长推荐电影”。1985版12集铁道游击队连续剧，虽然画质模糊、道具粗糙但其叙事方式仍然让今人津津乐道。1995版电影《飞虎队》一改小说的故事情节，独辟蹊径立新说，留下了血脉贲张的枪战传奇。2005版35集铁道游击队连续剧是在抗战胜利一个甲子的特殊节点上改编的，其丰富的故事情节，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也是实至名归。尽管2011版电视剧，导演和创作者声称是无缝衔接，欲打造“后抗战”时代的铁道队，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狗尾续貂的嫌疑。但无论对作品的评价如何，“存在即为合理”。一本小说加上五部影视剧作品，也就是“非常5+1”构成了《铁道游击队》的谱系。这些作品塑造一批优秀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女人们也没有缺席。在影视剧中他（她）们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存在，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特质，各有各的精彩。无论是芳林嫂、梅妮、蓝妮、鲁大姑、邓华还是白菊花、紫玉、红杏和珍珍等等，这些女人们撑起了铁道游击队家族谱系的半边天。

第一节 原型：鲁南妇女的群像

芳林嫂在知侠的小说中是这样被描写的：“一个黑眉大眼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妇人，明亮的大眼睛是美丽的，里边却含着哀伤，但从端正的鼻子和微向下弯的口形上，很可以看出她是个有志气的女人。衣服虽是粗布，可是剪裁的很合体。……她的眼睛充满着羡慕、敬佩，盯在这刚才冯老头指给她的刘洪大队长的脸上，好象要把他认准似的，嘴里低低的说：‘你们可真行啊！’^[357] 在现实生活中芳林嫂她是有原型的。正如知侠所讲：“‘芳林嫂’在生活中不是一个人，她是一个群体的形象，是作者融合了很多人的事迹写成的。”

作家当年采风时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三位妇女。她们分别是时大嫂、刘二嫂和尹大嫂。“时大嫂近三十岁，有个叫小凤的女儿，由于小时没缠过脚，外号叫时大脚。她丈夫是铁路工人，被日本鬼子杀了，她守寡和女儿过日子，后来在帮助铁道游击队斗争中和老洪有了感情。可是老洪又牺牲了，所以她又二次守寡。另一个是刘二嫂，刘桂清，她的儿子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的通信员，队员们都称他二嫂。刘二嫂也是个很能干的妇女，她的丈夫是个极老实的农民，不仅自己帮助铁道游击队，而是也鼓动丈夫为革命尽力，还送自己的儿子当了王志胜的通信员。在‘文革’期间刘二嫂同时隐蔽‘王强’和知侠两个人，两个人同时在一起2个月，却不知道对方也住在同一个小院子里。知侠与刘二嫂有着浓厚的革命姐弟情，刘二嫂活着时每每都能‘管够知侠酒’。刘二嫂去世时，滴水不进是知侠含泪喂她米汤的。‘还有一个姓尹的大嫂，尹大嫂，精明能干。她不但掩护伤员，送情报，还带过几个铁道游击队员去袭击敌人’，她的名字叫黄秀英^[358]，他的娘家在在临城车站下的古井村，她的婆家在皇甫庄，就是刘少奇过铁路时在她家简单歇息，从那里进湖坐船回延安。黄秀英解放后每每坐在村子边的大树下纳鞋底，给孩子们讲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同时也好像等待铁道游击队再度归来。她们三人的家都是铁道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每当敌情紧急，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为了躲避敌人，或执行战斗任务回来，往往乘着夜色来到她们的家，她们家成了最安全的港湾。…他们不仅给队员们做饭吃，还在村边为他们放哨。遇到敌人搜捕，她们会巧妙地应付敌人，掩护这些队员，使他们免遭敌人的杀害，然后把他们安全转移。有时敌人夜间去袭击铁道游击队，她们获悉情报后，就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给铁道游击队送信，让他们迅速转移地方。她们常常去敌人控制的临城据点，完成侦察任务。有的队员负伤了，她们把他藏在自己家里，像对待亲人一样救护和治疗。她们成了鬼子的眼中钉，手中刺，她们都上了敌人特务队的黑名单。这三个妇女都被捕过，虽然受尽敌人种种酷刑，有的被打碎了头骨，打断了肋条，但她们从不屈服。放出后，继续帮助铁道游击队去歼灭敌人。”^[359]这就是作家知侠在《后记》中专门用大的笔墨反复强调的三位典型。既然是“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么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妇女也在对铁道游击队做出过贡献。比如还有吕英，每当游击队聚集开会，吕英便倚在门口纳鞋底，放哨掩护、这与刘知侠创作小说时选用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吕英与铁道游击队战友感情很深，一次游击队员受伤无处安身，吕英冒险把伤员藏匿在座后一地窖里，白天用稻草伪装好，晚上进去为他们送饭、换药洗伤口，直到伤愈归队。吕英常以卖香烟为掩护，监视鬼子动向。吕英利用风筝飘过寨墙时故意断线掉到寨墙外，鼓动孩子哭闹着让鬼子放行到寨墙外拣风筝，然后将情报送到了潜伏

在湖边的洪振海手里。党史工作者证实，吕英夫妇直接间接掩护过的过路干部我军高级将领。^[360]“我知道鲁南人民是强悍的。这是苦难的生活所培育出的坚强性格。鲁南的妇女比男人受的苦难更沉重。她们还受封建社会束缚。因此，她们的反抗和斗争性亦更强烈。她们是那么勇敢地冲破加在妇女身上的封建牢笼，在铁路线上的残酷斗争中帮助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猛歼敌寇，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所以我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融合她们三个人的个性特点，塑造了芳林嫂这个妇女斗争形象。在刻画这个人物时，我采用了老洪和老时这条爱情线索。当然，我也揉进了其他两位妇女的个性特点和斗争事迹。”^[361]芳林嫂的形象是鲁南地区无数个保家卫国勇于奉献的妇女们的典型代表。正是这些“芳林嫂们”在承受着家庭生活的重担还挑起战斗的重任，建功立业的军功章里自然也有她们的一半。

第二节 芳林嫂：巾帼不必让须眉

知侠在《铁道游击队》中塑造的女性英雄形象芳林嫂下接地气，能食“人间烟火”，是英雄和美人的结合。或者说，芳林嫂也有情也有欲，有着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她的个人情操最初也不是那么高尚，她对党的觉悟，来自于在自觉追求爱情过程中向刘洪的不断靠近。她爱刘洪，从而爱上了他的事业，爱上了党。也可以说爱情成为芳林嫂向往革命的动力。芳林嫂成为寡妇之后和刘洪相爱。实际上就杂糅了多重情感：一方面是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的认同，就是把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她对刘洪的认同，这也成为了她认同共产党的一个潜在的条件。但是前者是弱于后者的。如刘洪在微山岛上被敌人包围之后，芳林嫂一想到“老洪他们又处在那样危险的境地。这一切都在撕着她的心。她不是感到自身的孤独，而是在为他们着急和担心啊！”^[362]当芳林嫂身处困境时，她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党，而是刘洪：“她的心被撕裂着，如果有老洪在身边，一切就会好些。只要他发亮的眼睛望她一下。或者简短地叫一声：“别熊气呀！她也就满身是劲了。”^[363]芳林嫂和刘洪分别时。这种依恋情感获得了升华：“两人的手握在一起了，芳林嫂抓住老洪的手，总不想放开。”是刘洪感到时间紧迫，才“毅然地把手抽出”。在这里，他们之间所显现的情感与其说是战友情，不如说是在特定的战争场合中男女之间朦胧的爱情更准确。如此说来，芳林嫂行动力就是对刘洪的爱。芳林嫂在母亲去世后，渴望能够早一点到山里去：“心里想着自己马上就要离开这到处追捕的环境，到山里去学习，很快就要见到刘洪了，她心里感到无比喜悦。”^[364]这实际上就把芳林嫂到山里学习的驱动力归结到了刘洪身上，这和接下来的英雄叙事

中强化了党和组织的动力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芳林嫂被敌人逮捕后，面对酷刑她坚贞不屈，倒不是来自组织和党的支持，而是来自刘洪的支持。“她在百般的痛苦中间咬紧了牙关，她觉得这样作，才对得起老洪，在和老洪相处的时候，她爱老洪坚如钢铁的性格。因此，她知道老洪也是这样来希望自己的。”^[365]显然，这样的英雄叙事，到了“十七年”后期就很难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包容了。在知侠为我们所提供的英雄叙事中，尽管已经涉及到了爱情这样的话题。但这样的英雄叙事和实际生活相比较，依然显得“不如他们原有的斗争那样丰富多彩”。“刘洪”是知侠虚构的一个英雄，“是根据两任游击队长洪振海和刘金山的事迹创作的人物。两个人的名字合在一起才是刘洪。”“洪振海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他牺牲的时候才30岁，结婚刚一年”。“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还不到半个月”。洪振海这样的英雄，在他者的视阈中，则被看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山东汉子”。^[366]所以正是这样的汉子们用自己的魅力吸引女性形象而走向了人格成熟，在人生导师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三节 “铁姑娘：女性性征缺失

芳林嫂的形象，她从小说《铁道游击队》诞生之日起，就为读者广泛接受，深入人心，以至于原型人物刘桂清，人们都叫她“芳林嫂”。芳林嫂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个典型符码，这一形象的表现的好坏也成为了影视剧改编好坏的“试金石”。

1956年5月，毛主席正式提出了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又说：又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在战国时代，两千年前的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鸣，现在我们需要这个。……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在报纸上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党的方针明确文艺可以争鸣，这对于知识份子而言意味着政治氛围的舒缓和轻松，与接下来1957年5月党的整风运动相比，这一年无疑是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最佳时期，就在这个时期，导演赵明创作了电影《铁道游击队》。

在1956版电影中，芳林嫂的形象由被称为“四大名旦”之一的秦怡扮演，秦怡当时34岁，风姿优雅，被称之为“中国最美丽女性”。在影片中，表现女性柔美的S形曲线和披肩长发被悬置，取而代之的是齐耳的长发和肥大粗布的衣裳。与后来创造的“铁姑娘”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女性们从“把人当成鬼的旧社会”走来，是党将她们从地主老财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在文艺作品中，新的社会容不得她们作休整，她们需要迅速地

在精神上长大成人，加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中去，这是“十七年”文艺“政治一体化”对人物塑形的根本要求。虽然演员本身很漂亮，但是芳林嫂戏份却较少，在影片中也是地地道道的配角，据我统计，在影片中秦怡出场 17 分钟左右，占总时长的 1/5，她一出场，便主动请缨到票车上侦查敌情，“智打票车”获取情报。电影中完全没有铺垫时间，芳林嫂就彻底地完成了从一个受苦受难的农村妇女向革命战士的转变，也就是实现了由地母盖亚向花木兰革命女战士的转变。“十七年”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受苦受难型”、“支持革命型”和“革命花木兰型”三种类型。

“受苦受难型”的典型形象就是 1956 年电影中祥林嫂的形象。“支持革命型”有沙妈妈（沙家浜）和冯大娘（苦菜花），他们是困苦农民的代表，她们是贫苦的代名词，有时也是需要拯救的对象，同时她们也是革命战士哺育者。“革命花木兰型”，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何兰芬和《烈火中的永生》的江姐，等等。这三种类型的人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形象可以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渐变。在芳林嫂的身上就有所表现，她由“革命的支持者”转变成“革命女战士”。影片跟小说相似一如既往地让芳林嫂的丈夫缺席，这也是作家或导演的叙事策略，同时也是向主流意识形态致敬的一种方式。由于丈夫的缺席，她们才能从父权制的家庭中走出来，才能彻底绝缘于肉体父权的光晕，才能使她的精神重生。她接纳精神导师的教化，这种精神内涵能给她提供良好的精神尺度。肉身父亲的离场，精神导师的出场，成为了以后“红色经典”改编钟情的叙事策略。在 85 版铁道游击队电视连续剧中，芳林嫂的丈夫刚一出现，即被杀害，成为疑案。找到凶手为夫报仇，成为了芳林嫂最本真的想法，这也成为了她要求思想进步的垫脚石。当然时代发展了，到了 1995 版的电影《飞虎队》中，这一模式又发生改变，将在下文中进行论述。

那么，男性导师的出现仅仅是精神上的领路人吗？他们难道不会把党的女儿演化自己的女友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革命是世代的事业，需要有革命的接班人。革命的接班人不是孙悟空，不能从石隙中蹦出来。只有有了“革命家庭才有革命后代，才有革命事业的延续与壮大”，“走向亲情不是目的，由亲情进一步升华为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认同才是爱情应具有的境界。”^[367]但是这种爱情表达不是自由的言说，是在主流意识形态规训下的爱情，是作家或导演在言说的过程中争取的最大限度的爱情。比如，刘洪在芳林嫂家里养伤的那场戏。故事并未按照人之常情的向度向前发展，而是保持了更大的革命理性，“英雄人物终于以革命事业为重，将个人情感问题暂时搁置。”^[368]也就是说这种选择不是导演或作家自觉为之，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压力下的不得已的选择。

“《铁道游击队》开拍前，包括导演在内的主创人员，都主张要刻画芳林嫂与大队长共同对敌斗争过程中，特别是刘洪负伤疗养，芳林嫂静心照顾时，两人萌生爱情的细节。戏正式开始后，拍了两场完整的爱情戏。但意想不到的是影片即将上映时，政策有变，有关领导不主张在银幕上表现爱情戏，拍好的爱情戏被迫减去，前后的情节弄得接不上，芳林嫂的形象也被搞得支离破碎。对此，一般观众并不一定会发觉，专业人员对其中的破绽趋势一目了然，留下了遗憾。”^[369]对此，导演赵明也有着暧昧的评价，“关于爱情描写，有人觉得太浓了一点，我也有此感觉；但这是否就是禁区，就根本不应表现，那倒未必。”^[370]

虽然情感表达在电影中未能淋漓尽致地表达，但是在意识形态约束如此紧张的年代，能够出现这“一抹温柔”也是难能可贵的，是创作者内心情感力量使然，对艺术价值追求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电影拍摄的时期正是个人爱情在“十七年”电影中争取最大化出场时间的时期。导演在“政治化命题”和“人性化书写”之间寻求到最大的个人言说空间。

第四节 灰姑娘：男性拯救的对象

芳林嫂在1985版电视剧中的故事情节基本保持了小说和1956版电影的故事情节，较之1956版电影秦怡塑造的芳林嫂，革命觉悟上没有太大的提升，个人形象塑造上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演员牛娜在处处竭力想演成秦怡的样子，可是她的表演多少有些不自然，没有能跨过秦怡塑造的芳林嫂的标高。芳林嫂在影视剧中是充要的符码，我们必须给予她最大的尊重，不能置换，那么其他的角色都可以置换。比方梅妮的形象给1985版电视剧平添了很多情趣。小说《铁道游击队》中对梅妮进行了白描勾勒，仅有百字余。“梅妮长高了，红红的脸蛋，一双俊秀的眼镜，黑黑的头发梳成一条扎红绒线的大辫子。虽然他是移过来看小坡了，可是脸上去红红的露出少女的羞涩”^[371]，我们看完以后，对小说中的形象不会留太多的印象，这一形象无疑是空洞的能指，在文章中她也只是起到路人甲的作用。而在1985版电视剧中，导演积极地为梅妮赋名，纳入电视剧人物谱系建制之中。通过一系列事件的展现，使梅妮这样一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一个贫家灰姑娘，出落成革命的花木兰。如何使一个黄毛丫头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从无名之辈变成党的女儿呢？在电视剧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导演利用了塑造典型事件的方法，比如小坡叫梅妮去送信的情节，小坡巧用激将法，使梅妮快速地长大成为党的女儿，完成从灰姑娘向花木兰的转化。她的转化也绝不是偶然的，只有政治力量在权利结构中占据有主导

地位的年代，流行的才是革命灰姑娘的故事。革命灰姑娘不像原型人物那样“经常受到继母与两位姐姐的欺负，过着悲惨的生活”，也不像电影《律政俏佳人》中的艾丽那样的光鲜，只有那些像梅妮、蓝妮或吴琼花一样的姑娘，出身贫苦，又有家仇国恨，受尽地主老财鬼子汉奸的无尽压榨，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才能成为革命的灰姑娘。“梅妮”们只有在政治力量或主流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年代才得以被挽救。革命灰姑娘身份的转变不是由贫苦走向富贵，也不是有弱势走向强势，而是由苦大仇深、受尽压迫走向革命的道路，成为又红又专的女性革命者。同样地，革命的“白马王子”身上有着男性“力比多”气质同时还有着高尚的党性或者崇高的信仰，他是党的化身，他们有着先进的党性。他们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宏大主题书写者。灰姑娘们经过故事重新包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也被巧妙地缝合进故事之中。灰姑娘在男性荷尔蒙的吸引力和党性精神光芒的双重磁场的作用下，发生了同化。他们对男性“王子”言听计从，比如“小坡为梅妮示范送信时遇到鬼子时如何处理的情节”、“上山集训时小坡对梅妮的教导”、“蓝妮要去报仇是亮子一把抓住了她”。而这种情感电流不是单向的，不光是灰姑娘对自己的“白马王子”充满爱慕，作为革命导师的白马王子同样也不是铁板一块，“白马们”往往会对他们的灰姑娘产生兴趣，二者情感的电流一旦有了握手信号，王子爱上灰姑娘，灰姑娘才能得以救赎。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成为了灰姑娘化茧成蝶的关键，叙事才得以发展。在男性的吸引和规训下，灰姑娘们积极学习（进山学习、入党等活动），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得到双重解放，获得了新生。灰姑娘和白马王子情感结局一般两种情况：要么“英雄抱得美人归”，要么“执手相看泪眼”。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段时间主流意识形态把爱情作为资本主义个人话语放逐，因而为了向主流示好，作家们通常进行升华处理，把男女的感情提纯。在新时期影视剧改编中，人们对政治热情减弱，在创作中一般选择英雄抱得美人归的方式，美人和英雄结为秦晋之好。

就这样在党的吸引和教育下，灰姑娘们完成了肉体 and 灵魂的双重解放，获得了新生，灰姑娘把白马王子的个人膜拜和感激之情化为了对党的无限忠诚，自觉进入了革命大熔炉，涅槃为真正的革命花木兰的形象，完成了个人精神和肉体的形塑与重生。

第五节 孟姜女：闺房幽怨盼君归

在1995版电影《飞虎队》中，电影开始就打出了字幕：“该剧是根据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改编的”。可是，看过电影以后才发现，电影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发生了悄然移

位，战争让女人们静悄悄地离开。芳林嫂这个参与战斗的女战士在影片中被边缘化。芳林嫂被降级为无名的嫂子，还不仅仅如此，连人物身份也发生错位，芳林嫂这个曾经有妇之夫被置换成黄花闺女，她的婚姻是由奶奶安排的，她被许配给刘洪。刘洪也不再是侠肝义士，更像是草莽流寇，更加吊诡的是“刘洪家的”嫂子在文本中变成了怨妇，喋喋不休唠唠叨叨讲故事。她除了在影片的开头和结束出场外，在影片中基本上没有出场。她的脸被红布盖头遮挡，观众无法看清。即便给出了几个看清脸部的特写，也是她自己闷闷不乐地坐在闺房内百无聊赖地等待老洪回来。她的身份被挤兑到了可有可无的位置，她从战争的亲历者参与者堕落成战争的道听途说者。尽管电影中李九的情人小青的戏份仿佛更加足些，但她在与李九缠绵时被鬼子包围与李九同归于尽，这是导演的计谋。这个灰姑娘终究不能成为李九名正言顺的妻子，只能成为李九祭坛上的贡品。这些情节分明就是导演在给我们开的一个个玩笑，战争的严肃性，经典的故事性在这里消失的殆尽。这是一种反常规的故事叙事，这是对铁道游击队小说的颠覆，留给观众的仅仅是大块朵颐的视觉盛宴。

《飞虎队》电影情节与小说情节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导演添加了一些自己独创的情节，比如王强药店买药惨遭杀害情节等。这些都是创作者在对原文肢解后另类加工的结果。在文本中导演试图把过去的故事结构和确定意义去魅，以达到否定永恒展示自我的目的。“解构作为一种阅读和批评模式，首先是将反传统和反权威为己任”，也就是说解构就是把权威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它们尝试打倒经典、消除崇高、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在这里艺术的永恒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疯癫的嬉笑，这类作品不仅仅表现在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在其他题材的影视剧中都有体现。比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电影中，这部影片不仅仅把《西游记》的整个框架都解构了，而且零碎的片段、错乱的时空交叉、无厘头的表现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西游”。在这部被解构的《西游记》中，充满正义感而又生动活泼的孙悟空，变成了一只感情生动、多情、叛逆，因为爱情流泪的毛猴子。孙悟空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只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他作为人死了的那一天，直到他的心被剖开因而看清楚自己的真心的时候，他终于“顿悟”了，留下了一句所有人都念念有道的一句话：“曾经有一段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想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的话 那将是一万年。”这种后现代的文化把过去的经典文化予以消解，传统的文化风格不再规范。在这类影视作品中历

史感和厚重感荡然无存，人们看到的是另类的文本，一个扁平的、无历史深度的、无中心的文本。

对于《飞虎队》而言，这种改编的确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满足了主导文化和大众的需求。对主导文化而言，文本巧妙的把爱国主义精神和情怀缝合到文本中，借武侠和暴力图景以完成爱国主义表达。用腹语术式的演说以满足意识形态规训的目的。对于大众而言，在观看影片的同时，自己从紧张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起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目的。对于资本而言，通过市场的良好反应，卖出更多的拷贝，以实现获利的目的。

如果与当时拍摄时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话，自1992年以来，改革开放加快步伐，能者多劳快者致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胆大心细，坚韧不拔，有着某种草莽精神。他们能够把握机会，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在铁道游击队的男队员们的身上能找到他们的影子。他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商界战争中运筹帷幄，他们是这场战役的绝对的主角。根据女人们在这场商战的表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女人变成了“男人”，成为了职场“花木兰”；另一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成为了全职的太太。第一种女人女性性征已经消失，他们能像男人一样在商场中谈生意搞管理，甚至比男人做的还要优秀，她们可以对家庭做巨大牺牲。而全职太太们则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失去了话语权，成为这场战斗中边缘化的人。她们是这个社会可有可无的“跑龙套者”。她们回归家庭，相夫教子，默默的为家庭付出，变成了“某人家的”，忍辱负重、温良恭俭成了她们的代名词，委身为囚在笼子的金色雀。女性絮絮叨叨啰啰嗦嗦地像祥林嫂那样，被社会主流所遗弃。而男人们在他们的江湖中风生水起，“某人家的”则絮絮叨叨向他人讲述男人的江湖抱怨着她们的委屈，她们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他者”。而男人们对这些女人们的絮叨早已厌烦，对他们青春不再的容颜早已厌倦，他们喜欢的是小青那样既解风情而又性感的女人，小青们吸引了男人们的目光，即满足了男人观影的欲望，男人又不要承担观看的责任。如果电视像一扇窗，给观众展现外面的世界，那么电影无疑就是一面镜子，能展示现实生活中的生活图景。这种故事的讲述方式无论是导演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通过影片都实实在在地展现一个真真正正的社会存在。

第六节 “潘”之“花”：女“祸水”于女战神

2005版电视连续剧保留了原著中的经典故事，阐发了原著精神内涵，还增加了多个人物和些许剧情。同时电视剧也保留了原来的内在思维模式即我军与敌军二元对立；这

种思维具体表现在创作上就是：敌我对立。“我”是正义、光明、英勇善战、不怕牺牲、轻易不会牺牲、无性欲、无私念等的代名词；而“敌”意味着邪恶、黑暗、贪生怕死、必定会牺牲、贪女色、有杂念等。这两中话语系统归根结底就是：好人都有好报、坏人都遭殃。在这种思维左右下，女性形象呈现为两种，一种是花木兰般的女战神，他们和男人们一道驱赶鬼子。比如说电视剧中的芳林嫂和蓝妮；另一种形象是像潘多拉一样以自己的美貌和情色吸引男性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或虚荣心，寄生是她们的本性，欲望是她们的特质。比如红杏和紫玉姐妹两个以及“枣庄一枝花”的白菊花。这些“红、白、紫”等等由颜色构成的女性，自然会很快陨落，最能保鲜的自然是身着灰色军装的革命女战士。潘多拉是美貌色诱的化身，依附男人，永远在男人的臂膀下，她思想品格成长缓慢或者基本不成长，依附寄生是她的特点，是男人的奴隶。花木兰，却是男人的好帮手，在男人的帮助下快速成长。她们之间的二元对立是红颜祸水与巾帼英雄的对立，是潘多拉与花木兰的对立，即“潘”与“花”之间的对立。在改编中，这种两元形象的对立无疑是人物设置的最好方式。

在本剧中，芳林嫂一如既往地延续前剧的人物形象特征。为夫报仇，是她最本初的想法。在铁道游击队最危难的时刻，她当上了后勤部长，做饭洗衣伺候伤员，在开会时她充当了警备员，能够及时发现进村偷袭的松尾，她在铁道队行动时负责侦查，她能在刘洪李正去高敬斋家赴鸿门宴时发现高家的猫腻，保全了队伍。同时在电视剧中，还增加了刘洪和芳林嫂的儿女爱情缠绵戏，比如在刘洪负伤时她给刘洪熬鸡汤包扎伤口等等。在这种情爱的呵护和情感的滋养下，“花木兰”似的“地母盖亚”快速的成长，成长为一位革命战士。这种人物建构方式恰恰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言说的方式，又使个人情爱在文本中得以回归，延续了传统伦理纲常，使革命的火种得以延续。把儿女情长的爱情纳入到革命工作之中，使芳林嫂的爱恨情仇得以展现，使传统女性的俭恭温良得以自然的阐发。较之先前的多个芳林嫂人物形象，本剧中的芳林嫂人性得以本真的生发，这也是同一时期中国电视剧人物塑形的一个新的症候。

在 2005 版电视剧中出现的蓝妮形象，是本次改编时新加上去的。她是“独行侠”李九的妹妹。彭亮和田六子是师兄弟，都是李九的徒弟。他们两个人都爱着蓝妮，可是蓝妮只喜欢彭亮，厌恶田六子死缠烂打，三人情感的情感纠葛弥漫于故事的讲述之中。蓝妮有从哥哥李九那里学来的一身好拳脚，是个练家子，在战斗中多次显身手。蓝妮身份与 85 版的电视剧中的梅妮的身份有些相似，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出一个乡野“灰姑娘”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变成革命“花木兰”的，到最高的学堂“山里”大学去集训完成由茧

到蝶的蜕变。在他们的身上看出了女性青年如何在党的规训下一步一步成长为合格的女战士。同时彭亮、田六子和蓝妮，他们三个人情感的复杂性也表征着新时代男女爱情的特点，男女之间的爱情不再是那么的简单一对一的关系，可以是两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女人可以自由选择爱某一个男人，他们之间需要竞争才能获胜，使自己能够独自拥有某人，这体现出了新时代的情感变迁。只是蓝妮的个人爱恋没有在田六子和彭亮之间徘徊，他一如既往地选择彭亮。在商品消费时代，大众要求文本以最大可能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本性。

在本剧中，改编者设置了两组潘多拉似的美女形象，一组是红杏和紫玉一对姐妹花。她们资本家出身，日本鬼子的侵袭使父母双亡，从济南流亡到枣庄和临城。姐姐红杏成了李九的未婚妻，而妹妹紫玉成了汉奸高静斋的姨太太。她们两个人的都格外仇恨日本人，她们分别寄托于自己的男人给自己报仇，一个是“单打独斗的独行侠”，一个是“实心踏地”卖命的大汉奸，然而她们报仇的结果是不言自明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李高本是亲戚，在日本人的授意下，高静斋在红杏生日那天，借李九从上海来给她过生日的时机，派人把李九团团包围，最后红杏和李九丧命于高静斋的枪下。而高静斋的女人紫玉在知道妹妹红杏被丈夫高静斋杀害，家仇难报，又添新仇的情况下，点燃卧房，焚火自尽。同是有家仇的女人，与芳林嫂比起来，红杏紫玉要悲惨的多。芳林嫂支持革命队伍，以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为靠山，不但能够报仇还能使自己成长获得个人的幸福。而红杏紫玉两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他们的下场当然是穷途末路，她们非但不能报仇雪恨还落得个家破人亡，只有也唯有共产党领导下的铁道游击队才能真真正正的打击鬼子，为千千万万芳林嫂们谋幸福。

在剧中另一组潘多拉似的美女是白菊花，她是枣庄的名妓，是“枣庄一枝花，最美就数她”。人长的漂亮性情也风流，她辗转于多个男人之间，姘头有特务队的丁二牛、张三还有叛变革命的游击队员黄二喜以及2011版电视剧中的孙玉田。这些人以跟白菊花交往为荣。更有甚者，黄二喜和孙玉田跟白菊花交往了以后迅速得堕落，或给鬼子通风报信成汉奸或自己向党要待遇要票子，丧失了自己的党性。然而我们也看到，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去会丁二牛，白菊花多次勾引他，他都能机智的拒绝。这对当下有着厚重的隐喻功能，在糖衣炮弹的面前，防腐拒变抵御美色成为了一个共产党员品质是否坚定的试金石。使得具有浓厚的偷窥心理的观众也在这种风花雪月插科打诨中满足自己好奇心。这种叙事方式既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满足了大众渴望自己在美色和金钱面前不变色不变质的期许。这无疑是主流意识形态愿意看到的。把意识形态的教育缝合进

文本中，故事内以达到自己权利演说的腹语术的目的。

在 21 世纪开端的几年，影视界掀起了一股影视剧的改编热潮，这股热潮一直在持续。广电总局对愈演愈烈的过度改编以文件方式进行了规限，2005 版《铁道游击队》就是在政策出台时予以拍摄上映的。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在规训最严格的时候所拍摄影片，是最符合主流要求的作品。电视高清技术的发展、电视机价格的降低、收视信号的普及使电视从家中神龛的位置走下来，成日常生活中的一员。人们在休闲时间观看电视剧满足人们休憩歇息放松的目的。而电视主管部门则虎视眈眈地隐形关注电视节目的内在精神，一反原来咄咄逼人的政治宣讲，化为润物细无声的政治浸润，把自己的主张春风化雨撒下民间，实现了主流教育的目的。而作为投资资本，在高的收视率中获得高额产业利润。同时 2005 版《铁道游击队》还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被评为“五个一工程”。这也为 2011 版电视剧的改编奠定了好的基础提供了动力。

第七节 亚努斯：于连般红黑人生

亚努斯，罗马最古老的神之一。他起初是太阳和光明之神，掌管天门的启闭，给大地带来光明，使季节、月、日更迭，后来成为守卫一切门户、通道的门神和象征一切事物开始的神。罗马广场建有亚努斯神庙，战时庙门大开，亚努斯神庇护战士出征；战争结束，庙门关闭，以示和平。亚努斯最大的特征就是她的两面性，因此，亚努斯雕像常有向着相反方向的两幅面孔，一幅面孔是向着过去的样子，而一幅面孔则向着未来。她是掌管未来和过去的双面神。在这里使用“亚努斯”，是在于它的双面性，这种双面性往往表现为阴与阳；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在这种意义上而言，2011 版《铁道游击队》连续剧中的女性身上表现出了这样矛盾的特征。

2011 版《铁道游击队》连续剧在试图使故事无缝对接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了微调，加入了新的女性角色人物。如运河支队的女政委鲁大姑、七区区长邓华、女扮男装“小李九”、还有昙花一现的百灵等等。这几位女性身上不仅有革命者红色，同时也有自己无法洗掉的污点，是红与黑的混合。他们在这种矛盾复杂体中小心翼翼的生存，试图在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光鲜的优点，同时她们身上的缺点也总是无法回避，使她们处于尴尬难堪绝望的境地。

运河支队的女政委鲁大姑是延安抗大的高材生，她有勇有谋，会使用双枪，打起仗来绝不输给男人，同时她还很小资。在外侦查是孚一亮相一席旗袍，S 型身材毕露，活像一个达官贵人的官太太，绝不是一个共产党的女干部。在组织内工作，她换上了军装，

严肃而又认真，英姿飒爽。在攻打警备团和鬼子余部时，她身先士卒，斗智斗勇，冲在 frontline，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如此要强完美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遭到了高静斋堂侄的强暴，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被她送人，然后自己被抛弃。母子失散多年。这个女孩子就是本剧中的小李九“珍珍”。珍珍的下落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对珍珍有无尽的牵挂和思念，作为母亲她是愧疚的。发现小李九就是自己的女儿时，她的母性一下子爆发了，她原来端着的女干部形象放下了，她哭泣不止。随着她和政委李正在工作中接触，爱情之花静悄悄开放，她逐渐地爱上了李正。她对他含情脉脉，她会织毛衣让芳林嫂偷偷地送给他，她会因为李正和女区长邓华交谈工作而吃醋。文本为我们所构建的女政委鲁大姑不是一根筋的扁平人物，而是有着丰富情感的圆形人物。鲁大姑是我党革命女干部。她的形象如果出现在五十年代的文本中应该是政治清白，没有任何的污点，个人品质不能有任何的瑕疵，保持政治上绝对洁净，把个人情感全部提纯。一切个人污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然而在 2011 版的电视剧中却没有回避鲁大姑的个人污点，反倒是这些命运瑕疵让我们看到了人物的真实和可怜。究其原因就是当下政治环境宽松，影视剧中的角色就像现实中的人物一样，不再需要十全十美白玉无瑕的完人。人物的底色越复杂和多样在影视剧中的可塑性才越大，才越有戏，才可能生发出复杂的故事和丰富的感情，才能满足各种类型读者的需要。主人公不再是需仰视才见的神，而是我们生活中的甲乙丙丁。我们对这种人物不再陌生或间离而是与他们打成一片，就像是我们的邻居。他给我们带来共通性的感情，引起了我们感情的共鸣和通感。在“十七年时期”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毒草的因子”的爱情在这里没有缺席，而是保留并得以强化。“革命产生爱情”的模式在这里得以续写，爱情本是人类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放逐，这是正常的人性回归。

鲁大姑这一人物形象表征现实中的女性。当今时代，女人们不是生活中的弱者，她们也和男人们一样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行，同时她们比男人承担的更多，她们要生育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她们不再是事业中的配角，而是可以和男人一样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一个”。女性决不可被无情地驱除出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沦落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他者。影视剧中女性的复归，也算是现实中意欲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于女性的补偿。

小李九，女扮男装，一个行走在江湖上的小混混，她在戏中一出现，就把全车厢的钱包偷了个遍。她是鲁大姑的私生女，很小就离开了她。她和一帮兄弟组成“胶东帮”混迹于铁道的沿线，靠吃两条线为生。与枣庄本地的筷子会发生冲突，进行火并，两败

俱伤。被狡猾的鬼子特务松尾收并。小李九发现松尾不仅仅是个商人，还有其他更大的秘密，就暗中调查他，松尾发现以后便要派人暗杀她。后来小李九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恢复了女孩的装扮与铁道游击队的小坡成为了好朋友。从一开始的互相防范到逐渐的产生了感情。后来珍珍向鲁大姑说明了身世，母子相认。在小坡和鲁大姑的教导下和帮助下，珍珍在逐渐的成长，进入党的大学学习，成为了合格的八路军战士，故事圆圆满满的结局。

故事之所以这样讲述，一方面暗含着在旧的社会制度下，颠倒是非，把好人变成坏人，而一旦在党领导下的社会，她能矫正自己的错误，能够改过自新。同是也能满足在当今消费文化时代，以男性视域审视下的对女性的要求。那么女性真的解放了吗？

虽然小李九能够带着一群小混混在铁路上纵横驰骋，为所欲为。但是她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在场抑或不在场的男性权威在背后。这个权威最初是松尾，松尾把他们收编，她为松尾卖命。后来她与鲁大姑相认，她背后的那个男性的权威就变成了以党的代表女政委“鲁大姑”。（不是他的肉身母亲鲁大姑）。在鲁大姑这样一个女性的 *chrisma*^[372] 的教育训导下，成为了八路军的女战士。这种人物塑造方式实际上是男性中心意识和商业意识共谋的结果。对传统的女性形象进行了颠覆，以吸引观众的眼球，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如何塑形，为谁塑形？当然是手握电视遥控器的观众说了算，对于志在提高收视率，以获得高额收入的制片方来说，当然得顺应观众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女性就是在后现代时期大众文化抗战戏中木偶般的狂欢形象，终究不能逃脱男性的羁绊，身份不可能自由自在。

在这个“非常 5+1”的铁道游击队的谱系中，女性呈现了各种不同的性别想象特质。在小说中，芳林嫂是作家知侠根据数个鲁南妇女的形象杂取种种汇成一个。可以说，芳林嫂是鲁南妇女形象的典型代表。在 1956 版电影、1985 版电视剧中，芳林嫂保持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兰形象。在 1985 版电视剧中梅妮的形象则外化为被拯救的灰姑娘的形象，她在小坡的帮助下快速成长。而在 1995 版电影中，“嫂子”的形象倒像是啰里吧嗦的怨妇在喋喋不休地讲自己心中冤屈的祥林嫂。在 2005 版的“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女人们呈现出了二元对立即潘多拉和花木兰的对立。在 2011 版的狗尾续貂剧中，芳林嫂一如既往地 2005 年电视剧中的形象相似，而其他的人更表现为形象的双面性，她们身上不像原来的人那样的简单，她们形象的双面性也意味着“思想单一化”的时代已经远去。女性想象的多样性也是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变化和变革的结果。

本章试图对铁道游击队的谱系中的女性进行分类，当然这种分类方式从研究方法上

来看可能存在着某些问题。即便有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现也是建立在已经成文基础上的，如果不让这种错误从故纸堆里展露的话，可能这仅仅是一堆废纸了，同时这些文字的公开还能对意欲从这个角度研究的后来者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他们可以防止重蹈覆辙。

结语

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眼中艺术价值微不足道的《铁道游击队》在一个甲子的岁月流转中能有这么多故事，这可能连作家知侠也没有想到。小说前后历经七次修订，被改编成评书评话、歌剧舞剧、电影电视剧。在2014年的冬月，老树继续开新花，三部影视剧在2015年秋季将同时杀青，继续为“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献礼”。其改编形式之多是其他“十七年”任何文学作品都望尘莫及的。

与国家政治的曲折发展相似，《铁道游击队》也历经波折，在“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创作者们意欲表露的人性在主流的规训下隐遁舞台之后。作者对作品进行了语言文字、文学表达上的矫正和修订，同时对“少奇过路”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删除，以及后来的还原，以顺应主流的要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思想的鼓舞下，人性和情爱才羞答答粉墨登场，“英雄儿女”变成了“儿女情长”。同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启蒙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寻根文学，作家们从文化革命的痛楚中走了出来，他们试图从新的维度来为当时的中国开方问药，缓解时代的症候给中国人带来的苦痛，以探寻中国的发展之道，在同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影视剧作品。在今天仍然能耳熟能详，比如《渴望》《四世同堂》《上海滩》等。尽管“十七年”文学在当时不受待见，但不能阻碍人们的改编之风。比如1985版《铁道游击队》连续剧，导演们或许是出于自觉或许是出于响应“主流呼唤”进行创作的，尽管作品的影视效果还不精到，还有些粗糙，但仔细考量，其对于传统叙事方式做了很好的继承，比如悬念的设定，伏脉千里的设置，都是值得称道的。在九十年代出现的电影《飞虎队》无疑是向后现代致敬的作品，但她仍然将红色精神和理性进行了透彻的生发，仍然称得上是“主旋律”电影的佳作。

在二十一世纪以来这种创作的倾向更加地突出，在红色精神的主导下，继续凸显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复杂书写。小说改编的文本（电影、电视剧、歌剧、舞剧）等在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对话中寻找到自己诗意栖息的空间。2005版《铁道游击队》的改编，成为了红色经典改编的典范。在多家卫视播出后，收视率高居不下，百姓齐呼“铁道游击队又回来了”，同时还得到了主流的认可，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在剧情上，竭力再现小说内容，同时加入了衍生文本中的元素，使得故事情节合理历史逻辑清明，使其成为了“红色经典”改编的教科书。在2011版电视剧中，导演和编剧尽管一再声明是与2005版电视剧的无缝衔接，但仍然摆脱不了狗尾续貂的嫌疑。这是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所探究的一个要点。在探究这些现象的同时还试图解构作品与作品间的文本

间性，探究发生的时代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

同时论文还试图对女性形象进行了探究，女性的情感是细腻的，女性的角色定位在小说和影视剧中发生着变化，从灰姑娘向铁姑娘花木兰，从潘多拉向双面人物的转变。同时在论文的结尾还试图分析红色经典改编热潮的原因，是精英的退场、大众文化的积极跟进、大众的怀旧情绪的补偿还有主流意识形态默许。但无论何种原因，“红色经典”改编热还会继续，“红色经典”的改编还要既有温度又有高度，既有人文关怀又要振奋精神，既有思想情怀还要有政治内涵。

当下，文艺故事中蕴含的红色理性和红色精神，仍然肩负着社会的重任和主流的嘱托，仍然在义不容辞地形塑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从抽象的小说到具象的影视剧，《铁道游击队》们仍然能“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支撑我们的党和人民由一个胜利迎接下一个胜利。作品中渗透的精气神，也许正是本论文所寻之物，也或许是《铁道游击队》作品的盛行之道。

本论文对以上的方面进行了论证与书写，在写作的过程中《铁道游击队》又出现新气象：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各行各业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文艺界会更加敏感。在2014年的冬月，山东电视台在枣庄宣布：“自制剧《飞虎队》开拍”，传承红色精神，欲向经典致敬。

在2015年新年春节刚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内部创作会议上也有了改编《铁道游击队》电影的打算，将采用3D技术，启用“年轻的演员、年轻的明星、年轻的导演”。特邀成龙为武术指导，打造全新影片《铁道游击队》。

2015年的3月北京的一家民营电影公司在青岛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将以中美合作的方式高调复拍《铁道游击队》。请好莱坞的名导加盟做导演，请重量级一线演员，旨在打造商业大片。

《铁道游击队》将进入了三国混战时期：国企和民企哪家强；影和剧哪一种更胜一筹；“小鲜肉”老戏骨哪个更有戏；是外来“和尚”会念经还是本土“和尚”服水土，这都将是悬念。2015年的秋天，文艺界喜获丰收，必将好戏连台，烽火不断，呈现三国混战之势。

这三国鼎立之势，不仅给观众奉上视觉的盛宴，同时也给研究者们提供更多的素材。在本文中的研究过程中只能留下遗憾了。

同时需要指出来的是，“虽然本论文对1本小说和5部影视剧作品进行了剖析和论

述”，但这些作品建立起来的“铁道游击队”谱系还不够完善。“谱系”在英文中为 pedigree 或 ancestry。从词源学上来讲 ped =foot 足迹。Gree 是 grade 的缩写，走的意思。谱系是前人的一步一步的足迹的有序组合。铁道游击队的系列作品还非常丰富。比如连环画，“从 1954 年开始创作，到 1962 年出版完毕，历时九年。此后这套书再版了二十多次，印数累计达三千六百多万册，是连环画史上印量最大的作品”，并且在“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评为一等奖”，更是奠定了其经典的地位，有些人了解铁道队的故事就是从《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开始的。山东省京剧院创作排演的现代京剧《铁道游击队》获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一等奖；总政歌舞团编排的舞剧《铁道游击队》被评为国家文化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还有各类电视“解密节目”（包括崔永元的《电影传奇 微山湖上》以及《新电影传奇 铁道游击队》）（详见附录五），以及各类民间的艺人所改编的评书评剧等作品。当然也不能忘记吕其明创作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曲，在多版影视剧作品中作为主题曲，成为了铁道游击队的一枚徽章，成为了枣庄地区城市的外宣名片，也成为了枣庄“红色经典”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乐谱原稿，如今也被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了文物，成为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都是书写谱系时必不可少的家族成员。

以上这些问题有些是我在写作之前就想到的，有些是在研究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应该在本论文中一一地解决。但时间仓促，同时自己才疏学浅，对于跨艺术种类的作品把握总感觉力不从心。同时自己是一个喜欢扛机器拍片子搞创作的“专业硕士”，平时坐下来安静看看书是件很困难的事，但这几个月我也是拼了，我老老实实坐在书桌前书写这份家谱，同时算是给自己研究生学习生涯交上一份答卷，虽然不尽圆满。好在还会有机会，同时这也将是论文下一步进行论证和研究的突破点，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铁道游击队》系列老作品常读常新，新的改编也层出不穷，这就是经典作品的魅力。《铁道游击队》的改编续写在路上，研究也在路上，稍作停留欣赏下四月天，我将再度出发。

注释

- [1] 三红一创指的是《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四本小说。
- [2] 青山保林指的是《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四本小说。
- [3] 三火三花指的是《草原烽火》《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烈火中永生》六本小说。
- [4]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读书仅为4.3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中国是世界人均读书最少的国家之一。
- [5]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A]，见：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12-44.
- [6] 新华社. 刘知侠同志逝世[N]. 人民日报, 1991, 09(24):4
- [7] 2009年版的《辞海》突破了历次版本不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的惯例。2009年版增收了《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铁道游击队》《于无声处》《白鹿原》等作品。详见：张贺. 千锤百炼十年一剑——《辞海》第六版出版综述[N]. 人民日报, 2009, 12(09):4. 《辞海》中是这样对该词条定义的：“长篇小说。知侠作。1954年发表。抗日战争时期，鲁南临枣地区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他们斗洋行、打票车、扒铁路、拆炮楼、炸桥梁、夺物资，神出鬼没，出其不意，使日本侵略军惶惶不可终日。作品富有传奇色彩。”
- [8] 刘勇.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思考—兼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1).
- [9] 李杨.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367.
- [10] 周春霞. 解读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8.
- [11] 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6.
- [12] 周春霞. 解读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8.
- [13] 蓝爱国. 解构十七年[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
- [14] 蓝爱国. 解构十七年[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5.
- [15]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7:1-402.

- [16]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65.
- [17]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65.
- [18]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230.
- [19] 李茂民. 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20] 马立新. 红色理性与革命战争文学[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4.
- [21] 孙士生. 小说《红嫂》以及跨媒介传播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2.
- [22] 钱振文.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1-283.
- [23] 赵勇. 怎样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以《〈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一书为例[J]. 海口: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1).
- [24] 周春霞. 解读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
- [25] 姚丹. “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6] 林曼叔, 海枫, 程海. 《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第十章《军事文学》(大陆部分, 1949--1965), 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出版.
- [27] 南波. 《铁道游击队》读后[N]. 解放日报, 1954. 4(28).
- [28]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系统分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系统分会——中国当代百篇长篇小说评析[M].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0:25-29.
- [29]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系统分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系统分会——中国当代百篇长篇小说评析[M].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0:25-29.
- [30] 侯金镜. 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J]. 文艺报, 1958, (3).
- [31] 朱建伟, 宓晓文. 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J]. 新闻记者, 1992, (05).
- [32] 林小龙. 〈铁道游击队〉搬上屏幕得失[N]. 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6, 7(9).
- [33] 张扬. 明星“飞虎队”[J]. 大众电影, 1995, (05).
- [34] 洪流. 《飞虎队》得失谈——兼与电影《铁道游击队》比较[J]. 写作, 1997, 2.
- [35] 搜狐娱乐 2005 年连续剧播出时专门做了一个专栏, 其网址是.
http://yule.sohu.com/s2006/tdyjd/.
- [36] 导演王新民让〈铁道游击队〉变得更“武侠”[EB/OL]. 搜狐娱乐, 2005-10-8,
http://yule.sohu.com/20051018/n227231780.shtml
- [37] 林芳. 新《铁道游击队》浪漫多而凝重少[EB/OL]. 搜狐娱乐, 2005-9-8,
http://yule.sohu.com/20050908/n226899641.shtml.

- [38] 郝东智. 铁道游击队再现枣庄 编剧感言告别时代局限[EB/OL]. 搜狐娱乐, 2004-11-9, <http://yule.sohu.com/20041109/n222905979.shtml>.
- [39] 郝东智. <铁道游击队>将开机 导演让战斗片战斗起来[EB/OL]. 搜狐娱乐, 2004-11-8, <http://yule.sohu.com/20041108/n222878480.shtml>.
- [40] JH. <铁道游击队 2>不当“狗尾” 无缝对接成典范. [EB/OL]. 腾讯网, 2011-9-9, <http://ent.qq.com/a/20110909/000305.htm>.
- [41] 新华. 《铁道游击队 2》加了很多动作戏很像武侠剧[N]. 生活日报, 2011, 9(27).
- [42] 陶东风. 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10):31-48.
- [43] 以上观点散见于杂志和专著中, 其中陶东风先生对此给予了清晰的梳理, 详见:陶东风. 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M]. 中国比较文学, 2004(10):31-48.
- [44] 陈思和. 我不赞成“红色经典”的提法[N]. 南方周末, 2004, 5(4).
- [45] 刘康. 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 中国比较文学[J], 2003(1):38-52.
- [46] 景秀明. “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研究的反思及改编的再出发[J]. 当代电影, 2007(1):145-149.
- [47] 张法. “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读解[J]. 文艺研究, 2005(4):21-25.
- [48] 陶东风. 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10):31-48.
- [49] 余志平. 关于“红色经典”的几点思考.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2007(07):55-58.
- [50] 於曼. 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视剧[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1-220.
- [51] 王春艳. “红色经典”研究综述[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1):26-31.
- [52] 铁道游击队后人王金国讲述抗战历史警醒后人[EB/OL]. 齐鲁网. 201409(04). http://sd.ifeng.com/news/mr/detail_2014_09/04/2873240_0.shtml
- [53] 铁道游击队 烙在心底的传奇[EB/OL]. 齐鲁晚报. 201106(13). <http://news.iqilu.com/shandong/kejiaoshehui/20110613/487484.shtml>
- [54] 刘勇. 关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思考——兼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01.
- [55] 徐鹏绪、李广. 《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87.
- [56] [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98:212.

- [57] 李茂民. 文学理论的根本变革[J]. 东岳论丛, 2011(10):76-80.
- [58] 李茂民. 文化诗学的历史脉络与理论走向[J]. 山东社会科学, 2012(10):36-41.
- [59] 冠西. 最后的相聚—纪念刘知侠逝世两周年[N]. 人民日报, 1993, 07(02):8.
- [60]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291.
- [61]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279.
- [62]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304.
- [63]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534.
- [64]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256.
- [65]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256.
- [66] 姜蕙. 刘金山和《铁道游击队》. 大众电影, 1957(08):9-10
- [67]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256.
- [68]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509.
- [69]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509.
- [70] 上海抗日军政大学研究会暨校友联谊会编. 抗大校友回忆录选集(下册)[M], 1999:9.
- [71] 知侠. 我的第一篇小说——谈〈铺草〉的写作[A]. 见:刘知侠编著. 知侠文集 第2卷[M]. 青岛出版社, 2001:413.
- [72] 刘知侠. 知侠文集 第2卷[M]. 青岛出版社, 2001:40.
- [73] 知侠. 我的第一篇小说——谈〈铺草〉的写作[A]. 见:刘知侠编著. 知侠文集 第2卷[M]. 青岛出版社, 2001:29.
- [74]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502.
- [75]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510.
- [76] 知侠, 真骅. 黄昏雨[M]. 青岛出版社, 1994(570).
- [77]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32).
- [78] 阿诺·理德. 美学译文第1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90).
- [79] 1945年知侠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以《铁道队》为题, 在《山东文化》第二卷第三、四期上发表了《直性汉怒打马夫》《砸宪兵二次闯祸》《运兵车走英雄》《拉队伍货房抢枪》《朱大车深夜谈英雄》《抢机枪迫打副司令》《打四门子久遭难》等小说的7个章节; 1947年2月在《山东文化》第五卷一、二期上又发表了《铁道队》中《李政委和他的部下》等。这些作品因受真人真事的局限, 艺术上还比较粗疏, 但却有着十分朴实逼真的生活感。见: 傅冰甲. 刘知侠的生平和创作事略[A]. 见: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山东文史集粹 文化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120-127.

- [80]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11.
- [81]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20.
- [82]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02.
- [83]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02-503.
- [84]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00.
- [85]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08.
- [86] 欧阳山. 我的检讨[N]. 南方日报, 1952, 02(6).
- [87] 中央党史研究室, 揭秘: 1952年“三反”运动中的纪检成就. [EB/OL]. 2014. 12. 16. 人民网
<http://ah.people.com.cn/n/2014/1216/c358327-23243950.html>.
- [88] “皇宫”照相馆, 济南的老字号, 现在尚存, 尽管生意大不如前。在济南老商埠区, 经三路上, 中山公园北门东侧路南。由于在济南求学, 近距离的考察了它。具体详情见附录九。
- [89] 读者来信[N]. 人民日报, 1952, 02(11):2.
- [90] 几个文艺爱好者. 进一步揭发山东省文联存在的问题 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参加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和思想改造运动[N]. 人民日报, 1952, (02)27:6.
- [91] 三反运动[EB/OL]. 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11762.html>.
- [92] 王希坚. 真正的战士[J]. 时代文学. 1991(6).
- [93] 阮若珊. 忆知侠[A]. 见: 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编. 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中册)[M]: 535
- [94] 曲波: 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J], 山东文学, 1981(10).
- [95] 姚丹. “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38.
- [96] 这是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呼吁作家们的讲话。周扬. 新的人民的文艺[A]. 人民文学创刊号, 1949(10), 见: 周扬. 周扬文集第1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512—513.
- [97] 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 1962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 文章指出了这段话。见: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N]. 人民日报, 1962, 5(23):1.
- [98] 梁启超. 新民说[A], 见: 李华兴, 吴嘉勋编. 梁启超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 [99]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418.
- [100] 周扬. 周扬文集第1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259.
- [101] 周扬. 周扬文集第2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240.
- [102] 邵荃麟. 文学十年[M]. 作家出版社, 1960:210.
- [103] 梁斌. 红旗谱[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04] 金敬迈. 欧阳海之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6: 439.
- [105]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500.
- [106] 护送陈毅过岗楼 [EB/OL]. 中青在线, 2005-08-10
<http://bjyouth.yinet.com/3.1/0508/11/1085727.html>.
- [107] 宋剑华. 艺术拯救历史的经典文本[J]. 广东社会科学. 2011 (2) , 175-181.
- [108] 杜季伟. 到铁道游击队去[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山东: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8.
- [109] 杜季伟.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A]. 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 星火燎原选编之五[M]. 战士出版社, 1981: 12.
- [110] 杜季伟. 关于铁道游击队发展壮大的片段回忆[A]. 见: 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淄博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合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M], 1985:215-230.
- [111] 杜季伟王志胜. 鲁南铁道游击队[A], 见: 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微山党史资料 第四辑[M], 1986: 89--98.
- [112] 杜季伟. 到铁道游击队去[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山东: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8.
- [113] 王志胜. 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鲁南铁道大队纪实[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43.
- [114] 王志胜. 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文史集粹·革命斗争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166-180.
- [115] 在枣庄东湖公园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中这一任命书被做成了仿旧的宣传展板挂在墙上供人观看。
- [116] 杜季伟. 到铁道游击队去[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山东: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8.
- [117] 杜季伟. 鲁南铁道队的创建与发展[A]. 见: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2-10.

- [118] 杜季伟. 鲁南铁道队战斗生活片段. 见: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38-47.
- [119] 杜季伟. 铁道游击队战斗生活片段[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 鲁南峰影 (上册) [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9: 185-204.
- [120] 杜季伟.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A]. 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 星火燎原选编之五[M]. 战士出版社. 1981: 12.
- [121] 杜季伟. 关于铁道游击队发展壮大的片段回忆[A]. 见: 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淄博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合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工人运动史料选编 (上册) [M], 1985:215--230.
- [122] 王志胜. 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文史集粹·革命斗争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166-180.
- [123] 王志胜. 铁道游击队与齐鲁支队[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8: 308-314.
- [124] 陈慈林整理赵明伟口述. “飞虎队传奇” [N]. 杭州日报, 2009, 9(23).
- [125] 杜季伟. 鲁南铁道队的创建与发展[A]. 见: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2-10.
- [126] 杜季伟. 关于铁道游击队发展壮大的片段回忆[A]. 见: 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淄博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合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工人运动史料选编 (上册) [M], 1985:215--230.
- [127] 王志胜. 铁道游击队与齐鲁支队[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308-314.
- [128] 王志胜. 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鲁南铁道大队纪实[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43.
- [129] 王志胜. 初创鲁南铁道队[A]. 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枣庄市市中区文史第1辑[M], 1991:10.
- [130] 杜季伟. 到铁道游击队去[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山东: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304.
- [131] 杜季伟. 回忆在铁道游击队的政治工作[A], 见: 济南铁路总工会工运史编写组. 济南铁路工运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1985:109.
- [132] 王志胜. 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文史集粹·革命斗争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166-180.

- [133] 王志胜: 忆鲁南铁道队的战斗历程[A], 见: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26-37.
- [134] 这一资料来源于山东省档案馆馆藏 G028-01-0037-003, 见: 高扩. “抓煤老道”变身抗日英豪 档案还原真实的铁道游击队[J]. 齐鲁晚报, 2014, 09 (09).
- [135] 这一资料来源于山东省档案馆馆藏 G028-01-0037-003, 见: 高扩. “抓煤老道”变身抗日英豪 档案还原真实的铁道游击队[J]. 齐鲁晚报, 2014, 09 (09).
- [136] 王志胜. 忆鲁南铁道队的战斗历程[A]. 见: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26-37.
- [137]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山东文史集粹 (修订本) (上集) [M].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427
- [138] 王志胜. 忆鲁南铁道队的战斗历程[A]. 见: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26-37.
- [139] 王志胜. 铁道游击队与齐鲁支队[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8: 308-314.
- [140]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团旗为什么这样红[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1:100.
- [141] 王志胜. 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26-37.
- [142] 王志胜. 铁道游击队与齐鲁支队[A]. 见: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 [M]. 山东: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308-314.
- [143] 王志胜. 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文史集粹·革命斗争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166-180.
- [144] 杜季伟.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A]. 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 星火燎原选编之五[M]. 战士出版社. 1981: 405
- [145] 杜季伟: 到铁道游击队去[A], 见: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305.
- [146] 杜季伟. 铁道游击队的年轻人[A].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团旗为什么这样红[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1:95-110.
- [147] 杜季伟. 铁道游击队的年轻人[A].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团旗为什么这样红[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1:95-110.
- [148] 杜季伟. 关于铁道游击队发展壮大的片段回忆[A]. 见: 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 淄博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合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
[M], 1985:215--230.
- [149]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山东史志资料 一九八五年第二辑（总第9辑）[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27.
- [150] 杜季伟. 鲁南铁道队战斗生活片段[A]. 见：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05：38-47.
- [151] 杜季伟. 关于铁道游击队发展壮大的片段回忆[A]. 见：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淄博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合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
[M], 1985:215--230.
- [152] 知侠. 铁道游击队. 人民文学出版社[M], 2009:131.
- [153] 杜季伟. 关于铁道游击队发展壮大的片段回忆[A]. 见：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淄博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合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
[M], 1985:215--230.
- [15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八路军回忆史料（2）[M]. 北京：解放军
出版社, 1989：449.
- [155] 本文系根据济南军区大百科全书编辑室、枣庄市志办公室提供的两份材料整理而
成。两份材料的作者杜季伟王志胜都是原鲁南铁道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文章涉及的主要
事件均为他们的亲身经历。个别地方，我们在整理时又根据文献材料作了考订。原载《山
东史志资料》一九八五年第二辑，杜季伟王志胜. 鲁南铁道游击队[A]，见：中共微山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微山党史资料 第四辑[M], 1986：89--98.
- [156] 王志胜. 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文史集
粹·革命斗争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166-180.
- [157] 王志胜. 铁道游击队与齐鲁支队[A]. 见：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8：308-314.
- [158] 杜季伟. 到铁道游击队去[A]. 见：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山东：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8.
- [159]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文史集粹 革命斗争卷[M]. 山东人民出版
社, 1993:176.
- [160] 日军的一个小队大约四十余人; 马国藩. 南官庄全歼日军小队纪实[A]，写道“一九
三九年一月，我八路军游击一团二营刚刚成立不久，在首战山西省洪洞县南官庄村日军时，
以大刀等简陋武器，全歼日军一个小队四十余人，博得当地群众的赞誉”，见：云南省军

- 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难忘的八年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M], 1985:87.
- [161] 杜季伟.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A]. 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 星火燎原选编之五[M]. 战士出版社, 1981: 408.
- [162] 知侠. 铁道游击队. 人民文学出版社[M], 2009:145-146.
- [163]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山东史志资料一九八五年第二辑(总第9辑)[M].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28.
- [164] 杜季伟. 关于铁道游击队发展壮大的片段回忆[A]. 见: 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淄博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合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M], 1985:215-230.
- [165] 杜季伟. 铁道游击队的年轻人[A]. 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团旗为什么这样红[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1:95-110.
- [166] 杜季伟. 鲁南铁道队的创建与发展[A]. 见: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2-10.
- [167] 杜季伟. 鲁南铁道队的创建与发展[A]. 见: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2-10.
- [168] 杜季伟. 铁道游击队的年轻人[A]. 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团旗为什么这样红[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1:95-110.
- [169] 杜季伟. 铁道游击队战斗生活片段[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 鲁南峰影(上册)[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9: 185-204.
- [170] 王志胜. 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鲁南铁道大队纪实[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33.
- [171]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北京青年报编. 我的见证[M].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294.
- [172] 马世田. 截列车沙沟搞布匹[M],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鲁南铁道大队纪实.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223.
- [173] “这批布运往山里, 解决了一个军区、三个军分区部队的冬装问题, 还剩余一些花色布, 分给了群众”, 王志胜. 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鲁南铁道大队纪实[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26-37.
- [174] 王志胜. 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A]. 见: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鲁南铁道大队纪实[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26-37.
- [175] 杜季伟. 鲁南铁道队的创建与发展[A]. 见: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2-10.

- [176] 杜季伟. 关于铁道游击队发展壮大的片段回忆[A]. 见: 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淄博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合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M], 1985:215-230.
- [177]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山东史志资料一九八五年第二辑(总第9辑)[M].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28.
- [178]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枣庄市出版办公室. 鲁南峰影(上册)[M].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9:170.
- [179]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16.
- [180] 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微山党史资料第四辑[M], 1986:104.
- [181] 《铁道游击队》山东枣庄寻主角 探寻“芳林嫂”不为人知的秘密[EB/OL]. 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cn/c/2005-08-18/16307534148.shtml>. 转引自 2005 年 08 月 18 日《辽沈晚报》.
- [182]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25.
- [183]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10.
- [184] 赵明. 剧影浮沉录[M]. 北京: 天津出版社, 1991: 146.
- [185] 宋剑华. 艺术拯救历史的经典文本[J]. 广东社会科学. 2011(2), 175-181.
- [186] 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微山党史资料第四辑[M], 1986:97.
- [187]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10.
- [188]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36.
- [189]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24.
- [190]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 鲁南峰影(上册)[M],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9:184
- [192] 铁道队所同意的日军的三条意见是: 一, 保证护送日军到华北, 二, 日军的東西(除武器外)全带走, 三、允许日军携带自己的防身武器(指剃刀, 指挥刀)。”见: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微山党史资料 第四辑[M], 1986:104.
- [193] 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微山党史资料第四辑[M], 1986:111.
- [194] 傅永顺. 铁道游击队中的日本人[A]. 见:政协枣庄市薛城区委员会编. 铁道游击队在薛城[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35.

- [195] 一个日兵俘虏写给刘金山的信，改编成了文章《一位日籍队员的信》，见：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鲁南铁道大队纪实[M].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453.
- [196]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 民族英雄与日月争辉[M].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59:84.
- [197]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 民族英雄与日月争辉[M].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59:92.
- [198] 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91.
- [199] 薛城区政协. 薛城文史（第一辑）创刊号, 1986:104-121
- [200]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 鲁南峰影（上册）[M].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9:173.
- [201]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鲁南铁道大队纪实[M].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171.
- [20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第32辑[M].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61.
- [203]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424.
- [204]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423.
- [205] 傅冰甲. 刘知侠的生平和创作事略[A]. 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山东文史集粹文化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120-127.
- [206]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427.
- [207]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427.
- [208]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19.
- [209]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19.
- [210]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433.
- [211] 知侠.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M]. 青岛出版社, 1990:452.
- [212]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20.
- [213] 枣庄煤矿重新出煤, 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回矿工作. 解放日报, 1957. 12(2):1
- [214] 邱沛篁, 吴信训, 向纯武等.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01
- [215] 编者的话. 读书(创刊号), 1955年
- [216] 澎. 从印数看“厚古薄今”倾向. 读书, 1958(09)
- [217] 说明 A: 未得到一手版权页，印数是根据 1、3 印的版权页提供数据推算的；B: 未得到一手版权页，印数是根据 5、7 印的版权页提供数据推算的；这里除了 2 印和 6 印，我通过不同的渠道看到了它们的版权页，并保存了照片。

[218] 1953年11月陈云提议新币与旧币比价定为一比一万较为^{合适}。中共中央吸收了陈云的这个提议，在《中共中央关于发行新币的指示》中指出：“新币与现行人民币的比价，确定为新币一元等于现行人民币一万元资料。见：赵学军. 陈云与1955年人民币新币的发行[J]. 中共党史研究资料, 2005, (04).

[219] 1949年12月27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九次常务会议讨论全国邮政会议报告，决议：“调整邮资，归财委掌握。邮资：平信每重20公分以小米12两为标准，于物价涨落超过20%到25%时调整之。”1950年1月13日政务院会议决定：“中财委核准邮资国内平信（本外埠一律）以小米12两为标准，按物价涨落，随时呈请调整，至多不使落后25%。现华东平信每件400元，其他区300元，一律先调整为500元。”1950年元旦，全国邮政总局成立。1月10日实行国内平信每重20公分邮资500元；2月1日调整为800元；3月改以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分的40%为标准，调整为1000元。以后物价开始稳定。5月10日，国内平信邮资又从1000元降为800元。1955年3月币制改革（人民币新币值与旧币值的比例为1:100000），国内平信邮资改为8分，从那时起一直实行到1990年。

[220] 多读好书多读反应现实的作品. 读书, 1958(05). 《图书情报词典》指出：“拒借”是指读者未能借到符合图书情报机构馆藏特色的文献。又指出“拒绝率”又称“拒借率”。它是某一图书情报机构的读者在一定时期内未借到的文献数量占其全部合理借阅文献要求数量的比率。

[221] 龚奎林. “故事”的多重讲述与大众化文艺[D]. 郑州：河南大学，2009:101.

[222] 龚奎林. “故事”的多重讲述与大众化文艺[D]. 郑州：河南大学，2009:89.

[223] 该系列丛书由著名装帧家钱君匋设计装帧，出版时间1958-1962年，图书全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具体图书详情见附录六。

[224]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1977：610.

[225]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78：618.

[226] 2009年版的《辞海》突破了历次版本不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的惯例，本版增收了《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铁道游击队》《于无声处》《白鹿原》等作品。详见：张贺. 千锤百炼十年一剑——《辞海》第六版出版综述. 人民日报, 2009, 12(09):4

[227] 说明：这里的出版以及印数情况是极其不完整的，选用了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的版权页官方数据，其他出版社借版印刷的没有涵盖进去。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掌握的各个版本的版权页，然后进行了统计汇总。另外在“孔夫子旧书网”我淘到了一份卖家自称是作者知侠统计的《铁道游击队》印数的清单，虽然该清单的真实性不确定，但经

过考证也有些价值，详情见附录三。

[228]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4: 173-193.

[229] 知侠. 列车上的战斗[J]. 解放军文艺, 1953, 7: 54-62.

[230]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4: 173-193

[231]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4: 173-193

[232] 转引自 <http://www.iciba.com/皇军>

[233] 白刃. 抗战故事. 见白刃. 白刃文

集. [EB/OL]<http://www.zddmt-br.cn/index1110.html>.

[234] 知侠. 铁道游击队（普及本）[M].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5: 146.

[235] 知侠. 铁道游击队（普及本）[M].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5: 125.

[236] 辨别“香花毒草”有六条政治标准, 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主要内容为: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而不是分裂人民; 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而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 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 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这六条“六有六不”的标准中, 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 提出这些标准, 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 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结合这六条标准, 在今天我们重新阅读《铁道游击队》小说真的不知道触犯了哪条标准, 不过欲加其罪, 何患无辞。

[237] 湖北省图书馆编. 批判毒草小说文选[M], 1971:234.

[238] 湖北省图书馆编. 批判毒草小说文选[M], 1971:245.

[239] 吴大琴著. 土地整理[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4:19.

[240] 知侠. 铁道游击队（收获创作丛书）（下）[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709. 或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6: 525.

[241] 吴大琴著. 土地整理[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4:17.

[242]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561. 被删除的文字, 见: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6: 524-530. 在下一版本中被复原的文字, 见: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563-568.

[243]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115.

[244]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6: 189.

- [245] 金宏宇. 新文学版本之“九页”[J]. 人文杂志, 2006(6):103-107.
- [246] 金宏宇. 新文学版本之“九页”[J]. 人文杂志, 2006(6):103-107.
- [247] 1988年热奈特在《普鲁斯特副文本》一文中, 将副文本称为“文本周围的旁注或补充材料”, 由作者和编辑的门槛(如题目、插入材料、献辞、题记、前言和注释等)、与传媒相关的门槛(如作者访谈、正式概要等)、与生产和接受相关的门槛(如组合、片段等), 以及私人门槛(如信函、有意或无意的流露等)等各种“门槛”组成。文本门槛内外的规则有所不同, 进入了门槛门外面的规则就被颠覆, 里面的新规则就要起作用。副文本在文本中, 即是要标出文本和非文本间的过渡区和交易区。见: 李玮. 论新闻副文本对新闻收受与解释的影响[J]. 新闻界, 2014(01):23-27
- [248] 金宏宇. 新文学版本之“九页”[J]. 人文杂志, 2006(6):103-107.
- [249] 马立新. 红色理性与革命战争文学[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4.
- [250] 这里提到的《铁道游击队》小说引言是1954年1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9月第5次印刷的版本, 之前印刷的小说是否有引言我还没有掌握。
- [251]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610.
- [252] 若望. 也谈买书[N]. 人民日报, 1956, 11(2).
- [253] 张国华. 千篇一律的内容提要[N]. 人民日报, 1956, 7(25).
- [254] 成志伟. “内容提要”和“人物表”[N]. 人民日报, 1962, 9(21).
- [255] 夏振文. 写好长篇小说的“内容提要”[N]. 人民日报, 1959, 5(12):7.
- [256] 夏振文. 写好长篇小说的“内容提要”[N]. 人民日报, 1959, 5(12):7.
- [257] 夏振文. 写好长篇小说的“内容提要”[N]. 人民日报, 1959, 5(12):7.
- [258] 格拉塞尔. 马克思的工作方法[N]. 人民日报, 1953, 3(14):3.
- [259] 新华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成都视察 对出版发行工作提出许多建议[N]. 人民日报, 1956, 12(18):4.
- [260] 格雷马斯在研究人物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行动元”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一种结构单位, 是指文学作品中的主要行动因素, 通常是文中的角色, 也可以是某种抽象力量或关系, 用于表明人物之间、人物与客体之间的行动关系, 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推动情节的发展。在人物行动元类型中, 他提出了三组对立的行动元模式: 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帮助者/敌对者。并且运用结构主义思维, 以二元论的方式对行动元的原型进行语法的重组, 为叙事文本设计出一个“行动元模型”, 见: 李广仓.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6, 4: 201。上面的文字用以解释这一原理也许晦涩, 学者李茂民先生的解释则清明透彻的多: 他在专著中指出, “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讲述的

是同一个故事：主人公在帮手的帮助下，争取中间人物，与对手展开斗争，最终遭到失败或者取得成功。”见：李茂民. 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3.

[261] 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M],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96.

[262] 维特根斯坦, 陈嘉映译. 哲学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13.

[263] 岳洪治. 也谈图书的封面装帧[N]. 人民日报, 1991. 04(15):8.

[264] 丁贵池. 应注意书籍的封面装帧和插画[N]. 人民日报, 1953, 04(13).

[265] 人民日报. 关于改进文学书籍插图和封面设计工作的座谈会记录[N]. 人民日报, 1953, 06(23):3.

[266] 浩泯. 书籍插图的百花齐放[N]. 人民日报, 1961, 8(26).

[267] 岳洪治. 也谈图书的封面装帧[N]. 人民日报, 1991, 4(15):8.

[268]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140.

[269]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收获创作图书”具体书目见附录六。

[270]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文艺文学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 1977.

[271] 创作人员具体信息见附录八.

[272] 《飞虎队》电影是由峨眉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香港永盛影业公司联合出品的.

[273] 电视剧《飞虎队》开机 重塑“铁道游击队” [EB/OL]. 搜狐娱乐, 2014-11-17.

<http://yule.sohu.com/20141117/n406100846.shtml>.

[274] 具体网址详见 <http://dy.chinasarft.gov.cn/shanty.deploy/blueprint.nsp?id=014c5a50949629cd402881a74c4b68ea&templateId=012a2e051030004740284c812a2d62df>

[275] 电影《铁道游击队》拍摄往事, 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35c3550100fo5g.html.

[276]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34.

[277] 荧屏上的山东抗战: 大刀, 向鬼子头上砍去[EB/OL]. 胶东在线, 2005-08-15.

<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5/08/15/000756290.shtml>.

[278] 秦怡:周总理称为最美丽女性. 大揭秘. 湖北卫视, 20150226, 视频详见:

http://www.iqiyi.com/v_19rro0hz78.html

[279] 电影《铁道游击队》拍摄往事, 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35c3550100fo5g.html

[280] 贺雅佳. 秦怡: 拍片捂出的痂子, 长了一辈子. 新快报, 2011, 05(20).

[281] 电影《铁道游击队》拍摄往事, 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35c3550100fo5g.html

[282] 创作者信息见附录八

[283] 荧屏上的山东抗战: 大刀, 向鬼子头上砍去[EB/OL]. 胶东在线, 2005-08-15.

<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5/08/15/000756290.shtml>.

[284] 荧屏上的山东抗战: 大刀, 向鬼子头上砍去[EB/OL]. 胶东在线, 2005-08-15.

<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5/08/15/000756290.shtml>

[285] 贺雅佳. 秦怡: 拍片捂出的痂子, 长了一辈子. 新快报, 2011, 05 (20) .

[286]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即“金凤凰奖”(China Film Society Of Performing Art Award), 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批准, 由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主办的极具权威性和专业性的评奖活动, 在中国电影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专业性和广泛影响力。“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突出“德艺双馨”的评奖宗旨, 它的评委全部由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的专家组成, 旨在从专业的角度, 鼓励和督促全国的优秀电影演员继续进步。第10届金凤凰奖获奖名单于2005年在山东省日照市举办。那次的奖项中共评选出了终生成就奖4人, 陈强、于兰、孙道临和秦怡; 特别荣誉奖8人, 沙莉、冯奇、管宗祥、师伟、庞学勤、曹会渠、刘世龙等。其中, 参加过铁道游击队演出的演员中在这一次的评选奖中就有三个人获奖, 他们是秦怡、冯奇和曹会渠。

[287] 赵明. 剧影浮沉录. 北京: 文津出版社, 1991(146)

[288] 袁成亮. 电影《铁道游击队》诞生始末[EB/OL]. 人民网, 2010-03-19.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1175633.html>

[289] 袁成亮. 电影《铁道游击队》诞生始末[EB/OL]. 人民网, 2010-03-19.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1175633.html>

[290] 姜蕙. 刘金山和《铁道游击队》. 大众电影, 1957 (08): 9-10

[291] 湖北卫视在20150227节目《铁道游击队大揭秘》中对这个拍摄的细节进行详细的介绍。网址是:

<http://v.ifeng.com/history/lishijiemi/201502/01595ecc-c165-420b-b05f-77b0d28f28dd.shtml>

[292] 荧屏上的山东抗战: 大刀, 向鬼子头上砍去[EB/OL]. 胶东在线, 2005-08-15.

<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5/08/15/000756290.shtml>

[293] 同上

[294] 同上

- [295] 秦怡. 秦怡: 拍片捂出的痂子长了一辈子[N]. 新快报, 2011, 5 (10)
- [296] 唐明生. 跨越世纪的美丽: 秦怡传[M].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1-284
- [297] 荧屏上的山东抗战: 大刀, 向鬼子头上砍去[EB/OL]. 胶东在线, 2005-08-15.
<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5/08/15/000756290.shtml>
- [298] 王晓梅. 《人民日报》在“批判《武训传》运动”中的作用[J]. 新闻大学, 2010(03):46-57
- [299]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7:87,
- [300]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7:88,
- [301]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7: 32-33.
- [302] 钱谷融. 论“文学是人学”[J]. 文艺月报, 1957, 5: 12.
- [303] 巴人. 论人情[J]. 新港, 1957, (1): 8.
- [304] 竹马. 铁道游击队[J]. 现代语文《文学评论版》, 2005, (11).
- [305] 刘璇. 铁道游击队: 激情燃烧的不老传奇 ——关于一个抗战文艺主题的梳理和记忆[N]. 解放军报, 2010, 8(13).
- [306] 俞亮鑫. 牛娜和芳林嫂[J]. 大众电视, 1986(09):10.
- [307] 胡春帆. 永不磨灭的记忆[J]. 中州古今, 1985, (7) .
- [308] 于军波. 小城建起开发区[N]. 人民日报, 1992, 11(04): 3.
- [309] 据《改革开放 30 年枣庄进程大事记》记载: “1986 年 6 月 26 日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在本市首映。由上影电视部、上海影视公司和《新民晚报》读者服务部联合摄制的 12 集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首映式在枣庄宾馆举行。”资料来源:
<http://bbs.iqilu.com/thread-533091-1-1.html>
- [310] 该版本的电视剧散见在网络上还有 14 集和 16 集两个版本.
- [311] 创作者信息见附录八.
- [312] 俞亮鑫. 牛娜和芳林嫂[J]. 大众电视, 1986(09):10.
- [313]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24-25.
- [314]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7
- [315] 成志伟. 荧屏上的艺术之花[J]. 大众电影, 1995(09):20.
- [316] 成志伟. 荧屏上的艺术之花[J]. 大众电影, 1995(09):20.
- [317] 朱建伟, 宓晓文. 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J]. 新闻记者, 1992, (05)
- [318] 朱建伟, 宓晓文. 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J]. 新闻记者, 1992, (05)
- [319] 刘璇. 铁道游击队: 激情燃烧的不老传奇 ——关于一个抗战文艺主题的梳理和记忆

- [N]. 解放军报, 2010, 8(13).
- [320] 黎平. 一个电影导演的艺术道路——记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冀邢[J]. 《电影作品》(成都), 1995(03): 70-72
- [321] 黎平. 一个电影导演的艺术道路——记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冀邢[J]. 《电影作品》(成都), 1995(03): 70-72
- [322] 黎平. 一个电影导演的艺术道路——记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冀邢[J]. 《电影作品》(成都), 1995(03): 70-72
- [323] 上篇报道, 陈庆恒 扈爱民. 铁道游击队将再上银幕[N]. 人民日报, 1995. 02(27). 下篇报道, 文中省略号引者加, 详见: 向兵. '95 中国影坛亮丽多彩[N]. 人民日报, 1995. 02(28)
- [324] 《飞虎队》电影是由峨眉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香港永盛影业公司联合出品的。
- [325] 赵明. 几点说明——写在《铁道游击队》上映之后[J]. 大众电影, 1957(08): 8
- [326]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61.
- [327]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63.
- [328] 中共薛城区委党史研究室. 铁道游击队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141.
- [329] 中共薛城区委党史研究室. 铁道游击队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468.
- [330] 甘文瑾. 〈铁道游击队〉让战斗片真正“动”起来[J]. 中国电影报, 2005, 08(25)
- [331] 赵楠楠. 新《铁道游击队》武侠味重[N]. 京华时报, 2005, 9(03): 25.
- [332] 导演王新民让《铁道游击队》变得更“武侠”[EB/OL]. 搜狐娱乐, 2005-10-18. <http://yule.sohu.com/20051018/n227231780.shtml>.
- [333] 导演王新民让《铁道游击队》变得更“武侠”[EB/OL]. 搜狐娱乐, 2005-10-18. <http://yule.sohu.com/20051018/n227231780.shtml>.
- [334] 铁道游击队[EB/OL]. 光明网, 2010-09-01, http://www.gmw.cn/content/2010-09/01/content_1236469.htm.
- [335] 江西电视台. 电视剧新版《铁道游击队》里演员大耍真功夫[EB/OL]. 江西广电网 2005-08-17. <http://www.jxgdw.com/news/ylxw/2005-08-17/3000060011.html>.
- [336] 导演王新民让《铁道游击队》变得更“武侠”[EB/OL]. 搜狐娱乐, 2005-10-18. <http://yule.sohu.com/20051018/n227231780.shtml>.
- [337] 导演王新民让《铁道游击队》变得更“武侠”[EB/OL]. 搜狐娱乐, 2005-10-18. <http://yule.sohu.com/20051018/n227231780.shtml>.
- [338] 电视剧《铁道游击队》正拍 新“飞虎队”大耍功夫. 新闻晨报, 详见: 电视剧《铁

道游击队》正拍 新“飞虎队”大耍功夫 .[EB/OL] .新华网, 2005-01-19.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 /2005-01/19/content_2479173.htm

[339] 电视剧《铁道游击队》正拍 新“飞虎队”大耍功夫 .新闻晨报 , 详见: 电视剧《铁道游击队》正拍 新“飞虎队”大耍功夫 .[EB/OL] .新华网, 2005-01-19.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 /2005-01/19/content_2479173.htm

[340] 刘澍. 秦怡一辉煌于银幕挣扎在婚姻. 大众电影[J], 2003, (1).

[341]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23.

[342] 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EB/OL].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598/57524.shtml>

[343] 李茂民. 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182.

[344] 张宗伟. 一起事先张扬的文化事件: 透视红色经典改编[J]. 当代电影. 2007(1).

[345] 孙成香. 黄石名编剧胡燕怀执笔《铁道游击队 2》[N]. 东楚晚报, 2011-1-22.

[346] 导演王新民亲抓剧本 《铁道游击队 2》可拍性增强[EB/OL]. 新华网. 2010-06-28.

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10-06/28/c_12272602.htm.

[347] 这段文字就是本剧的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中内容提要省略的部分, 被我引用在此.

[348] 该拍摄制作备案详见:

<http://dsj.sarft.gov.cn/tims/site/views/applications/note/ noteTable.shanty?id=01282303be420b2c4028e4a12804c267>.

[349] 这一要求是, 剧名、制作单位和剧集变更必须上报, 并在广电总局官网上公布。“请各级电视剧管理部门据此备案核查, 加强规范管理, 杜绝违规行为, 并负责将此件转发所属的电视剧制作、播出机构, 以备验查、选片, 并请各级管理部门遵照总局要求每月如期报备。”

[350] 这次变更的详情, 见 <http://dsj.sarft.gov.cn/tims/site/views/applications /changing/view.shanty?appName =changing&id=012f103b344d0d85402881a22ed7cd65>.

[351] 这次变更的详情, 见 <http://dsj.sarft.gov.cn/tims/site/views/applications /changing/view.shanty?appName =changing&id=01304511426904c1402881a2302aa265>.

[352] 李洁采访《铁道游击队战后篇》总编剧胡燕怀: 人生易老[EB/OL]. 黄石电视台李洁博客, 2011-10-1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6ace40100ujww.html.

[353] 李洁采访《铁道游击队战后篇》总编剧胡燕怀: 人生易老[EB/OL]. 黄石电视台李洁博客, 2011-10-1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6ace40100ujww.html.

- [354] 《铁1》指2005版《铁道游击队》，《铁2》指2011版《铁道游击队》暨《铁道游击队——战后篇》，本文同。
- [355] 《铁道游击队2》不当“狗尾”无缝对接成典范.[EB/OL]. 新浪网, 2011-09-09 <http://ent.sina.com.cn/v/m/2011-09-09/14403412454.shtml>
- [356] “卡里斯马”是英语单词 charisma 的音译, 指的是有神帮助的人物, 有着非凡的魅力和领袖气质的领袖。
- [357]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163.
- [358] 《铁道游击队》山东枣庄寻主角 探寻“芳林嫂”不为人知的秘密[EB/OL]. 腾讯视频, 2014-09-11, <http://v.qq.com/cover/i/i7yxhjk5foi5k6/e0015bvjmcm.html>。文字详情见附录七。
- [359]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517.
- [360] 朱海波等. 微山湖上的抗日侠女——访电影《游击队》中芳林嫂原型吕英[M]. 中国民兵. 2006, (01).
- [361]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517.
- [362]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515.
- [363]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516.
- [364]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527.
- [365]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550.
- [366] 杨新会. 因为真实所以感动[N]. 生活日报, 2004, 11(09).
- [367] 龚金平.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J]. 兰州学刊, 2007, 11.
- [368] 龚金平.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J]. 兰州学刊, 2007, 11.
- [369] 唐明生. 跨越世纪的美丽: 秦怡传[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1-284.
- [370] 赵明. 剧影浮沉录[M]. 北京: 文津出版社, 1991: 146.
- [371] 知侠. 铁道游击队[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331.
- [372] “charisma”的汉语翻译叫做“卡里斯马”, 指的是有神帮助的人物, 有着非凡的魅力和领袖气质的领袖。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研究生冷少丽论文中专门有章节论述, 她的论述对本论文有用故引用如下: “‘卡里斯马’(Charisma)一词来源于西方, 它原来是早期基督教语汇, 本义是神圣的天赋, 意思是因蒙受神恩而获得的天赋, 主要指有神助的人物, 即能够得到神帮助的超常人物, 它是一切富于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个人领导的根源,

也可引译为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领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探讨现代西方合法性统治权威时进行分类，并将其称为卡里斯马式权威。韦伯在其著作中写道，“他超然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视为具有超自然的、超人的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品质”。而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Shils）进一步引申了卡里斯马的含义，不仅仅那些特殊人物，更宽泛地指社会中一系列行为模式，角色、作用、制度、象征符号以及实际物体等，当其或多或少体现出原创性、神圣感召力等超凡特征时，都可以说具有卡里斯马精神品质，因为它们能够与那主宰一切的产生秩序的神圣权力之源相接触”。如果想理解得更透彻，详见：王一川. 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的修辞论阐释[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参考文献

知侠作品及其他作家作品:

- [1]知侠.老洪飞车搞机枪[J].解放军文艺,1953,7.
- [2]知侠.列车上的战斗[J].解放军文艺,1953,7.
- [3]知侠.铁道游击队[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
- [4]知侠.铁道游击队(普及本)[M].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5.
- [5]知侠.铁道游击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6]知侠.铁道游击队(收获创作丛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 [7]知侠.铁道游击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5.
- [8]知侠.铁道游击队[M].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1977.
- [9]知侠.铁道游击队[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78.
- [10]知侠.铁道游击队(中华之魂丛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62.
- [11]知侠.铁道游击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2]知侠.铁道游击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13]知侠.铁道游击队[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4]知侠.山东三十年电影文学剧本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
- [15]知侠原著.打岗村:“铁道游击队”里的故事[M].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
- [16]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 [17]知侠.知侠文集(1-4)[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
- [18]梁斌.红旗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9]金敬迈.欧阳海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
- [20]曲波.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铁道游击队》连环画作品

- [1]*.《铁道游击队》(一)血洗洋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 [2]*.《铁道游击队》(二)飞车夺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 [3]*.《铁道游击队》(三)夜袭临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 [4]*.《铁道游击队》(四)杨集除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 [5]*.《铁道游击队》(五)巧打岗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 [6]*.《铁道游击队》(六)苗庄血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 [7]*.《铁道游击队》(七)两雄遇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 [8]*.《铁道游击队》(八)湖上神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 [9]*.《铁道游击队》(九)三路出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 [10]*.《铁道游击队》(十)胜利路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 [11]*.《铁道游击队》.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
- [12]孙韵清改编.铁道游击队(电影连环画册).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
- [13]知侠原作、萧红叶萧文采画.铁道游击队.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

铁道游击队队员及当事人口述资料（按创作者排序）：

- [1]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苏鲁支队[M]. 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 [2]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鲁南铁道大队纪实[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 [3]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 枣庄革命历史图片集[M].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①
- [4]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 鲁南峰影(上册)[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9
- [5]童邱龙. 运河支队抗日史话[M].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 1988
-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枣庄市中区文史第1辑[M], 1991
- [7]中共薛城区党委研究室编撰. 铁道游击队队史[M]. 中国文献出版社, 2005
- [8]政协枣庄市薛城区委员会编. 铁道游击队在薛城[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 [9]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微山党史资料第四辑[M], 1986
- [10]济南铁路总工会工运史编写组. 济南铁路工运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M], 1985:109
- [11]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淄博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合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M], 1985
- [12]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文史集粹·革命斗争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13]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山东史志资料 一九八五年第二辑(总第9辑)[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 [14]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 星火燎原选编之五[M]. 战士出版社, 1981
- [1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团旗为什么这样红[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1
-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八路军回忆史料(2)[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 [17]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 民族英雄与日月争辉[M].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59
- [18]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北京青年报编. 我的见证[M].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 [19]文思编. 铁道游击队传奇[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 [20]王兆虎. 铁道游击队真实档案[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
- [21]陈慈林整理赵明伟口述. “飞虎队传奇”[N]. 杭州日报, 2009年9(23)
- [22]高扩. “抓煤老道”变身抗日英豪 档案还原真实的铁道游击队[N]. 齐鲁晚报, 2014, 09(09)
- [23]山东省档案馆馆藏 G028-01-0037-003 号杜季伟口述资料

理论专著（按国内外排序）：

- [1] 毛泽东. 毛泽东论文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6, 1~114.
- [2]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7:87.
- [3]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418.
- [4] 周扬. 周扬文集第1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259.
- [5] 周扬. 周扬文集第2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240.
- [6] 邵荃麟. 文学十年[M]. 作家出版社, 1960:210.
- [7] 侯惠勤.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537.
- [8] 戴锦华. 隐性书写[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1~283.
- [9] 陈思和.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30~63.

- [10]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1~445.
- [11] 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1~62.
- [12] 唐小兵.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1~263.
- [13] 王一川. 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1~324.
- [14] 王昕. 在历史与艺术之间: 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文化诗学研究[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 1~289.
- [15] 杨远婴. 电影理论读本[M].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2, 1~624.
- [16] 汪民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1~528.
- [17] 张凤铸. 中国电视文艺学[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 1~637.
- [18] 李茂民. 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197.
- [19] 李茂民. 在激进与保守之间[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297.
- [20] 杨厚均. 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1~305.
- [21] 余岱宗. 被规训的激情——论 1950、1960 年代的红色小说[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 [22] 周春霞.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 30~220.
- [23] 於曼. 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视剧[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 30~220.
- [24] 钱振文.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277.
- [25] 姚丹. “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279.
- [26] 唐明生. 跨越世纪的美丽: 秦怡传[M].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1-284 .
- [27] 赵明. 剧影浮沉录[M]. 北京: 文津出版社, 1991: 146.
- [28] 湖北省图书馆编. 批判毒草小说文选[M], 1971: 234.
- [29] 王晓升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423.
- [30] 高建平丁国旗. 西方文论经典 (第六卷) 后现代与文化研究[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 [31] 凌新. 阿尔都塞后期哲学思想研究 (译者) [M].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1~215.
- [32] [澳大利亚] 约翰·多克尔 (John Docker) (王敬慧, 王瑶译). 后现代与大众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68~335.
- [33]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 [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2003.
- [34] [法]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 (谢强、马月译) [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98.
- [35] [法] 米歇尔·福柯. 性史 (张廷深等译)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9.
- [36] [法] 波伏娃. 第二性[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
- [37] [美] 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唐小兵译)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38]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文化转向 (胡亚敏等译)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39] [美] 约翰·菲斯克. 电视文化 (祁阿红, 张鲲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40] 维特根斯坦 (陈嘉映译). 哲学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13.
- [41] [英] 苏珊海·沃德 (邹赞等译). 电影研究关键词[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学术论文:

- [1] 马立新. 红色理性与革命战争文学[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4.
- [2] 龚奎林. “故事”的多重讲述与大众化文艺[D]. 郑州: 河南大学, 2009.
- [3] 孙士生. 小说《红嫂》以及跨媒介传播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2.
- [4] 孙虹利. 新世纪大陆电视剧与革命叙事[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 [5] 郭建敏. 革命·历史·叙事[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5.
- [6] 余燕芝. 《小兵张嘎》: 一个“红色经典”的改编与传播[D]. 广州: 暨南大学, 2010.
- [7] 史春晖. 中国历史戏说剧的意识形态表达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 [8] 韩颖琦.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红色经典”化. 苏州: 苏州大学: 2008.

报纸期刊(按发表日期排序):

人民日报(1954-2004)

大众日报(1954-2015)

读书(1955-1960)

- [1] 巴人. 论人情[J]. 新港, 1957, (1): 8.
- [2] 钱谷融. 论“文学是人学”[J]. 文艺月报, 1957, 5: 12.
- [3] 施殿华. 别具神韵 各有千秋——《飞虎队》与《铁道游击队》对比谈[J]. 电影评介, 1996, 5: 32.
- [4] 申洪涛. 艺术分寸严重失衡——《飞虎队》人物形象诤议[J]. 电影评介, 1996, 5: 32.
- [5] 洪流. 《飞虎队》得失谈——兼与电影《铁道游击队》比较[J]. 写作, 1997, 02: 24~26.
- [6] 李运传. 中国当代小说五十年文化思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1(4).
- [7] 朱晓进.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从30年代文学谈起[J]. 文艺争鸣, 2002(2).
- [8] 李扬. 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理论与拉康[J]. 学习与探索, 2002, 4: 1~5.
- [9] 刘澍. 秦怡一辉煌于银幕挣扎在婚姻. 大众电影[J], 2003, (1).
- [10] 刘康. 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J]. 中国比较文学, 2003(1).
- [11] 程倩. 十七年军旅长篇小说美学特征分析[J].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04(2)
- [12] 马立新. 红色理性与主题意蕴[J]. 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3)
- [13] 赵楠楠. 新《铁道游击队》武侠味重[N]. 京华时报, 2005, 9(03): 25.
- [14] 竹马. 铁道游击队[J]. 现代语文《文学评论版》, 2005, (11).
- [15] 陈冲. 杂谈“红色经典”[J]. 文学自由谈, 2004(4): 13—21.
- [16] 熊文泉. “红色经典”艺术生产的内在机理分析——以作品《林海雪原》的生成、改编为例[J]. 当代电影, 2004(6).
- [17] 侯洪、张斌. “红色经典”: 界说、改编及传播[J]. 当代电影, 2004(6).
- [18] 陆绍阳、张岚. “红色经典”改编的背后[J]. 中国电视, 2004(9).
- [19] 彭文祥. 电视剧改编“红色经典”的新思维和新尝试) 电视剧《小兵张嘎》的叙事特色[J]. 中国电视, 2004(11): 24—25.
- [20] 张希. 电视剧《小兵张嘎》的叙事策略[J]. 中国电视, 2004(11).
- [21] 田义贵. 试论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J]. 北方论丛, 2005(3).
- [22] 张法. “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读解[J]. 文艺研究, 2005(4).
- [23] 阎浩岗. 从文学角度看“红色经典”[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
- [24] 刘玉凯. “红色经典”与时代精神[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
- [25] 周星. 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抗战影视剧创作反思[J]. 文艺争鸣, 2006, 1: 116~120.
- [26] 王凤才. 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辨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 3: 34~42.

- [27] 龚金平.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J]. 兰州学刊, 2007, 11.
- [28] 李茂民, 孟丽花. 意识形态及其在影视剧中的言说方式[J]. 影视镜像, 2009, 196.
- [29] 蔡翔. 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J]. 文艺争鸣, 2010, 8:37~61.
- [30] 尹姝红. 顺应与重构:浅析历史题材电视剧叙事特点及成因[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 8:176~178.
- [31] 陈斌. 抗日神剧, 一个扭曲的艺术符号[J]. 声屏世界, 2013, 9:17~19.
- [32] 韩松. 抗日“神剧”的神话何时终结?——兼谈电视剧评价体系的建设[J]. 视听界, 2013, 02: 44~47.
- [33] 薛晋文. 论电视剧创作的问题及突围方向[J]. 现代传播, 2013, 02: 145~146.
- [34] 路春艳. 粗鄙时代的影像狂欢[J]. 当代电影, 2013, 02: 42~44.
- [35] 贺雅佳. 秦怡: 拍片捂出的痍子, 长了一辈子. 新快报[N], 2011, 05 (20).

《铁道游击队》影像资料:

1956 版电影《铁道游击队》

出品公司: 上海电影制片厂

导 演: 赵 明

编 剧: 刘知侠

摄 影: 冯四知

美 术: 张汉臣

作 曲: 吕其明

录 音: 陆伯仲

片 长: 85 分钟 9 本

色 彩: 黑白

主要演员:

曹会渠(饰刘洪)

秦怡(饰芳林嫂)

冯喆(饰李正)

冯奇(饰王强)

冯笑(饰小坡)

邓楠(饰鲁汉)

仲星火(彭亮)

陈述(冈村)

1985 版电视剧《铁道游击队》

出品公司: 上海电影制片厂

艺术顾问: 张俊祥

编 剧: 师征、刘泉

总 导 演: 高正

导 演: 冯笑、张弘

摄 像: 黄葆华、周福兴

作 曲: 吕其明

集 数: 12 集

色 彩: 彩色

主要演员:

张甲田(饰刘洪)

王国强(饰王强)

张学浩(饰李正)

杨鸣健(饰彭亮)

牛娜(饰芳林嫂)

薛国平(饰小坡)

1995 版电影《飞虎队》

出品人：郑全刚、吴宝文、向华强

制片人：石兆琪、周军

导演：王冀邢

编剧：梁沪生、胡建新、王冀邢

摄影：王小列、罗逊

作曲：赵季平

片长：96 分钟

色彩：彩色

主要演员：

刘威(饰刘洪)

李雪健(饰王强)

李强(饰李正)

陈小艺(饰嫂子)

张丰毅(饰李九)

王志文(饰张兰)

赵小锐(饰鲁汉)

曹蓬(饰林忠)

常戎(饰彭亮)

雷汉(饰小坡)

李幼斌(饰秦雄)

潘长江(饰黄二)

袁莉(饰小青)

赵宝刚(饰赵老板)

石兆琪(饰岗村)

吕凉(饰松尾)

刘金山(饰金三)

2005 版电视剧《铁道游击队》

出品公司：山东省辉煌世纪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出品人：王汉平

总导演：王新民

导演：陈咏歌

文学顾问：刘真骅

总编剧：李世明

编剧：李世明、胡燕怀、于峰、吴作望

集数：35 集

色彩：彩色

主要演员：

赵恒煊(饰刘洪)

张立(饰王强)

刘长纯(饰李正)

史兰芽(饰芳林嫂)

张亚坤(饰彭亮)

韩福利(饰鲁汉)

2011 版电视剧《铁道游击队》

出品公司：山东电视台影视频道

导演：王新民

编剧：胡燕怀

集数：36 集

色彩：彩色

主要演员：

赵恒煊(饰刘洪)

史兰芽(饰芳林嫂)

刘长纯(饰李正)

山东京剧院排演现代京剧《铁道游击队》

文学顾问：刘真骅

出品人：焦体怡

编剧：李应该 王新生（执笔）

导演：谢平安 白云明

唱腔设计：续正泰

音乐设计：于建民

舞美设计：刘杏林

灯光设计：周正平 王庆江

主要演员：

刘洪——宋昌林

芳林嫂——段晓羚 杨洋

冈村——郑少华

李正——刘建杰

鲁汉——靳志永

王强——逢焕亮

小坡——杨亚朋

黄二——刘桂华

2010年总政歌舞团编排舞剧《铁道游击队》

艺术总监：彭丽媛

音乐总监：赵季平

舞美剧本：赵大鸣

总编导：杨笑阳

作曲：赵麟

主要演员：

刘洪——邱辉 朱峰

芳林嫂——山翀 柴明明 国雅琦 姚若然

小坡——覃江巍 李志

梅妮——苗苗 陈雅斓

王强——唐黎维 耿剑

彭亮——苏鹏 李雷

李正——李志 谷亮亮

鲁汉——朱峰 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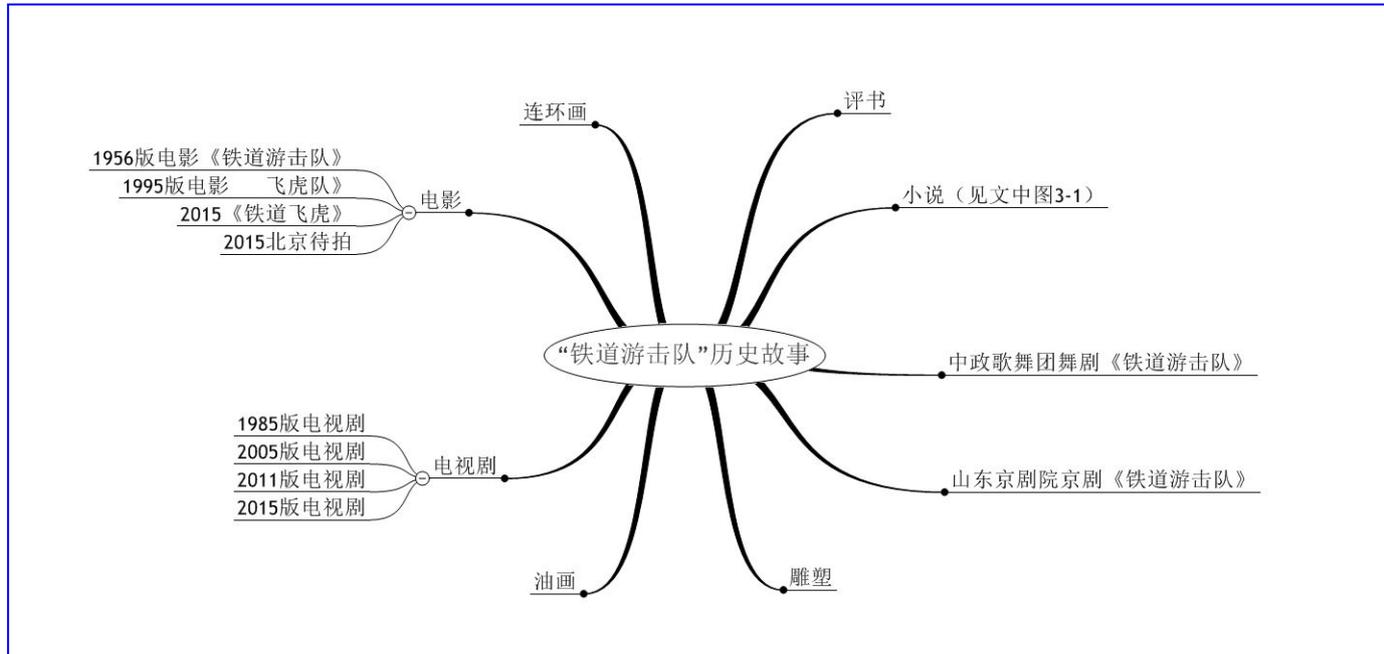
解密影像见附录四

网络恶搞：

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

铁道游击队之春运大战

附录一 《铁道游击队》家族谱系



附录二 《铁道游击队》小说研究史料

序号	文章名称	作者	出处	时间	资料来源
1	铁道游击队	纹	文汇报	1954.04.02	《现代重要作家、作品评论研究文章目录索引》
2	“铁道游击队”读后	南波	解放日报	1954.04.28	
3	“铁道游击队”写作经过	知侠	文汇报	1954.05.21	
4	读“铁道游击队”	林静	文汇报	1954.05.21	
5	平凡的人们创造奇迹 ——介绍小说“铁道游击队”	马云杰	新民报晚刊	1954.05.03	
6	有关“铁道游击队”的二三事 ——答青年记者的信之一		青年报	1954.06.01	
7	抗日战争中的一支神兵 ——读知侠著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	舒晴	中国青年报	1954.08.28	
8	读“铁道游击队”	姜立四	新民报晚刊	1954.09.20	
9	关于“铁道游击队”	知侠	中国青年报	1955.02.10	
10	写了“铁道游击队”之后 ——访作者知侠	马蓝	新民报晚刊	1956.06.04	
11	谈影片“铁道游击队”	朱青	北京日报	1957.04.02	
12	读“铁道游击队”	叶朗	文艺月报	1954.05期	
13	“铁道游击队”	招明			
14	华东作协谈“铁道游击队”	民			
15	读“铁道游击队”	吕哲	文艺报	1954.05期	

《铁道游击队》小说研究史料

序号	文章名称	作者	出处	时间	资料来源
16	我怎样写“铁道游击队”的	知侠	读书月报	1954.03期	
17	谈谈“铁道游击队”改编	王云缙	大众电影	1957年08月期	
18	几点说明——写在“铁道游击队”上映以后	赵明	大众电影	1957年08月期	
19	《铁道游击队》研讨会发言记录		华东作家	1954.02期	《中国现代当代作家文学研究论文索引》
20	各报刊关于《铁道游击队》的评论		文艺书刊	1954.10期	
21	访“刘洪”	谢光宁	解放日报	1957.04.08	
22	试论知侠的军师题材短篇小说	任孚先	柳泉	1982.04期	
23	刘知侠小传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修订本)	1961年出版 大众日报印刷厂	
24	发扬革命朝气、坚定深入生活	刘知侠	文汇报	1958.01.07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评论资料索引》
25	铁道线上的英雄	黄屏	文汇报	1961.11.20	
26	关于《铁道游击队》的讨论	刘知侠	华东作家	1954.02号	
27	济南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影片《铁道游击队》	大众日报		1957.05.09	
28	铁路线上的鏖战——从电影《铁道游击队》的终场谈起	鲁忠	北京日报	1960.11.11	
29	我对《铁道游击队》的几点意见	王西彦	百花文艺出版社 《从播种到收获》	1959年出版	

《铁道游击队》小说研究史料

序号	文章名称	作者	出处	时间	资料来源
30	《铁道游击队》的初稿和修改	邢乃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年出版	

《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研究史料

1	小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	杨子敏	人民日报	1959. 04. 18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评论资料索引》
2	一片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儿童作品——读《小铁道游击队》	陈伯吹	文学书藉评论丛刊	1959. 02月	
3	读《小铁道游击队》	陈伯吹	长江文艺出版社 《儿童文学简论》	1959年出版	

以上资料是一下几本书索引资料的汇总版本:

- 1、《现代重要作家、作品评论研究文章目录索引》
- 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二》
- 3、《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评论资料索引》
- 4、《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山东师范学院)
- 5、《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
- 6、《作家谈创作》上册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1978年12月
- 7、《文艺资料索引》第二辑 (1955) 兰州大学图书馆
- 8、《文艺资料索引》第一辑 (1949--1955) 兰州大学图书馆

附录三 《铁道游击队》小说各版本印数情况

中国版本图书馆提供自 1954. 1—1990. 10

《铁道游击队》一书的印数

新文艺出版社	(平)	54. 1—58. 6(年)	印 12 次	共 231130 册
新文艺出版社	(普及本)	54. 8—58. 7	印 12 次	共 325060 册
新文艺出版社	(精)	55. 10—58. 4	印 4 次	共 19120 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平)	59. 5—62. 10	印 5 次	共 152000 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收获创作	62. 2—63. 2	印 2 次	共 80000 册
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	(平)	65. 4—65. 5	印 2 次	共 103000 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平)	66. 1—66. 5	印 2 次	共 65000 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精)	58. 9	印 1 次	共 2000 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平)	59. 11—62. 5	印 2 次	共 22000 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平)	78. 3—90. 4	印 6 次	共 573000 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平)	77. 9—88. 6	印 5 次	共 555400 册
历年各地租型		61—81	印 7 次	共 420000 册

至 1990. 4 共计发行 2547610 册

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 吴提供

备注：这张清单是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一份卖家自称是知侠统计的《铁道游击队》小说的印数清单，虽然该清单是否是知侠亲笔书写还不确定，但经过考证印数还是也有些可靠性，我把此放在本附录中。

附录四 《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出版和印刷情况

(截止到 1990 年 11 月)

编号	书名	印次(次)	印数(册)
1	血染洋行	17	3325530
2	飞车夺枪	13	3325530
3	夜袭临城	36	3997530
4	杨集除奸	34	3989530
5	巧打岗村	32	3956530
6	苗庄血战	30	3886530
7	两雄遇难	25	3802000
8	湖上骑兵	25	3782530
9	三路出击	19	3495530
10	胜利路上	13	3155300
合计			36716540
总印数:	叁仟陆佰柒拾壹万陆仟伍佰肆拾		

备注：这是根据连环画版权页一本本摘录总结的，是真实可信的。

附录五 《铁道游击队》史实、解密类电视节目

栏目名称	制作方	节目名称	观看的网址	备注
《电影经典》	央视*崔永元	《电影传奇 微山湖上》	http://www.56.com/u12/v_NTU2MTA3MjE.html	
《新电影经典》		《新电影传奇：铁道游击队》	http://video.sina.com.cn/m/jlplx1_61496879.html 或者 http://www.iqiyi.com/jilupian/20120221/8e636358eae923ce.html	
《金声玉振之电影传奇》	山东卫视	《铁道游击队》山东枣庄寻主角 探寻“芳林嫂”不为人知的秘密 20140911	http://v.qq.com/cover/i/i7yxhjk5foi5k6/e0015bvjmcm.html	
《档案》	北京卫视	铁道游击队传奇20110624	http://www.letv.com/ptv/vplay/1256234.html	
《经典传奇》	江西卫视	揭秘真实的铁道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20150204	http://www.letv.com/ptv/vplay/21877565.html	
《大揭秘》	湖北卫视	红色经典之《铁道游击队》20150227	http://v.ifeng.com/history/lishijiemi/201502/01595ecc-c165-420b-b05f-77b0d28f28dd.shtml	
《非常解密》	**都市	20121108铁道游击队威震临城1集和 20121109铁道游击队威震临城2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1BuYHhoIukg/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O_ouv5L3mH8/	
《经典电影》	重庆卫视	《铁道游击队》火车来了20110122	http://dianying.cntv.cn/C25836/classpage/video/20110123/100619.shtml	
《胜利日特别节目》	央视	近2000名日军向不足100名的铁道游击队投降	http://v.ifeng.com/history/zhanshichuanqi/201409/01c32d99-82af-484f-9fb4-9c24017f9ab0.shtml	
	凤凰网	抗日组织铁道游击队被改编小说事迹传遍全国	http://v.ifeng.com/culture/201101/3da7d21e-d0a8-4ea0-919e-882ebbb42963.shtml	

说明：网址提取时间2016年4月1号

附录六 上海文艺出版社“收获创作丛书”书目

书名	作者	出版时间
谁是奇迹的创造者	胡万春	1958
姜海劈闸	钟铨	195810
监狱里的斗争	茅理	196304
禾场上	周立波 (顾炳鑫彩色插图)	196208
雪白的哈达	张永枚	1962
聂耳	于伶 孟波 郑君里	195909
铁窗烈火	阿藪	1959
红色堡垒	中共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委员会厂史办公室 编	196108
走向胜利	周洁夫	1962
新疆兄弟民族小说选	《天山》文学月刊编辑部编	196002
林则徐	叶元	196201
铁道游击队	知侠	1962
枯木逢春	王炼	196005
金桥	柯岗	195901

备注：关于“收获创作丛书”的文献太少了，我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寻找这个书系的出版背景、出版书目都未果，最后在“孔夫子旧书网”的卖家书目中，搜集到一部分，这是一份不全的书目。

附录七 山东卫视《铁道游击队》电视解密文字实录

山东卫视《金声玉振之电影传奇》20140911期
《铁道游击队》山东枣庄寻主角 探寻“芳林嫂”不为人知的秘密

人物介绍

A: 董 姝, 主持人, 山东电视台卫视频道记者

B: 王金国, 王志胜之子, (王志胜是小说《铁道游击队》里王强的原型)

C: 张岱南: 原薛城区档案馆馆员, 在此工作了几十年

D: 刘圣才, 刘桂清之孙, (刘桂清是小说《铁道游击队》中芳林嫂的原型之一)

A: 王老师, 我们想问一下《铁道游击队》里面芳林嫂, 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啊?

B: 一个是郝贞, 女人都裹脚, 她没有裹脚, 所以依着她对象姓, 喊她“大脚老时”, 电影小说当中, 那个扔手榴弹没拉线的就是她。

(旁白: 他叫王金国, 他的父亲叫王志胜, 是电影里王强的原型, 说起芳林嫂, 他告诉我们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A: 电影中的这个芳林嫂是有闺女的, 那现实中的时大脚, 时大嫂有后人吗?

B: 后来解放以后, 郝贞一直在我们薛城区, 她有一个女儿, 后来到了 50 年代支援边疆建设的时候, 她响应党的号召将女儿送到了北大荒去了。

(旁白: 电影里的芳林嫂与刘洪有一段爱情, 那真实的郝贞与洪志海之间, 是否也有一段感情呢?)

B: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洪振海带着铁道游击队的人到薛城来, 住在六炉店的时候, 洪振海刚结婚。

旁白: 第二位女人是谁? 他们又有哪些故事呢?

B: 我确实不大了解。我只知道她叫黄学英, “大老殷”的原名就是黄学英, 听我父亲说过, 她为了搞情报, 批发了人家的油条, 在薛城火车站附近卖油条。

C: 她对她的村里人都很关心, 在本村的威望也很高。

(对他的采访变得很艰难, 但提到“大老殷”, 这三个字的时候, 老人的眼里重新闪烁起光芒, 一个意想不到的故事开始了。)

C: 大老殷的娘家在古井村, 日本鬼子进城以后, 她 32 岁, 她被吸收为情报人员以后, 以卖油条为职业, 经常到临城收集情报, 1941 年 5 月, 在临城搞情报的时候, 贴传单被特务发现了, 被关进了监狱, 关进监狱以后, 这时候的警务站的特务队长松尾, 进行了审讯, 第二天松尾亲自审讯的时候, 问你的同事是谁? 领导人是谁? 在什么地方? 黄学英一句别的话都没说, 就是不知道。日本人审讯的最后一招, 是绑到杀人场, 松尾觉得是个女的, 没有很大的价值, 就放狼狗去咬她, 狼狗上去三次没咬, 原因就是黄学英 13 天的监狱生活后, 已经骨瘦如柴了, 浑身臭味很重。准备用刺刀刺得时候, 一想她是个女人还是骨瘦如柴了, 刺她也不出血了, 松尾就放了她, 把狼狗牵回去回家了, 把她绑在杀人场, 当地群众就她解下来, 抬到了她娘家古井村, 疗养了三个月, 仍然继续革命。她的革命精神是坚强的。

旁白: 老人一再叮嘱我们, 不能称呼她为“大老殷”, 她有自己名字黄学英。采访的最后张老意外找出当时的一张地图, 从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三位英雄当时生活的村庄, 战争中的位置优势。

A: 张老手上拿的就是一张非常老的薛城的地图, 他告诉我, 三位女英雄住在铁道和微山湖中间, 她们三个人的家住得非常近, 这样我问一下, 张老, 您能不能大概告诉我们一下这三个人的家大概在哪里?

C: 好, 黄学英就在古井村, 郝贞就在六炉店村, 车站南 7 里路, 刘桂清在车站西南 9 里路刘庙, 这个地

方离微山湖较近。

A:张老给我指了一下,她们三个的位置大概就是一个三角形。

C:这三个人的位置就是一个三角形,相离就是5到7里路,这三个人的村庄都离微山湖很近,临城距离微山湖12里路,也很近。

旁白:郝贞和黄学英的后人,已经找不到了,而刘桂清我们很幸运的找到她的一张照片,据说她的后人,有的还住在原来的村子里,我们决定去这个叫刘庙的小村子,看看这位老人曾经经历了什么。



图:三位铁道游击队原型人物所在村庄分布图

A:这里是枣庄薛城区的刘庙村,距离微山湖只有两千米的距离,这个美丽的村庄是当时铁道游击队一个重要的联络地点之一,而这里也是芳林嫂原型之一刘桂清老人的老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刘桂清老人的孙子刘圣才,您好!

D:我父亲弟兄五个,我有四个姑。

A:那您经常回这里吗?

D:经常回来,这是老家啊。这是我奶奶当年住的地方。

A:可是已经没有当年的样子了,对吗?

D:当时这个门就在这,有时候铁道游击队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我奶奶就站在这个门口放哨。当时这里有三间草房子,现在应该变成了平房了,当时就在这个地点开会,很窄,都是土房子茅草屋。

A:最后,刘桂清老人是安葬在哪里呢?

D:我奶奶是85年去世的,去世之后就安葬在济南英雄山烈士灵堂那边,后来到了90年代,99年就迁回来了,埋在我们村后边的一个祖坟上,大约一里地。

A:这个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D:可以可以.....这个就是我奶奶最后安葬的地方,就在那个松树旁边,现在下着雨没法过去了。

A: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老人的坟头有一棵松树,松柏长青。

A:刘桂清老人和铁道游击队这五个字,有着宿命般的联系,1985年老人病危,眼看就要不行了,闻讯赶来的《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含泪为老人喂了几口稀饭,老人看了看刘知侠,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面带微笑的安然与世长辞。

主持人:通过几天的走访,《铁道游击队》几个原型几乎都不识字,但是正是三个不识字的女人,谱写了一篇用文字都写不出来的文章。(完)

附录八 1956 版、1985 版《铁道游击队》创作家简介

秦怡	(1922, 2, 4—)	1956 版《铁道游击队》饰芳林嫂
----	---------------	-------------------

生于上海，1941 年秦怡离开中国电影制片厂，进入中华剧艺社，成为该社演员。在长时间的话剧舞台实践中，秦怡的演技不断进步，在话剧《草木皆兵》、《离离草》、《桃花扇》、《戏剧春秋》、《结婚进行曲》等都有出色的表演，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当时与白杨、舒绣文、张瑞芳一起被称为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1947 年秦怡在上海走上了大银幕，参加了电影《忠义之家》、《母亲》、《无名氏》等片的拍摄。由陈鲤庭编导的《遥远的爱》成为她的成名作。2005 年被授予从事电影工作 50 年以上的老一代电影工作者奖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2007 年被授予上海德艺双馨电影艺术工作者称号。2008 年被授予中国十大女杰称号，2008 年被授予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艺术家。“她曾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女演员奖、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国家有突出贡献艺术家”、第 10 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终身成就奖(金凤凰奖)、第 1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等。”^[1]



《铁道游击队》秦怡剧照



《铁道游击队》曹会渠剧照

曹会渠	(1930, 12, 4—)	1956 版《铁道游击队》刘洪扮演者
-----	----------------	--------------------

原籍山东蓬莱，出生于辽宁丹东。1938 年入安东小学读书。自幼喜爱戏剧和音乐。1945 年后，曾入安东高中学习，并参加学校的乐队和文艺宣传队。1948 年 5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吉军区第五军分区宣传队，后编入第四十九军一六二师宣传队任宣传员。同年底参加辽西战役和解放沈阳的战斗。次年随军进天津，后南下到湖南，任湖南军区衡阳军分区宣传队班长。1956 年，在全国第一届话剧汇演中，饰演话剧《保卫和平》中志愿军英雄崔凯，获三等演员奖。同年应邀在上影拍摄影片《铁道游击队》，成功地塑造了性格粗犷勇敢的大队长刘洪这一银幕形象。又拍摄了《第十个弹孔》、《青山夕照》、《飓风行动》等影片，还拍摄过电视剧《英雄无悔》。2005 年荣获第十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他所塑造的舞台形象和银幕形象均具有质朴深刻、分寸恰当、真切传神等特点，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铁道游击队》饰刘洪。《长空比翼》饰张雷。《蓝色的海湾》饰赵副部长。《青山夕照》饰刘洪。

冯奇	(1924, 1, 21—2015, 4, 13) 享年 91 岁	1956 版《铁道游击队》饰王强
----	-----------------------------------	------------------

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曾扮演的角色亦正亦反，在《两个巡逻兵》《铁道游击队》《舞台姐妹》《长虹号起义》中塑造了解放军干部、游击队员、老艺人、地下党员等正面形象，也曾在《红色娘子军》《阿诗玛》《春苗》等片中成功地扮演反面角色。有人曾问冯奇：“你长得慈眉善目的，怎么在电影里总演坏人呢？”冯奇叹了口气说：“别提了，自从我在一部影片里饰演了一个不务正业的医生后，一上街就有人指着我说‘看，那不是钱济仁吗？’从此，导演就尽让我演反面人物了！”冯奇在 2005 年 8 月，被授予第 10 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荣誉奖”。



《铁道游击队》冯奇剧照

仲星火	(1924, 2, 5—2014, 12, 25) 享年 90 岁	1956 版《铁道游击队》饰彭亮
-----	-----------------------------------	------------------

仲星火 1924 年出生在安徽亳县。本姓赵，1946 年参加革命后改名为“仲星火”。按他的解释，取意为“群众当中的一颗火星，发着自己的光和热”。1946 年来到山东临沂解放区，进入山东大学文艺系。当时山大是一所革命干部学校，仲星火经常到前线 and 农村进行红色宣传演出，演技得到了锻炼。在解放战争胜利炮火声中，年轻的仲星火随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南下，1949 年进驻上海并随文工团一队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仲星火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演员，他是从一名普通百姓走上大银幕的。也许正因为如此，50 前电影《李双双》收获百花奖之际，大作家郭沫若和老舍二先生分别为男女主演者颁奖题词。老舍欣然为仲星火写下了题词：“百花喜旺，星火燎原。”老舍巧妙地把仲星火的名字与他在影片里面扮演的角色融为一体。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一致称赞仲星火是一个适应性很强、戏路很宽的优秀演员。他不仅工农兵、干部、民警、知识分子样样都能演，而且难度很大的喜剧人物、反派角色也同样演得活灵活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电影事业同时也是仲星火演员生涯的黄金时期。1959 年对 36 岁的仲星火来说是最忙碌的一年。这年是共和国十周年大庆。他参与拍摄的《聂耳》、《老兵新传》等影片，有幸入选文化部的共和国十周年 18 部献礼影片，特别是仲星火主演的轻喜剧风格故事片《今天我休息》广受大众好评。仲星火在《今天我休息》中饰演了一位敬业的民警马天民，直到现在人们平常见了仲星火还叫他“老马”。就在 21 世纪初，全国网络联选中国十大民警，马天民形象还是入选其中。马天民因为体贴关爱民众，蜚声影坛，深入人心，成为黄金时代中国银幕上的一位经典普通人物形象。

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评价仲星火说：表演以朴实无华、接地气见长，他既能把小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又能在大局上把控表演尺度，他在主角和配角表演上兼具功力，也因此获得过金鸡、百花奖殊荣。

冯笑	(1932, 12, *—1998, *, *) 享年 69 岁	1956 版《铁道游击队》饰小坡
----	----------------------------------	------------------

冯笑，山东淄博人。1948 年入济南华东大学预科学习。1949 年后在南干纵队文工团、华东革命大学文工团任演员。1952 年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四十多年的演员生涯，创作的主要作品有《鸡毛信》（饰小刘）、《一场风波》（饰小朱）、《为了和平》（饰江思远）、《铁道游击队》（饰小坡）、《幸福》（饰刘传豪）、《春满人间》（饰电台记者）、《红日》（饰李尧）、《北国江南》（饰明新）、《飞向太平洋》（饰摄影记者）、《青山夕照》（饰小坡）等十余部。《为了和平》在苏联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中受到好评。此外，他还在多部话剧中担任主演，并在《龙女》、《蓝光闪过之后》、《开枪为他送行》等影片中作副导演。独立导演了影片《金钱梦》。执导 12 集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以及《征服饥饿的人们》等近十多部。他在《铁道游击队》中扮演的小坡，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印象，尤其在片中演唱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至今在传唱。他不仅演技相当精湛，而且多才多艺。这位富有艺术才华的著名电影人却因长期带病工作，劳累过度，于 1998 年永远告别了人间。



《铁道游击队》仲星火剧照



《铁道游击队》冯笑剧照

陈述	1920, 6, 30—2006, 10, 17 享年 87 岁	1956 版《铁道游击队》饰鬼子松尾
----	----------------------------------	--------------------

原名陈致通，浙江省上虞县人，生于上海。陈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演员，从小喜爱电影，1935 年考入商务印书馆做练习生，工作之余参加中华基督教男青年会少年剧团的活动，曾演出独幕剧《汉奸的子孙》、《放下你的鞭子》。1939 年考进上海邮政管理局，和一些大学生、职业青年在青年会组织了中青剧社演出《狄丝娘》、《大雷雨》、《纪念日》、《吝嗇鬼》、《闺怨》等名剧，后加入中国旅行剧团等七、八个职业剧团，演出《少奶奶的扇子》、《人之初》等四五十部话剧，出场次高达一千五百多场。1948 年任“文华”、“大同”等影片公司特约演员，拍摄了《影迷传》、《彩凤双飞》、《彩车曲》等影片，两年后辞去邮政局工作任专业电影演员，1952 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于 1954 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地扮演了敌情报处长的角色，一举成名。《铁道游击队》中的岗村、《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的黑帮老大。从影以来，陈述先后拍摄了《斩断魔爪》、《为了和平》、《海魂》、《黄浦江的故事》、《林家铺子》、《聂耳》、《难忘的战斗》、《神圣的使命》、《开枪，为他送行》、《爱情啊，你姓什么》、《飞来的女婿》、《蓝盾保险箱》等一系列影片，成为解放后银幕上著名的反派角色，曾获 1949—1955 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个人一等奖。此外，陈述还参加了《新郎之死》、《两家春》、《藏金记》等电视剧的拍摄，并为《钦差大臣》、《第十二夜》等十多部外国电影配音。陈述的戏路较宽，除了演反面角色外，也演过一些正面角色，并着力于创造喜剧人物形象。



《铁道游击队》陈述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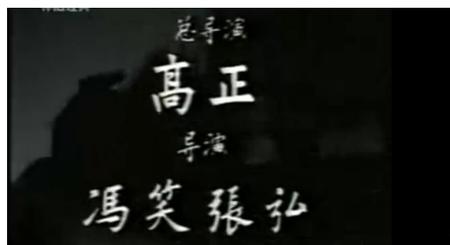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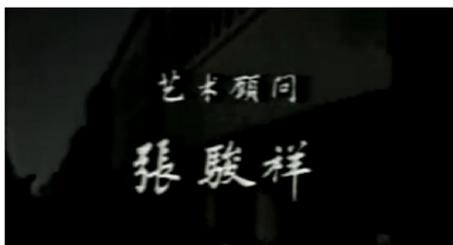
《铁道游击队》冯喆剧照

冯喆	(1920—1969) 享年 49 岁	1956 版《铁道游击队》饰政委李正
----	---------------------	--------------------

原名冯贻喆，原籍广东南海（佛山），生于天津，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级辍学，后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主修大提琴，曾参加美艺、华艺、同茂等文艺团体，先后演出了《家》、《风雪夜归人》、《上海屋檐下》、《大明英烈传》等 40 余部话剧。1946 年入上海国泰影片公司，主演了《裙带风》、《忆江南》等多部影片；1948 年到香港，在《恋爱之道》、《结亲》等影片中扮演各种角色。1950 年回上海，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后调入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在《羊城暗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桃花扇》、《金沙江畔》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冯喆遭受迫害关押，于 1969 年 6 月 2 日不幸离世。冯喆的戏路非常宽广，且人物反差极大，既能演文人，又能演武将；既能演现代革命青年，又能演古代多情公子，可以说是古今纵横，工农商学兵皆有，“性格演员”当之

无愧。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辰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冯喆被国家文化部列为126名“中华影星”之一；2005年，冯喆被评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星”之一。

1985版电视剧总导演是高正，导演是在同名电影中扮演过小坡的著名电影演员冯笑和导演张弘。编剧是师征和刘泉，师征曾经写过《同魔鬼打交道的人》。艺术顾问是曾经拍过《鸡毛信》的电影艺术家张骏祥。



1985 电视剧《铁道游击队》艺术顾问、导演

张骏祥	(1910, 12, 27—1996, 11, 14)	1985 版《铁道游击队》艺术顾问
-----	-----------------------------	-------------------

张骏祥(1910, 12, 27—1996, 11, 14)出生于江苏镇江，其父张立瀛。张骏祥早年对进步文学发生强烈兴趣，并开始发表诗作和翻译小说。1927年入北师大英文系。翌年转入清华大西洋文学系，其间着重西洋学戏剧的研究。张骏祥和曹禺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是同学也是好朋友，都热爱话剧。1936年，他公费留学美国，就读于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专修导演、编剧、布景灯光等多种课目。1939年秋回国，应聘于江安国立剧专，教授导演、舞台美术，并导演了话剧《蜕变》、《以身作则》，创作了《边城故事》、《小城故事》。皖南事变后他参加了中华剧艺社，导演了《边城故事》、《北京人》等剧。1945年到上海，先后在中电一厂、二厂编导了讽刺喜剧片《还乡日记》、《乘龙快婿》。解放后，他深入工农兵，改编了《胜利重逢》、《鸡毛信》、《六十年代第一春》，导演了《翠岗红旗》、《水上人家》、《燎原》、《白求恩大夫》等。他还担任过上影厂副厂长、上海电影局局长。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其妻为著名声乐家周小燕。



张骏祥照片 (照片来源: 好搜百科)



《一江春水向东流》高正饰张忠民

高正	(1922, 4, 27—)	1985 版《铁道游击队》导演
----	-----------------	-----------------

高正(1922, 4, 27—)原名郭震，号雨辰，北京人。1928年随家人迁居哈尔滨。1935年开始话剧表演生涯，曾与王人路、刘国权等人在哈尔滨组织电波剧团。1939年到上海，先后任华声剧团、无名剧团、“中旅”剧团、联艺剧团、中流剧团演员。演出过《岳飞》、《茶花女》、《武松与潘金莲》、《日出》、《原野》、《家》、《钗头凤》、《雷雨》、《生死恋》、《少奶奶的扇子》、《上海屋檐下》、《国民公敌》、《清宫怨》、《梁上君子》等五十多部话剧。1946年入昆仑影业公司任演员，拍摄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武训传》、《人民的巨掌》、《劳动花开》、《纺花曲》等影片。1952年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先后拍摄过《斩断魔爪》、《伟大的起点》、《沙漠里的战斗》、《牧童投军》、《常青树》、《巨浪》、《油船火焰》、《林则徐》、《聂耳》、《今天我休息》、《向海洋》、《激流》等影片。1960年起从事导演工作。

曾导演过《兄妹探宝》、《白求恩大夫》、《平鹰坟》、《蓝光闪过之后》、《开枪，为他送行》、《桔园情》等影片。还导演过《乱世女侠》、《铁道游击队》、《洗冤录》、《鬼城》、《敢死队在前线》、《吝啬姑娘》、《智保钱江桥》、《勇敢者》、《赤光》、《他死谁手》、《烽火千里行》、《秋潮》、《碧血浦江》、《千堆雪九重恩怨》等电视剧。2013年荣获第十四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

电影作品：

1947：《八千里路云和月》（昆仑）饰纨绔子弟周家荣，《一江春水向东流》（昆仑）饰热血青年张忠民。

1948：《万家灯火》（昆仑）饰汽车司机小赵。

1949：《三毛流浪记》（昆仑）饰男宾客。

1950：《武训传》（昆仑）饰士绅郭芬，《人民的巨掌》（昆仑）饰公安侦察员薛家琪。

1959：《林则徐》（海燕）饰道光皇帝，《今天我休息》（海燕）饰哥哥刘其，《聂耳》（海燕）制片主任兼饰音乐家李天音，《向海洋》（海燕）饰海军战士宋大明。

1963：《兄妹探宝》（海燕）导演。

1964：《白求恩大夫》（海燕，八一厂）执行导演。

1982：《开枪，为他送行》（上影）导演。

1985：《铁道游击队》12集连续剧（上影）导演。

附录九 济南“皇宫”照相馆的前世今生

“皇宫”照相馆，济南的老字号，现在尚存，尽管生意大不如前。在济南老商埠区，经三路上，中山公园北门东侧路南。由于我在济南求学，近距离的考察了它。

皇宫照相馆坐落在济南老商埠的经三路路南、纬四路与纬五路之间。其创办人张鸿文，早年给冯玉祥担任司机，后给韩复榘当秘书。皇宫照相馆是当时山东设备最先进、装修最豪华、技术最高超的照相馆，虽然历经多次变革，但始终以先进的设备和高超的技艺享誉省内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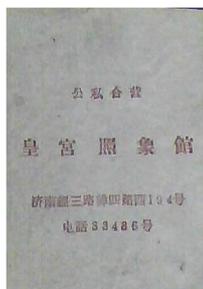
其间，皇宫照相馆于1956年实行了公私合营。1959年用另一处铺面换取了隔壁的二层楼房，即现在皇宫照相馆的东半部分，成了六开间的门面。1966年，皇宫照相馆结束了公私合营，成了国有企业。

文革初期，皇宫照相馆改名为“红艺照相馆”，门面样式也进行了破旧立新。当时，全省只有济南的皇宫照相馆和青岛的天真照相馆被授权洗印领袖像，其他照相馆均不得擅自洗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来济南视察时，都曾在皇宫照相馆拍过照。1987年，皇宫照相馆恢复了原名，后又经过整修，恢复了原来那种古色古香的容貌。

2013年8月27日济南的《都市女报》专门刊登文章《皇宫照相馆：不让照片说谎》来纪念这家耄耋老店。网友对这家的老字号评价也颇高：“服务好、技术好，儿时照相都去那里。其他明湖、良友、人民、友谊等老照相馆都已经找不到了，只有这间老店还存在着”，“家里人全都去那照相，技术一流，要是身份证的照片能让他家老板去照，此生无憾啊。”



1932年的皇宫照相馆



公私合营时期的济南皇宫照相馆相袋



改名为“红艺”的皇宫照相馆相袋

附录十：莫让经典成绝唱

民间艺术平阴渔鼓，经过了几百年，传承到今天，仅仅有一个老者在传唱，他就是渔鼓的 19 代传人朱世年，为了倡议社会公众对这一艺术形式的重视，我和我的团队进行了这次创作：

一、平阴渔鼓历史源流

平阴渔鼓是曲艺的一种类别，流行於山东的平阴及周围的泰安、济宁、菏泽等地。相传始自唐代道教的一种劝善方式，后来演变成历史小说、典故的传播载体。十六世纪成为道情，传入山东。南宋时开始用渔鼓和筒板为伴奏乐器，始称渔鼓。渔鼓，是用一个三尺多长的竹筒(现多用塑料筒)用鱼皮、蟒皮或猪心皮蒙住的一种乐器，表演时可吹、可敲、可拨鼓面，一手拿筒板，音声相配。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唱词基本为七字句。明代王圻《三才图绘》中记载：“渔鼓，长三四尺，以皮冒其首，用两指击之。又有筒子，以竹为之，长二尺许，阔四五分，厚半之，其末略俱外反。歌时用两片合击之以和也。”相传，“八仙”过海时，一条金色鳌鱼在海上兴风作浪，溅湿了汉钟离的衣服。汉钟离心中恼怒，便拔剑斩了鳌鱼，并抽出鱼骨，蒙上鱼皮，制成了一种管状乐器，取名叫“渔鼓”。而另一伴奏乐器筒板，来源于曹国舅的“阴阳板”。13 块阴阳板，两块给了铜匠打锣，两块给了船夫做舢板，两块给了开店的做门扇，最后两块给了说书人。因为这样，以前说书的住店、坐船不用给钱，这是“老规矩”。渔鼓，又叫渔鼓书，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传统曲目多为短篇，也有一些长篇。

二、平阴渔鼓传人朱世年

说起渔鼓，济南平阴的渔鼓最正宗。而今作为渔鼓表演者，它最后的传人便是朱世年。朱世年，平阴县孔村镇郭柳沟村的一位普通农民，12 岁时便自学了渔鼓表演。那时候每逢镇上赶大集，一些渔鼓老艺人便在集上表演，很是热闹，小小的朱世年每次都听得如痴如醉。于是，他回家自己制作了一把“二弦”，然后模仿着老艺人的样子自演自唱起来，竟然也有模有样。1960 年，在他 14 岁时，他已经能说长篇大书《花木兰》，在周围村里也有了点小名气。临村经常请他去表演，每晚 4 元的酬劳，还擀面条、杀鸡来款待他。1964 年，18 岁的朱世年辗转来到了东阿县，继续唱起了他心爱的渔鼓。名声在外的朱世年后来还是被平阴县的有关部门请了回来，参加了县里“上山下乡”曲艺宣传队。期间，他跑遍了平阴的各个村，他说唱的《呼家将》、《杨家将》、《响马转》等长篇大书受到村民们

的热情欢迎，一时间各村的打麦场上人满为患。“文革”期间，朱世年再次遭遇劫难，他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了监狱。就是在监狱里，他也没有放弃渔鼓。“文革”后，平阴一带唱渔鼓的，老的老去了，年轻的彻底放弃了。只有30多岁的朱世年又拿起了渔鼓，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重新唱响了渔鼓。如今的朱世年，忙时在家种种地，守着两个儿子和妻子安稳地生活。只要有演出，他就背上他的行头，又精神焕发地出现在舞台上……

三、民间绝唱

跟渔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朱世年，对渔鼓的感情自不必言表。现在，已入暮年的朱世年最担心的就是这项传唱了一千多年的曲艺将在他手上失传。随着现代文化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再能忍受得住这种寂寞，他曾经收过几个徒弟，后都有始无终。现如今，求徒心切的朱老又把一个颇有表演天赋的同村女孩小程带到了他经常表演的长清区曲艺说唱团，无偿授艺。对于近60岁的朱老而言，不论收徒成功与否，这是他挽救濒临失传的渔鼓曲艺最无奈、也是最实际的行为了。朱老说：“渔鼓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这种声音如同他的歌唱一样，令人震撼。一个看似农民的艺人，凭着一付简板、一只渔鼓那么简单的工具，尽情演绎着古书今世，可就是这样的文化瑰宝，包括皮影，包括杨柳青年画，包括汉绣，包括新疆玛纳斯说唱……，一个个都面临着难觅传人的尴尬，为什么？是因为学习它要忍受寂寞享受清苦？还是因为日新月异的城市乡村不再需要传统曲艺？到了此时，争论谁是谁非已经没有必要，“救，抢救，再抢救……”成了一些老艺术家最急切的呼喊。他们呼吁，他们奔走，就是希望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不是在史书中查找这样一些词汇，就是希望此时的“寂寞渔鼓凭谁诉”，不成为一曲悲壮的千古绝唱。

四、创作历程

经过了上面的前期调研。2014年春节刚过，我和团队成员在一块考虑新学期的创作选题时，就将这个题目作为创作的主题。并于3月15号和3月18号两天跟老朱联系拍摄事宜，经过我们的沟通，4月19号、20号两天我们到了平阴县老朱的家中，进行了这次拍摄。共采集素材12个小时，基本上达成了同步记录和艺术实现的目的。并与5月4号进行了初剪，在剪辑的过程中注重了情节和故事的表达。5月10号作品进行了公映，形成了自己的作品。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刊物年号	刊物期号	开始页数	结束页数	发表类别	完成情况
1	“星跳”节目的冷思考	青年记者	2013	11 中	7	7	中文核心期刊	独立完成
2	《舌尖上的中国 2》“透明性”叙事策略	青年记者	2014	9 月中	73	74	中文核心期刊	独立完成
3	《致富经》美学品格的建构	青年记者	2014	10 月中	57	58	中文核心期刊	独立完成
4	纪实类电视短片故事化叙事机制	戏剧之家	2014	3 月上	138	139	一般期刊	独立完成
5	小细节 大魅力	西江月	2014	1 月中	58	58	一般期刊	独立完成
6	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影视剧创作的现状分析	西部广播电视	2014	8 月上	6	7	一般期刊	独立完成
7	人性的碰撞与弥合	金田	2014	7 月	159	160	一般期刊	独立完成
8	大数据时代影视剧创作之反思	戏剧之家	2014	9 月上	153	153	一般期刊	独立完成
9	大数据视域下的国产影视剧创作	戏剧之家	2014	9 月下	98	99	一般期刊	独立完成
10	大数据：改变生活方式的新动力	现代视听	2014	9	25	28	一般期刊	独立完成
11	金属外壳笼罩下的柔弱内心	西江月	2014	2 月中	93	94	一般期刊	独立完成
12	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成规	戏剧之家	2014	10 月上	251	252	一般期刊	独立完成
13	反腐题材电视剧要反什么“腐”	戏剧之家	2014	10 月上	250	252	一般期刊	独立完成
14	影视研究的新视角	山东教育报	2014	5 月 12 日			报纸	独立完成
15	艺考≠易考——影视编导高考培训现状及思考	山东教育	2014				增刊	独立完成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成果名称	获奖日期	排名	成果级别	获奖情况
第九届全国新闻学子优秀论文评奖三等奖	2014/3/10	1	省部级成果	三等奖
2014年第三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奖	2014/7/21	1	校厅级成果	优秀论文
“我的中国梦·最美中国”全国大学生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微电影特训营	2014/7/18	1	国内外会议	优秀奖
数字传媒产品的整合研究及系统开发 课题 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2012-2014		省部级	参与

致谢

当窗外沙哑而忧伤的离别情歌每晚准时唱响时；当实验室内焦灼而忧虑的气息日渐浓烈时；当楼下文印社盼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时，这都预示着该论文的写作接近尾声，也预示着年年相似的毕业大戏已经拉开帷幕，只是今年的主角多了我。

三年的学习时光过的真快，三年前的复试、开学第一课仿佛就在昨天；当初我誓把图书馆 I 和 J 开头的专业图书读个遍，也只能留下些许遗憾；当初我下决心要发表几篇高水平文章，但距离 C 刊要求好像还很远。师大三年，一千余天，有各种快乐和收获，也有各种感慨和遗憾。这篇论文就是各种复杂心情综合体。论文的题目是导师无偿馈赠的，“本来就是一个好题目”，如何能够把她做好，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我决心花费大气力来完成。我自费去鲁南地区沿着知侠当年采访时的路线花了几天时间走了一趟，感受作家的写作心境。我在校图书馆特藏和过刊库呆了整整一个月阅遍所有相关库藏；多次探访省图书馆、驻济高校图书馆和省档案馆查找各类图书报刊档案资料；动员北京、上海和杭州的同学到各大图书馆去寻找小说的版本；我购买了市面上流通的各类《铁道游击队》小说版本，买齐了各类《铁道游击队》影视资料，这一过程颇费周折，并对获取的资料逐一阅读。这么多资料如何整合利用，才能条理清晰逻辑分明，我陷入了迷茫之中，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突破。在 2014 年 11 月我开始了正式的写作，日进两千字，经过三个月每天五小时雷打不动的写作，这篇 18 万字的论文才得以完成。这份毕业答卷虽不尽完美，但我可以欣慰地说，我无遗余力试图做到最好。在研究《铁道游击队》的过程中，我自身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提高，那就是：在逆境中不气馁，在顺境中不张扬；事不避难，义不免责。

我能有些许进步当然要感谢我的校内导师李茂民先生，是他把我这样一个苦苦徘徊于学术大门口的流浪者领入学术殿堂，让我体悟到多读书勤学问的幸福。他广博的学识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的道德文章同样是我学习的楷模。每每在我生活中学习中有疑问时他总能巧妙地帮我解答，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还要感谢我的校外导师杨永军主任编辑，杨先生本职工作那么忙，但每每学术上有问题，杨老师总是在第一时间给我回复，并给出最给力的解决方案。

感谢马池珠院长在入学考试时能录取我，在为人为学诸方面给予我教诲和指引，我将终生铭记。感谢雷淑萍老师、马立新老师、付庆军老师、张冠文老师、王宏老师、白传之老师、苗元华老师、郑德梅老师和王虎老师在学术上对我的帮助。同时还要感谢牛绍明老师、刘阳老师和李群老师为我提供的行政保障，他们细致入微的工作令我敬佩。

感谢我的同门们，三年间我结识了五届同门（2013、2014、2015、2016 和 2017 届），在每月 N 次的“导师圆桌会议”上，我们各抒己见，谈理想议学术论江湖吐烦恼，那往往是智慧的碰撞，思想的启迪，大家每每意犹未尽讨论到很晚。这之于我将成为过去，但想必是最欢快的时光。

感谢我的 2012 广电班的同学们，两个专业每个专业 13 人，这是一个 2*13 的集体，但这是一个不二的集体，这是一个奋进的团结的争先的创优的集体。感谢集体中每一个成员对我的包容和帮助。

感谢我的家人，正是有了你们全力支持我才能够安然潜心读书三年。

感谢所有默默关心我的人，我来师大只渴望得到一缕春风，而你们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正如公元前 47 年，凯撒大帝在战争中大获全胜，他在给友人报捷时只用了 3 个单词：“Veni! Vidi! Vici!”（我来！我看！我征服！）。我一介书生，没有凯撒的抱负和雄心，但在 2062 年后的今天，站在 SDNU 的校园，我可以骄傲地说：“I Came, I See, And I will love...”